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Yenching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Series
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如何做田野笔记

〔美〕罗伯特·埃默森 雷切尔·弗雷兹 琳达·肖 著 符裕 何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近几年，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强调写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民族志写作的起点和基础是研究者的田野笔记。那么，如何做田野笔记呢？

为此，三位具有丰富田野实践和教学经验的人类学家，给出了一系列实用而又指导性的建议。本书通过大量正在撰写的、“未完成的”田野笔记实例，考察了田野研究者如何将亲身经历和观察写成田野笔记的过程，讨论如何运用田野笔记来讲述民族志故事的方法，以及帮助研究者基于田野笔记撰写民族志的关键步骤。

本书致力于提出一套实用的田野笔记写作指导，以帮助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口述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因为田野研究和人类学方法在以上学科中都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政治学、商业管理、传播、社会福利及公共卫生等学科，田野研究和民族志也可以作为次一级的辅助研究方法。

上架建议：人类学、社会学

ISBN 978-7-5327-5665-0



9 787532 756650 >

定价：3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责任编辑 / 张吉人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 / www.yiwen.com.cn





詹姆斯·弗雷泽《人类学田野笔记》
——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如何做田野笔记

〔美〕罗伯特·埃默森 雷切尔·弗雷兹 琳达·肖 著
符裕 何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做田野笔记/(美)埃默森(Emerson, R.),
(美)弗雷兹(Fretz, R.), (美)肖(Shaw, L.)著;符
裕,何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4

书名原文: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ISBN 978 - 7 - 5327 - 5665 - 0

I. ①如… II. ①埃…②弗…③肖…④符…⑤何…

III. ①文化人类学—调查研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8960号

Robert M. Emerson Rachel I. Fretz Linda L. Shaw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1995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 - 2010 - 410号

如何做田野笔记

[美]罗伯特·埃默森 雷切尔·弗雷兹 琳达·肖/著 符裕 何珉/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200册

ISBN 978 - 7 - 5327 - 5665 - 0/C · 047

定价:3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4742977

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

Harvard—Fuda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主 编 张乐天 潘天舒

顾 问 Arthur Kleinman (凯博文) James Watson (华 琛)

Rubie Watson (华如璧) Theodore Bestor (贝斯特)

总序

过去的几十年,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中国读者能领略到在人类学理论、研究方法、实证发现和应用实践方面的最新成果,正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这场具有深刻而持续影响力的变革。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们的近期研究,是对当代人类学动向的极好阐释。这套丛书,第一次使得中国的教授、学生和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能接触到这些研究作品。目前,国际人类学界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就是其关注对象正转向当代的主要社会和地区,如中国、日本、欧洲各国和美国等等。而另一重要趋势,是作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分支的医学人类学,正逐渐占据日益显著的中心地位。这一动向显示,人类学家正在转而研究影响当代各共同体的重点社会问题,并开始表达出努力转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使之能为政策辩论、项目实施和一般传媒所用的意愿。丛书中的部分作品也使我们看到,医学人类学已经成为一方联结社会和人文科学,另一方联结健康和政策科学间的“桥梁”。用跨越不同社会空间的“桥梁”来比喻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间的关系,尤其是新近创立的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我们相信,包括华琛(James L Watson)、华如璧(Rubie Watson)、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贝斯特(Theodore Bestor)及本人在内的哈佛人类学家,在比较文化和社会研究方面所做的田

野实践和理论探索,将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国际化和专业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这套丛书将有助于全面矫正人类学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眼中的形象和面貌。它不仅是对哈佛人类学研究的一次展示,更重要的,是向读者推荐一些在人类学界内外已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思想和新看法,如文化亲熟说、地方性的道德世界、社会的疾痛体验、生命文化过程等等。这套书,还展示了都市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以及行政机构的田野考察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将展示人类学方法在精神医学领域,包括像政治性创伤、医学伦理及医学人文等方面的最新应用和研究。我们希望通过齐心协力,能在中国创造出全新的人类学领域,同时,鼓舞中国的同仁们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探索和发现,奉献出激动人心的成果。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及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

Arthur Kleinman(凯博文)

2007年10月24日

前言

近几年,很多民族志研究者都曾经强调写作在他们这一行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格尔兹(Geertz 1973)提出“深度录写”(inscription)是民族志“深描”的核心,而加斯菲尔德(Gusfield 1976)对科学的修辞基础做出了剖析。之后,克利福德(Clifford)和马库斯(Marcus)共同编写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1986)、范·马南(Van Maanen)所写的《田野的故事》(*Tales of the Field* 1988)以及阿特金森(Atkinson)所写的《民族志的想象力》(*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1990)进一步探讨了民族志写作的问题。

然而,学者们对民族志写作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有的研究都是讨论如何从已经写成的田野笔记出发来撰写最终的民族志,所考察的都是修辞手法这种细节问题或者是整体结构之类更加概括的问题,这样民族志就算完成了。如此一来,他们就忽视了民族志写作的最初场景——做田野笔记,从而忽视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理解观察者/研究者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坐下来,将一段鲜活的生活经历转化为书面文本的。

的确,学者们在分析“民族志的诗学”(Clifford 和 Marcus 1986)时所选取的对象往往摘自业已出版的学术专著,是一些对社会生活的经过润色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也是由一些更短小的、

不够连贯的零碎文字——即田野笔记——编辑而成的,而许多田野笔记是作者在对民族志形成任何整体看法之前就已经写出来的。此外,最终版本的民族志中所出现的田野笔记都是作者按照某种分析的需要,经过选择和塑造,重新安排和改写而成的。因此,与人类学家在田野中所做的原始田野笔记相比,它们的形式和寓意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考虑到这些方面,我们认为在民族志撰写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应该是做田野笔记,而不是写精练的民族志。

在实际的方法论层面上,田野研究者们也同样忽视了怎样做田野笔记的问题。指导研究者“怎么开展”田野研究的手册就怎样接近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陌生人,以及怎样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大量建议。但是关于如何做田野笔记以及应该写些什么等方面,只会偶尔针对特定场合提供一些说明。^① 田野研究者通常没有对如何在具体项目中做田野笔记给予密切系统的重视;他们也没有考虑如何有效地训练从事田野工作的新手,使他们能写出更加敏感、有用和激动人心的田野笔记。相反,田野工作手册直接给出的实用性建议是关于如何处理已有的田野笔记,其目的在于组织和撰写最终版本的民族志。例如,斯特劳斯(Strauss 1987)和他的同事(Strauss 和 Corbin 1990)针对如何对田野笔记进行编码,以及撰写民族志时应该如何处理编码,给出了详细的对策。但是,集中讨论编码过程的前提假设是:人类学家已经写出了

① 可参考 Schatman 和 Strauss 在《田野研究:自然社会学的策略》(*Field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a Natural Sociology*, 1973: 94—101)中提出的“编码策略”。书中提到研究者在田野中何时应该做笔记,何时不应该做笔记,把田野笔记录入电脑与当场录音相比有什么相对优势,以及将观察的、方法的和理论的田野笔记加以区分的好处。但是,书中并没有提到研究者究竟写了什么,怎样写的,也没有提到应该怎样学习写作技巧以及不同的写作风格对田野笔记的影响。

一系列田野笔记,现在的工作就是分析、组织这些笔记,并且赋予它们意义。这些工作手册丝毫没有提到人类学家最初怎样写出这些田野笔记,也没有提到他们怎样做或许能写出不同的笔记。同样,三位经验丰富的田野研究者——菲特曼(Fetterman 1989)、理查德森(Richardson 1990)和沃尔科特(Wolcott 1990)——也预先假定研究者已经做好田野笔记,而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展开民族志分析。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人类学家已经着手纠正这个问题,开始认真关注田野笔记的性质和用途了。1990年,桑耶克(Sanjek)编辑了一本题为《田野笔记:人类学的形成》(*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的论文集,书中收入的论文都响应了同一个主题,即“考察人类学家是如何处理、如何利用田野笔记的,以及研究者处理和使用田野笔记的态度是如何随着他的职业生涯的改变而改变的”(Sanjek 1990b: xii)。这本论文集涵盖了西方人类学进行“田野笔记实践”的一段长期历史(Sanjek 1990d),分析了田野笔记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所具有的研究的、私人的用途和意义(Jackson 1990b; Sanjek 1990c; Ottenberg 1990),探讨了研究者应该如何阅读和使用其他学者的田野笔记(Lutkehaus 1990),学者们在分析过程中把田野笔记作为描写和呈现各种文化的一种方法(Clifford 1990; Lederman 1990)。

同一时期,阿特金森所著的《民族志的想象力》也开始考察经典的以及当代的民族志在文本方面的特点。尽管阿特金森关注的焦点还是在于民族志的修辞结构,但他确实促使人们关注分析田野笔记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他指出当时“田野笔记仍然是研究者本人的私人文档”,因此其他研究者很难获取这些文档进而对其

进行分析。于是,他极力主张学者们对“出自某个学者或社会学学派的田野笔记的体裁特点”做深入研究(1990:57),并且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分析了两篇最初发表在《田野工作:社会科学入门》(Junker 1960)中的田野笔记片断,迈出了分析田野笔记的第一步。

即使研究者从现在开始纠正他们对田野笔记的忽视,也有一些既存因素决定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首先,人类学家提到田野笔记的时候会感觉不自在或者尴尬。很多人似乎把田野笔记当成在别人背后潦草写成的东西——有点杂乱,有点不可信,不是一些可以公开拿出来讨论的东西。田野笔记看起来太显示个性、太凌乱、太不经琢磨,因而研究者不能堂而皇之地把它们呈现在任何读者面前。由于这些或那些原因,学者们没有机会看到原始的、未经编辑的田野笔记,而只能阅读已经完稿的民族志,出现在民族志里的田野笔记都是经过作者精挑细选和重新整理的。这样,人类学家如何做田野笔记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起来了,显得有些神秘。

相比之下,民族志撰写这一后续阶段,完全围绕着怎样写出最终版本的民族志专著而展开,这样反而更容易从理论上来驾驭,而且明显不那么私人。在积累了大量田野笔记以后,人类学家就会离开田野,尝试着选用田野笔记中的一部分内容来讲述一个民族志故事;此时的工作与当初做田野笔记的时候不大一样,田野笔记是写给研究者自己看的,而民族志是为其他读者撰写的故事,因此研究者会像处理数据——研究、参考、重新安排的对象——那样更加客观地处理这些田野笔记。这一写作阶段中的程序——编码、提出可供分析的关注点等等——更接近于最终出版的作品,因此也更适合呈现给读者。

此外,田野研究者对于什么形式的写作才属于“田野笔记”、田野笔记应该在什么时候写、怎么写,以及它们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价值这些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研究者在田野笔记的性质和价值上的这些分歧,已经妨碍他们自觉考虑如何做田野笔记这个问题。

首先,当提到“田野笔记”的时候,研究者脑海中可能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写作形式。最近的一项资料(Sanjek 1990c)显示,人类学家谈到的田野笔记形式有:“批注”(headnotes)、“手记”(scratch notes)、“正式的田野笔记”(fieldnotes proper)、“田野笔记备案”(fieldnote records)、“文本”(text)、“日志和日记”(journals and diaries)、“信件、报告、论文”(letters, reports, papers)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人类学家眼中的田野笔记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一些田野研究者认为田野笔记是一种文字写作,这些文字既记录了他们了解和观察到的他人的活动,也包含了他们自己的行为、问题和反思。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记录他人言行的笔记——田野工作的“数据”——肯定不同于那些结合了他们自己想法和反应的笔记。但是持后一种观点的研究者内部也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只有对他人的描写才是田野笔记,而有关自己的文字只是私人的“日志”或“日记”;另一些人“通过将田野笔记与数据进行对比,提出田野笔记是对研究者个人反应的记录,是一份汇集了所要关注问题的秘密清单,是对分析的一种初步尝试,等等”(Jackson 1990b:7)。

其次,田野研究者可能采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做田野笔记。许多研究者仅仅把田野笔记当作“每一天结束时所写的流水账”(Jackson 1990b:6)。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正式的田野笔记”与

“田野笔记备案”不同,后者中的“信息已经经过分门别类的整理,不同于原始连贯的田野工作笔记”(Sanjek 1990c:101)。此外,一些田野研究者试着尽可能一观察到相关事件,随后就马上写出详尽的笔记,常常是每天晚上坐下来将完整、详细的观察结果输入电脑。另一些研究者最初只做一些不太详细的记录,只是用手记在笔记本上,待离开田野之后再添枝加叶,加以完善。还有一些研究者直到他们离开田野,开始着手写一份连贯的民族志时才进行大量的写作。

最后,人类学家在田野笔记到底是能帮助理解的一个资源,还是阻碍了理解的一个障碍的观点上存在分歧。虽然有些学者将田野笔记看作他们研究事业的核心,但是还有学者认为田野笔记的贡献并不大,只不过在研究者试图从外部理解另一个陌生世界的时候,帮助他们缓解工作中的压力和焦虑。事实上,有些人声称田野笔记阻碍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理解。杰克逊(Jackson)引用的一位人类学家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不做田野笔记,就有)更多系统化、概念化的可能性……不受数据中那些琐碎的例外事件和半真半假的真相的干扰。”

总的来说,人类学家未能深入考察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田野笔记是什么”持有不同的观点,还因为他们对人类学观察和写作所需的技巧,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技巧,也持有不同的意见。很多田野研究者持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几乎任何有文化的、爱冒险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进入田野并开展田野工作;即便需要一些技巧,他们也能本着“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或者“自己去闯”的心态当场学会。另一种极端的观点则主张,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做田野笔记,和上帝赋予的天赋和研究者自己的敏感度

有关,而这些都是学不来的。例如有人指出,只有那些像 E·戈夫曼(Erving Goffman)那样拥有特殊才干的人才能成为富有洞察力的田野研究者。后天的训练不能培养出那些如此依赖天赋的技能。

尽管其他学者勉强承认研究者的确应该而且能够学会田野研究各方面的技巧,但是却将做田野笔记排除在这些技巧之外。他们把田野笔记看得非常特殊且个人化,以至于无法通过正规指导来进行学习。田野工作者如何对待他们的研究对象,怎样理解和叙述这些事件,都会因人而异。因此研究者由于学科偏好、理论兴趣、个性、心情以及既定风格方面的差异,他们写出来的田野笔记也是截然不同的。人们认为做田野笔记与正规指导格格不入的原因是因为不管人类学家写什么,它们的道理和意义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都是利用“不言而喻的知识”和没有明确写在笔记里的亲身体会写出来的。

我们既反对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方法训练人类学家,也不认为人类学家没有特殊的技能或者没有超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力范围的技能。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天生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还运用了可以习得并能熟能生巧的技能。人类学家必须磨练这些技能,随着他们越发自觉地关注怎样做田野笔记,民族志的质量也会不断提高。

此外,我们认为人类学家通过明确民族志的本质——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研究与写作活动,就可以从为了区分田野笔记的概念而产生的僵局中解脱出来。对民族志本质的认知直接关系到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做田野笔记。比方说,假如某个研究者将民族志看作搜集信息的过程,而这些信息可以由任何研究者用几乎相同的

方法“找到”或“发现”，他就有理由区分这些“发现”和得出它们的过程，区分“数据”和“个人反应”。类似的，也有学者认为田野笔记有碍研究者进行直观的理解和更深入的分析，这种认识反映了这样一种理论取向，即要抓住“全局”，要确定一般的行为模式，而不是仅仅记录日复一日的日常事务和过程。反过来讲，这种观点认为如果研究者仅仅记录日常事务和过程，可能就会迷失在“太多的事实”或“太多的细节”之中。

因此，虽然就如何做田野笔记提出普遍的指导方针有些不切实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对田野研究的某种特定的理解框架，然后在此框架下就如何做田野笔记提出明确的建议。在这本书里，为了专门详细阐述一种做田野笔记的方法和步骤，我们所采取的对田野研究的理解是交互主义的、阐释性的，这种理解由符号互动论和民族方法学的传统衍生而来。显然，我们仅仅提供了做田野笔记的众多可能方法中的一种。那些以科学实证主义信条或其它民族志传统为出发点的田野研究者，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所讨论的诸多问题和步骤。尽管如此，我们希望书中提到的大部分内容对于每一个刚开始做田野研究、写田野笔记的人来说，都是有用的、具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在这本书中追求的一个更深层次的目标是：解密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过程，明确关注他们将自己的观察和经历转变为可检查的文本的过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应该着眼于已经出版的、经过润色的田野笔记，而应关注正在撰写的、“未完成的”的田野笔记，以及研究者怎样组织、改写这些笔记，使之成为最终的文本，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大量技术上的、互动的、个人的和理论的问题，我们将集中讨论如何做田野笔记本身。同时我

们也将考察研究者在撰写分析性备忘以及最终供更多读者阅读的民族志的过程中对田野笔记进行处理的程序和实际情况。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现实操作性的,我们还希望弥补对人类学文本的反思和撰写民族志的实际过程之间的间隔。通过考查研究者通常做田野笔记的实际情况,我们希望促使学者们关注将谈话、观察和经历转化为书面文本的基本程序,从而进一步理解民族志的本质。有人认为仅仅通过阅读最终的民族志和与之相关的田野笔记就能理解从经历到文本的转化,这样的想法是有误导性的。研究者将自己的观察和亲身经历写成最初的、未经润色的文本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遵循的程序,和那些为了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民族志而对田野笔记进行回顾、挑选、编辑和修订的过程相比,有显著差别。已出版的田野笔记不仅经过润色,还经过了高度筛选,这些被筛选出来的田野笔记必须和特定的主题相联系,正是这些主题使得民族志形成一个整体。相反,未完成的田野笔记,或多或少是在所描写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同步写成的,没有在理论高度将材料集中或者整合起来,没有始终一致的声音或目的,甚至常常没有清楚的或者风格上的限制。

我们对做田野笔记这一问题的关注,源于我们自己教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何进行田野研究的亲身经验。我们中的两位——罗伯特·埃默森(Robert Emerson)和琳达·肖(Linda Shaw)——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关于田野研究方法的本科生课程,这门课程是一个实习科目,内容主要涉及田野笔记和笔记所描述的田野经历。课程坚持要求所有学生都进入田野的场景中,而且立即着手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写成田野笔记。除了加强针对学生的田野笔记所组织的小组讨论以外,他们还拿

出课堂时间来讨论两份“每周田野笔记之星”——目的在于阐释田野关系、写作策略或理论焦点方面的关键问题。整个课程期间，学生们对做田野笔记提出了无穷无尽的问题，从类似“我该写什么”的问题开始，到“我怎样将所有的这些笔记写成最后的论文”这样的问题结束。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埃默森和肖不断向在洛杉矶分校任教写作班的同事们请教。他们认识了雷切尔·弗雷茨(Rachel Fretz)，一个拥有丰富非洲田野研究经验的民俗学者。通过与弗雷茨的讨论和磋商，他们决定将一门关于田野笔记写作的课程和当时已经存在的田野研究方法课程结合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们小组作为洛杉矶分校浸入式培养计划的成员来教授这些课程的时候，这本书的手稿开始初具雏形。参加这个培养计划的学生，在学习三组课程——田野研究方法、田野笔记写作和一门选修的主题课程(心理疾病、犯罪控制、学校里的性别、人种和族裔)的同时还要进行实际的田野研究。其中，田野研究方法课程和写作课程是紧密结合的，有配套的主题、阅读材料和田野作业。作为教师，我们定期讨论学生们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进步。我们把自己的经验和已经解决的问题汇集起来，相互交换想法，这样当学生学着将现实世界的经验拿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就能帮助他们用更好的方法解决问题。构成手稿核心内容的这些想法就来自于全体人员的早期讨论和共同努力。

荣克(Junker)的著作《田野工作：社会科学入门》(1960)提供了如何汇集和呈现手头资料的范本。《田野工作》中的材料——“田野工作的案例”——来自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由E·C·休斯(Everett C. Hughes)主持，目的在于“对田野工作进行田野工作”(Hughes 1960:v)。在这个项目中，组织者“汇集了从

数百名学生那里获得的(之前已经向那些学生教授了研究方法)关于学习和开展田野工作的经验”(vii)。类似的,为了阐述做田野笔记的实践经验,提供不同的写作选择,我们在各个章节中提供了大量“原始的”田野笔记。

我们选用了很多本科生和研究生所写的田野笔记和民族志片断。这些学生在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马科斯分校和康奈尔大学选修了我们的田野研究课程和民族志写作课程。有人可能因为这些文本不是出自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者之手,而反对使用学生的田野笔记。然而,我们对学生笔记的偏好部分地反映了我们开始编写这本书的过程——通过阅读和评论这些笔记,澄清并说明什么是我们认为有效的、激动人心的笔记,并且为教学目的而选择能够说明特定问题的例子。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希望能够减少田野笔记的神秘感,最好能通过告诉那些将要阅读和使用这本书的学生“他们能够做些什么”来达到这个的目标。最后,每一季我们都会发现,学生们提交的田野笔记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些报告都具有很高的质量,激动人心而且新颖独特,描述了不同社会背景下或平凡、或罕见的事件。

除了学生的田野笔记,还有的例子来自我们自己没有出版的田野笔记,这些笔记都是我们在许许多多不同的研究项目中积攒下来的。涉及到的项目包括埃默森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所进行的关于诉讼人申请家庭暴力监管条例的研究;^①弗雷

^① 这项题为“The Pro Se Litigant: self-representation in consequential civil cases”的研究得到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编号是SES-8713255,共同研究者是Robert M. Emerson和Susan McCoin。

茨关于讲故事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这项研究分别于1976、1977、1982、1983年在扎伊尔的乔克维进行,1992—1993年间在赞比亚进行;^①还包括20世纪80年代早期肖在一个为前精神病患者提供帮助的精神病院里所完成的田野研究。

我们提出的有关做田野笔记的问题主要面向两类读者。一类读者包括那些主要因为学术研究目的而关注民族志和田野研究的人。我们致力于提出一套实用的田野笔记写作指导,这些指导将会帮助来自一些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学科一方面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口述历史学、教育学以及民族音乐学,田野研究和人类学方法在这些学科中都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还包括政治学、商业管理、传播、写作研究、社会福利以及公共卫生等等,田野研究和民族志在这些学科中可以作为次要的研究方法。

这本书还面向另外一些通常意义上与民族志不怎么相关的读者——那些从事实验教学(experiential education)和服务性学习(service learning)的人。为了达到以实践来促进学习的目的,实验教学主张安排学生从事社区服务或者让他们在一些公共机构里实习。学生在这些安排中将面临实际操作的现实挑战;他们的任务则是要将这些经历与传统的学术问题结合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这种结合的关键就在于记录重要突发事件的日志了(Batchelder和Warner 1977)。但是服务性学习中的日志鼓励学生们写出他们的观点和感受,而不是别人的言行。这种日志

^① 1982年Rachel Fretz在扎伊尔乔克维进行的关于讲故事的研究得到了Fulbright-Hays奖的支持,1992年在赞比亚的后续研究得到了Fulbright基金会的高等研究拨款的支持。

通常不要求学生将他们的观察真实详细地记录下来。它们倾向于“以突发事件为焦点”，关注戏剧性的、标志性的事件，而不是日常琐事和例行事务。因此这些日志往往是十分概括的记述，或是仅仅将“重要事件”抽离出来的记录，这样就阻碍了研究者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深入理解。

我们认为，做人类学田野笔记，而不是日志记录，肯定可以加强和深化现实经历与课堂知识的融合。做田野笔记能鼓励实验教学的学生观察得更细致、更系统，既考虑日常的情景又关注戏剧性的事件，鼓励他们像被研究者自己那样注意他们的活动和关注点。此外，系统的、同步撰写的田野笔记可以用来了解实习生适应具体环境的不同阶段。这种田野笔记给实习生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文本指南，告诉他们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该怎么去做。这类指南为初学者尽快融入任何场景提供了一种主要途径；它既提供了工作的技巧和知识，也对这些技巧和知识在实际场景中的优先顺序、既定假设和规则做出了必要说明。

很明显，田野研究和实验教学之间始终存在矛盾。比方说，实验教学的学生通常会希望为他人提供服务——至少最开始是这样，或评估某种职业的吸引力，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做大量的田野笔记可能就加重了他们的研究任务。然而我们可以举出例子给这些学生证明，民族志可以加深他们对可能会遇到的个人的、工作的以及组织的过程的理解。因此，参与田野工作和田野笔记的写作，通过提供一种将研究者的亲身经历转换为文本形式的途径，在两种长期以来互相分隔的传统之间找到了许多共同点。这些文本可以重新带回到课堂中来，供学生仔细考察它们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学术问题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本书中给自己设定了明确的任务：考察在撰写和使用人类学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不同写作程序。因此我们没有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本自成一体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实践指南。我们既没有在书中运用深奥的人类学理论，也没有描述研究者在实际开展田野工作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进退两难的局面，而是通过专门考察那些与撰写和使用田野笔记有关的重要实际问题，来对已有的对人类学研究^①的前提和程序的概述进行了补充。此外，我们认为做田野笔记总是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以及他的理论取向紧密联系在一起。

书中各章节的安排反映了我们的双重考虑，其一，学习如何做田野笔记，其二，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过程对田野研究的意义。从一开始，本书的着眼点就是学生学习做田野笔记的经验和实践，而不是理想化或说明性地描述田野笔记“应该怎样写”。在回顾了田野笔记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本质和地位之后，接下来的章节依次讨论了撰写和处理田野笔记的一步步程序。每一章都以“反思”作为总结，反思的对象就是我们在那一章中讨论的程序对更广泛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意义。

具体来说，第一章将会考察做田野笔记在田野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且澄清我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和准则。第二章将会分析人类学家的独特立场——参与和观察一个自然场景下的实时生活是为了记述观察到的事件；接着将讨论在田野中速记

^① 比如，Burgess 1982, 1984；Denzin 和 Lincoln 1994；Ellen 1984；Emerson 1988；Hammersley 1992；Hammersley 和 Atkinson 1983；Lofland 和 Lofland 1995；Schatzman 和 Strauss 1973；Schwartz 和 Jacobs 1979；Spradley 1980；Taylor 和 Bogdan 1984。

短语或笔记的问题。第三章将探讨撰写田野笔记的程序,不管是根据记忆还是根据现有的速记。第四章将讨论多种写作策略:如何将脑海中的场景呈现在纸面上,如何描述观察到的事件,如何组织扩展性描述以及如何撰写有关这些场景的当场的分析性观点。在第五章我们将介绍一些做田野笔记和进一步分析田野笔记的方法,以帮助研究者有效地捕捉和传递事件对当事人的意义。第六章则将转向处理大量“已完成的”田野笔记,考虑如何对这些田野笔记进行阅读、分类和编码,以及如何着手分析。第七章将讨论人类学家如何为更多读者组织和编写经过润色的、连贯的民族志。最后,在第八章中我们将反思民族志写作中对互相矛盾的要求和关注点加以平衡和协调的需求——包括对被研究者的忠诚和对未来读者的责任,有意识的反思和写下记录的紧迫性,以及对当地意义世界的关怀和分析的相关性。

我们希望能在此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田野研究项目给孕育本书的浸入式培养计划所带来的鼓励和支持。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还要特别感谢 Jane Permaul、Rob Shumer 和 Parvin Kassaie。我们也要感谢下面这些给原稿提出过意见和建议的同事们: Timothy Diamond、Dianne Dugaw、Shelley Feldman、Jan Frodesen、George Gadda、Dwight Giles、Claudia Ingram、Michael O. Jonnes、Jack Katz、Susan Mc Coin、Anita McCormick、Melvin Pollner、Anita Pomerantz、Armanda Powell、Judith Rithlin-Klonsky、Mike Rose、Ruth M. Stone、Carol Warren、Randy Woodland 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评审。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文字编辑 Richard Allen,他曾许诺会“让我们日子不好过”,而且他的确做到了,从而敦促我们澄清观点、阐述论据。

最后,我们应该感谢下面这些来自田野研究课程的学生们,他们慷慨地准许我们使用他们的田野笔记和人类学著作作为实例,他们是: Karin Abell、Teri Anderson、Jim Angell、Erin Artigiani、Ben Beit-Auri、Nancy S. Blim、Paul Brownfield、Jennifer Cheroske、Rebecca Clements、Cabonia Crawford、John Cross、Maria Estrada、Julie Finney、Robert Garot、Mauricio A. Gormaz、Heather W. Guthrie、David Hillyard、Suzanne Hirsch、Ronald X. Kovach、Shawn Lemone、Wendy Lin、Storm Lydon、Francisco “Chunk” Martinez、Martha Moyes、Deanna Nitta、Phil Okamoto、Blair Paley、Kreistin Rains、Lisa Ravitch、Joanna Saporito、Kristin D. Schaefer、Joe Scheuermann、Cliff Spangler、Lakshmi Srinivas、Martha Stokes、Kathryn L. Tater、Laura Miles Vahle、Linda Van Leuven、Karina Walters、David Whelan、Nicholas H. Wolfinger 和 Terri Young。我们还要特别感谢 Lisa Holmes 和 Martha Millison,不仅因为他们允许我们摘录他们的田野笔记,而且因为他们在读了本书的初稿以后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学生回复”。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民族志研究中的田野笔记.....	1
田野参与.....	1
记录经历的/观察的现实	5
对于做田野笔记的启示	15
反思:写田野笔记和做田野研究	20
第二章 在田野中:参与、观察和速记	23
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速记.....	27
以写作为目的的参与	38
两个速记实例	43
速记的记忆术:词汇和短语.....	45
反思:写作和人类学意义上的边缘性.....	51
第三章 田野笔记的撰写(一):从田野到书桌	56
在书桌前	56
田野笔记撰写中的立场和读者	60
撰写过程	65
反思:“写作”和“阅读”模式	88
第四章 田野笔记的撰写(二):呈现场景	91
撰写详细的笔记:描绘场景.....	93

撰写扩展条目:组织	115
撰写过程中的分析:旁注、评论和备忘	138
反思:田野笔记是写作选择的产物	146
第五章 揭示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	149
强加的外在意义	150
呈现当地人的意义世界	156
使用被研究者界定的概念范畴:处理方法和常见问题	179
被研究者对族裔、性别与阶层的解读	190
当地事件与社会力量	197
反思:通过田野笔记来发现/创造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	198
第六章 田野笔记的处理:编码和备忘	202
阅读作为数据集的田野笔记	205
针对田野笔记提出问题	207
开放式编码	213
撰写最初的备忘	219
选择主题	222
集中性编码	226
综合备忘	229
反思:从田野笔记中创造理论	234
第七章 撰写民族志	238
主题描写	240
将田野笔记转化为民族志文本	244
撰写完整的民族志	275
反思:在被研究者和读者之间	290
第八章 结论	293
参考书目	300

第一章 民族志研究中的田野笔记

人类学田野研究是对群体和民族的日常生活所进行的研究,包括两种不同的活动。第一,田野研究者进入某个之前并不熟悉的社会场景,开始了解身处其中的人们。研究者参与这个场景中的日常生活,和里面的人们建立持久的关系,并且始终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参与观察”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第二,研究者以规范、系统的方式写下他在他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因此,随着研究的开展,对于观察和经历的书面记录也在不断积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活动构成了田野研究的核心:研究者在一些开始并不熟悉的社会里的直接参与以及基于参与而撰写的书面记录。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详细考察每个活动,然后探讨它们对做田野笔记有何意义。

田野参与

田野研究者必然要走出去接近他人的活动和日常经历。“接近”至少要求研究者从身体上以及社会意义上接近他人生活和活动中的日常行动。为了观察和理解他人,田野研究者必须能够进入他人生活活动的关键场所和场景。但是“接近”还有一层更有意义的含义:研究者尝试着更加深入地沉浸到他人的世界中,以领会他们的经历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要性。通过沉浸,研究者从内部

观察人们怎样生活、怎样进行日常活动、什么是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东西以及他们怎样做。这样,沉浸就使研究者得以了解他人生活的动态过程,提高他对互动和过程的敏感性。

此外,沉浸促使田野工作者必须独自直接体验他人的生活,既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例行事务和通常情况,也包括生活中所面临的约束和压力。戈夫曼(Goffman 1989:125)特别强调:田野研究包括使你自己、你的身体、你的个性、你所处的社会环境服从于被研究者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因而你可以在身体上和生态上洞察他们对他们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和族裔环境的一系列反应。人类学田野研究中的沉浸既包括与他人待在一起以观察他们对事情的反应,也包括亲自体验这些事件以及产生这些事件的环境。

显然,沉浸要求研究者不能作为一个孤立的、被动的观察者来进行研究;田野工作者只有积极参加人们的日常活动才能接近被研究者的生活。此外,这种参与不可避免地要求研究者经受某种程度的再社会化。通过与一群人共同生活,田野研究者“进入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参与他们组织的活动,感受到他们的道德约束”(Wax 1980:272—273)。田野研究者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中去,这样就可以了解到要成为那个世界的合格成员需要什么必备条件,并且可以用接近于成员的体验^①来体验事件和意义。实际上,一些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会尽可能模仿他们所感

① “成员”这个词是从民族方法学中借用而来的,这个学科所关注的是普通人对自然语言的掌握,最终讨论的是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所反映出来的日常活动的常识性知识。(Garfinkel和 Sacks 1970:339)。

兴趣的那些人的行为。举例来说,田野工作者熟练掌握他们试图去理解的某项工作(Diamond 1993; Lynch 1985)或者真诚地加入教会或宗教组织(Jules-Rosette 1975; Rochford 1985),因为只有当他们成为组织成员时才能够对这些群体及其活动有更加全面的洞见和理解。或者,村民们可能会给田野工作者派一个角色,比如一个大家庭中的姐姐或者妈妈,这样的身份就要求研究者参加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并且通过再社会化来适应当地人对她的期待(Fretz 日期不详)。

当田野工作者为了了解他人而积极参与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时,不可能也不应该表现为一个不被察觉的观察者^①。没有一个田野工作者可以是完全中立而孤立的观察者,处于被观察的现象之外,并且不依赖于它(Pollner and Emerson 1988)。相反,当田野工作者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和关注点中的时候,他的观点就会“与现象纠缠在一起,而这些现象不是客观地独立于观察者的观点和方法的”(Mishler 1979:10)。研究者不可能注意到所有的事情。更准确地说,他始终处于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之中,通过参加某些活动,与一部分人产生联系,来提出特定的视角。此外,在田野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常常遵循政治分歧线,使研究者只能选择性地接触到某些观点。因此,田野工作者的任务不是确定“事实”,而是展现他人生活中显然存在的多重事实。^②

① 这里,我们假定田野工作者在他所感兴趣的情境或者场景公开表明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关于隐蔽性田野研究的优点,参见 Douglas(1976)和 Schwartz 和 Jacobs(1979);关于对隐蔽性田野研究的批评,参见 Erikson(1967)和 Casell(1980)。

② Mishler(1979:10)提出:“(任何现象)都包括多重事实,其中的每一重都通过不同的视角、方法或目的展现出来……研究者的任务不是穷尽事件的唯一意义,而是展现多重意义……意义正是从观察者与事件的相遇中产生的。”

而且,由于田野工作者必须与被研究者发生互动,这些互动会对被研究者产生影响,所以研究者在田野环境中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①“有影响的存在”常常和反应效果(即研究者的参与对被研究者言行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研究者不应该认为它对观察结果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相反,这些效果恰恰是了解和观察他人生活的资源(Cl Clarke 1975:99)。田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会严重破坏或者急剧改变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模式,反而会显示人们最初建立社会关系的条件和基础。比如,在一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村落里,人们可能会把田野研究者吸纳为家庭成员,给她一个亲属称谓以指明她的权利和义务。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不会阻碍研究者的发现,而可能为研究者理解更微妙、含蓄的问题提供线索,这些线索往往不能仅仅通过观察或者访谈来获得^②。因此,人类学家需要对别人看待和对待自己的方式保持敏感,而不应该把被研究者的反应视为需要小心控制并尽量减轻的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者一直认为观察者在田野研究中的理想状态是与被研究者高度分隔的、“不多嘴的”、边缘化的,但是研究者自身的存在一定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很多当代田野工作者提倡高度参与(Adler, Adler 和 Rochford

① 有时候研究者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存在“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比如,被别人自然地、毫无问题地视为“只是一个观察者”。但是这种感觉实际上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通过共谋而获得的(Pollner 和 Emerson 1988)。当田野研究者希望更加深入地参与被研究者的生活,而这样做会在某种意义上消解“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区别的时候,他就会通过一系列互动来确立并保持自己作为“观察者”的角色。

② Georges 和 Jones(1980)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田野工作者直接研究他们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1986),这样研究者才能真正参与被研究者生活中的核心活动。从这一点来看,研究者在服务实习经验中真正担任核心职位、履行核心任务就为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让他能够在之前不熟悉的社会中接近、参与和经历其中的生活。实习生真正承担工作责任或者研究者在乡村生活中积极参与到当地事务中去,都是再社会化,都要求研究者对当地的行为方式和感受方式进行移情的理解。

最后,密切、持续地参与他人生活,鼓励研究者将社会生活视为正在进行的动态过程。田野研究者在参与过程中密切观察人们如何应对不确定和混乱,意义如何从言语和集体行为中展现出来,理解和阐释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田野研究者通过这些途径密切参与他人的日常生活,这样就提高了他们将社会生活视为过程的敏感性。

记录经历的/观察的现实

田野研究者即使经过深入的再社会化,也决不可能成为跟那些“本来”就在田野中的人们一模一样的成员。^①研究者在田野中相对短暂地停留之后就会离开田野,所以他对当地生活的经历会因逗留时间短暂而受到影响。因此,“田野研究者的参与既不需要像当地人那样投入,也不会像当地人那样受到种种约束”(Karp 和 Kendall 1982:257)。此外,在田野工作者眼中,很多当地的事件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自己可能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一些也许

^① 比如,实习生受到工作要求的约束,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不能到处乱跑。另一方面,研究者和实习生都是田野中的临时成员,地位往往较低或者边缘化。

会被有选择地记录下来,然后写进田野笔记中的事件。从上述方面来看,开展研究和撰写笔记限制了田野研究者沉浸在田野中的程度,至少使研究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局外人,更极端地说,他就是一个文化的异类。^①

田野笔记是研究者在深入参与他人生活的过程中用来描述自身经历和观察的记录。但是对经历和观察进行描述性记录可能并不像它一开始表现得那样直接和明晰。因为描述不仅仅是尽可能准确地捕捉观察到的事实,也不仅仅是将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和看到的事情写成文字。如果有人简单地认为描述就是撰写准确契合研究者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文本,那他就是假定对任何一件事件来说都存在唯一的“最佳”描述。然而,事实上对某一观察到的现象来说,并没有“自然的”或者“正确的”描述方式。相反,由于描述过程中加入了研究者的感受和阐释,所以很可能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情况和事件的描述也会各不相同。

比如,下面几个片段分别出自三个学生之手,描述人们如何通过三个洛杉矶超市的快速收银通道的情况。这些描述具有一些共同点:都是从顾客和观察者的角度来描写的;都描写了排队的其他主要角色——收银员、其他顾客——的体貌特征,或者至少记录了他们买的一些东西;都在快速通道近距离留意了几分钟内人们的

^① Geertz(1976)和 Bittner(1988)认识到田野研究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局外人,并由此提出一些启示。首先,因为研究者在田野中的经历大约而不是绝对重复当地社会成员的经历,所以“曾经在那里”和“亲眼所见”并不能为撰写关于那个社会的故事提供强有力的合法性。可参见 Marcus 和 Cushman(1982)关于“人类学的现实主义”的讨论。第二,研究者受到的种种限制,促使他们从主观感受和建构的角度理解他人的世界。因此,这种理解缺乏人们认为是真实的固有特性的东西,比如深度、稳定性和必要性的特点(Bittner 1988: 155)。

行为细节。但是,每一份田野笔记在描述超市的快速通道时都各有侧重点。每一份笔记都选取并突出特定的特征和行为,而忽略其他特征和行为。此外,这些片断是从不同视角来写的,它们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在快速通道上发生的事情——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们所观察的人和事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写作的时候进行了不同的选择:

上流社区的超市快速通道

有四个人在排队,每个人买的东西之间都用一根大约 18 英寸长的矩形黑橡胶棒分隔开来。我把冷冻袋放在滚动带上,然后走到收银员那里拿了一根橡胶棒,把我的东西隔开。收银员大概 30 来岁,5 英尺 2 英寸高,皮肤挺黑,一头深褐色的卷发。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是能听出一点儿口音。她穿着白色短袖上衣和一件从肩膀到大腿的褐色围裙,戴着一个松松的栗色领结,比男人的领结更加下垂、更加蓬松。她的姓名牌挂在左胸,上面用红字写着“Candy”。

[描写排在最前面的两位男士。]排在他后面的女人皮肤黑黑的,留着深褐色的齐肩直发,穿着蓝色的 V 字领毛衣和黑丝袜。她买了果汁、一罐菠萝汁和 6 包装的 V-8 番茄汁。排在我前面的那家伙穿着粉色的 Polo 衬衫和茶色短裤,大概 6 英尺 2 英寸高,瘦瘦的,金发,左耳戴着一个 18 码金耳环(我觉得他是个同性恋)。他买了一包袋装胡萝卜、一加仑全脂牛奶和一包猪排。

Candy 花在每个人身上的时间都很少,先打个招呼,然后告诉他们金额,收钱,把找零放在付账的人面前的台子上。在 Candy 给那个深色头发的女人找零之前,我发现穿粉色衬衣的男人已经走

进了那个女人购物的等待区域,可能跟她相隔不到一英尺,站在了别人付款时才站的地方,在写支票的台子前面。(相对于身体之间的距离,人们似乎更注意在他们买的東西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隔,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

当我走到台子(似乎所有事情所发生的地方)时,我说:“你好,”Candy 一边对我说:“你好,”一边用扫描器扫描我买的東西……

这个观察者描写个人(尤其是体貌特征和服饰)和他们所买的東西(“他买了…”)来展现队伍中的空间格局。当然,文本也在旁观的角度记录了一组对照,一方面,人们很关心自己买的東西,另一方面,他们看起来忽视了身体之间距离,这种忽视体现在写支票的台子那里,一个顾客即将离开,下一个顾客走上前。

Ralph 的快速通道,复活节的早晨

我朝东边的收银台走去,手里拿着做早午饭要用的大米沙拉配菜莴苣和一瓶 Gewurtztraminer,这是我最近很喜欢喝的酒,必须在半小时内冷藏起来。当我走到收银台附近的时候,发现不到 10 件物品的现金柜台是我的最佳选择。我发现 Boland 在收银台前——他总是对我很友好——“你好,最近怎么样?”

我排在一个已经在那儿的妇女后面。她已经在她买的東西后面放了一个橡胶棒,这是这样一个高度惯例化的队伍里能做的为数不多的友善举动之一。我很感激,原本打算谢谢她(也许对她笑一笑),但是她始终向前看,我想她是很想早点儿结账。我放下了酒和莴苣,这时候我后面又排了个人,我打算也为他们放一个橡胶

棒以示礼貌。我等到我面前的食物移动到我可以拿走橡胶棒的位置,也就是放橡胶棒的地方的前面(应该用什么词儿说这个地方呢?棒箱?),这样我不需要在不是我买的东西那里做较大的移动,否则会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我等了一会儿,终于看到了橡胶棒,于是拿起一根,放在我买的东西后面,冲我后面的女士笑了笑。她看起来很高兴,带着一点小小的惊喜。我很高兴可以表示这样一个小小的好意。她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人,买了一瓶香槟(也许也是为了复活节的早午饭?),看起来穿的是条复活节裙子——纯棉质地、漂亮、华丽,她看起来很年轻,大概跟我年纪相仿,个头在女人里面算很高的,也许有5英尺10英寸。

我前面的妇女没有花太多时间。我已经知道怎么排队等候,不要显得太不耐烦。收银员 Boland 看到我,说:“你好!最近怎么样?”或者类似的话……

这个观察者描述了她经过通道时的经历,按照时间顺序把她接受、理解别人的好意以及对好意的回应整合在一起。这种描述风格为读者提供了一条理解观察者思想和情感的独特路径,比如,作者在讨论空间问题时,不是根据实际距离,而是根据研究者自己和感觉(如:避免“在不是我的东西那里做较大的移动”)来展开讨论的。

在下面的片段中,作者将关注点从自己转移到他人:

Boy 的超市快速通道

……我挑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尽管超市里很安静,但是快速通道的队伍却很长,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只买了几件东西。我排在

一个只买了一条面包的男人后面。他身边有个手推车,我认为有人把它弃置在那里的(里面还有几件东西)。一分钟以后一个男人走上来,握住了车。他并没有向我们解释他又回到队伍里了——他显然走开了,去拿之前忘记买的东西——但是他也没有排在我后面。我觉得有必要问问他是不是排在队伍里。他说是,于是我试图移到他后面——我们似乎是肩并肩地站着——他说:“没事儿,我知道你排在哪里。”

我后面排着一位老妇人。她把东西放在手推车里,老年人往往用这种车把东西推回家。她在翻阅一本 *National Enquirer*, 还拿着一张优惠券;浏览了几页之后把它放回架子上。我向前看着正在付账的那个人——她在东西通过收银台的时候盯着每一样东西的价钱。

就在这时,我之前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带着惊讶的表情从我身边走过,走到过道尽头一辆被弃置的手推车那里。他饶有兴趣地拿起几件东西,然后又将它们放下。我想他肯定是看到什么想要买但是忘记买的东西。他又回到自己的手推车旁。然而,当一个超市员工经过的时候,他叫住了那个男人,并且走到那个手推车那里,指着说:“经常会有人把东西留下吗?”超市员工迟疑了一下,似乎没有听懂问题,说:“没有。”那个人说:“看到这是什么了吗?这是配方奶[几罐婴儿配方奶]。这是穷人吃的。看见这个[一个铜壶洗刷器]了吗?他们用来吸毒(纯可卡因)。”超市员工看起来很惊讶。那人又说:“我只是比较好奇。这些都反映了这地区的情况。”员工说:“我就住在附近,但是我不知道这些。”那人说:“你昨天没看 28 频道吗?”员工回答:“没有。”那人说:“他们播了一条关于内城问题的报道。”员工一边

走开一边说：“我只看国家地理频道、麦克尼尔-莱勒时段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他越走越远……

此时，买面包的男人已经付过钱了。在他等着找零的时候，我前面的男人说：“为了一条面包等了很久啊。”男人说：“对呀，”然后开玩笑地补充道（一边说一边看着收银员，好像要看看他的反应）：“这些收银员速度很慢。”收银员假装没听到这句话。买面包的男人离开了，我前面的那人开始结账。他对收银员说：“你怎么了？最后一班了？没有幽默感了？”收银员说：“不是，我很累。”那人说：“我听着呢。”他接着对装袋工说：“给我一些纸和塑料袋，Jacob（他强调了装袋工的名字）。”Jacob照做了，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反应。那人站在栏杆边等着打包，和着正在播放的背景音乐的词儿，Peabo Bryson的歌儿。那人的东西打包好了，他向装袋工道谢，装袋工也祝他一天愉快。

收银员对我说：“你好。”……

观察者在这段田野笔记的开头，将自己写成一个排在队伍中的人物，接着在对另一个角色进行集中描述的同时将自己转移到台下。那个人在等待的时候的言行很哗众取宠，最后结账离开了。这个快速通道俨然变成了一个迷你社区，一开始描写排队的人之间的互动，然后加入了一个路过的超市员工，最终以那个人和收银员、装袋工之间的互动达到高潮。

做田野笔记，很大程度上不是被动地拷贝发生的事实。更准确地说，做田野笔记是研究者积极地阐释和创造意义的过程：一方面，注意到并且描写一些“重要的”事儿，另一方面，即使会错过可能重要的事儿，也要忽略一些“不重要的”事儿。因此，研究者即

使面对类似的(甚至“相同的”)事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敏感性和关注点来展开描述,以达到不同的目的。

因此,认识到田野笔记是对社会生活和社会话语的深度录写。这些深度录写不可避免地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可供回顾、学习和反复思考的书面文字。格尔兹(Geertz 1973:19)曾经将人类学的这一核心过程的特征定义为:“人类学家深度录写社会话语,他将它记下来。这样,他就将一个仅仅短暂存在的事件转化为文本,文本存在于记录中,可供重新认识。”

作为深度录写,田野笔记是将所观察到的事件、人物和地点转化为纸面文字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产品,也反映了这一过程中所遵循的惯例。^① 研究者在转化的过程中必然进行了选择,他们描写了某些东西,因而必须略去其他。然而,意义更加重大的是,描述性的田野笔记还不可避免地要求田野研究者在呈现和组织材料的时候只能采用某一种方式,而“错过”其他可能的方式。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反映了研究者通过接近和参与所述事件所收集的感受、意义和理解,并将这些感受、意义和理解纳入材料的呈现之中。

还有其他将社会过程简化为书面形式的途径。比如,问卷调查记录了被访者对预先设计好的问卷的“回应”,有时候将这些答案化约为数字,有时候保留被访者的原话。影音资料看起来捕捉并保存了互动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实际上也只是保存了正在

^① 类似的,Latour(1987:68)将在实验室进行的科学研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记录形式,他所关注的问题是科学家们如何将一系列实验过程转化为文本,同时,他将实验使用的不同器械视为“记录的工具”。可参见 Latour 和 Woolgar(1979)。

进行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最初什么内容被录下来取决于录像设备何时、何地、如何被设置和激活,取决于它能机械地获取什么类型的资料,取决于那些被拍摄的人对设备有何反应。当那些体验式的话语片断被记入“实录文本”,并以序列线性的文本样式得以展示时,一个进一步简化(社会话语)的过程也就开始了。由于田野中的谈话是一个“多渠道发生的事件”,而写作“本质上是线性的,在某一时刻只能处理一条线,所以必须对可供呈现的问题进行精挑细选”(Walker 1986:211)。所以,抄本(transcript)选取某些维度和内容,而忽视了其他东西,比如,像眼神注视、手势和姿态这样的带有当地意义的非语言符号。研究口头文化的学者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出一套符号系统,这一系统可用来记录口头的,以及至少部分非口头的交流;由于转录的民间传说“采用另一种媒介(即书面文字)呈现人们的表现”,因此它的质量会受到学者的质疑(Fine 1984:3)。因为转录是对言谈和行为的“分析性阐释和选择”(Psathas 和 Anderson 1990:75),所以它从来就不可能将话语逐字还原出来。也就是说,抄本是转写者不断以阐释和分析的方式回答一些棘手问题之后所得到的,这些问题有:怎样将自然发生的言谈转化为具体的词语(面对自然的元音省略);怎样决定何时添加标点以示一个完整的短语或者句子(日常言谈往往缺少清晰的结尾);决定是否试着呈现以下内容,如空间和沉默、交叠的言谈和声音、语速和音量,以及听不到或者不可理解的声音或词语。^① 总而言之,即使研究者声称最接近“客观之镜”的方法也必须

① 我们可以通过提出一套写作习惯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参见 Psathas 和 Anderson (1990), 作者回顾了研究者进行话语分析转录时所使用的关键“转录符号”。

大体上像做田野笔记那样,对鲜活、复杂的社会生活加以简化。^①

既然每种记录方法都是简化论,那么研究者对方法的选择就反映了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以及应该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看法。田野研究和田野笔记的基础都是对社会生活的某种特定理解,这种理解认为社会生活是人们不断寻找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的意义的过程。从这个视角来看,访谈和影音资料是有用的。如果被研究者愿意并且有能力描述社会生活的这些特征,那么访谈也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类似的,影像资料真实地记录了人们实际上说的话和做的手势。但是田野研究主张:研究者要从参与者的视角全面理解人们的行为就必须长期密切并广泛地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像范·马南(Van Maanen 1988:ix)所强调的,民族志就是“通过分析自己在他人生活世界中的经历,来呈现他人的社会现实的一种特殊实践”。田野笔记显然是捕捉和保存研究者在长期亲身经历中所获得的洞见和理解的一种方法。因此,田野笔记有时候会记下一些不成熟的理解和洞见,这些理解和洞见来自于

① 虽然我们比较了田野笔记和影音资料这两种将鲜活的社会生活简化为文本的方法,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田野研究中只会使用前一种方法。事实上当前大部分田野研究很大程度上既依赖于田野笔记又依赖于录音。现在的田野研究手册中都会讨论记录研究的多种方法,尤其重视录音和录像设备(如:Goldstein 1964; Ellen 1984; Jackson 1987; Wilson 1986)。Stone 和 Stone(1981)特别描述了研究者使用的多种媒体,并且讨论了各种编码方法,从做田野笔记开始谈起,然后又提到录音和录像。

田野研究者由于学科和课题的不同,对田野笔记或者录音录像的相对侧重也会有所不同。比方说,很多研究者常常既为非正式访谈录音,也做很多田野笔记——这是在外语环境下进行研究的基本做法,对使用母语或者在本文化中展开的研究也有借鉴价值。类似地,另外一些研究者系统地录下与他们理论关注点相关的意义重大的场合和重复出现的事件,以此来补充自己的田野笔记。相反,研究言谈、表达方式和口头传统的田野研究者,如社会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和口述史研究者,常常将录音作为基本手段,但是也会做详尽的田野笔记,通过描写细节来补充口头录音。

田野研究者对另一个社会世界的近距离沉浸,来自于研究者身处日常事件和偶发危机中所进行的观察,来自于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碰到的突发事件和外在约束。的确,正是这种深度沉浸——以及沉浸所呈现和加强的对地方的感觉——使得田野研究者能够写下被格尔兹(Geertz 1973)称为“深描”的那些详细的、上下文相关的、体现地方知识的田野笔记。

田野笔记的这种经验性特征也体现在笔记的内容和关注点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田野笔记将一天的记录累加在前一天记录后面,按照这样的方式不断累积。由于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时候并没有预设和假定,而影音资料可以依据标准预先设定好,所以田野笔记和影音资料是不同的。在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中,研究者并不是依据一些预设的原则通过抽样来选择要写的内容的。相反,它既是直觉的,又是移情地,分别反映了田野研究者对读者和被研究者可能认为有趣或重要的东西的感觉。

对于做田野笔记的启示

我们认为民族志是可供分享的记录,从这一理解中可以得到四点启示:(1)研究者观察到的以及最终分析的数据、发现与实地观察的过程不可分割。(2)研究者在做田野笔记的时候,要特别关注被研究者赋予事件的意义以及他们的关注点。(3)同步性的田野笔记有助于研究者对他人生活和关注点进行更加深入、连贯的记录。(4)田野笔记应当记录人们日常生活和活动中社会性互动过程的细节。

“方法”和“发现”不可分割

参与并发现他人日常生活的模式是田野研究方法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些“方法”决定了研究者的所见所闻。如果实质内容(数据、发现、事实)是所用方法的产物,那么实质内容就不能独立于方法之外。研究者的发现与他是如何发现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方法不容忽视。更准确地说,它们应该构成田野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田野研究者自己的行为、所处的环境和情感上的反应会影响他观察并记录他人生活的过程,所以他就很有必要记录下这些因素。^①

从这一点来看,将田野笔记的数据和研究者的反应,将田野笔记的记录和研究者的日记(Sanjek 1990c)截然分割开来是错误的做法。虽然田野研究者可以将他自己的言行从他所观察到的他人的言行中分离出来,认为后者没有受到前者的影响^②,但是这样的分割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扭曲了研究过程和田野“数据”的意义。首先,这种分离将数据视为具有确定意义的“客观信息”,与抽取信息的方法和抽取信息的人没有关系。这样,在做田野笔记时,研究者自己的行为,包括他的“个人”感受和反应,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或者无关于事件的,而只有那些出现了其他人的事件才被视为“发现”或者“观察”。第二,这种分离假定研究者“主观的”反应和理解可以并且应该通过与“客观的”、非个人的记录的分离开来而

① 很多田野研究者已经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田野研究中如何影响最终研究发现的多种途径:尤其参见 Clarke(1975), Ellis(1991), Emerson(1988: 175—252), Georges 和 Jones(1980), Kleinman(1991) 和 Reinharz(1979)。

② 正如一些研究者(Clifford 1983; Stoddard 1986)已经提到的那样,研究者获得的田野数据(更广泛地说:“科学数据”)看起来是客观的、权威的,但是人们其实忽略了研究者本人、她的研究方法、写作方法对数据的影响。

加以控制。最后,这种控制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个人的、情感的体验受到贬低,被视作危及客观数据的“污染物”,而不被认为是有助于洞见重要过程的渠道。

在田野笔记中将方法和实证联系起来有以下好处:促使人们意识到“发现”是研究者在田野环境中随时都可能遇到的,而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此外,阻止或者至少阻碍研究者轻易接受某个人对事情的看法和对重要性的把握,而把某个人的看法和把握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完整的”和“正确的”看法。更准确地说,“已发生的事情”是某个研究者根据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向特定对象给出的一份文本。从以上几点看来,研究者通过把方法和实证联系起来,增强了自己对被研究者所处的多重的、情境的现实的敏感度。

对本土意义的追求

一些研究只关注他人的行为而没有系统审视这些行为对于被研究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与这些研究不同,我们认为民族志就是致力于揭示、描写本土性意义。参与的最终目的在于接近被研究者,以此来理解他们的经历和行动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所具有的意义。^①

田野研究者必须尽力在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捕捉和保留本土意义。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必须认识到并且减少他们对他人生活和行为的预设和偏见。他们必须处在被研究者自己的语境中,对他人的关注点做出响应。由于田野笔记是关于他人的,他人的

^① 本土性意义提供了“其他世界的内部记录”(Marcus 和 Fischer 1986:26),标志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阐释人类学”的诞生。

关注点和行为是研究者通过同情的沉浸而获得的,所以田野笔记必须反映和传达作者对这些关注点和行为的理解。因此,田野笔记是经过研究者个人以及他自己的观点过滤后的、关于社会成员的经历和关注点的书面记录;田野笔记为研究者,而不是社会成员,记录了后者的经历、意义和关注点。

学者们一开始认为,一些关注“多声重叠”(Clifford and Marcus 1986:15)的民族志,或者试图让被研究者“说出他们自己的声音”的口述史和女性主义民族志(Stacey 1991)能够有效避免研究者的介入。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况下,研究者仍然在选择观察什么、对什么提问,或者在大的方面确定访谈的性质和目的,通过这些行动研究者不可避免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参见 Mills 1990)。

同步做田野笔记

有人认为田野笔记充其量是拐杖,在最坏的情况下还会束缚手脚,相反,我们认为田野笔记使得我们可以深入理解田野研究者是如何捕捉和阐释他人的行动和关注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笔记展现了研究者对他人生活、惯例和意义的细微而复杂的理解。

正如前面讨论的那样,田野研究者为了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就试着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学会像他们那样经历事件并赋予事件意义。因为时间的流逝会冲淡研究者在最初接触某种未知生活方式时所产生的想法,所以他们在学习和再社会化的时候,立即记录下这些微妙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研究者在田野中待了很长时间,那么他最初在适应和发现他人认为有意义的东西时产生的感觉就会慢慢消解;早期对微妙结构和潜在紧张的感觉就会变得迟钝。简要地说,田野研究者不是一下子了解他人的关注点

和意义的,相反,研究者不断在先前的洞见和理解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洞见和理解。研究者应该如实地同步记录这些过程和阶段,而不是根据最终对意义和重要性的阐释来重构这些过程和阶段。田野笔记帮助研究者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当时的情况,这就让对这些情况的深入反思和理解成为可能。

田野研究者所得到的关于被研究者和他们的日常活动的发现也是同样的道理。研究者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要尽可能真实地把它们记录下来,保存它们具体的、即时的特征,要不然等到将来回忆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很多细节,讲不出所以然。当研究者为了编码和分析重读田野笔记时,会从当时写成的笔记中发现很多与众不同之处,也会抽取出生动的记忆和形象。此外,在最终的分析中运用田野笔记中的精彩描述,可以创造一种立体感和多样性,以防止过度概括所带来的平面化。

描述互动细节的重要性

田野研究者接近他人以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持并向读者展现他的接近程度,他就必须详细描述一些有趣的情境和事件。当然,学界从来就没有有一套判定田野笔记是否达到“足够细节”的绝对标准。观察和描述的接近程度取决于研究者的兴趣点,而他的兴趣点受到自身个性、理论倾向和所属学科的影响。然而,大部分田野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一种密切的或者“微距”的方式(Geertz 1973:20—23)来观察事件,并在田野笔记中用详细精致的细节重述发生的事情。

除了对“微距”的关注,我们还采用了互动论的视角,因此我们希望研究者能够密切详细地记录互动的过程。首先,互动的细

节促使研究者对方法和材料之间的联系变得敏感,并且能够跟踪和分析这种联系。既然田野研究者的发现都来自于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因此观察和详细记录互动的结果和情境就非常重要。第二,记录下活动的细节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了解 and 跟踪事件的过程,因此,有助于更好地对田野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过程性的阐释。我们认为田野研究尤其适合用来记录社会生活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建立起来的意义(Blumer 1969)。如果研究者关注互动的细节,那么他就更可能看到超越固定、静止的实体之外的东西,更可能在动态之中把握社会生活。我们建议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时候详细描述互动的过程,以及社会成员如何在这些互动过程中创造和维持特殊的地方性社会事实。

反思:写田野笔记和做田野研究

撰写民族志是一项积极的事业,它的活力来自于双重动力。一方面,田野研究者必须进入新的世界,建立新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必须学会如何以书面形式呈现自己亲历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理解。

人们很容易把做田野研究和做田野笔记对立起来。毕竟,研究者在田野中必须经常转换角色,一方面“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加入别人的谈话”(Lederman 1990:72),另一方面退出到一些更加私密的环境中记下这些所见所闻。一些研究者认为“真正的田野研究”就是与被研究者交谈并且聆听他人所说的话,这样的理解不仅降低了写田野笔记这个田野工作核心部分的重要性,而且笔记的质量也会大打折扣。“做”和“写”不应该被看成相互分离的活动,而应该看成辩证相关和相互依赖的活动。田野研究中的很大

一部分就是记录研究者与他人面对面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正如格尔兹所强调的:“田野研究者‘记下’社会过程,他将它写下来。”(1973:19)记录和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有助于田野研究者理解他在第一时间观察到的现象,因此,可以使他以新的方式参与,以更大的敏锐性倾听,以新的视角观察。

虽然田野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写作是他们的核心本领,但是他们常常在如何定义写作以及写作与田野研究的关系问题上产生分歧。一些人类学家批评格尔兹的概念“深度录写”太过机械和简单,也忽视了人类学家不是在写“正在发生的事”而是在写“已经阐明、确定的话语或知识”,因此,深度录写更应该被称作“转录”(Clifford 1990:57)。另一个对“深度录写”的批评认为它太过陷入“抢救民族志”的假设,“抢救民族志”可以追溯到博厄斯(Franz Boas)在语言和习俗消失之前“写下”口述文化的努力(Clifford 1986:113)。的确,田野研究者提出过很多种定义田野写作的方法。人类学家常用“翻译”(或者“文化翻译”)来指称将文本从一个文化转述到另一个文化能够理解的版本的过程。克利福德(Clifford 1986)和马库斯(Marcus 1986)用一个更加抽象的术语“文本化”来指涉民族志将“经历转变成文本”的生成性过程(Clifford 1986:115)。社会学家,特别是理查德森(Richardson 1990)认为田野写作的核心叫做“叙述”。

这些定义一般都将撰写最终版本的民族志和做田野笔记混淆在一起,虽然每个方法都强调研究者要在田野中随时写下所见所闻,但是它们都没有正确地阐明做田野笔记的关键过程和特征。首先,翻译指的是将一系列概念和术语重新引入另一个语言系统,也就是说,田野研究者希望找到可以比较的概念和相似的术语。

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时候,即使是在为自己做田野笔记的时候,也常常阐释、翻译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形成文本。当然,在撰写最终的民族志时,作者不仅翻译概念,而且要向可能不太了解情况的读者们介绍被研究者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第二,叙述适合指称研究者把一天的经历写成田野笔记的过程。但是,不是所有的生活经历都是连贯的故事:叙述可以将没有明确结果的、杂乱的互动编辑成连贯的、内部勾连的故事。因此,尽管很多田野笔记都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研究者一天的经历,其中的大部分田野笔记缺乏能将一天的事情串联成一整条故事链的整体结构,因此,田野笔记中讲的故事一般都是片断化的。最后,文本化显然不仅是在撰写最终民族志的过程中,而且尤其是在做田野笔记的时候,明确关注从研究者的经历到书面文本的转化,这种转化首先出现在最初的、多样的田野笔记中。此外,这些田野笔记预示着最终的文本!

总而言之,动态的、开放的田野笔记写作过程体现了以上定义所指出的所有特征。田野笔记从来不是简单地记录下社会世界的情况,研究者除了记录观察到的现象之外还有其他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基于研究者所选择的写作方式以及他讲述的故事,田野笔记展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她写的东西向那些不了解当地生活、人们和事情的读者传递了她的理解和洞见。田野研究者在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将发生的事转化成文本。更准确地说,这种写作是阐释的过程:是文本化的最初行动。的确,这份常常“看不见的”工作——做田野笔记——是最原始的文本化,它使一个社会世界跃然纸上,并且最终塑造了发表的民族志文本。

第二章 在田野中：参与、观察和速记

民族志学者最终将以某种书面的形式记述他们在田野中所看见、听见和经历的事件。然而不同的民族志研究者,甚至同一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将观察和经历所得诉诸文字的方式都会有所不同。某些学者着力突出自己对当地活动的沉浸以及他们对研究对象所经历的生活的参与和体验,而将如何记述这些事件的任务暂时抛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集中关注于去哪里进行田野研究,观察的对象是什么,在现场如何交流,如何提问等方面的问题,以期对研究对象的生活以及与其攸关的事物能有全面的了解。在进行田野研究的时候,这些研究者对事物本身的关注很少会从“怎样记录下来”的角度来进行,甚至都无暇超然事外地予以纯粹的“观察”。事实上,民族志研究者在研究期间是真正长期生活于某一特定的情境下而并非简单地定期探访被研究者的生活场景,而这种情况在西方人类学家研究那些言语不通、生活习惯迥异的非西方文化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突出。这时研究者别无选择,只能够尽力参与到那些生活中去而暂时停止考虑如何去写作了。举例来说,一名研究非洲当地妇女生活的女人类学家,很有可能发现自己总是忙着帮助收集可食用的绿叶植物以及照顾孩子,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做田野笔记了。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她能够最充分地了解非洲妇女是怎样身兼工作、参与社会生活、抚养孩子等数职的。也只有在经历过这一切再进行反思的时候,这

位女人类学家才能对自己在学习和经历非洲当地妇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了充分的咀嚼和体味。

抱有上述观念的研究者对田野工作中涉及的各种情境都自然接受,他们努力的重点是凭借整体论的思想或者掺杂一些个人直觉来解析被研究者的行为。出于对在沉浸中分心于做田野笔记将冲淡异域文化所带来直觉与洞见的担心^①,研究者会搁置那些有关做田野笔记的想法(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把这方面的考虑降到最低或者全然不去考虑)。而只有到了研究后期的某一阶段,研究者们才会重新回忆和检视他们的这段田野工作经历以便使之见诸笔端。

然而民族志学者也会以某种需要更加即时而直接地加以描述的方式参与田野研究。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找到合适的研究点”,观察到引人入胜而又意义重大的事件从而能对这些现象给出详细的文本记录。这样,田野实践中观察所得的结果将更加适合于田野笔记的写作。从另一个极端来看,研究者也会有意识地寻找并关注那些值得记录下来以供研究的事件;他会置身于那些能够被观察和记录的场景,也会在对这些场景的观察与研究带上“我要找到那些重要并且值得记忆的事物以便将来予以记述”这一明显的价值倾向。

显而易见,前面提到的两种参与田野研究的方式各有利弊。如果研究者采用“体验方式”(前一种方式),那么他对研究所关注的日常生活和普遍关注点的沉浸将变得更加深入,从而将对他人

^① 比如,Jackson(1990b:23)引用了几位强调纯粹“做”田野的研究者的话:“田野笔记会有妨碍,它扰乱了田野工作的全部,即做田野研究”;“我认为田野工作不是在田野中做记录,而是研究者和所谓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

生活的观察和研究置于更加开放的视野中。而如果研究者采用“参与-写作方式”(后一种方式),那么他将有可能对他人生活进行更加细致、更具有时效性的描述。而在实际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对这两种方式的运用通常并无偏废:有时全神贯注于当前田野研究中的事态而不纠缠于将来如何记述眼前的事物,有时又心无旁骛地关注某一事件以便之后给出适当的描述。随着田野工作的开展,研究者们有时也会经历两种研究模式的相互转换。举例来说,当研究者置身于某些社会事件的时候,他就会倾向于探究这些现实生活背后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与解释;反过来讲,当研究者全力于超然的、以写作为导向的观察中时,也很可能突然之间被直接卷入所观察的事件而没有置身事外的余地。^①

不管采取上述哪种方式,民族志研究者或早或晚都将在观察和经历了他们感兴趣事件之后完成他们的田野笔记,正如某位人类学家的评论“人类学家就是在晚上记录下当天事情的那种人”(Jackson 1990b:15)中所体现的那样。在“体验方式”中,做田野笔记这一过程可能被推后数小时或者数天之久,直到研究者离开他所工作的田野,面对便笺簿或者是电脑,通过回忆来重构那些重要事件的时候方才开始。^② 而在“参与-写作方式”中,做田野笔记

① Jackson (1900b: 25) 举了一个说明前一种模式的例子,引用自一位在现场中体会到澳大利亚土著人对土地所赋予的象征意义的人类学家的原话:“你会发现人们在进行任何形式的长时间交谈时,总是蹲着或者躺在地上。部分由于我也必须学着他们这样做,于是身上总黏着很多灰,所以我对他们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好奇。”Pollner 和 Emerson (1988: 244) 为后一种模式举出一例,即原先被边缘化或者游离于被研究者之外的观察者,在一次入户心理评估中突然被置于场景的中心位置。

② 一些强调沉浸的田野研究者可能会推迟对田野笔记的系统写作,常常直到他们最终离开田野之后才开始做田野笔记。而我们建议研究者一定程度上在田野研究的同时做田野笔记,因此我们不会讨论如何在感兴趣的事情发生很久以后做田野笔记的技巧。

或者对田野笔记的构思在田野工作中就开始了,也许与所要记录的言谈或者行动同步进行,因而开始得更早。这种记录并不仅仅采用默记或者“头脑笔记”^①的方式记录完整事件的一鳞半爪,而是同时以速记、草稿、缩略语或者是词组的方式记录,以便之后构建出完整的田野笔记。

不论采用何种模式开展工作,怎样与试图加以了解的人群之间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都是田野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为了更加自然而开放地评价研究对象所处的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活动,田野工作者们尽量避免写作活动影响和打扰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业已形成的良好关系。研究者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使自己与所关注的对象不会产生疏离,同时也是因为研究和写作本身很容易就会使那些已经与研究建立紧密关系并且分享生活隐私的受访者产生一种被窥视和泄密的感觉。那些采用“参与-写作方式”的研究者,在与被访者建立并保持一定关系的过程中,会更加公开地说明自己的研究兴趣,也会在实际研究中公开关注这些研究兴趣。这些研究者因此会经历痛苦和煎熬的瞬间,对于是否将被访者的那些隐私的抑或是引以为耻的事件记入田野笔记而举棋不定。此外,由于田野工作中的笔录过程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被访者面前,因此这一过程会非常影响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关系的保持,田野工作者在做田野笔记时的态度与方式就不能不慎之又慎。

在这一章余下的部分我们将主要讨论“参与-写作方式”这一在田野工作中直接涉及做田野笔记的研究方式。这一研究方式使

^① 这个术语来自 Jackson(1900b:5)的作品,而他是从 Simon Ottenberg 那里借用而来的。

得参与、观察和写作这几种研究未知世界的必备方法相互渗透：一方面聚焦于学习怎样为了写作而进行观察，同时也使得研究者意识到写作是如何塑造和限制观察的。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首先讨论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所面临的到底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来做田野笔记这一问题。在此之后我们将就研究者如何带着写作目的在田野工作中进行观察给出一些建议。最后我们将给出研究者在不同的田野环境中进行速记的实例并讨论一些可能用以指导速记的原则。

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速记

研究者在用心观察田野工作中不断发生着的场景、事件以及互动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在头脑中默记下某些细节和自己对它们产生的印象。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印象将仅仅停留在“头脑笔记”阶段。但在某些情况下，田野工作者会把这些印象以关键词或者短语的方式速记下来形成一份简明的书面记录。研究者把那些在田野观察中发现的值得记录下来的一言一行，一挥而就诉诸纸面的方式，称之为速记。与观察同时或者稍稍滞后速记下来的一言半语能够在之后唤起研究者的记忆，从而使他们能够捕捉到观察中看到的那些有意义的行为或者采用富有启发性的方式描绘当时的情景。此外，如果研究者能够速记下更多的内容就有可能收录下一段对话或者被研究者对一系列问题给出的答复。因此，研究者在接触到一种新的语言时，就更应该将关键的表述和术语用速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通过“尝试-错误-尝试”的方式，田野工作者可以得出一套适

合自己习 速记工
具开始。 或者钱包
里面的便笺簿来速记。也有些田野工作者采用更加随意的材料，
比如手头一叠可以折叠的白纸，研究者就可以在不同面上记下与
不同主题相关的内容。与此相类似，研究者对记录用笔也会有自
己特定的习惯与偏好。

田野工作者完成速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鉴于逐字逐
句完整地记录既麻烦又费时，很多田野工作者做速记的时候都
会有一套自己的符号与缩写系统。更有甚者通过参加正式的培训
来学习各种速记技巧。当研究者建立了一套适合自己使用习
惯的速记方法之后，这套速记法一方面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加快
捷地记录下各种信息，更重要的是记下来的内容让他人即便得
到了这些记录也会觉得文字晦涩难解，从而保护了记录内容的
私密性。

田野工作者还面临另一个抉择：到底何时、何地以及如何速
记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一抉择远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
而会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带来重大影响。由于学科
性质的需要，研究者将尽一切可能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起紧密
的联系，因而极有可能接触被访者生活的核心深处。然而，处
于这种密切关系中的研究者又常常面临着巨大的两难选择：他
一方面希望通过速记的方式尽可能同时并真实地记录下所听到
的言谈和所看到场景的各种细节；而另一方面又会担心一旦取
出纸笔开始速记就会破坏这种和谐的氛围并且播下不信任的
种子。被访者则会觉得研究者的兴趣居然是窥视自己生活中的
隐私，而自己所珍视的个人生活片断在研究者眼里竟也只不过是

科学调查的对象罢了。^①

几乎所有的民族志研究者在试图保持与被研究者良好关系的同时又希望尽量揭示他们所处的世界,而这些时刻却总难免使人感到无法处处兼顾。面对这些复杂而又牵扯到伦理道德的议题,很多研究者认为在被研究者尚未清晰全面地了解到研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并同意参与其中之前,开展任何研究工作都是有违道德标准的。依照这种观点,研究者在当地找的助手应该被看成研究者的合作者,他们一起将当地人的生活细节以及文化观念传递给外面的世界。这种相互合作要求研究者在征得被研究者同意之后才能将所观察到的事情诉诸笔端,并且充分尊重当地人希望对自己生活的某些方面予以保留的愿望。

而另一些田野工作者觉得事先把自己将要记录下研究过程中所发生和观察到的事件与经历这一意图告知被研究者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并非十分必要。这些研究者认为田野工作者并没有申明自己研究意图的特殊义务;正如没人能够真正做到完全暴露出自己所有深层次的动机和私人生活一样,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都包含了掩饰和伪装的成分。还有研究者指出纯粹私人的、以个人记录为目的的速记和田野笔记并不会对他人的生活带来直接意义上的损害。然而我们认为这种方式也仅仅不过是把所面临的道义及人际关系方面的痛苦抉择留到了将研究结果出版或者以其他方式呈

^① Everett Hughes (1971: 505) 强调相比于最后出版的报告,研究者对被研究者个人问题和隐私的冷漠对待更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喜欢专门驳斥既成事实的历史学家偶然才会遇到的敌意在那些描写被研究者行为的人类学家那里都是家常便饭;研究者撰写报告的行为并没有怎么惹恼被研究者,更让他们不舒服的是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对他们进行客观的分析。”

现在他人面前的时刻罢了。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主张只要最终得到的信息能够产生更大的收益,不妨暂时把研究目的对田野工作涉及的相关人员有所保留。举例来说,当研究者试图调查乃至发表工厂里非法劳工或者养老院中垂垂老者的生存状况时,或许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向管理者隐瞒自己的研究目的。

为了避免过度利用被访者的信任,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尴尬时刻甚至是紧张对峙,那些刚刚开始田野研究的新手们往往在田野工作中采取隐秘的方法,试图隐藏自己正在进行研究的事实,或是等到离开田野之后才进行速记。尽管这一策略既考虑了研究者的学术良心也考虑了实际操作的问题,我们还是建议田野工作者在研究的一开始就将研究目的告诉涉及到的人员,而这一点对于那些已经与田野工作者建立了某种私人关系的人们来说则显得尤为重要。开诚布公除了对发展诚恳而直接的关系有所裨益,也降低了被研究者日后揣测出田野工作者的实际意图时所产生的被利用和被出卖感的风险。如果田野工作者执意对被研究者有所隐瞒,那么对被研究者有朝一日反过来窥探到自己用意的担心将会随着研究的进行和双方关系的加深而与日俱增地折磨着研究者自己。

当然,研究者可能面临的紧张关系和道德困境并不会随着他坦陈研究目的而完全得以避免。即便是被研究者同意接受研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准确知悉了研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以及研究者将具体怎样进行这一研究。^① 他们也许意识到田野工作者会在—

① 被研究者不了解田野研究者正在做的研究的原因,部分是因为研究者的分析目的和关注点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并不是预先完全确定的,而是随着对当地生活体验的加深而不断改变的(Wax 1977)。就像 Thorne(1980:287)所强调的,“田野工作者进入田野的时候往往对研究目的并没有确定的想法;他们倾向于采用归纳的方法,可能会随着研究的推进改变自己的兴趣点;有时候,现实中发生的紧急事件也可能迫使研究者大幅改变原先的研究计划”。

天结束之际做田野笔记,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习惯于研究者的存在,他们就可能“淡忘”这种记录的过程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另外,对于那些并非研究所关注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临时出现在场景内的人员,若非研究者进行善意的提醒,他们也许并不会注意到研究者的身份和他的研究目的。

当研究者以公开的方式当场做田野笔记的时候,那么诸如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做田野笔记等方面的问题都会因此变得更加灵活。在很多情况下,公开地做田野笔记也许是切实可行的方式。然而研究者在当场做田野笔记的时候应该非常小心谨慎,避免妨碍或干扰自己与观察对象之间的正常关系以及现场所正在发生的一切。只要现实条件允许,研究者应该尽早获得观察对象的许可从而能够当场直接做田野笔记。当研究者将自己成功塑造成“记录者”的角色时,被研究者就把研究者做田野笔记这一行为当作他们预料之中的事情了。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做田野笔记的必要性提供原初解释:研究者重视文本的准确性,也就是说逐字逐句地记录下现场参与者所讲过的话。人们通常能够理解在学习过程中做笔记对于一个中学生的重要性,因而也应该能够容忍和接受那些力图忠实记录事件来龙去脉的研究者在现场做记录的需要。尤其当田野工作者学习另一种文化中的语言时,可以向被研究者解释他记录下当地特定用语的目的在于帮助自己记住它们。而当研究者把他们记录下的语句说给被研究者听的时候,也许会进一步激发后者提供更多的当地用语,也促使他们更有兴趣教研究者这门语言。

尽管当场做田野笔记在开始的时候显得多少有点古怪,一段时间之后被研究者就会接受研究者需要做田野笔记这一事实,甚

至还带着些许期待。下面的片段描写的是住房和城市发展办公室的办公室主任和职员开玩笑即兴表演“帮助”客户的自嘲戏剧,并让田野工作者充当观众:

后来,我待在让(Jean)的办公室里,这时拉蒙(Roman)进来了。他以情节剧般的语调冲着我说:快把这个也记下来。让(Jean)做了些动作让我写,于是我掏出便笺簿开始记。“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只剩下八个小时来献身于帮助”……他开始以傻傻的而又厚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唱“不可能的梦”……“跟我一起唱”,他说……

在这一片断中,研究者和他做田野笔记的行为被研究对象拿来开玩笑。^①

尽管一些被研究者已经对研究者公开做田野笔记感到习以为常,还有一些人对研究者取出便笺簿记录下自己的点滴言行仍会感到不快。田野研究者可以试着将自己置身于场景的边缘位置来避免对那部分人的刺激从而仍旧能够公开而充分地做田野笔记。即便如此,研究者还是会面临各种困难,正如一位田野工作者在观察法庭上的离婚调解程序后所作的如下评论:

我希望尽可能把整个调解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为了能够在

① 类似的,被研究者常常幽默地谈论正在做田野笔记的人类学家。下面的例子还是来自住房和城市发展办公室:“当山姆考虑把他的办公桌放在新办公室的什么位置的时候,职员们正在谈笑着。我听到一个职员说:‘我希望鲍勃没有把这个记下来。’我问:‘你说什么?’‘哦,我只是告诉山姆这样就可以把他的弯刀放在办公桌后面了。’他们又笑了起来。”

做田野笔记的时候不显得那么突兀,我坐在了委托人身后,而并非出于研究方法上的其他考虑。虽然我所做的大量笔记(每次开庭大约有50页)看起来似乎没有打扰到委托人,一些调解员倒是对此比较排斥。有一位调解员想知道我是如何决定“哪些是要记录下来的而哪些又是不需要记录的”。在工作人员会议上,那个调解员总会坐在我身边,试图看看我到底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

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及与此类似的种种复杂状况,田野工作者必须不断地运用自己在人情世故方面的技巧与才智来判断在某一具体时刻做速记到底是否恰当。^①

此外,在被研究者习惯于研究者当场速记的同时,又往往会对特定事件和话题是否值得做笔记形成自己的预期。他们也许会反过来询问研究者为何记录或者不去记录某些事件;当他们看到研究者并没有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时又会产生某种不被重视的感觉。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片断来体会这种变化,这个片断描写的是那位研究离婚调解的田野工作者就刚刚结束的庭审过程采访某位调解员并当场做笔记的时候发生的状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问答之后……[调解员]在我快做完田野笔

① 这里可以提出的更深入的问题是:人类学家会不会在完整的田野笔记中写到他之前特意没有速记下来的或者被要求不要记下来的事情。一方面,田野工作者可能会认为田野笔记是他自己私人的(也是科学的)记录,因此他可以写任何他想写的东西。如果这样做,研究者就不需要考虑是否在论文中采用某些田野笔记片断,不需要考虑这些片断会不会被读者看到。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可能感觉到自己受到某种默认协定的约束:不论这份材料将来是否会给别人看,研究者在完整的田野笔记中要避免涉及当时没有速记的事情。采取这种方式的研究者更加重视他与被研究者之间个人的、伦理的关系。

记的时候开始画眼妆。她厌烦地扫了我一眼,说:“你把这个也记下来了?!”“这个”指的是她画眼妆的行为。

因此,研究者在公开速记的时候需要仔细把握自己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处于何种情境之下。^①

当场做田野笔记不仅可能影响研究者与那些发现他在做笔录的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影响研究者自身,使得他们的注意力从正在进行的谈话和事件上分散开去。当研究者过分专注于做记录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忽视那些转瞬即逝的表情、微妙精细的动作甚至是某些关键性的内容。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原因促使我们并不建议研究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当场做速记。在某些情境下研究者的参与至关重要以至于没有机会停下来做笔记;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不得不更多依赖大脑的记忆,只关注那些将来能够帮助自己回忆起整个事件或者场景的关键性细节。举例来说,当研究者在某个只有少数社会成员会写字或者只在少数场合写字的村庄里进行研究的时候,如果他还是忙于记录而不到村庄里通宵跳舞,那么他恐怕就无法维持好与研究对象之间应有的社会关系——对于那个人际关系密切的村庄而言可算是一种严重的冒犯了。

为避免这些问题,即便是那些通常总以公开方式现场做速记的研究者也会在某些时候躲开被研究者的视线私下里记录一些事

^① Goffman(1989:130)建议研究者不要在事情发生当时做速记,这样就可以降低被研究者的负面反应(比如,“由于被研究者可以通过你何时动笔来了解你记录了哪些事情,所以不要速记你正在观察的事情”),但是这样做也可能以其它方式冒犯了被研究者,因为在被研究者看来研究者所速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情。他们等到某个场景、某件事件或者某段谈话结束之后,才走到一处私人空间记录下值得回忆的词句。田野研究者可以采用当地人常用的方式“退出”或者“离开”。田野工作者的私人空间可以是浴室(Cahill 1985)、众人离去的餐厅、楼梯间或者储物间,他们参照当时的具体情况每半小时左右或者在某些重要事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周期性地去那些私人空间做速记。某些田野工作者在田野中时不公开做任何笔记,然而一离开田野就会及时拿出笔记本记录下有关关键性事件、言语或者人们的反应等等的提示字句,以便将来写入完整的田野笔记。这一方法使田野工作者在不冒犯被研究者的同时保留了需要记录下来的种种条目。

研究者也可以采用介于公开和私下之间的方式做速记,特别是当速记成为他的任务或者是所扮演角色的一部分的时候。而现场的其他人并不一定清楚地知道田野工作者是在为研究做记录。举例来说,某个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学生负责在律师会见委托人的时候做笔录,而她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做田野笔记。这个学生说尽管她在做速记的时候并没有讲明,但是律师和委托人都意识到她正在做某项研究。当田野工作者正在做的事儿并不能正好成为他们做速记的理由时,他们则可以利用其他自然而然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举例来说,田野工作者为了成为被研究者中的一员经常要了解熟悉他们所处的情境。被研究者认为研究者是该情境下的新成员,因此允许甚至希望他做一些笔记,而研究者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写下最初的田野笔记。

研究者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做田野笔记的策略会随着田野工作的进行以及田野工作者与被研究者关系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即便田野工作者与被研究者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个人关系,也仍然存在一些不适宜做公开记录的状况;在这些情况下,研究者一旦掏出笔记本就可能让自己和被研究者都觉得很不舒服^①。某个研究校园书店的学生在已经与店员建立起良好关系的时候——可以和店员公开谈论自己的研究——却遇到了下面的状况:

一个年轻的收银员注意到我最近进行了两段观察,于是走到我的面前,试探性地问我是不是其他校园书店的“密探”或者是不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我试着通过开玩笑给自己解围,就告诉她我是社会学派来的“密探”。但是她并没有听懂这个笑话,因而整个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因为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很少会遇到需要自己做笔录的情况,所以有时他们和研究者共处时看到研究者不时地在做速记就会感到不自在。特别是对于那些身处非文字文明中的人而言,观察并记录其他人的行为确实显得有些古怪。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把笔录和某些不愉快的事物联系起来,认为它本身就带有冒犯性,而且有可能带来某些潜在的危险。比如,当田野研究者仅仅因为想记住赞比亚乡间某位老者的姓名而将它记在纸片上的时候,这位老者就很犹豫是不是还要继续和研究者交谈下去。之后该研究者了解到老者做出这样的反应是因为在殖民地时期当地政府官

^① 比如,在乔克维,成人仪式(mwadi)中,某个年老的妇女正在通过模仿性行为来教一个年轻女子怎样“和丈夫跳舞(性交)”,如果田野研究者在这个时候做速记就会显得很不合时宜,而且可能受到被研究者的指责。

员经常到乡间记下当地人的姓名以便征税或者是分派政府工程的劳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得到当事人的允许可以当场公开做速记,明智的田野工作者仍旧会留心并避免记下那些当事人认为是私密的、尴尬的、过于透露内情的以及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事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当事人本身并不反对甚至强烈要求研究者记录下某些带有敏感性的事件。即使研究者预见到发表这些材料可能会让被研究者很尴尬或者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话,他们也可以当场记录下这些事件而留待之后正式完成写作时再决定是否使用这些材料。

总而言之,研究者拿出便笺簿开始记录人们在特定场合中的言行的那一刻,就给田野研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正因为田野工作者速记时采取的策略往往在被特定情境以及其中人际关系决定的同时也对后者具有反作用,所以这些策略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研究者应该在顾全自己与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前提下决定究竟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做速记。我们显然不建议研究者在身处某些特定情境或者处于某些特殊关系中的时候当场公开做速记。而在另一些适合速记的场合,研究者又必须设计好有针对性的方法来避免或者减少可能会发生的尴尬。研究者在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做速记这一问题上事先指定某种所谓的“最佳方式”的做法不但不可取而且在事实上也很难办到。那么就像田野研究所涉及的其他方面一样,值得推荐的方法是兼顾公开性与灵活性,随时准备好一旦现有方式对被研究者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就能够及时做出调整。

以写作为目的的参与

田野工作者首先要对观察和写作的方向有或多或少的判断后才可能决定某些具体的事件是不是需要记下来。然而对初学者而言,当他们面对整个田野调查流程的时候通常会对到底观察哪些事物才有可能推导出有潜在写作价值的议题而感到束手无策。我们在建议学生如何开始“以写作为目的的观察”的过程中总结出几种对研究者有帮助的规律。^①

首先,研究者应该把他们“最初的印象”记录下来。这些印象可以包括感官获取的信息——对物理环境的味觉、嗅觉和听觉,以及对所关注的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做的观察和得到的感受。这些印象又可以包括对物理场景的描述,诸如大小、空间、声音、颜色、设备、运动;或者是对当地人的描述,如人数、性别、族裔、外貌、衣着、行为、举止和气质。对这些因素的记录可以帮助研究者开始在看起来非常复杂的场景中展开研究。进入某个语言和习俗都一时难以理解的全新文化对研究者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尽管如此,研究者不妨把记录下这些看似奇怪的景象和言语作为开始理解它们背后逻辑的第一步。^②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会对田野中的很多独特之处失去敏感性,变得见怪不怪,因此,在田野笔记里记录并保存好那些

① Geer(1964)的文章讲述了她刚刚进入田野的情况,包括她所写的关于进入新场景这一重要时间段的详细笔记。这些田野笔记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田野研究者所关心的事件和问题;还详细说明了一些值得速记的问题。

② Gottlieb 和 Graham(1993)在叙述他们在非洲的田野研究的时候提到了记笔记的过程。

最初的同时也往往是具有洞见的印象是很有帮助的。研究者一旦在研究环境中工作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对这些环境变得相对熟悉,通常就不再能体会到对环境的第一印象了。这时,只要他们观察任何新近进入这个场景的人,尤其观察他是如何学习、适应这一环境的,就能够间接地回忆起自己当初的第一印象来了。

第二,田野工作者可以关注“核心事件”。刚开始的时候,田野工作者不得不凭借自己的经历和直觉从人们纷繁复杂的活动中找出值得记录的事件。举例来说,田野工作者可以关注那些自己预料之外的事件,并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突发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观感、印象和人们对此产生的言语的或者非言语的互动。

类似的,研究者可以凭借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令自己满意、吃惊甚至是愤怒的事件来决定哪些事情是值得记录的。研究者对某一事件产生某种强烈的情绪或许意味着身处同一场景的其他人也会有类似的感受。研究者有时会怀有强烈矛盾的感情——比如,对自己在田野中的所见所闻既感到值得同情又觉得有些厌恶。这一复杂的感情或许也能够反映出该场景下其他人所同时感受到的两种互相矛盾的力量带给自己的冲击。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如果希望有效地利用个人的反应来推进研究,则需要非常小心并且时时加以反思。许多初窥人类学堂奥的学生在记录下所观察到的事件之后,不加区分地用自己而非当事人的标准和价值观来加以评判。研究者以局外人的视角对观察到的事件做出预判断会妨碍他从当地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参见第五章)。田野工作者应当意识到当地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与研究完全不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在与研究者面对同一件事的时候都很有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比如,在

乔克维村庄做研究的田野工作者,也许看到通灵仪式上某人因为饮用致幻草药汁后不省人事就会急忙示警。但是他很快发现当地人对自己的手忙脚乱付之一笑,因为他们知道那位服药者很快就会自然而然地恢复神智。

然而田野工作者也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应该对自己的反应视而不见或者是干脆在田野笔记中略去不提。我们建议研究者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先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接着后退一步,带着自己的感受来更好地观察被研究者是如何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的:那些人们会像研究者一样意外、震惊、满意或者赞同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地人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做出反应的,又是怎样处理上述突发事件和涉及其中的人际关系呢?研究者不论是在与自己相似或者相异的文化氛围中做研究,都应该尽力避免事先把他人对事件的反应等同于自己对事件的反应。

第三,田野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根据自己的感受来判别事情的重要性,而应该对当地人认为“意味深长的”或者“重要的”事件始终保持充分的敏感性。那些能够吸引当地人注意的行为、互动或者事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提示他们内心关切所在的线索。田野工作者所关注的应该是那些对被研究者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到底怎样的事件会让当地人停下手中的工作而驻足观看?他们又会公开发表何种言论却私下传播怎样的街谈巷议?又是因为什么缘故使得他们在心底掀起轩然大波?我们知道“冲突”和“矛盾”能够引起被研究者的深切关注和强烈情感,那么在当地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和矛盾呢?人们又是怎样认识、阐释和处理这些冲突、矛盾的呢?在这些冲突和矛盾中,田野工作者可以记录下诸如“谁做了什么事情”以及“其他人的反应如何”等方面的

信息。既然身处陌生环境的研究者经常需要密切观察他人的行为并加以模仿从而融入当地的环境,那么记录下当地人的行为与反应自然能够帮助他们加强揣摩和学习的效果。我们强烈推荐一种“探究式”的策略,就是研究者在事情发生之后,访问那些牵涉其中或者见证事件过程的人,询问他们对于整个事件的认识与感受。

田野工作者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参与到当地人的活动中去,同时还可以了解当地人赋予这些事件的深层含义。田野工作者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互动的间接推断来探寻当地人的想法和关注点,而不是直接询问他们到底关心什么。比方说,田野工作者也许可以更加关注被研究者在日常社会活动中对人对事所做出的评价与判断。工作单位里的员工常常会举具体例子来说明哪些人是“好”员工,哪些人是“差”员工。研究者如果能够注意到这些评判,就能了解员工们重视的是什麼。田野工作者通过研究人们在交谈中如何给每个员工贴上评判标签就能更进一步从这些声誉中理解员工们的意义世界。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田野研究者并没有把被研究者赋予人或者事的意义当作静态的分类标签,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被研究者如何把这些意义运用到具体的人际关系和互动中去。这就要求研究者并不仅仅记录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要在田野笔记中所有涉及到这种互动的时候都始终写清楚“何时、何地以及出自何人之口”。举例来说,在制度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比如管理者和工人、员工和客户)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评价标准来判定哪些员工是“好”员工(或者是“差”员工)。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往往不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内部由于各自的职位和现实关注点的不同,会产生不一样的意义世界,因此这些不同之处要在田野笔记中有所体现。

每当研究者最初进入一个新场景的时候都应该广泛涉猎；他们应该做好准备同时留意一系列事件和互动。对陌生环境的短暂造访并不应该被割裂成一个个离散的、孤立的、走一步看一步的活动。与此相反，对某一类事件的观察和记录总是提示着接下来将要进行的观察与记述。如果研究者认为某个事件是值得记录的，那么他就会考虑还有哪些事件是与之类似的，因而那些事件也就具有记录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也不断明确，他就会自觉地搜集那些“属于同一类型”的事件和人际互动，并寻求其中蕴含的规则与范式。

然而即便当田野工作者寻找某一类事件的其他例子的时候，也会以开放的心态去发掘与此相悖的例子，以及不符合已有范式的例子。每当田野研究新手遇到不符合预期的事例总会感到大受挫折，担心这些不同于他们所提出的范式的反例会让别人质疑他们对田野的理解力。虽然研究者发现的差异和反例确实会敦促他修改、完善、深化自己原先的认识，但是事实上这些差异和反例是不会引起别人的质疑的。田野工作者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状况造成了这种不同与差异：这些不同的行为是参与者不同的偏好与气质所致，抑或是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对所处的状况有着不同的认识？或者研究者可以从更加本源的角度思考当初所定义的“相似”与“不同”，也许通过这样的反思之后，那些原以为不符合范式的事例现在看来倒是在更深层次上与范例有所契合。经过这样的一番思考，那些至少粗看起来不一致或者有差异的事例将在最终的文本里呈现出更加丰富、更有质感的描述和更加精妙、更有理有据的分析（参见第七章）。

总之，田野研究中的关注涉及两种取向之间的平衡。特别是

当一项新的田野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田野工作者常常凭借自己的第一印象和个人的反应来寻找有意义的事情。然而随着参与度的加深,田野工作者会对当地人的关注点与视角变得越来越敏感,他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当地人已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考虑使用自己的方式描绘了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一个敏锐的研究者固然会根据自己的见解来确定哪些议题可能对当地人的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然而这一“局外人”的见解当然也会服从“局内人”自身对重要性的描述和分类。

两个速记实例

我们在这里给出两个实例来告诉读者田野工作者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做速记的。这两个例子所关注的都是观察到的场景、动作和对话而不是评价或者心理阐释。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在社会场景中与被研究者进行互动,并记录下不同的感官性和解释性细节。

“他们并不是很出众”

下面的速记写的是研究者在俱乐部见到一位自称西班牙语摇滚音乐支持者的情况:

乔奇 = 坐在桌边 并没有向任何人介绍我是谁

现在光讲西班牙语

闲聊——是谁在演奏?

“他们并不是很出众”——抱歉

这段速记提到了发生在俱乐部里的几件事情,包括乔奇坐在哪里以及他之前讲的是英语而现在讲的是西班牙语。事情来龙去脉可以作如下梳理:乔奇并没有把陪他一起来的观察者介绍给其他人;众人在做一般性的交谈(闲聊);有人(并没有特别指出是谁)问“是谁在演奏?”(乐队的名称很可能已经介绍过了,但是观察者觉得非常容易记住所以并没有写下来);有人(并非观察者本人!)对乐队做出了评价,而观察者觉得这句评价是“抱歉”的意思(把她带到了这样一个俱乐部),因此为阐释这一评价的意义提供了互动的背景。

“你可以给他的医生打电话”

在下面这段速记中,一位妇女在法庭上要求临时限制她两位房东的人身自由,而其中一位房东并没有出席庭审。这个妇女认为没有露面的那位房东“身体健康,完全可以行走”,所以本应该来法庭受审。而出席庭审的那位房东辩驳了妇女的这段证词。

你可以给他在 UCLA 的医生打电话并且
 医生可以证明这一切
 我从不和人联系
 我是说以电话的方式——在法庭上是不能这样运作的——
 要么是以书面的形式,要么
 (面对面)

这段速记是作为被告的房东(上面的两行)和法官(下面的四行;根据这段速记写成的完整田野笔记请参见第三章)之间对话的片断。速记体现出法官对法律程序的坚持:他作为法官(“在法

庭上”)并不独立地调查诉讼人的陈述;相反,诉讼人有义务把所有证据带到法庭上予以展示。请注意研究者只速记了对话的内容,而并没有指明讲话者的身份,但是他可以通过上下文或者根据记忆而得出说话者的身份。除了最后一行,所有的文字都是在人物说这些话的时候尽可能准确记录下来的原话;最后一行,观察者没能记下法官这句话最后用了什么词(因为忙于记录前面的对话),因而加上了一句解释“面对面”(用括号标出)。

速记的记忆术:词汇和短语

上面给出的两个速记片断都是“(书面的)带有记忆术性质的词汇或短语,帮助研究者牢记某次观察的结果或者用来回忆某人讲过的话”(Clifford 1990:51)。研究者在速记中不会做完整的田野笔记,而是抓住那些最为关键的言行片断。根据这些片断,田野工作者就足以勾画出社会场景、反复出现的事件、当地特有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当地人的特征和陈述、在场的人们之间的谈话以及研究者自己参与的谈话。

速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撰写过程,它还同时涉及到了脑力的思考。要想使速记下来的细节仍旧清晰易懂,并且能够最终轻易地还原成鲜活的描写,这项技能的习得至少部分依靠研究者将场景想象成文字条目的能力。研究者写出能够激发回忆的速记材料的前提条件是学会哪些事物是值得记录的以及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记录。我们认为下面的几条建议在帮助研究者做出形象生动而带有启发性的田野笔记方面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田野工作者可以记录自己观察到的场景或者互动中最

为关键的细节。田野工作者在第一时间记录下言语和行动的片断,并在日后以此为基点调动记忆,以尽可能详细的文字描述还原出所发生事件。以研究西班牙摇滚音乐的研究者为例,她速记下了这样的细节:陪同她前往某俱乐部的家伙虽然在之前私下接触的时候讲的是英语,而“现在光讲西班牙语了”。她还写下了一句关键的直接引语“他们并不是很出众”以及短语“抱歉”,来提醒自己这句评论的背景和含义。

其次,田野工作者应该尽量避免以归纳概括的方式来描述人们所做事情。许多新手在刚开始田野工作的时候总是倾向于使用印象化的、主观性的词句,这些词句或许有助于写出一些带有评价性的总结,然而对形成细节丰富又充满质感的描述却帮助不大。举例来说,田野工作者用“效率低下”这个词来形容某人的工作方式就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当该田野工作者日后试图对这一社会场景做出全面描述的时候,这一模糊而带有评论性的速记给他带来的只可能是一段模糊的记忆,也没能说明其他在场者是怎样体验和评价工人的工作表现的。类似的,研究者在观察缓刑考察时速记下监督官作了“以学校为主题的发言”以及少年犯“非常顺从,总是对监督官的意见表示赞同”,就显得过于概括了;倘若要对这一具体场合下监督官和少年犯的言语与行为做出细致描述的话,上面那种总结概括性的速记所能起到的帮助作用并不大。

第三,田野工作者应该记下自己所感知到的言语和行为的具体细节。田野工作者对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所做的笔记应该反映出而不是直接告诉读者当地人的所作所为(参见第四章)。速记通过把细节汇总起来能够记录下确切的词汇、短语以及对话等田野工作者希望尽量准确保存下来的信息。举例来说,简单地用“愤

怒的言语”来描述一次情感的爆发是远远不够的。与此相对,田野工作者应当把被研究者当时所讲的具体词句,连同他的姿态、面部表情等所有与愤怒相关的细节全部写下来。这样做出来的速记不仅仅能够帮助研究者回忆当时所发生的事件,而且能够揭示引发这件事情的特定背景:当时有哪些人在场,他们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在大动的这场肝火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等等。以这种方式写下的速记才有可能清楚地呈现特定场景中所进行的谈话、话题和行为的来龙去脉。

田野研究新手在观察到某些场景时会试图找出深层次的动机和内在的状态。还是拿上述愤怒的场景为例,当新手目睹了这次剧烈的情感冲突之后,总想找出引发愤怒的原因:通常就是争吵双方或者其中一方愤怒的动机(比如说潜在的“不安全感”等等)。然而这些心理层面的分析,仅仅突出了那些可能伴随或者导致事情发生的诸多内在因素中的一个。愤怒的原因粗粗想来还可能来自受到的挫折、精疲力竭的感受、当地某些势力的角力或者是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而田野研究者如果仅仅目睹了整个过程中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他是没有办法确切知道到底是哪些因素引起了人们的愤怒。^①

田野工作者当然也不会忽略人们的感情因素;他们可以记下当事人在特定的情境下表达出来的诸如愤怒、悲伤、愉快、满足、厌

^① 当然,研究者也可以访问那些被研究者,直接询问他们自己的内心状态和动机以及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和看法。但是,这样的访谈并不能准确地回答以上问题,因此研究者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得出满意的答案。比如,可以参考 Emerson 和 Pollner (1988) 的研究,他们就一位心理健康诊所医生的工作环境和诊断过程写出了一份田野笔记,然后拿给那位医生进行评价,之后他们分析这位医生的评价时则需要非常困难的阐释。

恶或者是孤独的感情。比如,住房城市发展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在工作中不得不对那些急需住房的人一遍遍机械地“说‘不’”,研究者是这样描写官员对“不得不说‘不’”的情绪的:

劳拉面对我无精打采地坐在办公桌前,用手托着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在帮助别人。你不得不经常说‘不’,这构成了我工作的一大部分。这简直是从心理上折磨着你。(怎样的折磨?)虽然我没有学过心理学,但是它的确影响了我的情绪。”(转了转她的眼睛)。

这位研究者在笔记中并没有解释这个官员为何产生这样的情绪(尽管这位官员自己指出她工作的一个特点——“你不得不经常说‘不’”),他所强调的是该官员是如何表达出这种情绪的。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研究者不仅直接引用了官员的原话,也对她的身体语言做出了生动的描述(“无精打采地坐着”、“用手托着头”),还注意到了她引人注目的眼睛活动。

田野研究者在观察社会场景时需要通过自己敏锐的嗅觉来了解其他人是怎样理解和评价周遭事物的,他们的内心状态和心理动机是什么。因此有价值的速记应该能够反映和帮助研究者对人们之间的互动进行富有质感而详细的描写,而不是仅限于描写某个个体的动机。

第四,田野工作者应该记下那些很容易被遗忘但却很关键的细节。速记的目的在于为研究者日后将观察到的场景和活动写成更加充实而丰富的田野笔记提供回忆的线索。既然速记的目的在于帮助回忆,那么每个田野工作者就都应该学会判断自己可以用

大脑记住哪些细节,而用速记的方式记录下那些容易遗忘的细节。因此田野工作者应该建立起符合自己记忆特点的速记方式,这些方式可以是视觉上的、动作上的或者是听觉上的。某些学者偏好描写那些容易唤起回忆的广泛背景,而有的学者记录的则几乎全部是对话;有的学者偏重记录那些非语言的细节,比如声音、姿势和动作,另一些学者则保留了有关颜色、形状等视觉方面的细节。通过尝试-错误-尝试的方法,每个研究者都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速记方法,这些方法最能帮助他们在书桌前回忆出当时田野研究的经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完整的田野笔记。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速记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回忆记录下来这件事,还可以帮助他们回忆所记录的事件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以一个参与“幼儿早年教育计划”教学的田野工作者为例,她描述了自己在看护小孩子们做沙盘游戏的时候发生的一系列小事。她当时做了这样的速记:“沙盘里添了三袋新沙子”,而这些文字并没有出现在最终版本的田野笔记中。她在课堂上讨论田野笔记片断的时候说:“我觉得这些文字不需要写进我的田野笔记,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我记下它们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提醒自己那天的状况,那天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罢了。”^①

第五,研究者可以在速记中写下某些总体印象和感受,即使田野工作者当时并不清楚它们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田野工作者可能只是从直觉上隐约感觉到某件事情是重要的,而并不清楚地知道

^① Linda Shaw 对一些人类学学生进行访问,让这些学生坐在电脑前一边根据自己的速记和批注撰写田野笔记,一边把自己写作时的想法当场说出来。这个片段和本章以及接下来的章节中的一些片断都来自于这些访谈。

这件事重要在哪里以及为什么重要。这些感觉是一种关键的信号，提示田野工作者将来可能将一系列貌似不相干的事件组织成一幅有意义的画卷。还是那个在“幼儿早年教育计划”做田野工作的研究者的例子，她曾在速记中这样描述一个学生：“尼可对我表示出了信任”。虽然她也不打算把这句话写到田野笔记中去，但是“这是我在一天中得到的总体印象；……我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并不能想到什么具体的例子。”然而这句话毕竟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印象，促使她接下来留意（并记录）下面这个体现“学生信赖老师”的实例：

有一次尼可光着脚爬到秋千上并请我推她一把。我跟她说要是她去把鞋子穿上的话，我就会帮她推秋千。尼可停在那里看着我。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并告诉她在她去穿鞋的这段时间我会帮她看好秋千，这样她一回来就能马上荡秋千。于是，尼可爬下秋千，去穿鞋子。当她回到秋千这里时，我夸奖她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并拥抱了她，然后帮她荡秋千。我发现这件事情对尼可来说是个大进步，因为她往常根本不听老师的话。^①

在考虑过是否把速记下的这句话写进田野笔记之后，这个学生马上对“信任”这个议题变得非常敏感。这段速记激发她观察

① 研究者对这一过程做出了这样的反思：“之前我总写不出什么（具体的例子），我就是一点也想不出来。因为这些孩子的事情都挺琐碎的，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事情，所以看起来没什么重要的。但是我却记住了这件事，而且我也想记住它。当时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记住’。”

这段速记还反映了研究者的观点。她认为这件事不仅说明 Nicole “听老师的话”，而且体现了 Nicole 日常行为的前后变化。由于她在场景中担任老师的角色，因此她还将这一改变称为“进步”，认为 Nicole 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换成另一个仅仅做观察而不在此场景中担任老师的研究者，可能就会对这件事持有不一样的判断（例如，作为一个成年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使），不会立即评价 Nicole 做得“好”还是“不好”。

并记录下上面这个关于“信任”的具体实例。

总而言之,研究者一旦进入了一种一直需要留意做速记的状态,就会把自己经历的种种事件都视为潜在的写作议题。就像进行其他任何形式写作的作者一样,田野研究者必须学会寻找并发现值得写作的要点并通过细致的观察将它们写进田野笔记。学会如何带着写作目的进行观察对现场采集信息和日后的写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就这样,研究者慢慢掌握了怎样为了预期的写作目的而体验社会生活:像演员那样记住对话和动作,像画家或者摄影师那样观察颜色、形状、材质和空间格局,像诗人那样体味情绪、韵律和语气的起伏;在把生活细节转化成速记的文字时,尽量使用活跃的而不是了无生气的动词,体验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形容词,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而非高度概括的对话。

反思:写作和人类学意义上的边缘性

尽管田野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研究者全方位地“沉浸”在某一特定人群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经历中,然而研究者在某些方面还是明显游离于他们所研究的这个生活世界之外。所谓的“沉浸”并不是全然的“融合”;那些试图接近研究对象的研究者,虽然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可能与当地人几乎并无二致,但他们终究还是一群既抱有兴趣点又怀着研究目的的研究者而不可能真正成为当地人中的一员(参见 Bittner 1988; Emerson 1987)^①。研究者在参

^① 当然,一些田野研究者最终可能决定放弃自己的研究,这就是始终让研究者为之焦虑的“完全入乡随俗”的危险。另一些田野研究者往往由于不能忍受对一些事情和人物的描写所给自己带来的个人的和/或伦理上的背叛感,而决定不在田野笔记中涉及这些事情和人物。后一种情况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讨论。

与当地入生活中许多点点滴滴的同时,至少在某些方面依旧是个“局外人”。上文提及的那个在书店工作的人类学学生感到使自己变成“局内人”的压力很大,因此发现“研究者”的身份却变得难以保持了:

有好几次我都想一个人待着以便听听他们的谈话,看看他们都在做什么。但是我的朋友和熟人却总是让我分心,他们不停地上前与我交谈,以至于我一刻也闲不下来。此外,随着我对某些店员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们的人格魅力就越来越突显出来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恐怕要失去社会学的洞察力了——我不想觉得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利用他们。

田野工作者们对待这种压力有他们各自的解决之道。有些人即便面对他们喜欢和尊敬的人也尽量保持一种超然的、纯粹观察式的态度,从而将研究任务与个人情结区分开来。^①另一些人则认为对自己不可能对那些日趋熟悉的对象和日益涉足的事件总是维持着一成不变的疏远态度。这些研究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暂停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某些经历既不观察也不记录,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经历上。而且有些研究者慢慢地觉得与可能得到的研究成果相比,自己在田野调查中与当地入建立的关系更加持久、可贵,故而最终放弃了整个研究计划。

① 田野研究者通常采取一些互动的技巧来保持自己与研究者之间的距离(Pollner 和 Emerson 1988)。这些策略包括:直接“声明”不希望更深入地参与被研究者的生活、“为了不进一步深入而抢先采取行动”以及“一系列委婉拒绝的反应”(1988:243)。

田野工作者在研究中实际上面临着两个互相对立的过程：一方面，他要了解和研究他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他要以当地人的方式进行生活。只要这种冲突存在，他就始终是一个“局外人”。当研究者在一个村庄里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把自已当作日常生活中关系亲密的邻居甚至家庭成员。在这种情形下，他可能会“自然地”参与到当地的社会生活当中，而不再带有写作目的或者分析性反思。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会直接带着观察和收集数据的目的去参与当地的活动，他的目标就是做速记并最终以速记为基础细致地描述当地人的生活。这种为了撰写经历和事件而进行的观察，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特定的人类学视角。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建议研究者通过做田野笔记来创造和保持与周遭环境的某种“陌生感”；而田野笔记则体现和反映出这种既在社会意义上接近却又在实践上有所区隔的视角。^①

当田野工作者不再和当地人一起进行一些活动继而公开地在田野笔记上记录这些活动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边缘性”就体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做田野笔记作为一项关键而具有重要意义的田野研究活动，正式宣告和确认了田野工作者的研究职责以及他们与被研究者的不同之处，他们始终是“局外人”，而且肩负着描述当地社会世界的目的和任务^②。做田

① Jackson (1990a) 通过访问很多田野研究者来了解田野笔记的“局限性”或者“模棱两可的特点”以及他们当初的写作经历。很多田野研究者的回答都类似于下面这句话：“我逐渐慢下来。更关心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生活节奏。由于你感觉这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因此你会忘了做笔记。”(Jackson 1990a: 18)

② 很多田野研究者还通过摄影或者摄像来表明自己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参见 Jackson 1987)

野笔记这一行为一直在提醒研究者注意自己在田野中所处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位置,与此同时,也创造了这种边缘性,增加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离感和疏远感。

那么当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者,这里既包括刚入门的学生也包括富有经验的老手,对速记怀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场做速记干扰了他们与当地人的互动;而与当地人交流的同时又必须观察和记录所发生的一切又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事实上那些两手空空地从田野里回来的学生们总会说当场做笔记会让在场的其他人感到不快。这些学生亲身感受到做田野笔记使他们精力分散,而且被他人疏远。

大多数田野研究者则试着平衡和驾驭这两种趋势。有时他们只是参加某项活动而并不当场做记录,有时他们会暂时退回到私人空间里独自做速记,而有时他们则干脆在现场直接做笔记。上述两种趋向又会在实际写作中带来冲突和矛盾。一位更加倾向于以“自然”参与者的方式体验当地人日常生活的研究者,和一位更加倾向于以研究者面目出现的田野工作者,会在细节重要性的判定以及写作观点等一系列方面得出不同的意见。甚至研究者对自身身份的界定,作为参与者抑或是观察者,都会影响到他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做速记。研究者无论是以邻居的身份出现在乡村,还是以实习生的身份从事某项工作,当他做速记或者撰写形式更加完备的田野笔记的时候,都将面临两种角色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以此刻日常角色扮演为导向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以最终回归研究者身份为导向的力量。

总而言之,当场做速记在绝大多数社会情境下是一种奇怪而易受边缘化的行为,它将研究者限定于旁观者的身份而不能作为

一个与当地人一样全身心投入的参与者。但在如果我们暂时不去考虑其他人的反应,还是可以发现以写作为目的的观察能够使研究者保持观察者的清醒头脑,从而可以不时跳出眼前场景与事件的羁绊来评判它们到底是否值得记述。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些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采取全方位体验的模式,而把写作完全放到一边。但是因为那些有血有肉的生活经历终归要写成观察所得并整理成文,所以这种策略也只不过是推迟而并非全然避免了写作所带来的边缘化的危险。

第三章 田野笔记的撰写(一):从田野到书桌

大多数研究者在田野中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数小时的参与、观察,也许还有速记之后,都会回到书桌前,开始用电脑或者打字机来将他们的观察写成完整的田野笔记。此时,撰写田野笔记就成为民族志形成过程中的明确关注点和主要工作:在离开田野之后,研究者即可开始将回忆和速记转化为详细的书面记录,尽最大可能记录他注意到的并且现在感觉很重要的东西。

在本章中,我们主要讨论撰写完整的田野笔记的过程;我们将集中探讨田野研究者是如何通过回忆、阐述、描写以及评论田野笔记等等手法,来撰写关于观察到的场景和事件的完整书面记录。

在书桌前

撰写田野笔记需要大量集中的时间。田野研究者有可能花费几个小时去详细描写只持续了几分钟的事件;他尽力回忆谁说了、做了什么,是怎样的顺序,然后将这些诉诸纸面,写成前后连贯的段落。一句田野研究者的座右铭如此说道:一小时的观察需要额外花费一小时来撰写。长久以来,田野工作者形成了自己的节奏来平衡分配在田野中观察的时间和写田野笔记的时间。在一些情况下,田野研究者可能会订立观察时间的上限,以留下足够的时间在离开田野后用于写作。通过这种方式限制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时

间,可以降低他遗忘事情的概率,也可以使研究者免于过重的撰写压力。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刚刚入门的研究者在田野中观察三四个小时以后就要离开,去撰写田野笔记。

田野工作者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发现自己很难从田野中抽身出来写作。研究异文化的田野工作者一般白天观察晚上撰写田野笔记。作为正式员工的田野研究者必须工作一整天以后才能撰写田野笔记。在这两种情况中,研究者投入越长时间进行观察就需要他挤出越多时间来撰写田野笔记,也许还需要他使用不同的策略来使得撰写过程始终处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举例来说,田野研究者一旦在最初的几份田野笔记中描述了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节奏以后就会在之后的田野笔记中更加侧重观察到的重要事件。在这一阶段,在田野中待的时间越久事实上可能会使研究者有更多的机会观察到有兴趣的事件。

每天有固定工作的田野研究者可能会认为限定自己用于观察和速记的时间很有帮助,这样就留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把这些观察到的事情写成田野笔记。根据所选择的观察时间的不同,研究者可以观察被研究者一天当中的不同行为模式。当然,田野工作者在使用这个策略的时候也应该记录发生在其他时间的重要事件。

也许比田野研究者花多长时间进行观察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选择时间撰写田野笔记。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遗忘、简化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如果研究者在进行观察几天以后才撰写田野笔记,那么他就很容易进行总结概括,而剥离了丰富、细微的细节。因此,我们强烈建议研究者在完成白天(或者晚上)的研究以后尽可能及时撰写完整的田野笔记。

研究者在离开田野以后立即撰写田野笔记有助于借助他对当天发生的事情的投入和兴奋,写出更新鲜、更详细的回忆文字。的确,在离开田野后立即撰写田野笔记能够帮助研究者从所经历的事情的压力之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想法和精力集中在回顾、回忆和撰写这些繁重的工作上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相反,那些在离开田野后较长时间才撰写田野笔记的研究者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鲜活的经历逐渐褪色,撰写田野笔记成为一次繁重的,甚至可怕的经历。

但是,田野研究者常常不能在离开田野之后立即找到时间撰写田野笔记。比如,观察得太久或者太晚的时候,他也许会累得写不动。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地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开始撰写。有时候即使这样安排也不行:某个乡村活动可能前后持续几天,研究者此时需要决定是和村民一样睡在露天还是定时地停止观察,去睡觉和撰写田野笔记。

不论田野研究者从田野回来以后是立即还是在之后不久撰写田野笔记,他都应该立即坐在电脑或者打字机前,在完成完整的田野笔记之前不应该和熟人谈论发生的事情。这种“今天有点什么事儿”的谈话会使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时失去心理上的直接性,提前释放了感情;描写当天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走味的叙述,而不是宣泄般的倾泻。^①

田野研究者采用不同方式撰写完整的田野笔记。对于很多传

① 相比于时间的流逝对回忆带来的困难,不断参与到其他活动和社会情景中去会给研究者带来更大的难度。基于这种考虑,Goffman(1989:127)反对研究者将自己的配偶带进田野,因为“这会为你提供一个发泄的途径。你可以和他/她交谈,那么,你就不可能重现田野世界”。

统田野研究者来说,打字机是一种标准工具,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在便笺簿或者笔记本上手写田野笔记。当代研究者倾向于使用带有标准文字处理系统的电脑。使用文字处理系统输入田野笔记不但在速度上占有很大优势(打字慢的研究者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方法极大提高了速度和准确度),而且允许研究者在撰写的过程中随时修改字句,而不会像在笔记本上手写笔记那样杂乱,难以辨认。在电脑上写的东西很容易保存;而且很容易在适当的位置插入后来回忆起来的事情或者谈话。最后,使用文字处理系统进行编辑使得之后撰写民族志的时候对田野笔记进行编码和分类变得容易。

在田野中待了很长时间而没有足够的时间立即撰写田野笔记的研究者也有一些其他的选择。第一,他可以比较详细地动手速记下那天发生的事情,这些记录经常为推迟撰写完整田野笔记赢得一些时间。^① 第二,他可以用录音笔录下自己想记录的内容。研究者可以相对快速地“说田野笔记”,而且可以利用从田野驾车回住处的那段时间录音。但是尽管录音在研究者离开田野之际就保留了研究者鲜活的印象和观察,这些录音最终都需要整理出来,这是一项时间消耗较大而且昂贵的工作。同时,因为田野笔记以录音的形式保存,所以田野研究者不能直接回顾记录下的内容或者安排接下来的工作。

总的来说,刚刚入门的新人在撰写田野笔记时遇到矛盾的情况不足为怪。一方面,在一段长时间令人兴奋的或者消耗很大的田野研究之后撰写田野笔记看起来可能是一种单调的额外负担;

^① 比如 Sanjek (1990b) 提到他在整整一年以后才开始基于笔记本的记录撰写田野笔记;显然,当他在田野中的时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力去描写和记录事情。

另一方面,撰写田野笔记能够帮助研究者得到因表达而带来的释放以及反思的洞见。田野工作者在一天中看到听到种种吸引人的、令人惊讶的事情之后,终于可以坐下来进行思考,通过将这些事情转化成永久性的记录来重塑它们。撰写田野笔记在作者回顾当天发生的事情的兴奋之处和鲜活之时,会提供一个思维和印象输出的途径。

田野笔记撰写中的立场和读者

田野研究者坐下来撰写田野笔记包含了从田野中离开到“在纸上书写”以及到研究和撰写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研究者不是简单地决定写什么,他还要考虑以何种方式呈现和传递自己的观察结果。虽然一些决定相对简单,但是另外的决定就更加复杂了,取决于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立场,也就是说取决于作者对所谈话题和研究对象的定位和态度。不论研究者的立场是受到学科中某个理论流派的影响还是受到他自己个人的、道德的、政治立场的影响,这一基本立场都会体现在他撰写田野笔记时所采用的特殊方式中。

从根本上说,研究者在进行田野研究和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持有的立场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态度。研究者之前的经历、所受的训练以及理论兴趣点都会影响他在撰写田野笔记中所持的立场;这些影响促使他采用多少有些模式化的方式进行感知、思考和行动。不论这一立场是性别的、社会的、文化的或是学术的,它不仅会影响研究者在田野中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而且在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也会相应地影响研究者领会和表达事件的方式。

这些在田野笔记的撰写过程中由基本立场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比较微妙：这些影响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比如研究者由于认同（或者远离）研究对象因而在描写时怀着同情（或者不同情）的心态；研究者更细致地描写引起他注意的当地事件；研究者强调和表达特定主题的方式，因而将他认为相关的事件写得更加详尽。

田野研究者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基本立场就能够在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突出该立场所认为的重要问题和洞见，还会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如何形塑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比如，当研究者在一所专门为同性恋开设的学校进行观察继而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异性恋的男研究者会写学生们如何逼迫他承认自己的性取向，看他们对他们的笑话和戏弄如何反应。但是一名公开确定的同性恋研究者在同样的田野处境中则会对另一些话题更加敏感，如学生在日常交谈中建构同性恋认同的同时如何将他们的经历“色情化”。因此，他开始询问和记录学生关于性行为的谈话，请见下面的田野笔记：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故事。“在哪儿呢？”“在马戏团书店，”亚当说。“那他做了什么呢？”我一边微微笑着，一边略向前倾地问他。“他正在找性伴侣，”亚当说……“那是什么呢？”我问……“那是一个见面的地方，”约翰回答说。“就是在一个书店？”我带着一丝疑惑的口吻说。“是的，”他们两个人肯定地说。

田野研究者越能意识到那些影响自己对研究对象基本立场的因素，就越能在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审视和运用这种立场带来的洞见和评价。此外，他也会更好地避免自己压倒一切地、无意识

地表达某个事件——比如,避免使用评价性的语言或者侧重于描写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者对事件的看法。

随着田野工作的进行,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当他通过与研究对象的接触了解到他们看待行为、事件和问题的方式时,他就会更正自己之前的看法,重新调整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当研究者调整了自己对研究对象的立场之后,他在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不但会更加经常采用被研究者的视角,而且会动态地展现自己在田野中再社会化过程。田野研究者的个人观点和理论立场经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由于他越来越经常以被研究者的方式看待问题、对事情做出反应,因此他撰写田野笔记时的立场就会不断变化。

在撰写田野笔记中决定研究者立场的另一个核心因素是他所预想的或者未来最有可能的读者。田野研究者怎样描写他观察到的事情与他对于读者的设想紧密联系,这一点常常被学者们忽视。接下来我们首先讨论可预见的实际读者,然后转向讨论更细微但同样重要的更加分散的读者们。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时直接将自己视为一个未来的读者。因为缺少一个真实存在的读者,研究者可以以比较宽松、不断变化的方式撰写,不断变换自己的立场和读者,而不用担心(在那时)统一和连贯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田野笔记应该写得“松散”而流畅。如果研究者要将田野笔记展现给其他人看——通常以更加详尽的论文或者文章的形式——他此时就会对此过程有所把握;他可以在给别人看之前对任何笔记进行选择、突出、编辑。研究者作为他自己的田野笔记的未来读者,首先会详尽通读一遍田野笔记,为写论文的时候对笔记进行编码和

分析做准备。

根据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之后多长时间才会再次阅读笔记,他在最初的撰写中也会采用不同的写作方式。比如,学生会在近期阅读自己的田野笔记——比方说在某个季度或者学期结束时写期末论文的时候。经验丰富的田野研究者则会在更远的将来阅读自己的田野笔记,因此他会在笔记中写入充足而丰富的细节和背景,这样当直接的田野经验逐渐褪色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通过这些笔记感受到若干年前的场景。

但是,实际上,研究者的头脑中还知道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读者。尤其学生一般必须将田野笔记提交给老师,因此他们会将老师作为读者来进行写作。同样的,在团队项目中的田野研究者(Douglas 1976)会写笔记给同事看。田野研究者会有意识地针对头脑中想象的真实读者来写作,适应于读者的知识面和兴趣点。采用这种方式撰写田野笔记的一个基本效果就是研究者会在田野笔记中包括更多关于背景和情境的细节,这样田野笔记会变得更加易读。尽管如此,田野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应该尽力保持一种宽松、流畅而富有变化的写作方式,而不要一味试着保持语调和行文方式的一致性。^①

预想的读者对研究者撰写田野笔记的影响要比真实读者所带来的影响要微妙和复杂得多。^② 田野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时的

① 此外,田野研究者也许不希望将私人的事件展现在真实读者面前,不论是老师还是同事。我们建议研究者将这些内容写在另外一个单独的文档中,只给作者自己一个人看。研究者也许之后会觉得这个文档里的内容很重要,应该包括在最终的分析中;或者他可能会觉得这些内容太私人了,因此还是将其保密。

② Ong(1975)指出,研究者通过想象那些阅读类似作品的读者来设想自己作品的读者。因此,他会针对想象的读者来选择写作方式。

立场包括试着将他观察到的世界传递给那些对该世界不熟悉的读者。在这种意义上说,田野笔记最终是为这样或那样的局外人写的。的确,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田野笔记和个人的日记是不一样的;田野笔记不仅仅是作者本身为了提高自我认知和洞察力的个人回应;更是经过组织的供更多其他读者阅读的文字。

很多田野研究者是在为业内读者撰写,他们头脑中考虑的是最终发表的文章。尽管这些田野笔记也许还需要加工、润色,但是研究者写作的时候所面向的是那些对当地风土人情不了解的业内人士,目的在于为他们提供一份详细而全面的描述。一旦研究者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最终会面向更加广泛的读者,那么他所写的田野笔记就会更加丰富,会包括更多关于背景、情境和细节的内容。

这并不是说业内人士和其他读者能够立即理解“原始的”田野笔记。田野笔记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写作过程,后面写的内容是基于前面所写的内容。比如,在前面的田野笔记中描述的人和事不需要在后面的笔记中重复提及。研究者会在田野笔记中使用人物姓名的缩写,也会省略某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因此单从田野笔记来看读者并不清楚某一事件中的某个人物到底是谁。^① 只有补充一些信息,将事件的前因后果描述清楚,才能使读者理解田野笔记所写的内容。因此,研究者始终可以对不断累积的田野笔记进行编辑,添加新的信息和洞见。

在田野笔记的撰写过程中,田野工作者很可能不断交替地将

^① 就像一位田野研究者所说:“田野笔记也许可以这样定义:它不是别人已经可以理解的东西。”(Jackson 1990b:20)

自己和业内人士作为未来的读者。举例来说,当研究者以第一人称写自己参与当地活动的情况或者当他反思自己的情感反应或者对于下一步行动的直觉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些文字将来只是给自己看的,因此只要自己看得懂就可以了。相反,当描写研究对象认为很重要的某个事件时,这个事件很可能成为最终民族志的一个片断,研究者就会尽力将文字写得详细易懂。

总体来说,田野研究者的立场和预期的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怎样去撰写田野笔记,尽管当他有意识地为更广泛的读者撰写笔记的时候,这两者的影响更为突出。研究者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会时不时面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于怎样提炼、加工自身经历的选择。这些选择不仅包括观察什么以及速记什么,而且包括面向什么读者以及怎样撰写完整的田野笔记。对于学生来说,读者一般是阅读和评价这些笔记的老师,最终的读者——比如,学科内的教授们——也许也在此时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些未来的读者以及他们的学术旨趣始终影响着每个研究者。

撰写过程

田野笔记的撰写初看起来对研究者来说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看起来只要研究者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就可以简简单单地将他的观察写下来,而不用特别关注写作的过程。对于这种看法,我们首先承认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是研究者将所记得的事情写下来的重要因素,此外,我们还认为比较多种撰写方式会对田野工作者大有裨益。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目的和风格”、“为了撰写而回

忆”、“从速记到完整的田野笔记”、“多种视角”以及“实时和最终的描述”如何影响研究者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

多种目的和风格

田野研究者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带有多种目的,这些目的决定了他们的写作选择和行文风格。^① 最紧要的目的就是在自己经历的事情尚且鲜活的时候就将它们记录下来。因此,田野研究者在纸上匆忙记下一些文字;他们的记录读起来像一种倾泻,而不是经过雕琢过的、可供发表的片段。田野工作者一旦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记忆中的事情会慢慢褪色并且和之后发生的事情混淆起来,他就会在记录的时候使用任何当时最容易想到、最方便的词语和组织方式。他不需要考虑文字的内在统一性,只要打字速度允许就可以从一种风格、话题和想法转换到另一种。

在最开始写作的时候,田野研究者的精力集中于某个记忆中的场景,而不是具体的词句。如果研究者过早关注字句方面的问题,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编辑”,注意力从场景中移开,不能够顺畅地将自己的记忆输出。研究者在写作初期的目的是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记下最多的细节,而在此之后再考虑评价和编辑的任务。一个学生在她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提到:“我可能只是先将这些敲出来,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措辞,或者并不是最贴切地表达了我当时的感受。但是现在,我只希望将它们记录下来,之后再回头看。”

^① 就像 Flower(1988)所强调的那样,作者的目的是单一的、有意识的,而是一些互相关联的目标;在撰写的过程中,作者经常修改、调整这些目标。

在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研究者一方面尽量完整地描述观察结果,另一方面着力记录事情的精髓,他一直努力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有个学生在他尽力描写某一事件的时候写道:

现在我要停下来,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因为虽然我知道我想要说的是什么,但是就是不能一下子想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我还没到位,但是我必须考虑怎么说,所以我暂且把它放在那里。当我写田野笔记的时候,我就会尽力把所有的都写下来,回到之前记的东西,进行编辑,一段时间不看它,然后回过头来看这是不是自己想说的或者是不是有更好更清晰的表达方式。

田野研究者会一开始写下头脑中涌现出来的所有词句,之后再确定更加合适的措辞方式。很多作者因为明白他们之后会添加、润色字句或者调整段落,所以写初稿的时候速度会很快。因此,在第一轮写作中,找到对将来的读者来说最合适的词句不应该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这样会减慢研究者的写作速度。

总而言之,田野研究者在实践中形成了多种撰写田野笔记的风格和策略,我们建议初稿的写作就要像谈论一天的经历那样自然地组织起来,可以从主题和关注点的变化中看出作者视角的变化;像不同的人说话那样使用不一样的语言和句式;像很快的口述那样采用松散顺畅的措辞。由于这样撰写出来的笔记不是直接给读者看的,所以看起来很不精致。

在“写下来”之后,研究者就更加关注撰写田野笔记的其他目的。在写好一天的经历之后,田野工作者就会很快重读自己撰写

的笔记,在阅读的过程中加入字句和评论。^① 这些添加进来的内容可能把某段经历写得更加充实;可能是田野研究者对某段经历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的反思和评论;或者可能有意识地引导读者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解读某段经历。

这些不同的目的和添加内容可能会造成一组田野笔记内部行文风格的明显变化。初稿采用的是一种松散、零碎的写作风格;反思和付诸意义则在记录中加入了评论并提出了问题;设想一个有可能感兴趣的读者则促使作者写出篇幅更长、内容更详细生动的田野笔记。

为了撰写而回忆

民族志研究者在撰写完整的田野笔记时会使用一些标准方法来回忆和组织一天中发生的事情。策略之一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回顾研究者本人的行动和观察,按照观察和经历的顺序回忆出有记录价值的事件。另一种策略是首先回忆一些高潮或者特别生动或者重要的事件,尽可能详尽地予以描述,然后再叙述其他的重要活动、事件或者互动。此外,田野研究者为了回忆重要的事件也会更加系统地关注有关自己感兴趣的某个特定主题的事件。民族志研究者经常在各种策略之间进行融合或者替换,以意识流的方式在时间上不断往复。

正如前一章中所强调的,田野研究者并不是在坐下来撰写完

^① Perl(1980)敦促作者们经常重读自己写的东西,重新审视那些使自己重新对自己想说的“有感觉”的关键词或者短语。重新接触这种“感觉”能唤醒作者的精力。作者在这种“回顾性建构”的过程中不断推敲他们希望表达的东西。

整的田野笔记之前都会简练地速记下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些情况下,研究者只能从头脑中的记忆出发来回想当初看到的事情。此时研究者可能选取一些可供回忆的起点——某件重要的事、他在田野中的一天的开始——然后开始写作;或者从头到尾回忆一天中发生的每件事情,在回忆时逐个考量此事是不是有记录的必要。不论采用哪种方式,研究者在撰写之初都会列出一些事件和主题,然后在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覆盖列出的内容。

如果研究者是从速记(或者刚刚提到的为撰写做准备的、包括众多主题的列表)出发开始撰写田野笔记,那么整个过程就大不一样了。尤其在速记比较翔实的情况下,研究者就可以直接用这些速记来组织田野笔记:他只需要找到当天速记的开始,然后按照记录的顺序往后撰写,根据记忆进行一些补充,从而将速记的各个部分之间连贯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速记决定了撰写的过程,为研究者回忆田野中的经历提供了可能性,使得他们能够根据速记中的关键词和关键短语来唤起记忆。但是,研究者并不是基于速记就一定能回忆起所有的情况。更恰当的说法是,速记会使他们更有信心回忆并撰写他们在田野中认为有价值的场景。

从速记到完整的田野笔记

从速记到完整的田野笔记并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田野研究者必须通过回忆那些曾经给自己带来灵感的活动、事件和经历来将这些零碎的信息整合起来。即使只是写给研究者自己看的,这些描述也必须让人觉得是一系列有逻辑的事件和经历。

当研究者以速记为出发点开始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他不断穿梭于这些速记和自己对事件的更加完整、丰富的回忆之间。为

了更好地审视这些过程,请大家注意下面呈现的速记和田野笔记这两者在内容、结构和理解方面的不同。这个实例讲的是作者在一桩房东和租客的纠纷中听到租客要求法庭暂时限制房东自由的情况。

速记:①

[案件号]

马西娅·斯诺

托马斯

律师-艾滋病迈克

默菲

合法监护人

你准备好起诉了吗?

一个人—(两个)

很大剂量的化疗

我觉得他再也不能来了

这里

我知道他至少可以走路—

来(还加热器)—何时?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生

他可以证明

我不会给证人

① 这些速记是最初速写而成的,因此绝大部分读者是看不懂的。我们已经将速记转化为可阅读的形式。

打电话——我们在法庭上不这样做——证人必须将证词写在纸上
或者(当面作证)

—

迈克先生还我的加热器——
在走路

—

让我明确一下
你不希望起诉
只有一个人?

我希望起诉(是的,但是)
——如果他是他的合法监护人——但是

—

解决这个案子
10号部门——贝尔科夫法官
斯小姐,等一下

完整的田野笔记:

马西娅·斯诺大概20多岁,留着一头略长的深褐色卷发,穿着一身随意的蓝衣服,手上没有结婚戒指,但是和一个戴眼镜的看起来挺年轻的男人在一起。罗伯特·托马斯大约40多岁,浅褐色头发,留着杂乱的胡子,穿着红黑格子衬里的夹克衫。

法官首先问罗伯特·托马斯是不是有律师;他有律师,但是不在这里。他解释说他的商业合作伙伴迈克·默菲也在禁制令名单之列,但是他因为患有艾滋病,病得很厉害,所以今天没有到庭。“我是他的合法监护人,”所以我可以代表他。法官问马西娅·斯

诺道：“你愿意只起诉一个人吗？”马西娅·斯诺回答说她希望起诉两个人。罗伯特·托马斯接着解释说迈克·默菲三年前就得了艾滋病，接受了“很大剂量的化疗”，然后接着说：“我觉得他再也不能到法庭上来了。”法官问马西娅·斯诺是否知道迈克·默菲病得很重。马西娅·斯诺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我知道他至少可以走路。”我看到他走着去还他们偷的加热器。法官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没有听到她的回答。）罗伯特·托马斯说：他得艾滋病已经三年了，病得很重。“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生，他可以证明。”法官说：“我不会给他打电话，我们在法庭上不这样做。证人必须将证词写在纸上”或者当面作证。罗伯特·托马斯重复说迈克·默菲病得很重，他必须要照顾他，但是他不会再好起来了。但是马西娅·斯诺又进行了反击，说：“迈克·默菲先生给我还加热器的时候是走着路的……”

法官看了看马西娅·斯诺，问道：“让我明确一下——你不希望在只有一个人到庭的情况下起诉是吗？”马西娅·斯诺说：“是的，我希望他们两个都在。但是如果他是迈克·默菲的监护人，”我觉得今天也可以。法官同意了，说他会让另一个法官来解决这个案子，由贝尔科夫法官在10号部门进行审理。马西娅·斯诺和罗伯特·托马斯准备离开，但是法官说：“斯诺小姐，麻烦你等办事员准备好你的文件之后再离开。”马西娅·斯诺等了一小会儿，然后拿到文件，和陪她来的男人一起离开了。

与经过研究者高度选择和简化之后只记录了一部分观察内容的速记相比，完整的田野笔记讲述了研究者在法庭上看到的前后连贯的一步步发展的事情。这个故事很大部分来自于作者根据自

己的记忆所添加的细节。比如,速记中提到的简要“背景”经过研究者的充实变成了对诉讼双方(但不包括法官或者其他法庭上的常设角色)相对完整的描述。此外,这段笔记讲述了一个关于某个特定主题的故事——因为另一个被告没有到庭所带来的麻烦,法官就该被告没有到庭所提的问题,以及诉讼双方就此做出的反应。但是,这个故事缺少了一些重要内容(比如,这个案子是房东和房客之间的纠纷),也包括一些不能让人理解的内容(比如,马西娅说到那个没有到庭的被告“还他们偷的加热器”)。

我们在速记基础上撰写田野笔记时还需要注意对直接引语的处理。只有那些当场记下来的话才能作为直接引语,当时没有记下来的部分只能放在引号外面。因此,这个研究者当时速记下来的法官的原话,“证人必须将证词写在纸上或者(当面作证)”在田野笔记中是这样写的:“‘证人必须将证词写在纸上’或者当面作证。”一般来说,没有当时逐字记录下来的话语在田野笔记中应该不是以间接引语的方式就是以解释性的语言来呈现(参见第四章)。

总的来说,以速记为基础撰写田野笔记不是一项简单的回忆、补充的工作;实际上,它是一个建构相对连贯的行动链并且组织场景和人物的更加主动的过程(参见第四章)。在田野研究者将速记转化为田野笔记的过程中,他不断地组织自己在田野中的经历,发现并建构互动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他已经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的分析。他要对头脑中记得的事情和速记中写下的事情进行筛选,不仅仅是简单地决定写些什么,还要考虑不写什么。因此,研究者在撰写完整的田野笔记时虽然会很清楚地记得或者曾经在速记时写下某件事或者某个印象,但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而决定不

将其写入田野笔记。被研究者可能认为这些材料不重要,或者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与田野中的主要活动相比是一些边缘性的内容。

但是,田野研究者有可能在当天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或者在之后的某个时间,发现原先认为不重要的或者没什么兴趣的不论是速记下来的内容还是头脑中记得的内容都是很有意义的,需要写进田野笔记。一个学生在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基于不断地撰写和反思,意识到之前忽略的一段速记(给幼儿早年教育计划的沙盘“送三袋新沙子”)是有意义的:

我回想起来,当我们拿到沙子的时候天气的确很热,所以速记的确帮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因为天气很热,所以凯伦老师说孩子们可以在沙盘里把鞋子脱掉。通常情况下,这里有很严格的规定不许孩子们在任何其他地方脱鞋。这样的规定只是因为担心他们会直接从沙盘里跑出来,然后跑进停车场,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严格的规定。我正好碰到了这样一件事。

在上面的评论中,这个学生开始意识到(并且建构)她在速记中写下的三袋新沙子和她认为很重要的强制和控制之间的关系;正因为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作者决定将送来三袋新沙子作为一个事件写进田野笔记。而且,对于强制和控制的关注引导她去回忆相关的活动或“事件”;在这里她就回想起“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件事”,在田野笔记中将它写出来了。

由于在写作和思考的过程中一些事情的“重要性”会发生变化,我们建议学生即使当时认为某件事并不重要或者并不怎么相

关,也要尽量将这些“较小的”事件记下来。它们可能会提示与其他事件相关的重要过程,或者在作者后期思考的时候提供某种分析思路。作者即使在撰写某个相当连贯的故事之时也应该包括一些关系不大的活动和评论,因为这些活动和评论之后可能会为主要活动提供一些洞见。

多种声音与视角

田野研究者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不仅要回忆当时的场景,而且是从特定的角度呈现场景,该视角突出了一些特征而淡化了另一些特征。这一视角部分受到研究者学术取向的影响,同时也受制于研究者田野参与的本质——比如,他不可避免地需要选择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又比如他认同哪些研究对象的行为。因此,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重构了自己的记忆——从速记和记忆中得到提示——在重构中突出了特定的观察角度以及特定研究对象的经历。

研究者如同所有其他作者一样都会通过某种特定“视角”来讲述故事,因此他们在田野参与和记忆重构中都是有选择性的。“视角”一般是指描述事件的角度,比如通过谁的眼睛看到这些事情,使用谁的声音来描述这些事情,通过谁的视角向读者呈现人物、行动、环境和事件。尽管作者们使用各种不同的复杂方式来讲述故事,但是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人称,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和全知的视角(Abrams 1988:144—48)。

第一人称

第一人称“通过讲述者与其他人物的对话来描述所知道的、

经历的、推断的或者发现的事情”(Abram 1988:146)。在田野笔记中,“我”就是田野研究者自己。因为这种视角最适合用来叙述研究者自己的经历、反应和评论以及他人的言行,我们建议研究者尽量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写作。借助第一人称,研究者可以从自己的视角以自己的声音来呈现他的所见所闻以及记忆中的事情。

当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对象中的一员时第一人称就会尤为有效。这样我们读到的文字既经过了学术旨趣的过滤,具有专业性,又可以帮助读者从局内人的视角来看问题。此外,第一人称的视角帮助研究者以参与者的视角来自然地呈现自己的经历。

下面这段以第一人称撰写的田野笔记可以用来阐明上面的观点。在这一片段中,一位受雇于高档眼镜公司的观察者回忆了被店主性骚扰的苦恼经历:

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和理查德一起站在靠前的柜台,他是店主之一,阿尔经理那时在看门。我弯腰取出一副太阳镜准备试试,一边打开形状像停车牌的塑料镜架,一边说,“哇,真漂亮。”理查德嘟囔着“不”,他觉得我戴这副眼镜并不好看。我发现这副眼镜是Lunettes的,它是VVO眼镜的生产商,我之前竟然没有发现。同时,我惊讶于理查德这么快就下了结论。我戴上眼镜,问理查德,“你觉得怎么样?”他看着我说,“你的乳头真漂亮,难道不是吗?”我觉得他说的是,“你的品位真棒,难道不是吗?”所以我一边照镜子一边回答说,“是的,是很棒。”在理查德又一次重复他所说的话的时候,我发现我之前听错了他的话,也没有加入自己的理解。我看着理查德。他说,“你的乳头真漂亮。”我低声说,“什么?”(我这才回想起他刚才的话,发现我错把他说的话当成是他赞赏我欣赏

眼镜的品位了。也许我第一次就基本上听对了,但是下意识地把它听成了其他的话;充耳不闻才能保持镇定自若。)他接着说,“真的又结实又突出——真的很结实,”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指着这里,好像他正在摸我的胸。我被吓到了,把手臂交叉在胸前。(我是下意识这样做的,而且我并没有等理查德说后面的话就已经以这样的姿势防备了。)他又接着说,“你把自己包起来了。”他抱起手臂说:“还从来没有看到你这样害羞呢。”接着,他又鼓起胸部,好像要卖弄一下(似乎在给我表演我平时的样子,或者他希望我这个样子)。“这不合适,”我轻声说。

研究者使用第一人称不仅可以呈现骚扰者理查德的话以及作者的反应,而且可以表达她对于这段经历的感受和想法:“我被吓到了……”在这个例子中,研究者将侮辱性的语言写进田野笔记,比单纯地记录他的话更能表达她自己防备的感觉以及对他的言语的厌恶之情。如果采用第三人称的话,田野笔记就不能从她作为局内人的角度来描述——她内心的想法和感受随着事情的推进不断发生着变化;也不会显示出店主坚持重复无礼的话使研究者意识到听错了原来的话,并且使她“以防备的姿势”“把手臂交叉在胸前”。这样的重复突出了那些话的无礼。

另外,采用第一人称撰写田野笔记既可以使研究者从成员的角度来描写自己的经历,同时也展现了她身为研究者的反思。比如,她重构并呈现了自己受到性骚扰的经历,使我们看到她最初是以店员的身份与店主交谈的——将店主的话错听成了“你的品位真棒”,一个更合乎他们之间工作关系的评价,这个评价在店员向顾客介绍眼镜的时候也是恰当的。但是我们也从田野笔记中读到

她对自己经历的评价,这些评价贯穿于对事情的描述之中,比如为什么她开始的时候听错了:“也许我第一次就基本上听对了,但是下意识地把它听成了其他的话;充耳不闻才能保持镇定自若。”

第三人称

尽管研究者采用第一人称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但是民族志的首要目的是描述他人的言行。第三人称特别适用于展现别人说的话和做的事。我们建议研究者采用第三人称来描写他观察到的别人的言行。

使用第三人称写作并不要求作者完全排斥第一人称,也不要求作者必须将自己从田野笔记中抽离出来。在主要以第三人称叙述的田野笔记中,作者可以将自己作为参与观察者纳入场景之中,将自己的反应用第一人称写在旁边。比如,雷切尔·弗雷茨在赞比亚西北省卡波姆区观察和参与 *mukanda* 礼仪(男孩子的成人礼)的时候就常常在田野笔记中描述别人的活动。^① 这些描述基本上都是采用第三人称,但是她偶尔也会使用第一人称来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下面的片断中,她主要在观察别人的行为,偶尔加入“我”说的话来回忆自己当时参与的情况,描述自己的反应。

那天下午我们听妇女和孩子们叫喊着说 *lyishi* 好像来了,于

① Rachel Fretz 在这个项目中很多时候都与另外两个研究者一起在同一个村庄内进行观察,另外两个研究者都是艺术史专家: Elisabeth Cameron 和 Manuel Jordan。在同一个田野中一起工作的研究者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记述和呈现研究成果。

是我们[另一个研究者和我]就带着相机跑去[村子中央]了。那是 Kalulu, 一种兔子面具。他身材柔弱、矮小, 穿着草裙, 套着草编的衬衣, 四肢戴着常见的纤维编的饰品, 他的面具小小的, 涂成了红白相间的颜色, 还有两只大大的布耳朵。他大声地用鼻音说, “哇, 哇,” 就像小孩在哭。他在空地上跳来跳去, 向孩子们半跑过去。接着头人让妇女们陪他一起跳舞; 所以 D, 他的女儿, 叫上一些妇女和孩子, 背对着兔子 Kalulu 唱歌跳舞……Kalulu 时不时相当无精打采地追赶某个妇女或者孩子。突然, 他用自己的小鞭子直追一个女孩儿, 然后鞭打了她。女孩儿尖叫着跑开了, 兔子跑到 J 的家里, 很快又回来了。

接着, 头人把约翰叫过去, 看起来是让他去做些什么, 因为后来约翰就去找基娅, 一个和 N 住在一起的 8 岁女孩儿(她是她的孙女儿), 并且用手牢牢地抓着她, 把她从远处拖到 Kalulu 这里来, 兔子走过来抓她。

她挣脱了, 朝其他方向尖叫着跑过去, 约翰又在后面追她, 抓住她往兔子那里拉。基娅小心地提防着, 看上去完全被吓坏了, 不停地边叫边哭。(看到这里, 我也吓了一跳。)这时兔子用力打了她一下, 她还是叫着往家里跑。兔子在后面追, 跟着她进了屋。后来有人告诉我基娅躲在了床底下。

接着, Kalulu 追着金娅并抓住了她, 用手把她举起来。金娅也尖叫着, 但是她看起来似乎没有被吓到, 也没有哭。后来有人说当兔子开始带着她跑向通往 mukanda 营地的小路时, N[她的祖母]冲着兔子大喊, 让他放了金娅。

就在这时, 我发现安娜[另一个小女孩儿]不见了。(有人说她跑到树林里躲起来了。)看起来兔子认为她藏在自己家里了, 因

为他开始追赶安娜的妈妈亚娜的时候,亚娜迅速跑进屋子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因为亚娜把那扇厚实的木门关得牢牢的,兔子也没办法打开它……

(真的,Kalulu 兔子就是一个唱唱跳跳,然后使大家变得兴奋的魔术师。)第二天,我问约翰为什么要抓基娅和金娅;他说她们本该去学校上学,但是她们并不是每天离开家以后就直接去学校。过了一会儿,戴面具的兔子顺着 mukanda 营地的小路跑开了,我也回到家里,但是还是被兔子对待两个女孩的方式吓坏了。

尽管研究者在撰写上述田野笔记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其他人——戴面具的舞者、尖叫的女孩儿、祖母——她偶尔也在描述中加入了自己对两个被惊吓的女孩儿的反应。作者通过描写小女孩儿的尖叫和祖母叫人救孙女儿的行为,以更直接的、特写的角度渲染了当时追赶的紧张气氛。但是,由于她在一个多语言地区使用乔克维语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对象说的是 Lunda 语和 Luvale 语,因此她没办法使用直接引语。所以,她描写了他们的动作、尖叫以及讲乔克维语的人告诉她的一些事情。研究者只应该记录他们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事情;而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事情应该以间接引语的形式呈现。

如果田野研究者在一段时间内密切关注某个研究对象的活动,那么他可以用具有聚焦效果的第三人称来集中描述那个人所看到的事情以及他的言行举止。研究者可能会有意识地从位于场景中或者参加活动的某个人的视角来进行描述,比如考虑到这个人身处的实际位置所能看到的東西,描写这个人注意到的一些事情,采用这个人描述这件事的原话。如果研究者要从孩子的视角

来讲述父母之间的一次争吵,他除了使用很多孩子的语言,还会描述那些孩子会注意到的细节,比如声音的高低、危险的动作以及争吵的激烈程度。尽管研究者有可能会推测出研究对象的想法和感受,但是这些推测也必定是来源于他观察到的面部表情、手势、言语,并且用孩子的口吻把它们描述出来。

在写作中使用具有聚焦效果的第三人称常常能让研究者对某个单独的研究对象有更加全面的感知,并且了解到那个人所感兴趣的问题。举例来说,在对非洲文化中传统医术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可能会花一整天跟随一个传统医生:跟着他去制药,在他给人看病的时候就坐在他身边,在他不工作的时候陪着他一起休息(比较 Yoder 1982)。研究者通过密切参与到某人的生活中来描述那个人的关注点及其言行,就更可能获得那个人的视角。但是,研究者不应该将自己的动机强加于那个人身上,也不应该猜测他的想法;研究者只应该描写他亲眼看到的医生的行为,以及亲耳听到医生所说的话。逐字逐句的直接引语加上对手势和表情的描绘确实是描述某个人观点的最有效的方法。

显然,如果田野研究者采取了不同的观察位置,并且有同情心地观察了不同的个体,那么他就可以更加有效地以不同的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写作,记录田野环境中的不同声音。^① 例如,田野工作者在描写杂货店付款处的时候可以分别从收银员、打包员、正在结

① 我们采用 Abrams(1988)的说法,认为“声音”既包括独特的讲话风格,也包括个人具有特色的视角或者“气质”。我们还意识到研究对象会随着说话对象和说话目的的改变而改变自己写作或者说话的方式。坚持将不同的声音纳入田野笔记之中会促使研究者采用不同于他自己原先视角的其他方式参与到田野之中,会使研究者意识到并且表达出这些不同的声音——这是田野笔记的撰写如何反过来影响已完成的田野工作的又一个例证。

账的顾客以及还在等待的顾客等人的角度描写他们在不同时间的活动。研究者忠实记录研究对象的语言才能最清晰地呈现研究对象的声音和观点。

全知的视角

民族志研究者可以在全知的视角之下使用第三人称写作。在此视角之下,研究者假定“研究者不仅能够观察到研究对象公开的言行,还可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感受和动机”(Abrams 1988: 145)。用这种视角写作的研究者以一种“客观的”口吻和风格将事件作为“真实的故事”来讲述(Van Maanen 1988)。作者通过采用这种全知的视角就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时空之中进行转换,轻松地切换各个人物。确实,在这种视角下,作者不仅可以描写人物的行动和语言,还可以描写他们内心的想法、感受和动机。另外,因为在这一视角中作者是作为一个超然的观察者置身事外的,所以他能够洞察事情的前因后果。

如果在赞比亚研究 *Mukanda* 仪式的田野工作者在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采用全知的视角,那么她可能会描写整个村子的人在前一个晚上整整一晚激情狂热地跳舞、打鼓、唱歌。她也许会描写小男孩儿等待拂晓时被赶进营地施行割礼时的感受——有可能是害怕和兴奋。就着鼓点跳舞的那个戴着面具的人必然会引起她的注意,她也会描绘他纤维制的服装和面具上黑红相间的装饰。她也许还会描写在树林里男孩营地进行割礼的场景,父亲、兄弟和叔父们都在场。(她可能需要从一些访谈中得到有关这个具有性别色彩的男性领地的描述。)接着,她也许会转而描写留守在村子里的母亲们、其他妇女以及孩子,不仅会描绘他们如何唱歌,如何根据

礼仪将水泼在母亲们的头上,还会描写她们在等待营地首领宣布她们的儿子已经成功接受割礼后的心情——不论是紧张还是高兴。

当然,尽管这个研究者的确描写了一些她看到的听到的仪式内容,但是事实上她并没有以这种全知的视角来撰写田野笔记。实际上,如果不投入大量时间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来了解研究者没能看到的事件以及研究对象当时的感受,就不能真正采用全知的视角来描写方方面面的情况。此外,坚持互动论和阐释主义的学术流派通常反对研究者采用全知的视角撰写田野笔记,因为采用这种视角撰写出来的田野笔记有以下缺点:将研究者自己参与的经历和从别人那儿获取的信息合并起来了;呈现某个事件的多种理解的复杂过程不复存在;将很多视角以一种单一的、全知的声音混合起来了;忽视为调和或者筛选对同一事件相左的观点时所需要的依条件而定的多种阐释。

不同视角的结合和变换

不论以何种视角撰写田野笔记,尽职的田野研究者都只会记录那些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因此,不论他采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还是全知的视角,写作的内容都必然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呈现出他对他人经历的了解和理解。然而研究者参与到人们生活中的程度潜在地决定了他记述一些事件的视角。对研究对象生活的参与使得研究者可以以“贴近”的视角进行写作,呈现出仿佛是研究对象看到的一些细节,以直接引语发出研究对象的声音。但是即使采用第一人称写作,研究者身体上或者情感上“带有距离感”的视角常常导致他以一种记者的口吻进行更加概括性的

描写。

部分由于研究者一直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转换关注点,所以田野笔记也常常从一个视角转向另一个视角。在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研究者要在对研究对象自身经历的感知和对研究者自身视角和对他人反应的自我意识中寻求平衡。这些来来回回的变化必然体现在声音和视角的变化之中。

一方面,田野研究者关注并描写事件对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意义。尽管研究对象会对例行的事情习以为常或者对此没什么兴趣,但是因为这些事情占据了研究对象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研究者也会很关注这些经常发生的事情。研究者还会关注那些研究对象很感兴趣或者认为很重要的问题或者事件;他不仅要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还要认识到研究对象赋予它们的特殊意义。当怀着这种目的写作的时候,田野工作者常常采用受限制的第三人称,而且常常引用研究对象的原话。

另一方面,田野研究者不可能在观察和撰写的时候完全忽视自己在场景中的存在。我们期望可以在每天的田野笔记中看到研究者的存在。因此,田野笔记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描绘出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以及关注点,而且还要写出研究者如何看到、理解和传递这些生活和关注点。比如,研究者会描写那些没有预期到的有悖常识或者引起自己强烈情感反应的事情。由于他关注的是自己对事件和他人的反应,所以常常采用第一人称。研究者将自己纳入互动之后,因此会同时引用自己和他人的语言。

总的来说,研究者在撰写不同部分的时候采用特定的视角,因此从总体上看,田野笔记的视角就是不断变换的。田野工作者以某一视角描述某时某地观察到的事件,转而以其他视角组织其他

事件。

“实时的”和“最终的”描述

在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民族志研究者还面临着另一个选择:是以一种不完整的视角运用自己知道的部分信息“实时地”描述事件,还是稍后以更加完整全面的信息来描述事件。如果采取前一种方式,作者在描写较先发生的事情时就会尽量不使用后来才发现的信息。举例来说,下面的田野笔记描写了作者接近某个贫民窟的情况,读者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直到最终发现了关键意义的时候才将其表达出来的。

(宗教团体设在贫民区的)慈善会堂周围的所有区域,包括小巷里都挤满了人,比周围的街区多很多人,大概八成是黑人;九成是男性。人们顺着慈善会堂浅绿色的围墙,或躺或坐或站……门左边的人们似乎正在排队:他们之间保持着相当统一的距离,而且我在慈善会堂附近观察的几个小时里这拨人一直在那里站着。我后来翻阅慈善会堂文献的时候发现这些排队的人很可能是为了优先在慈善会堂里过夜。文献中写道:“睡觉券”于中午十二点半发放,在那之前人们早就开始排队了。有意思的是,在慈善会堂后面有比排队等睡觉券的人更多的人在排队等午餐券。

实时的记录保留了作者一开始看到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但他当时并不怎么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一开始,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排着队”作为整个场景的特征,而是作为他发现的一个正在进程中的情况;作者花费了一些精力去描写这些“排着队”的人们,

比如“统一的距离”、长时间一直站着。后来他发现了这些行为的“目的”——为了拿到“睡觉券”，从而可以在慈善会堂里面过夜，然后把这一目的明确描述出来了；直到那时人群的聚集才被称作“睡觉队”。

相反，田野研究者也可能运用他们最终知道的所有信息以及自己对事件的理解来描述事件，在描述早先发生的事情之时就将之后才了解到的“事实”或者理解纳入其中。比如，使用这种方法描写一次正式商务会议的时候，尽管观察者只有在会议过程中才可能知道每个与会者的姓名和职位，但是他会在田野笔记一开始就描写这些信息。

一般来说，这种描写事件的过程就是将在“终点”获得的理解作为描写之前发生的事情的资源。在观察新场景的时候我们经常使用最后才了解到的信息去描写我们一开始并不理解或者只是部分理解或者错误理解的事情。观察包含着这种回顾性再阐释的持续过程，期间观察者不断形成相较于之前模糊、矛盾或者彻底糊涂的理解来说更加确定、权威的解释（Garfinkel 1967）。民族志当中也可能包含这样的回顾性再阐释。比如，在公共汽车上进行观察的田野工作者会记下：一个“疯狂的女人”上了车，跟司机说话。如果这个女人的“疯狂”只是从她跟司机以及其他乘客的谈话中表现出来的话，那么作者的评价就来自于这一正在进行的互动；研究者在这个女人最初出场的时候就很快做出这一评价也就在田野笔记中隐去了他如何发现她分不清方向的过程。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也许那个乘客的表现以及最初的行为在田野工作者（大概任何谙熟美国城市社会文化的成员）“乍一看”都觉得显然“很疯狂”。在这个例子中，研究者一开始就用“疯狂的”来形容这个女

人的问题出于他描写得并不恰当,而不是回顾性再阐释的问题;“疯狂的”是一个带有强烈评价色彩的词语,因此在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就必须同时描写任何可以说明这个特点的具体情况。总的来说,描述得当的田野笔记能够让读者从回顾性再阐释区分出研究者最开始的_{理解}。

这种回顾性再阐释在研究者实际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出于各种原因,我们不满足于观察者基于最初很不完整的信息所进行的阐释,也不满足于观察者仅仅谈到他是如何发现被研究者的身份并观察他们的行为的。但是田野研究者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希望保留最初的理解——不论这种理解有多大的误导性——以及自己认识意义的实际过程。

这种情况之一就是民族志研究者希望强调自己的经历是如何自然发生的过程。比如,这一章前面对性骚扰的描述运用店主后来的话将作者实际听到的他最初侮辱的话重构为“他肯定说的”,这样的安排促使作者回过头去解释这样的“误听”是怎么发生的,这样就强调了“实际发生的事情”和“观察者/作者经历的事情”之间的区别。如果作者采用另一种描述方式,那么她会完全按照自己的经历来呈现整个事件:将店主的第一句话写成“你的品位真棒,不是吗?”然后指出他的第二句话“你的乳头真漂亮”修正之前听到的话。这种描述方式会使读者随着事情实际发生的过程体会到观察者的震惊。

民族志研究者也许还为了强调自己的理解过程而希望尽量少用回顾性再阐释。回到我们之前的例子:如果田野工作者对正式商务会议的与会者如何了解到一起开会的人是谁很感兴趣,那么他可能会集中描述他如何发现这些人的身份,而在田野笔记开头

不会说明这个问题。这样的描述过程至少使读者部分地了解到作者发现这些身份的实际经历。它还将观察者/作者置于建立意义的过程之中,因而将描述“去客观化”;从作者发现贫民窟慈善会堂外面“睡觉队”的描述可以看出观察者/作者是社会世界的积极阐释者。

总而言之,不论作者为了展现过程而“实时”写作还是采用“终点”讲故事的模式,他都是从描写自己经历的过程中有所收益。研究者在撰写的过程中开始理解自己的经历:他通过直观地选择、突出、排列细节以及评判它们与之前观察到并描写的经历之间的联系或者差异来阐发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田野笔记的撰写不仅仅是一个回忆和记录的过程。更恰当地说,田野笔记的撰写加深了研究者对田野中所见所闻的理解。^①尤其在了解一个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的时候,研究者描写自己的经历会大有裨益。因为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学会理解他们一开始看起来觉得不正常或者无法抵抗的事情。研究者确实常常愿意写作,因为他们发现写作是一种理解的途径,发现一段有生命的经历不仅保留在田野笔记中,而且是通过田野写作来阐明的。

反思:“写作”和“阅读”模式

有人认为田野笔记主要特征就在于描写,这种观点默认撰写

① Becker(1986)强调了这些促使作者澄清并得出想法的写作过程。他坚持认为没有写下来的想法是松散的、流动的:“首先想到一个,然后又想到另一个。等你想到第四个的时候,就不记得第一个了”(1986:55)。相反,“写下来的想法……是固定的,不会改变,可以与后来的想法进行比较”(1986:56)。

田野笔记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描写方式。但是一旦我们发现描写不仅仅是将发生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撰写田野笔记中就出现了一些复杂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描写的基础是观察者/作者在田野中的经历,但是任何两个人都不可能田野中拥有完全一样的经历。正在发生的事情永远多于田野研究者能够注意到的事情,此外他也不可能把注意到的事情全都记录下来。而且描写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不同的理论、目的、兴趣点和视角。因此,相较于全面的、文学的或者客观的描写,田野笔记中的描写更类似于一系列用细节描写生活片段的故事。^①

但是,民族志研究者在实际撰写田野笔记时需要防止自己沉溺于复杂的描写之中。他必须在开始的时候采用一种以最快最准确的方式将所见所闻诉诸纸面的写作模式。研究者在这一制造文本的模式中尽可能精确和完整地“写下来”,避免对写作过程进行过多的自我反省。他关注有争论的事件,重新点燃对这些事件的兴奋之情,在记忆褪色之前把这些事件记录下来。正在写作的研究者努力“捕捉那些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试着将自己观察到的、经历的“那些”东西详细记录下来。此时,过多的反思会使研究者转移注意力,甚至使之麻痹;研究者应该尽量写作而不要编辑,在细致描写的时候不要担心如何分析和连贯,不要有太多的自我反思。

只有在初稿真正完成以后,研究者才能回过头开始考虑田野

^① 尽管不是专门关注于田野笔记的描写,Wolf(1992) 也用一个有新意的例子来说明民族志如何描绘各种各样的生活片段;她用三种不同的形式——原始的田野笔记、更加正式的分析性描写以及虚构的小故事——来呈现“同一”系列事件。

笔记描写的复杂性；只有他手头具备完整细致的田野笔记的时候，才能采用阅读模式来反思他自己关于如何参与以及如何描写事件的决定常常是如何影响这些描写的。也就是说，只有研究者手头有完整的笔记，那么将这些笔记看作体现了研究者自己参与、写作风格的、被删节了的、部分的、带有观点的文本才是有意义的。也只有此时，研究者才能开始将田野笔记视为建构，在阅读的时候不仅仅认为田野笔记简单地记录了事实，而是创造了事实。

最初以写作模式撰写以及后来采取反思的阅读模式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研究者怎样看待“准确”这一问题，以及怎样看待书面文本和文本所描述的事情之间的“对应”。研究者在写作时必须尽量在书面文本和他对“发生的事”的经历和观察之间创造某种对应。撰写田野笔记中最紧要的工作就是根据研究者的经历写出详细、准确而全面的文本。但是一旦研究者写好了笔记这些对应关系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发生的事”经过了观察者本人以及他的写作方式的过滤之后诉诸纸面。这一文本将社会事实“放置”在恰当的位置，但是却割裂了社会事实与文本以外的其他事实之间的关系。读者可能会根据自己曾经“在那里”的亲身经历或者在某个类似情况下的经历来理解上述关系。但是读者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本的限制；他们在文本之外往往缺乏有效途径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在阅读模式中，研究者意识到并且反思自己在写作中的选择如何构建了具体文本和文本中描写的事实就变得可能而且恰当。

第四章 田野笔记的撰写(二):呈现场景

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田野笔记的撰写就是研究者将所见所闻写下来的过程,那么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这种观点认为田野研究者就是将观察到的事实“照搬”进笔记,描写时不需要使用雅致的语言、精巧的比喻或者复杂而充满悬念的叙述,认为撰写详尽的田野笔记需要的仅仅是好记性以及十分的努力就够了。

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坚持认为所有写作,即使看起来很简单的描述性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作者通过选择用词以及组织文本的方式,将观察到的世界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写作作为选择性、创造性的过程,往往更像一个过滤器而不是照搬“事实”的镜子。但是,民族志研究者直到最近才开始接受这种观点,才意识到即使“现实主义的”民族志也是一种基于众多文体惯例的建构。比如,范·马南(1988:47)曾经将“研究的中立性”作为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核心准则;通过遵守这个准则,“描写者……形成了一种非个人的模式,以一种不受个人偏见、政治目的或者道德判断影响的规范的知识风格得出客观的数据,而不像传教士、行政官、记者或者哪个文化中的活跃分子”。

描述性田野笔记和民族志一样也受到不同写作惯例的影响。民族志研究者从他回忆的、记录的瞬间出发建构田野笔记中的描述。不论是一个事件、一场活动、日常事务、互动或者视觉图像,研

究者运用他记得的或者之前记下来的带有选择性的细节(言谈、手势、身体语言、声音、背景,等等)来重构每个瞬间。为了突出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受,他在撰写过程中更加强调一些行为和言语而弱化其他的行为和言语。换句话说,研究者通过以书面形式描写观察到的和回忆起来的内容来描绘场景,这些描写带有高度的选择性和局部性。这些场景——再度呈现在纸面上的瞬间——展现出研究者对这些生活片段的理解和记忆,通过他们的写作技巧或增强或模糊。

本章我们将考察民族志研究者关注人们言行、回忆这些瞬间的直接目的与他在呈现和分析数据时所进行的写作选择之间的关系。当然,没有任何写作技巧可以让研究者将生活原原本本地完全按照它发生的那样记录下来,研究者甚至不可能准确地把自己记得的事情都写下来。他最多只能将自己的记忆“再创作”为书面的场景,这些场景运用经过选择和整合的细节来忠实地描写人们的生活。但是,研究者通过熟练掌握某些写作技巧就能在一开始记下所有内容的时候轻松一些;而且可以更有效地描写那些他一开始凭直觉认为尤为重要的场景。不论研究者描写重要的场景还是之后再回过头来补充一些细节,学习描写的技巧都能使他写出更加生动、全面的场景。

首先,我们将讨论在田野笔记中描写观察到的或者记忆中的生活片断的写作技巧,具体地说,就是如何描写基本场景、描写人们之间的对话以及刻画主要人物的技巧。第二,我们将提供几种组织这些描述的选择:速写以及两种叙事形式,情节和故事。(尽管我们将描写技巧和组织技巧分开来谈,但是实际上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需要同时注意两个方面。)第三,我们将讨论

几种分析技巧,这些技巧与描述性写作不一样,可以使研究者为正在写作的田野笔记加上旁注和评论来进行反思。这样的反思不仅促使研究者以后再遇到类似事件时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场景,而且帮助研究者认识到田野笔记中描写的事件之间的潜在关系。

我们将在本章中集中提出一些建议来让田野工作者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写作时进行的选择。比如,刚刚入门的新手描写简单的互动片断时通常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但是他们往往不确定应该怎样通过安排互动的顺序、刻画人物、记述对话以及使用生动的、可被感知的细节来介绍某个活动或者事件的来龙去脉,来描写更加复杂、更加关键的场景。如果不写过程中的评价,他们就会忽视一些显而易见的而且可能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联系。尽管我们提供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和例子,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个“正确的”风格,也不是为了涵盖田野研究者可能使用的所有写作选择。不过,我们确实认为研究者的写作风格常常影响他如何选择可供描写的材料。使用“客观的”写作风格的民族志研究者在写作中常常采用被动语态,使用中性无趣的词语,他往往忽略了人的能动性,而且更可能遗漏更加凌乱的(往往也是最有趣的)细节。研究者学着将场景想象成生动详细的书面记录,既肯定了这种真实的描写风格,也保证了全面准确地记录事件的学术诚信。

撰写详细的笔记:描绘场景

民族志研究者的核心目的在于描写某个社会世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但是初学者写出来的田野笔记往往缺乏足够的细节描写,而且写得不够生动。如果民族志工作者无意中进行了总结

或者使用了评判性的语言,那么他就不能恰当地描写观察到的以及经历过的事情。下面的一些技巧可以帮助作者运用生动的细节连贯地描绘出观察到的瞬间;这些技巧就是描写、对话以及刻画人物。读者可以在下面的若干田野笔记片断中看到田野工作者常常同时使用几种技巧。

描写

“描写”这个词有多种涵义。由于我们认为田野笔记的撰写是描述性的描写,而不是分析性的议论^①,因此我们用“描写”特指运用具体的、可感知的细节进行描述的一种方法,这些细节来自研究者观察到的基本场景、背景、物品、人物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描写这些描述性的形象只是研究者讲述一天经历的一部分。

描写这一写作技巧需要的是具体的细节而非抽象的概括,可感知的形象而非带有价值判断的标签,需要通过贴近地呈现细节来获得直接性。戈夫曼(1989:131)建议田野工作者将田野笔记写得丰富一些,在描写细节的时候经常使用形容词和副词。比如,使用颜色、形状、大小的细节来描述视觉形象;声音、音色、响度和音量的细节营造听觉形象;描写气味或者香气的细节制造出嗅觉形象;描绘手势、动作、姿势和面部表情的细节传递运动形象。尽管视觉形象在很多描述中占有优势,研究者还是常常会整合以上多种形象。

① 描写常常指四种主要写作方式之一——另外三种是议论、说明和叙述——但是在这里,我们将描写视为一种描述背景、人物、物品和行为的核心理技巧,它是更广泛的人类学描写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田野笔记从头到尾都充斥着这种人类学描写,从他进入田野的第一天起一直到最后离开田野的时候他所写的笔记。

民族志研究者描写场景时通常会选择那些最能清晰生动地在纸面上呈现出形象的细节；因此，当他根据一些目的和特定视角来挑选细节时才会描写得最为成功。比如，当他从一位秘书的视角来看，而这位秘书每天都在奋力对抗着老板的杂乱无序，那么他就会更明确地将关注点放在办公环境的混乱，而不是观察到的办公设施。但是，田野工作者常常在他还没有理解某个场景的时候就要坐下来描写它。事实上，刚入门的研究者常常会发现自己面临困境，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目的就只是在当时记录下他的印象。田野研究者常常为了方便以后回忆他所看到的东西的物理特征和自己感受到的印象，而描写场景和社会情境、人物的装束，甚至一些例行公事。

民族志研究者经常挑选一些细节来描写某个对读者理解后续行为很重要的场景或者环境。比如，研究者在扎伊尔东南部的一个村庄中的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她那时观察到的情况来描写当地的空间布局和社会关系。她可能在田野笔记中写到所有的房子如何朝向一块干净的空地；男人们聚集的大帐篷位于村子中央；女人们常常背着婴儿在妹妹的帮助下在自家门前点柴火烧饭；几个男人和男孩儿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面，不远处另外两个男人在编篮子。她怎样看待这些细节以及如何将这些细节组织成社会互动的场景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选取哪些细节来描写黄昏时分的小村庄。

民族志研究者为了为人物的言行提供背景信息还应该描写人物的外表，这也是场景的组成部分。比如，琳达·肖(Linda Shaw)在研究人们如何适应精神病护理所环境时描写了一个其他居住者认为尤为“疯狂”的人：

今天下午,罗伯特和我坐在杂货店旁说话,一个新来的叫布鲁斯的人走过去好几次。他很高,精瘦,留着披肩的杂乱灰发和长长的浓密胡须。我曾经听说他才30多岁,但是他现在看起来已经过早地衰老了,这让我想起那些流浪汉所经受的困苦境况。他穿着一件脏脏的灰褐色长外套,外套后面靠近肩膀的地方绣着彩虹图案,还穿着一条破了的蓝色牛仔褲和一件白色T恤,胸前似乎是咖啡留下的斑点。除了外表凌乱,布鲁斯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时似乎显得尤为激动和烦躁。他迈着闲荡的步子,大步大步地走着,头低在胸前,面无表情,手臂在空气中无力地画着圆弧,就像是橡胶做的一样。在布鲁斯又走完一圈的时候,罗伯特说:“这家伙真是疯狂,不要告诉我他会被重新送回社会。”

罗伯特认为布鲁斯疯狂到不能离开护理所的程度,研究者通过细致描写这个新来的人为读者理解罗伯特的评价提供了必要的情景。

虽然描写外表初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当很多观察者以一种真实生动的方式来进行描写时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些困难部分源于当我们观察不认识的人时最先是脸谱化的方式来观察的;一般使用性别、年龄、族裔以及一些其他的外表特征来描写陌生人。^①因此,田野研究新手也会不可避免地用性别来区分人物,他们经常加上一两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一个年轻女人”、“穿着花衬衫的年轻男性”、“两个带着小孩的拉丁女人”、“40多岁的

① Lofland(1985:15)将这种描写方式称为类型化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某人知道另一个人是谁仅仅是因为他可以用一些种类来界定这个人”,尤其是性别、年龄和族裔这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特征。相反,亲自的认识就至少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信息。

女人”、“留着中等长度黄褐色头发的白人男子”。实际上,很多田野笔记采用常常被用来描写他人的陈词滥调来描写人物,这就往往促使读者想到一些常见的脸谱:中年图书馆馆员被简单地描写成“戴着厚眼镜儿的秃顶男人”,少年教养院的青年“把头发齐齐地向后梳”,律师“穿着细条纹西装,拿着文件夹”。这些陈词滥调不仅让描写变得枯燥,而且更危险的是,会使作者自然地采用对待某种角色的态度看待面前的这个人。

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研究者为什么对人物外表进行“类别化”、脸谱化描写:研究者并不是用这些描写来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而是为了方便在田野笔记中指明是谁在做什么。比如,田野工作者可能会多次写到“穿着花衬衫的男子”,这样当他之后描写众多在拉美街道上发生的场景时就可以明确指出他在写哪个人。因此,最初的描写并没有提供很多关于人物外表的信息,而仅仅是标记这个人物,使得读者在接下来的描述中认出他来。

但是,民族志研究者必须训练自己不仅要关注这些普通的社会指标之外的信息,还要捕捉特殊的细节,这些细节会让读者(不论是她自己还是其他阅读田野笔记的人)能够尽可能多地重现他的观察和经历。研究者为了基于实际观察刻画出生动的形象往往会描写那些能够清晰形象化的特殊细节,不论是人物的还是场景的。比如,一个田野工作者这样描写一个贫民窟救济机构的男子:“一个黑衣男子,门牙都掉光了,所以说话口齿不清”。另一个研究者这样描写三年级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迟到以后进教室的时候“扭着屁股做鬼脸吸引人注意”。这些形象通过细节描绘得更加特别、生动,尽可能避免了含糊的、脸谱化的特征。

民族志研究者可以通过描写人物的穿着打扮来写出更加生动的文本。下面的片断运用读者可感知的具体形象描写了一个女人的衣着：

今天莫莉，一个白人女性，穿了印着非洲图案的夹克。夹克正面有很多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小方框图案，代表着非洲大陆。最上面印着一头犹太金色狮子（埃塞俄比亚神圣家族的标志）。袖子的颜色很亮，红、黄、绿条状。夹克后面画着鲍勃·马利正冲着麦克风唱歌。他是个梳着长发、留着小胡子的黑人男性。最上面用红色写着：“Rastafari”。

这段描写突出了民族志研究者对族裔身份和意识的关注。第一句话“今天莫莉，一个白人女性，穿了印着非洲图案的夹克”就引出了一个读者没有预期的矛盾：莫莉是个白人，但是她却穿着一件研究者认为与非洲裔美国文化相关的衣服。“非洲图案”单刀直入地指向夹克衫的特点（颜色、象征和符号）而忽视其他可以看到的特点，如材料、质地、款式、干净与否或者来源。研究者在这段描写中将这件夹克衫刻画成一件公开表明莫莉与非洲裔美国人有关的物件。^①

此外，研究者在这段描写中并不是简单地告诉读者自己的推

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描写可能来自于是研究者对族裔身份的理论兴趣，同时也加深了这种理论关注。也就是说，观察者开始观察这个场景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自己的兴趣点，那就是白人学生中的非洲裔美国文化是怎样的，这种想法引导他关注夹克衫带有的象征主义讽刺意味，然后生动地描写了那件夹克衫。还有一种可能性，当研究者记下自己当时的印象时开始考虑跨文化的联系。不论是哪种情况，研究者在接下来的田野笔记中继续关注这个女人和另外一些与黑人交朋友的学生，描写其他带有族裔色彩的衣服以及白人如何使用黑人的谈话方式，等等。

断,而是通过直接的细节来展现人物与非洲裔美国文化的关系。我们可以比较上面这段描写和下面这段(虚构的)简要的而且带有评价性的描写,后者进行了概括,而没有描写特殊的细节:“今天莫莉,一个白人女孩儿,特意穿上她明亮的非洲夹克衫。她经常穿着这些衣服炫耀,走来走去像个黑人。”这段简短的描写中不仅使用了含糊的形容词(明亮),使用评价性的副词和动词来描写人物的动作(特意、炫耀),而且将莫莉贴上了标签(像个黑人)。

如果民族志研究者希望为读者描绘某个场景,那么他就不能缩减细节,同时要避免使用带有评价性的形容词和动词,而且不能用标签来取代具体的描写。当所有的描写都体现出隶属于群体或者某种身份的细节时,研究者就要抵抗那种自然而然地根据自己的背景知识而将某人归入某一类别的冲动。然而,仅仅避免带有评价性的词语还是不够的。在描写的过程中,作者的口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个人对笔下人物的态度。研究者的自我优越感或者将他人客观化的态度(认为被研究者是反常的或者外来的,来自较低的阶层或者较不文明的文化)往往在一些微妙的地方显现出来:语气、口误,在词语之间的选择、含蓄的比较,甚至在唐突草率的回答的断奏般的语调中也会显现。具有自省精神的研究者应该在旁注中清楚地说明自己的判断。然而,避免这些评价性冲动的最好办法就是牢记研究者的任务是通过描写来达到对他人社会世界的同情的理解。

除了人物、地点、事物,研究者可能还会通过动作来描写某个场景。比如,他可能会描写某个人物的谈话、手势、动作。与描写人物的外表不同,一系列的动作强调了人物影响他周边世界的能动性;人物在某个场景中的动作、对某个情况的回应或者与他人的

互动的方式都会影响之后的互动。伴随着人物的动作而来的是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因此，作者力图捕捉动作的动态特征以及之后的变化——有事情发生了！

接下来描写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着重关注在为聋人和有听力障碍的人开设的课堂上某个学生的动作以及老师的反应。

鲍比走进来，晃来晃去，四下看看。老师问他去哪儿了，鲍比嘟囔了几句。然后他朝电脑走过去，说他想用电脑，但是老师说：“不行，鲍比，我希望你坐在这里，看看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儿。”鲍比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来。他发现桌面上有个裂缝，一边将它遮起来一边问，“桌上为什么要弄一个缝？”老师皱了皱眉头，不耐烦地说：“它原本就是这样的，不要乱动。”鲍比继续挪动着身边能玩的东西。老师说：“好吧，鲍比，你为什么不去玩电脑呢？”鲍比很快起身走到电脑那边坐下来，立即开始用电脑。

在这段描写中，作者呈现了一系列互动而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外表的描述。他通过描写持续的动作、灵活使用动词来展现场景，使得读者了解前前后后的互动过程。我们通过生动形象的动词对人物的动作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走进来、晃、四下看看、问、走过去、坐下来、告诉他、挪动、很快起身、走到、开始用。

按照惯例来讲，作者以时间顺序呈现动作。在上面的场景中，作者只使用了唯一的连词“然后”就将师生之间的互动清晰地连缀在一起。然而在更复杂的场景中或者在那些没有这么明显互动的场景中，作者就需要通过转折的信号让读者意识到在某个动作开始之前是否有时间、地点、人物的转换。作者为连续的动作排序

(比如:首先、第二、第三),使用转折来标记动作的变化(比如:现在、然后、接着、然后、第二天一早),还会使用地点来定位动作(比如:这里、那里、远处、后面)。在下面的片段中一个研究门诊精神病治疗设施的研究者运用转折的词组(“当他接着说的时候”)和转折的词语(“然后”、“正当”)把动作连缀起来了。

我坐在大厅中央的长椅子上,等待什么东西引起我的注意。这时,我听到主任关上洗澡间门并大声喊道,“洗澡的时候脱掉衣服!”……在洗澡间门外,主任跟罗贝塔说着话,罗贝塔是被安排来看着这些病人的工作人员之一。然后,凯伦拿着她在外面找到的一个脏脏的小精灵向他们走去。她冲主任说:“看这个,多漂亮啊,快亲亲它,”但是主任丝毫没有看她一眼。正当他继续和罗贝塔说话的时候,他四下看了看,发现我正在观察他们。一眨眼的工夫,他向凯伦伸开双臂,想要拥抱一下她。凯伦像往常一样害羞,傻傻地笑着。

在这段以动作为导向的描述中,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在人物谈话时(“主任大声喊道:‘洗澡的时候脱掉衣服!’”)随处发生的动作——坐下来、关门、走近、看了看、伸开。在观察和记录动作的时候,对社会互动的田野研究者会通过动作和谈话来考察相互联系的人们之间到底是如何互动的,他们将“谈话”作为人们动作的一部分。

对话

民族志研究者还会尽可能准确地描写对话——他们现场听到的谈话或者其他人谈到的曾经发生过的谈话。他们重现对话的手

段包括：直接和间接引用、转述、重述语意。只有那些真正逐字引用的词语才能使用引号；其他的话应该以间接引语或者段落的形式记录下来。

下面的例子中作者同时使用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转述来呈现谈话的始末。

在我离开前一分钟左右，我正和波莉一起走路，她是个黑人，看学校前门的。这时，一个穿深蓝色运动服的黑人女孩儿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波莉指着她问我：“你见过她吗？”我说见过，然后波莉向我倾诉说那女孩儿曾经和她吵过架。她说这个女孩儿曾经未经允许想擅自离开学校，因此她们开始争吵。她说，校长正好路过，他试图解决她们的争端。那女孩儿说：“这是我的学校，你不能管我！”她还叫校长“白人混蛋”。波莉对我说，“人们常说黑人混蛋，她把词儿改了。”她说这女孩儿“态度很差”，边说边摇了摇头。

这段对话描写以间接引语为主，保留了谈话的始末；随处可见的直接引用片断使对话鲜活起来，带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作者明确标示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转述，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直接引语：“你见过她吗？”

间接引语：我说见过……

间接引语：

然后波莉向我倾诉说那女孩儿曾经和她吵过架。她说这个女孩儿曾经未经允许想擅自离开学校，因此她们开始争吵。她说，校

长正好路过,他试图解决她们的争端。

转述、直接引语:

那女孩儿说:“这是我的学校,你不能管我!”她还叫校长“白人混蛋”。

直接引语:“人们常说黑人混蛋,她把词儿改了。”

间接引语:她说这女孩儿

直接引语:“态度很差”……

间接引语比重述语意更贴近真实的对话。作者重述自己和波莉之间的对话可能能够保留基本的谈话内容。但是,作者在重述过程中将人物说的话转换成了她自己的语言,而且过早进行了总结。比如,如果以重述的方式改写上面这个片断的结尾部分,结果可能会是这样的:“那女孩儿反驳了校长,还骂了他……她态度很差。”这样写就丧失了谈话和吐露秘密的原汁原味,而且没能重现学生骂校长的原话,原话中的用词还是闻所未闻的。

当事人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对他们所处的世界持有何种观点和视角(见第五章),因此应该尽可能逐字记录下来。作者逐字逐句地描写了当事人对研究者讲述的“故事”,这样就同时保留了两方面信息。第一,描写了学生、看门人和校长之间“发生的事儿”。第二,描写了看门人对这件事的亲身经历。相比于那个女孩儿和她的问题,这份田野笔记更是看门人的故事,更多地传达了讲述者自己以及她所关注的东西。

描写对话比简单地回忆谈话或者在字面上重现每个词要复杂得多。人们说话的时候总是脱口而出,而且是片断化的。他们通过手势、面部表情或者停顿来强调所说的话,甚至以这些来结束某

句话。他们使用那些前后不一的、看起来矛盾的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来传达复杂的信息,这些表达往往是人们在挖苦和奚落的时候才会用的。因此,田野研究者必须记下他们根据伴随着话语的身体语言——手势、动作、面部表情、语音语调——推断出来的意思。此外,人们在谈话中不会完全按照顺序:他们会打断对方、重复一些词儿、同时在说话或者一直在评论和嘟囔。研究者描写人物对话时可以把重复的话放在括号里,以一种线性的方式呈现在纸面上。

尽管在速记或者完整的田野笔记中准确捕捉对话需要相当大的努力,但是有很多理由促使研究者逐字逐句地引用原话来润色他们的田野笔记。首先,这些对话描写了人物的特点、行为,为读者了解说话者的社会地位、身份、个人风格和兴趣提供了线索。其次,对话可以帮助研究者捕捉当事人处于特定情境下时真实使用的词语和表达。此外,对话可能能够体现某种文化世界观的核心特征。下面的片断来自于一堂非洲裔美国人历史课的讨论:

德斯顿,一个留着杰里卷发的黑人男生问杜勃伊斯小姐:“什么是背叛?我听说如果你跟白人说话——那你就背叛了。如果你和白人女孩儿约会——那你就背叛了。”杜勃伊斯小姐说有些人“说得太绝对”。她说背叛者甚至可能是一位老师或者一个麦当劳员工。接着她将背叛者定义为“更在意发财或被(主流社会)接受的某个人……他没有族裔忠诚,也不为自己的人(黑人)效忠”。

作者使用间接引语描写这段有关族裔认同的谈话的同时保留了一些当事人的原话。

由于这种逐字逐句的引用很能使读者感到作者“曾经(真的)

在那里”，而且作为当事者亲耳听到了那些话，许多人或许想大约地恢复原话。但是，我们希望研究者在现场尽可能逐字逐句地记下别人说的话，而只在那些真正记下来的原话上面打上引号。这种一致性不仅避免偶然的误读，而且促使田野研究者更敏感地呈现当事人的观点。

如果当地语言和研究者使用的语言不一样，那么对话描写中的这些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研究者对当事人语言的熟练程度必然决定了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逐字逐句记录人们的谈话。举例来说，当研究者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工作的时候，他不仅会常常因为自己不理解某个词语而漏过某人说的话，甚至会在他即使理解某段话的情况下也很难将对话逐字逐句地捕捉下来。针对这些困难，研究者可以采取以下补救措施：找个当地人做助手或者确保自己能够正确理解当地人说的话。类似的问题也会出现在那些当事人使用很多技术术语或者俚语的英语环境中。如果研究者无法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整段谈话，他就会尽可能把谈话重述出来，时而包括一些他清楚记得的原话。

为了应对这些语言上的障碍，很多民族志研究者使用录音来辅助他们撰写田野笔记。他们使用录音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希望尽可能详细地保留人们之间自然的谈话，然后他们可以得出某些理论问题。比如，对员工和顾客之间互动模式感兴趣的民族志研究者至少会特地录下部分互动的全过程。^① 尽管如此，绝大部分

^① 最近很多关于服务机构的田野研究都同时采用田野观察和录音记录来研究具体的互动过程，包括学校（Mehan 和 Herweck 1983）、儿童保护服务（Dingwall、Eekelaar 和 Murray 1986）和刑事法庭（Maynard 1984）。Maynard（1989）讨论了如何将上述为关键互动提供文本的方法整合起来的路径。

研究者并没有将录音作为基本的或者唯一的数据形式；他们只是把录音作为众多方法中的一种来更加细致地考察那些事情和经历对被研究者来说的意义。

下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读者可以在这个例子中了解雷切尔·弗雷茨在扎伊尔班杜顿(Bandundu)地区乔克维人中是如何使用录音来记录当地人讲述故事的过程的。她仔细地将所有讲述者和听众的声音资料整理出来，之所以整理听众说话的内容是因为他们积极参与了讲述故事的整个过程。下面的片段是某个故事的开头；傍晚，讲述者(N)和听众(A)之间在火堆旁的交谈，讲述者是一个年轻男人，听众包括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和孩子们(弗雷茨就快来了)。

N:以前,有几个年轻小伙子,我自己,费尔南多,丰加和夏姆纳。

A:这个故事带好听的歌儿吗?

N:一共四个人。他们说:“好吧,我们去打猎吧。”皮亚他们到处跑来跑去。

A:嗯。

N:他们一直跑来跑去,一无所获。“我们回去吧,走吧。”他们看到一个大屋子,里面有个装着蜂蜜的容器。

“朋友们,这是蜂蜜,mba,谁放在这里的呢?”

他说:“是谁呢?”

[另一个人说,]“我们走吧,我们不能吃。”

接着,瓦普,丰加走上前说:“咳,你真麻烦,即使你很饿你也不吃这蜂蜜吗?”

“孩子,把蜂蜜放在这里的人现在不在这儿。你看看这屋子是用人的肋骨造起来的,而你却想要吃蜂蜜。”

他[丰加]说,“出去,我要吃蜂蜜,现在就吃。”他拿了一些蜂蜜,吃了下去。

“我们要等他吗?还是等他吧。”

他很快出来了,“咱们走。”

Liata, liata, liata, 他们一路走着。“我们要走很长的路,因为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们走着走着,啊! Kayanda[天哪],发现一条大河。

“朋友们,这是什么?”

“朋友们,好大的一条河,从哪儿流过来的呢?”

他说:“啊,谁知道?”

“我们看不到它的源头,也不知道它流到哪儿去。”

“先过河吧,我先走。”

第一首歌

N:噢爸爸。看,爸爸,是我在吃蜂蜜。

A:上帝创造了这条大河,我必须得过河。

N:爸爸!看,爸爸,我就要过河了。

A:上帝创造了这条大河,我必须得过河。

N:爸爸!看,爸爸,我没有吃蜂蜜。

A:上帝创造了这条大河,我必须得过河。

N:爸爸!看,爸爸,我马上去对岸。

A:上帝创造了这条大河,我必须得过河。

研究者把记录人们表现的录音转录成文本,其中包括了讲述者的所有语言和听众们的反应(常常需要当地人的协助),只是略去了狗叫或者婴儿啼哭这些杂音。在转录过程中研究者还需要仔细留意谈话的节奏和停顿,在相应的地方加上标点和换行符以反映当事人讲述故事的风格(参考 Hymes 1991; TedLock 1983)。

但是将录音转录成文本仅仅是民族志研究者研究和理解当地人讲故事的一部分努力。除此之外,研究者还要撰写更加翔实的田野笔记来描述当时的场景和参与者。^① 比如,她写到这个故事发生在酋长帐篷里的火堆旁,一家人随意地聚在一起,包括酋长、他的七个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她发现女人们的参与基本上是唱故事里的歌儿或者不时地应声。研究者还记下了她和这些参与者的谈话,乔克维人对讲这种故事的普遍评价是 *yishima*。她发现在这场表演中,听众知道那个用肋骨造的房子很可能属于某个巫师。偷吃他的蜂蜜是很危险的,因为巫师会对他们下诅咒,在他们的路上创造了那条从未见过的大河。偷吃蜂蜜的丰加没听大哥的话,这时候最有可能淹死。她还发现在表演中重复了四遍的歌儿,制造了一种对偷吃蜂蜜的后果的希望和恐慌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一方面相信这条河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这条大河”),另一方面害怕这是巫师创造出来的(“看,爸爸,是我在吃蜂蜜。”)

因此,对录音的转录不是记录某件事的简单手段。田野研究者需要观察、聆听语言之外的东西;需要进行追问,记下他获得的

^① 虽然田野研究是在非英语的环境中做的,但是田野笔记常常是用英语写的。因此研究者会使用很多非英语词语来保留其本土意义。

信息。所以,很多田野研究者使用多种记录和编码程序将田野笔记和音频、视频结合起来。^①

刻画人物

民族志研究者运用刻画人物的技术来描写他们在田野中遇到的人们。对衣着和行为的简要描写可以粗略勾勒出某个人物的形象,此外,作者还会通过展现这个人的语言、行为以及与他人的互动来完整地刻画这个人物形象。当被研究者处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时,研究者最能有效地刻画人物形象,此时,他的描写就不只是简单罗列被研究者的特点了。仅仅描写某人的特点远没有描写他的日常生活来得有效。因此,研究者会尽力描写人物的着装、语言、手势和面部表情,这样就将人物作为一个完整全面的社会存在呈现在读者面前,供他们去推测人物的性格。所以,人物的性格特点不是孤立的个人气质,而是在人物与他人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因此,研究者在塑造人物时需要具备描写动作和语言的技巧。

琳达·肖在下面这段田野笔记中描写了她在精神病护理所遇到的事情,故事发生在一套公寓的厨房区域,在那里她遇到了一对住在那里的夫妇。那个女人特别强调他们夫妇俩曾经非常努力地去营造“正常的”环境,但是他们觉得似乎没有什么用处:^②

① Stone 和 Stone (1981) 讨论了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工作的研究者或者对语言表达感兴趣的研究者是如何整合这些方法的。一些社会学田野研究者提倡使用一种成为“三角”程序的方法——比如,在观察之后通过对参与者进行访谈来了解他们在所录音的互动过程中的所思所为;可参考 Cicourel (1974:124ff)。

② Shaw (1991) 还挖掘了一些其他的例子来说明曾经是精神病患者的人们在与正常人交往时,由于感觉不能获得“正常的”生活以及普遍感受到的耻辱感所带来痛苦。

今天我遇到了泰莉和杰伊，他们邀请我参观他们的“公寓”，那是他们在一块原来是厨房的区域里面自己开辟出来的。泰莉陪着我一处处参观，很骄傲地向我展示他们如何将一头安排成房间，旁边是起居室，再旁边是厨房。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他们差不多布置了一整套公寓的构造，她还向我详细介绍了每个“房间”的特点。他们说他们的床上有真的床垫，不像其它的床上只有塑料泡沫垫。起居室的地上有块小毯子，床脚处还有一台电视。接着泰莉打开了碗碟橱。她指着调料瓶，一个瓶子一个瓶子地数着。她对每天早晨为杰伊煮咖啡的咖啡壶和有时候热外卖皮萨的烤炉尤为得意。

泰莉很努力地证明他们曾经努力把自己的公寓布置得像其他已婚夫妇的公寓一样，但是她越是努力就越明显发现他们的实际生活不是这样的。泰莉还向我谈起她所感受到的徒劳无用：“那些噪音、尖叫、紧张真的很烦心。我已经结婚了，但是我在这里却不能做一个正常的妻子。我希望早上起来在丈夫去工作之前给他准备早餐——一杯咖啡、鸡蛋、培根、橙汁，打扫房间，照顾孩子，然后为他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准备一些饮料或者任何他到家时想吃的东西。在这里，我早上起来只能给他泡一杯速溶咖啡。你知道，这还不如打扫整个公寓，但完了又没事情做。”

泰莉的行为和语言显示了她的性格，通过上面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正向我们走来。她尽其所能地营造一种她所期望的正常的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在准制度化的环境中是无法维系的。我们可以在她的言行中看到她的抗争，她重新安排了私人空间，将这个小小的区域作为自己的避难所，抗拒无处

不在的制度力量。

作者鉴于记录的压力有可能会使用一些更加便捷的标签(“一个反应迟钝的人”、“一个流浪汉”、“一个黑人/白人/亚洲人”,等等),而不是仔细观察当事人实际的外表和行为。但是,这种快速的人物塑造方式所描绘的人物形象,往好里说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个人,往坏里说就是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比如,一个学生在大型购物中心观察时,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破旧的大钱包里摸索着,一边对自己喃喃细语,于是他这样描绘这位老妇人:“拿包的老妇人”。这样的标签只是粗略地抓住了基本的信息,一旦贴上这样的标签作者就会不再关注其他相关的细节和行为。

民族志研究者还会在田野笔记中写下当事人模仿他人的言语和动作。接下来的片断描写了一个学生如何在同学面前模仿拉丁美洲“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儿”的典型手势和体态:

当这个白人男子和他的朋友们离开时,他模仿西班牙口音说:“Chale homes”[嘿!哥们!]接着,他以夸张地步子走起路来:两脚交叉向前,将胳膊搁到弯曲的角度之后,后倾……看到的人中有人说:“瞧你那傻样儿。”

在这群嬉闹的小伙子中,这个白人少年滑稽拙劣地模仿了拉丁美洲的“哥们”。研究者通过细节描写区分了当事人对其他人物的模仿和研究者自己对当事人的塑造,这些细节为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提供了语境,就好像来自当事人自己的视角。

读者在之前的描写中已经很熟悉的人物在之后的场景中出现

时,就不需要每次都进行完整的介绍。即使是故事的主角,民族志研究者也只要描写与当时的互动相关的行为和特点。换句话说,田野工作者不仅要考虑人物的特点,还要考虑该人物之前的情况以及对现在的影响。研究者的每一次进入只能产生一份不完整的记录,随着田野笔记的不断积累,田野工作者会发现他们的观察已经足以面面俱到地呈现一些人物(“丰满的”主要人物),可以不那么全面地呈现另一些人物(“平淡的”次要人物),还有像巴士司机或者警察那样的小角色(“微不足道的”配角)。

此外,研究者通过不断与人接触获得了更多丰富全面地塑造人物时所需要的原料。研究者不再受限于那些任何观察者都可以发现的表面特点,而可以记下那些一开始难以发现,只有随着不断接触并提高熟悉程度之后才能捕捉的特点。在这一点上研究者常常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往往只描写主要角色第一次出场时的情况,而不考虑自己之后对人物还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我们建议研究者定期回顾、反思、捕捉主要人物的形象以及自己对他们的感受,并将此作为研究的必要过程。这些主要人物就是那些后来发现具有与众不同之处的人。

田野研究者常常会仔细描写在场景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人。尽管对任何人物的全面描写都是随着时间不断积累的,但是每一份描写都会通过生动、重要的细节尽可能全面地初步展现某个人物,比如外表、体态、手势、语言和动作。相反,描写次要角色时也许仅需通过几个有限的细节来描述他在整个场景中所占的那一小部分。

田野研究者使用若干标准决定角色的主次。首先,研究者的理论兴趣会促使他关注特定人物。比如,在一项关于法庭上“后勤人员”之间团队合作的研究中,主要角色就是法庭书记员和监守,

而不是律师、证人或者法官。其次,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也会影响他的关注点。比如,侧重互动的研究者可能会在描写社会场景时关注那些能够生动呈现人物之间互动的角色。

此外,人物在社会场景中是否处于中心位置以及他们所起的作用也决定了研究者在塑造人物时的详细程度。如果某个场景中的人们共同指向同一个人物,那么研究者就需要把这个人物描写成整个场景的中心。相反,有些人即使是核心人物,但是他们在场景中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那么田野研究者就可能较少注意到他们。比如,午餐时分学生们在院子里聊天,这时“校长穿过院子,四下看了看”,如果没有学生注意到他,那么研究者可能就不会详细描写这个人物。

田野笔记也应该把研究者自己作为互动中的角色进行记录。记录研究者实际站在何处观察可能仅能用来说明他是从什么角度看到这件事的。但是直接参与某个事件的研究者在田野笔记中应该是一个相关的角色,尤其在有人明显与他互动的时候。研究者确实有可能在某个事件中以没有预期的方式成为主角,可能从一开始的旁观者逐渐完全地参与到互动之中。下面的片段描写了聋人学生在课堂上做具有教育意义的游戏,互相鼓励对方说话。田野工作者一直有口吃的毛病,所以非常理解这些学生。因此,尽管研究者本来是课堂的旁观者,但是在某个转折点上变成了关键人物:

林恩一直鼓励西泽把答案说出来(而不是用手语表示)。老师说:“林恩你真棒……就是这样,西泽,你也应该试着把答案说出来,这样我们都能理解你想说的。”西泽远远地看看我,有些脸红,

然后低下头看着他的课桌，半微笑着。老师问他（同时还指着
我）：“是不是因为他在这儿所以你怕说话？”林恩、杰克和西泽齐
刷刷地用手语表示他担心我听到他说话。我告诉西泽：“你别担心
我怎么想。我也曾经不敢说话。”

西泽看起来对我说的很感兴趣，他疑惑地用指头指着我。老
师说：“对，没关系，你说得很好。你不用担心任何人的看法。就说
一句话，他会告诉你他是不是听懂了。”

西泽勉强说了些什么，然后看着我，还是微微地低着头，脸还
是红红的，嘴角微微笑着等我回答。我一个词儿也没听懂，觉得很
绝望。要是他让我重复他说的话怎么办？我回答说：“是的，说的
很好，我听懂了。”老师立即用手语告诉西泽我的回答，然后又说
他不应该受别人看法的影响。西泽看着我，笑了起来。游戏还在继
续，西泽开始用说话和手语一起回答问题。我也逐渐能听懂一部
分他们说的话。

在这个场景中，民族志研究者以前的经历和当时的在场显然
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感同身受的回应从本质上为整段描写增色不
少。如果他没有在田野笔记中描写自己的互动和感受，那么这个
场景就与真实的情况相距甚远了。

田野研究者一般使用第一人称描述他们参与场景的情况。如
果观察者用第三人称描写，用自己的名字来代替第一人称，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

西泽勉强说了些什么，然后看着保罗，他还是微微地低着头，
脸还是红红的，嘴角微微笑着等保罗回答。……他回答说：“是的，

说的很好,我听懂了。”老师立即用手语告诉西泽他的回答,然后又说他不应该受到别人看法的影响。西泽看着保罗,笑了起来。游戏还在继续,西泽开始用说话和手语一起回答问题。

在原始的片断中,作者仔细观察了西泽的动作(“西泽远远地看看我,有些脸红”、“低下头看着他的课桌,半微笑着”)而且并没有归结于紧张。但是在第三人称的描写中,我们错过了西泽为了是否开口说话而不断内心斗争这一关键环节。这种斗争是从研究者移情的、自省的评价中传达出来的,“我一个词儿也没听懂……”以及到他观察的尾声,“我也逐渐能听懂一部分他们说的话”。通过作者对动作细节和语言的细致观察以及对自身感受的展现,读者可以切身感受到西泽的害怕以及之后开口说话并被别人听懂时的释然。

撰写扩展条目:组织

民族志研究者不仅可以通过学习如何描写生动场景的技巧来提高描写能力,还可以将田野笔记组织成连贯的单元,这样显得更加清晰。清晰的组织技巧使他们能够将单元概念化,更容易将田野笔记连缀成完整、复杂、连贯的回忆。

田野研究者可能一开始会发现在写作时很难保持集中的关注点。他们可能会回忆起许多不连贯的事件,把它们很快写下来,得到的只是散乱的细节和难以阅读的片断,很难从这些细节和片断中“看到”或者“听到”连贯的生活故事,以至于研究者后来难以使用这些田野笔记。或者,他们写了很多页田野笔记,其中包含了无

穷无尽的细节,这样却会给他们后期重读、分析笔记带来麻烦。为了帮助研究者描写“完整全面的”场景,我们建议他们将观察到的任何场景作为一系列瞬间来回忆,将对某个场景的回忆作为一个整体。此外,田野研究者通过使用常规技巧来组织笔记可以在写下他记住的所有细节时更加轻松地保持集中的关注点。

田野研究者常常试图描写完整的、详尽记录事件始末的笔记,希望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任何重要内容。因此,研究者撰写田野笔记时总是表示他们记录的就是“完整的”场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不仅描写所有的细节,还以单元的形式撰写田野笔记,这样可以让读者了解某个事件在何处开始和在何处结束。段落化的细节就构成一个这样的单元。

由于作者的关注点一般总是集中在某个观点,因此段落内部是连贯统一的。这就意味着他将有些行为视作自成一体的完整形态并加以聚焦。在描写时他回忆起一个又一个瞬间:比如,从教室里的一个人或者事转向另一个。这些转折常常体现在段落之间的转换。因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一个段落就描写了一个连贯的瞬间,因而将描述组织起来。^①

研究者还会撰写篇幅不止一个段落的田野笔记单元。他们将自己对整个情境或者事件的记忆组织成篇幅更长的文本,将那些独立的瞬间连缀成对某个场景的“完整”描述。篇幅更长的文本是一个扩展的条目,有可能包括好几个段落。尽管描写的最大单位是一整天研究积累下来的田野笔记,但是研究者经常发现关于

① 研究者将细节分段不仅便利他撰写田野笔记,而且分段的习惯还提高了之后阅读、分析田野笔记的速度。

某一天研究的回忆和速记往往会形成若干不连续的单元。

这些在一天内写下来的篇幅更长的田野笔记一般描写的是作者认为很重要的事件。这是很多田野工作者坐下来首先要写的东西。尤其当研究者使用电脑写作时,他可以先列出一整天的活动,然后转到中间某处开始先写最重要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田野研究者始终在努力达成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尽可能快地写下所有的活动;尽可能完整生动地描写直觉上认为对整个研究至关重要的场景。在一开始进入田野的时候,研究者会更加关注于写下所有的事情:这样的描写常常是更加片断的、自发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他会更加着力于撰写扩展的条目,选择那些尤能展现被研究者经历和体验的事件。此时,研究者往往需要通过更长的篇幅来保持集中的关注点,而且对行为的描写会更加生动、详尽、连贯。

民族志研究者在描写扩展条目时同时涉及若干不同的单元。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考察撰写扩展条目的三种方式:速写,以场景的形式描写生活片断;以及两种描述性条目的形式,情节和更加扩展的故事。故事在不断展开的场景中将互动、事件作为动态的行为进行叙述。

速写

田野工作者在速写中忠于自己感受到的生动印象,基本上通过细节的雕刻来描写场景。就像照片一样,动作的先后顺序并不重要。作者是一个处于场景之外的观察者,描写他/她的感受。以多少有些静止的快照形式呈现场景,完全不同于描述性描写,后者需要作者具有时间感,按照事件的发展顺序描写一个又一个动作。

“速写”这一说法借用了视觉感受上的比喻,这种组织写作的

方式不必只依赖于视觉的细节,还可以包括听觉的或者运动的细节。比如,味道而并非外观可能是回忆和描写某种食物优点的首要标准。作者在描写人物、场景、物体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必须激发所有能够帮助自己重现当时场景的感觉。但是,通常占主导地位的都是视觉,要么是因为田野工作者是在远处观察,视觉是他唯一能够得到的感受,要么就是希望对整个场景进行简单的概述。另一个能部分解释视觉主导地位的原因是,英语中用来描写视觉的词语要比其他任何感觉都细致、发达。^① 因此,田野研究者必须更加努力地激发和描写非视觉的感受。

速写通常是一个简单的片断,将有关某个场景、个人或者事件的细节整合在一起。因为它基本上是静止的,所以速写缺乏(情节的)前因后果和对人物的完整塑造。下面一段速写描写的是拉丁美洲的集市,研究者花费很多笔墨刻画一个在玩具摊边上的人物:

一位拉丁美洲的老妇人弯下腰来看放在地上的玩具。她背后背着两塑料袋什么东西,用这两个袋子的重量平衡着前倾的身体。她一连从地上拿起几个玩具,拿起来几英寸高,在手上把玩几下,然后又放回地上。一分钟后,她直起身来慢慢离开了。

在这种将细节组织成速写的写作方式中,作者可以通过对场景中某个角色的特写来让读者感受到整个场景的情况。

^① Stoller(1989)提出,即使被研究者自己重视视觉以外的其它感受——味道、声音或者动作,很多田野研究者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会偏向于着重关注视觉。这样来看,某个人最重要的感受是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的。

速写常常为连续的互动提供情境,把互动置于更大的事件体系之中,使读者更容易直观地想象出某个场景或者当事人的情况。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条目可能会成为田野笔记中的独立单元。比如,在下面这段速写中,作者通过描写一群高中学生们如何各自成群结伴来展现日常不拥挤的午餐时间的场景:

尽管天很冷而且有些风,中心广场上仍然有大概百来个黑人学生。在左边的远处,一个穿着黑色 Starter(一种品牌)夹克的矮个子男生正在玩弹球。在他旁边,有七个女生和两个男生坐在长椅上。广场右边聚集着三四十个学生。广场上部站着十五个学生,基本上都是女生。广场下部,比较远的右边,大约有二十个学生,男女参半,一些人站着,其他人坐在礼堂边的混凝土矮墙上。这群人右边,有个男生在听黄色的随声听,还自己跳着舞。他甩着手臂,原地跑着,好像正在滑雪。

这个研究者特别关注族裔关系,希望观察到学生们如何、何时、何处、与何人交往互动。尽管他不能清楚地听到或看到学生们在做什么,他也以快照的方式描绘出这些不同的人群;尽管这段速写中也有视觉和动态的细节,但是它更侧重于描绘静止的场景,而不是一系列动作。

速写通常可以有效地向读者传递研究者对某个地方或者人物的总体感觉,有时候还可以作为其他田野笔记的背景。比如,即使当时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研究者描写站在旁边的人或者某人看另一个人时的表情和手势,都可以展现一些社会关系。

情节

如果速写是描写某处的静态情景,那么情节一般用来叙述动作和行为。当研究者叙述持续时间不长或者涉及人物不多的事件时,可以用情节这一写作方式加以有效组织。作者在一段情节之中通过描写连续的动作或者互动来讲述一件事,构建一个或多或少统一的条目。因此,如果研究者发现动作之间存在关联,他就常常会描写一两段情节。^①

作者在下面的情节片段中描写了两个学生在课前的互动:

一个黑人女孩儿进来了,穿着蓬松的白夹克,戴着眼镜,留着一头直直的黑色头发。她在我右边坐下来。罗伯特和另一个男生(都是黑人)走进来也坐下了。他们一边吃着肯德基炸鸡一边拿出一些红白色的小盒子。罗伯特的朋友一直敲着那个女生的背,想打到她。她一直用恼怒的语气让他不要碰她。大约一分钟以后,黑人老师跟那个男生说:“兄弟,别碰她。”他笑着回答杜勃伊斯先生:“别担心,她是我姐姐。”女孩儿扫了他一眼,说:“Chhh”(表示烦恼)。他已经又开始吃鸡了。

在这段情节中,研究者将学生和老师的行为顺次呈现出来,一个行为引发另一个;女孩儿回应男孩子的敲打,老师警告男孩子,等等。因此,这些行为都是相互联系的,看起来像连续的互动,形

^① Lederman(1990:84)强调,因为像“事件”这样的单元具有“明显的‘完整性’”,所以它们在她的民族志中是“做田野笔记的好形式”和有用的分析单位。研究者把某个事件描写成简要的情节或者更加完整的故事。

成了统一的情节。

并不是所有的情节都需要像上面的片段一样呈现一个高潮。很多田野笔记的情节只是详细地叙述某个人物常规的日常行为。实际上,在很多条目中,民族志研究者发现他们自己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凡的事情。比如,在下面的节选中,研究者叙述了几个学生如何在一节非母语英语课上完成一项小组任务:

这一组有6个人:两个韩国女生、一个韩国男生、两个墨西哥男生和一个俄罗斯女生。和其他小组一样,他们把椅子围成一个小圈来完成布置的任务。伊什玛尔,一个墨西哥男生,手里拿着问题卡片念给其他人听:“请列举5件你在洛杉矶约会时可以做的、花费低于10美元的事儿。”(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西班牙口音,但是其他人都能听懂。)他把手肘撑在桌子上,直直地看着大家,说:“有答案吗?”他看了其他人一两分钟,然后自己说了一件可做的事:去滚石音乐餐厅喝咖啡。其他人都点头表示同意。伊什玛尔又开始等其他人的意见。另一个墨西哥男生说“去沙滩”,俄罗斯女生说“滑旱冰”。韩国人直点头,但是没有提出什么建议。(我觉得伊什玛尔即使看起来知道答案,也首先在等其他人的回应。)

在描写这个教室里的场景时,田野研究者花了整整6页纸来叙述一系列那一小时内发生的多少有些不太相关的情节。因此,她能够呈现同时完成不同任务的小组的情况。这些情节放在一起只是因为它们是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发生的。比如,描写在某一时间同时发生的事情时,田野工作者常常会写出一系列不连续的情节,根据时间和地点松散地联系在一起。

很多情节是独立的,几乎和其他情节没有关系。因为研究者

很少能跟踪一系列连贯的行为并且在一天之内了解事情的结局,所以他们写了很多这样的情节条目。他们可能出于对某个主题的兴趣而描写某次互动,而在撰写田野笔记时往往不知道这份田野笔记在之后完整分析时是否重要。但是持续撰写众多这样的情节会帮助研究者发现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和行为之间的联系。

故事

在某一天的条目中,有时候因为一系列情节都是在描写同一个人物或者类似的行为,田野研究者就会将这些情节联系起来。作者可能还会因为“发生了一些事”而认为某些情节是相互联系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发展,看起来带来了直接的后果。在描写这些情节时研究者就会使用传统的记叙手法,以“故事”的形式逐步展开。这些故事常常成为一天记录中篇幅最长的单元。

但是,写故事与打造一段生动的描述是不一样的。精心编写的故事不仅按照时间顺序描写行为以便让读者可以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要在不断展开的情节中加入悬念。这些故事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人物的行为总会带来一些结果,带来正面的但是常常戏剧化的结果。^①然而,研究者要谨慎对待将事件描写成有

^① Jonestone(1990:18)将故事定义为叙述(也就是说,它呈现了一系列的事件),并且带有意图(即除了单纯传达信息之外还要讲出来理由)。但是,讲故事的人组织故事以传达某种想法的方式随着讲故事传统的不同而不同。Riessman(1987:179—188)提出叙述的过程因文化而异。比如,她发现波多黎各妇女谈论有关婚姻问题的个人故事时,总是讲述家庭中重复出现的场景而不是讲述她与丈夫之间不断紧张的关系。Johnstone(1990)和 Stahl(1989)指出人们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时会遵循所处环境中的听众的表达习惯。在不同环境中什么是好故事、怎么讲述这个故事、怎样解释这个故事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民族志研究者必须注意防止按照自己认定好故事的标准来描写某件事。

统一结构的故事的过程。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事件并不像戏剧故事,戏剧故事中的一个行为会巧妙地引出下一个,最终总会得到清晰的结果;相反,生活中大部分事情的发展是没有方向可循的。通过描写来呈现生活是高度阐释的写作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可能对行为之间的联系和它们带来的结果提出多种解释。如果研究者试图让所有的经历都契合戏剧故事的要求,那么就反而虚假了。

因此,民族志研究者笔下的故事是一系列相关的情节,而不是一整段完整统一的叙述。我们建议研究者不要把事件写得过于复杂生动,或者听起来更好、更有说服力;既不应该通过对行为的修改或者重新组织来使它们(必然)导向特定的结果或逐步达到高潮;也不应该在平淡的生活中加入原本不存在的悬念。研究者应该按照事情真实发展的情况来描写,按照她亲眼看到的情况来讲述事件。这样写出来的故事便是插话式的,是写在纸面上的一个个连续行为。

尽管田野故事不是非常精致、精练的故事,但是一天条目中的田野故事既有松散的也有严整的。大部分田野故事不可避免地结构松散:作者只是写下他看到的以及差不多能回忆起来的事情。比如,民族志研究者会描写一系列情节,这些情节突出了若干人物或者集中描写了类似的行为。由于他认为这些行为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因此就将这些情节按照插话式故事的形式组织起来。但是,研究者在撰写连贯故事的压力之下只能描写一个又一个情节,把他看到的、记得的事情都写进去,在撰写的时候都来不及考虑这些情节是不是恰当。往往只有在重读故事时这些“无关”的细节或者情节的重要性才体现出来。研究者描写场景时只能凭借当时

的直觉来判断事情之间的相关性,判断在故事里写些什么,“什么内容应该放在一起”。

当然,出于一些言之有理的原因,民族志研究者有时候会以更加严整的结构来撰写田野笔记。由于研究者遵循当事人对事件的看法,因此应该将当事人的一连串行为写成连贯的故事。比如,民族志研究者会观察到一些活动,它们有比较清晰的开端,发展过程中一个行为引起另一个行为,最后还有明确的结果。美国社会很多刑事法庭诉讼都有结构化的程序,因此研究者可以就此写出连贯的故事。类似的,研究者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可能也是连贯的,那么他就应该完全按照讲述者描述的那样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比如,人们互相告诉对方自己当天的经历;他们根据研究者的提问描述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讲述从老人那儿听来的神话传说。研究者在描写这些事情和故事时恰当地以统一的叙述结构来撰写田野笔记,一个行为引起另一个行为,最后带来某个结果。^①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呈现两个篇幅较长的扩展的田野

① 但是,叙述的习惯和模式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民族志研究者必须对这些习惯保持敏感,以避免将自己对叙述结构的理解强加在别人的言语和行为上;他不应该在事情之间事实上没有关系的时候凭空想象事情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无端推测一系列行为会带来某个结果。比如,在西方英雄故事中,主人公要追求某样东西,历尽千难万险,打败了怪物或者取得了圣杯。这样的故事是关于个人的成功和胜利的。相反,很多文化并不那样关注个人的成功和进步,而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给社区或者扩展家庭所带来的影响。在这样的叙述传统之下听众更加关注人物如何与相关的人互动,以及他们处理亲戚朋友关系的时候是不是恰当。因此,当讲述者在讲某个关于掌权者教育年轻人的故事时就会更关注这个年轻人的行为给他的家庭带来的影响、对权威的尊敬以及权威对年轻人亲戚的看法。如果研究者在描写非西方文化时想写某个突出个人成功的情节,那么他很有可能误读了这个故事,完全歪曲了当事人的原意。因此,研究者在写当事人叙述的当地的事情时应该严格遵循讲述者的先后顺序,仔细写下当事人眼中认为的行动之间的联系。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常常借助录音把历史神话、民间故事和传说清晰地记录下来。

故事。尽管两个故事都描写了研究者看到和记得的一系列情节，但是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两个人物的活动，一个男警察和一个女警察，而且他们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研究者之所以把这些情节放在一起只是因为他对警察的行为这一主题很感兴趣；也就是说这些情节是由于同一个主题而结合在一起的。相反，第二个故事讲的是系主任如何教育学生，研究者将一系列的情节联系起来形成更加紧凑的叙述结构，因此讲述了一个不断展开的事情。作者明确地描写了发生在学校的一件事，其中一个行为引起另一个行为；田野故事随着一系列行为的进展得到最终的结果。

研究者在第一个故事中描写了某天晚上他和两个警察，山姆和艾莉莎，一起巡逻时的观察。他叙述了一系列虽然有条理但是相当分散的情节；即使这些情节都是有关警察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松散的，而且还包括一些作者并不确切知道的事情。

(a) 开车的时候艾莉莎在跟山姆谈论另一个部门的女警察。“我简直不敢相信某些女人和女实习生所做的事儿，我讨厌这些事儿，因为永远是那些女人在做最愚蠢的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女警察名声不好的原因。所以——”

“你知道为什么吗？”山姆说。“女人考虑问题的时候用错了另一半脑子。”

“什么？”

“她们考虑问题的时候用错了另一半脑子。”

“或者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从阴茎去想？”艾莉莎突然大笑起来。

“没有！”

“你是从阴茎想问题的吗,山姆?”

“不是。我如果这样告诉我老婆,她肯定会理解的。”我们从一条小路上驶过,经过一群西班牙人,大约有20来个。“那个人在偷那儿的轮胎。”

“那些儿童自行车的轮胎?”

“是的。”

“可能吧。”

“嗯,肯定。它原来在那儿了,但现在都没了。”

“它们昨晚就在那儿,是自行车的配件。”

“哦,我们要去把它拿过来吗?”

“不用,它们一直在那儿。”

(b) 我们开到一条小路的尽头,等着右转。“我要去管管那个。”我抬头看到一辆没打转向灯的白色吉普。我们加速前进,来到那辆车后面。那车和我们一样等在转弯道。指示灯变绿以后,我们顺着十字路口转过去,山姆亮起了警灯。那辆吉普开进了一家加油站……山姆走向那辆车,艾莉莎走上前用手电筒向车窗里面照了照。接着她走回来,站在我身边。加油站里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们。一个女孩儿(白人)下了车,走到车后面,看着她的尾灯。山姆跟她说了几句,然后回到警车这边。我们上了车,山姆说那女孩的前灯亮着,但是后灯没亮。他没有开罚单就让她走了。

(c) 我们决定去7-11店买咖啡,女店员之前就认识山姆和艾莉莎。她递给他们两个大杯子,山姆拿过去倒了咖啡。我也走过去,没看到他们那样的杯子就挑了个最大的杯子,给自己倒上咖啡。艾莉莎正在看药品的架子。我跟她说她应该吃点Tums抗酸剂治她的胃疼。山姆走过来说了几句。艾莉莎说她之前胃很疼,

但是不需要吃什么药。山姆买了一个 Mounds(一种品牌)糖。我们分别付了钱走回车里,又开始到处巡逻。开车的时候,山姆把车窗摇下来假装把糖纸扔出去。“你没有吧?”艾莉莎问他。山姆一边笑着说“没有”一边向她扬了扬糖纸。艾莉莎接着向我解释她很介意别人是不是乱扔垃圾,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榜样。如果有人看到糖纸从警车里面扔出来,他会怎么想呢?”

(d) 我们开过一片居民区时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我马上想是不是爆竹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似乎很傻,但是我之前确实从来没有听到过枪声,除了在近距离,我想我还不习惯于猜想什么声音是枪声。山姆指着一辆我从未见过的车说了几句,那辆车只有一个尾灯。他把油门踩到底,引擎猛烈发动,我们顺着街道飞奔而去。艾莉莎把咖啡扔到窗外,她和山姆都掏出了枪。她跟我说:“如果我跟你说蹲下,你就随时准备蹲下。”然后她让我们都不要进入对方的射程之内。“那些混蛋跑了。”我们仍然沿着街道开下去。其间,我们在一条两边停满车的街道上与另一辆车相遇了。山姆踩了刹车,轮胎发出尖尖的声音,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减速了。我们又顺路开下去,山姆一次又一次把油门踩到底地换挡。接着,我们上了一个小坡,我从位子上弹了出来。我听到(车尾)行李厢里的东西撞到行李厢的最上面部分。“我想找到那辆车,艾莉莎。”

“你看到里面的人了吗?”

“没有。他们正在逃走,而且他妈的没开尾灯,我甚至没看出来是什么车。”我们又开了一会儿,然后不再寻找那辆车。“妈的,我想在晚上巡逻的时候抓坏人。我们必须抓坏人,艾莉莎。我

想用枪指着那些坏人。那些坏事儿在哪儿？刚才我们离那些人那么近。”

“是啊。但是我相信你开车的技术。我必须要把咖啡扔出去。也许我们应该去看看咖啡是不是还在那儿。”[山姆开艾莉莎玩笑，笑话她之前把咖啡从车窗扔出去了。]

“如果我拿着咖啡，怎么拔枪呢？”

“我就拔出枪了，我当时还在开车呢。”

“那是因为山姆，你是匹种马。”

“我也没扔咖啡。”我开玩笑说，他们笑了起来。

“是你跟我说不要乱扔杂物的，但是到头来你却把咖啡扔出去了。”

“如果我错了你就指出来，我后来的确意识到我做错了，所以我要求你现在开回去，这样我就可以找回我的咖啡了。”

“不，你说的是‘回去，给我买咖啡！’”我们都笑起来了。

“但是只有咖啡还在杯子里我才能把它找回来。”

“你能不能做点正事儿，查询一下这个车牌照？”（我有点惊讶于气氛转变的速度，几分钟之间就从全然的紧张变成轻松愉快的谈笑。）

(e) 山姆开始跟踪一辆旧的美国产汽车。他一边加速一边让艾莉莎命令那辆车停下来接受检查。在他不断接近那辆车的时候，我看到汽车牌照上写着1991[现在是1993年1月]。“来吧，36号查尔斯。”山姆说，期望那个车牌的查询结果中有重罪通缉。结果清白，只是登记过期。那辆车从主街向左转了，我们也跟着它转过去，山姆点亮了警灯。开车的是一个黑人男子。艾莉莎用手电筒在后座上照了照，山姆走到司机那边的车窗。司机把驾照和

牌照递给山姆。山姆和那个男人说了会儿话然后走回警车。他一边上车一边说：“这是个负责任的爸爸。我不会记下一个负责任的爸爸。他把孩子们的免疫记录放在工具箱里。他不是我们要找的毒贩子。”

“只因为身为父亲并不代表他没有交易。”

“我不是这个意思。父亲有可能是毒贩子,但是负责任的父亲不会是毒贩子。”

在这个田野故事中,两个警察一边开车到处巡逻一边对车外的事情以及车内谈起的话题做出反应。这些情节展现了他们时而谈笑、时而互相帮助的工作关系。这个故事还讲述了警察日常巡逻的工作情况——不停地开车、聊聊天,偶尔打破一下这种常规——比如,作者着重描写了追捕坏人时的兴奋,但是这种兴奋也随着警察们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状态而消失。显然,这种快速的状态转换让作者很感兴趣,因此他评论道:警察们从紧张兴奋的情绪到开玩笑的转变是如此之快。

在作者描写的这些行为为某个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为几个可能的故事提供了素材。其中一个故事可能是关于两个警察晚间巡逻的;另一个可能是关于研究者如何跟两个警察一起巡逻,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以及他怎样试图得到他们的接纳。但是,在撰写田野笔记时研究者根本不清楚他要写什么故事。他所关心的是通过描写一系列故事把他所记得的事情记下来。

这些情节并不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把某个情节中一些行为与后续情节中的其他行为联系起来:比如,情节c中在7-11店买的咖啡在情节d的追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其他情

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尽管警察拦了两辆车,但是在作者的描写中,第二次拦车和第一次没有任何联系。当然读者可能会认为两次拦车之间也存在一些联系(比如,第二次中的黑人父亲只是被警告了一下,第一次中的白人女性也只是被警告了一下)。

田野研究者在叙述这个故事时按照时间顺序将自己观察到的行为组织成分散的情节;实际上,他不需要任何明显的连词(比如,接着、马上、然后)来表示他已经开始描写新的情节。他还避免使用因果关联词,比如“因为”、“因此”或者“尽管”,来描写行为的进展,以及在行为和结果之间建立清晰的联系。这种解释性的关联词过分强调了行为的原因;比如,这个研究者并不知道每个人为什么像他或者她那样行事。为了避免这种解释,他仅仅把相关的行为写在一起,展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总的来说,尤其是在描写结构松散的情节性田野故事时,连接词应该只是用来提醒读者时间、地点和顺序,而不是提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这些因果关系如何带来某个结果。

民族志研究者还会写内部连接更加紧密、更加连贯的故事。在这些田野故事中,所有的情节之间都有清晰的联系,而且这些描写最后会导向某一结局。在下面引用的这个故事中,研究者追踪了琼斯先生,一个高中校长,处理的一件小事。作者笔下的故事中有很多先后发生的情节,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它们编成了 a 到 i:

(a) 琼斯先生回到办公室以后就开始仔细审查放在他桌子上的文件。有整整一堆文件放在一边,都是关于那些抽烟被抓住的学生的。据琼斯先生说,抽烟是学校里最主要的违规行为。“如果第一次被抓住,就会被记过,留下记录。如果第二次被抓住——

现在已经是州立政策了——就要被开除。”我表示了惊讶。琼斯先生叹了口气,说:“所有被发现抽烟的孩子今天都不在。”

(b) 琼斯先生翻阅文件的时候谈起了另一种不良行为:“tagging”。我对这个词儿不熟悉,因此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tagging”就是涂鸦……“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被抓住就会被惩罚。当然,也是在我们可以处理的范围之内。第二次被抓住的话,要么被要求转学,要么为学校服务十五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让他们把所有墙上的涂鸦刮掉。”我问琼斯先生是不是许多学生都转学了。他回答说是的,“我们可以把他们送到地区内的其他任何一所学校。唯一的限制就是交通。我们把很多参加流氓团伙的不良青年送出去。他们中大部分人去了 Southside。但是,接着我们又会从城里接收很多同样的学生。”我问他:“所以是不是很多问题就是在学校之间踢来踢去?”他说:“呃,我们的想法是一旦学生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他可能会更愿意改变。因此,如果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变化,就会把他送到其他学校,看看他是不是能够摆脱一部分坏影响。”

(c) 翻着翻着,他看到了要找的一个学生,于是停了下来。“就是这个。对,两次抽烟被抓住了。这就意味着要被开除。”他转向我,神秘地说:“你知道,开除很可能毁了一个学生的前途,因为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学校愿意接收这样的学生。我们一直试图让孩子们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那个学生名叫索科洛夫(或者是类似的什么名字,带着明显的俄国发音)。他在文件中查搜索科洛夫第二节课在哪里上,然后我们就往那里去了。

(d) 当我走进索科洛夫所在的班级时,我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在严肃地互相看来看去。琼斯先生问白人男老师是否知道索科洛

夫是不是在这里。老师问大家这里是不是有个叫索科洛夫的人。很多学生都向一个个头矮矮的、留着长发、穿着重金属T恤的白人男孩儿看去。他站起来说索科洛夫就是自己。琼斯先生严厉地看着他,说:“拿上你的书包,你会用得上的。”我们从教室里走出来。(我其实只是站在门口,尽量显得不惹人注意。)

(e) 这个孩子带着俄国口音。我们刚走到走廊时他就看起来有些恐慌。他和琼斯先生并肩走着,抬头看着琼斯先生。他用恳求的语气问:“我做错什么了?”琼斯先生说:“你已经第二次被抓到抽烟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开除你。”那孩子充满不信任和哀怨地叹了口气,“但是那是上学期的事了,我现在已经不抽烟了。求您帮帮忙。”琼斯先生开始向他解释州政府的政策,告诉那孩子他也无能为力,只能开除他。那孩子开始说:“……洛吉斯小姐告诉我这项规定这学期就会改的。你可以问朱里奥[一个同学]。”琼斯先生看起来比较崩溃,他说:“我已经够麻烦的了,我只是在执行学校的政策。”说完,我们一起走进了值勤办公室。

(f) (为了不要显得我太突兀,我在琼斯先生桌子对面坐下,开始假装我在读他桌上的报纸。那孩子这时候开始注意到我并且一直盯着我的笔记本。)他一直在求琼斯先生帮帮他。琼斯先生反问他:“难道你之前不知道抽烟会给你带来什么吗?”他拿起电话,跟那个学生说:“我要打电话给你妈妈。她讲英语吗?”那孩子说是的。琼斯先生和他妈妈公司的前台通话时,带着权威的口吻介绍自己道:“我是琼斯先生,高中校长。索太太在吗?”那孩子的妈妈那会儿不在上班。

(g) 那孩子平静了一点恳求他:“帮帮忙吧。”琼斯先生颇有权威但是不太有精神地回答道:“我不会帮你的,我不知道洛吉斯

小姐说了什么。”那孩子在琼斯先生陷入沉默的时候又开始恳求。他说：“我的朋友伊格尔第三次被抓到抽烟的时候才被开除的。”最后，琼斯先生说：“好吧，今年是有新政策，因此我料想洛吉斯小姐有可能会把一些事情改过来。”

(h) 他正在说话的时候一个矮矮的亚裔中年妇女走进来，她似乎觉得这里发生的一切很好玩儿。（她看到我坐在桌子旁，我很快意识到这个位置是她的，于是连忙站起身，往下看看桌子，又回看她。她看起来很清楚这个学生出了什么事儿。她对学生说：“你抽过烟，是不是？难道你不知道抽烟对你有多不好吗？”她又接着问：“你父母抽烟吗？”他说：“是的，还有我的兄弟。我全家都抽烟。”（他看起来明显放松了很多，而且非常愿意承认抽烟的不好。）他说：“我也一直在戒烟，而且效果还不错。但是戒烟真的很难，你知道吗？”亚裔妇女说：“哦，你只需要用心去做。我以前也抽烟的。”琼斯先生接着说：“我也是，我以前也抽烟。”男孩点了点头表示明白。琼斯先生用温和的声音对她说：“我告诉他这次因为他得到了一些错误的信息，所以我不会开除他，但是下次就不行了。”

(i) 接着，琼斯先生轻轻地挥了挥手，放那个学生走了。那孩子就离开了办公室。

民族志研究者描写这个故事时，将分散的情节互相联系起来——谈话、动作——以时间顺序呈现各种行为是如何展开、发展的。整个故事以最初的行为（校长查看违反吸烟规定的文件）作为开头，在中间部分讲述了行为是怎样不断发展的（校长发现了一个违反纪律的学生、用处罚来吓唬他），故事在转折点达到高潮，

此处校长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又给了这个学生一次机会),结局处取得了结果,或者说动作最终结束了(学生离开了)。

但是即使这个故事和上述警察的故事很不一样,有具体的结尾,作者也没有暗示故事的结局。我们从最后的情节(h和i)中只是了解到男校长和女行政人员在一起工作,她和那个学生更详细地聊了聊抽烟的问题。可能只是因为她的存在校长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因为,他是在她进来之后态度才最终改变的。但是,我们并不很清楚为什么校长变得温和了或者假装温和了,尽管他可能自始至终都只是假装在吓唬那个学生而不是真正要惩罚他。结尾部分只是为这个田野故事画了个句号,而且非常仓促:那个学生仅仅是退出了场景。但是,如果作者在结尾中更加明确地解释纪律或者校长和学生的行为,反而会歪曲了整个事件,人为地拔高了一些人物的重要性或者假定了一些并没有发生的结果。作者始终忠于真实的田野观察,没有撰写更加明确的结尾。

描写故事常常使很多民族志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时非常紧张。研究者希望在他观察到行为的时候就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希望包括尽可能多的细节。然而,描写是一种重现、加深研究者的理解,从而最终创造场景的方法。描写故事就是排序的过程;作者必然选择了某些细节而放弃了另一些细节,然后以某种顺序把这些细节组织起来,从原本片断化和偶然的细节中总结出某种模式。

描写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化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帮助田野研究者有条理地呈现现实生活,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紧张关系,研究者一方面希望记录“所有”信息,另一方面又想撰写清晰的故事。他越是认为描写的故事是内部逻辑统一的整体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达到高潮,就越促使他在人物的行为之间建立联系,而去掉

那些处于边缘的或者无关的细节。比如,在校长教训学生的故事里只有关于涂鸦的片断 b 不与违规吸烟直接相关。如果研究者描写更多与这条故事主线无关的细节,那么这个故事将更加片断化,更没有内部连贯性。比如,这个故事中可能会出现一段无关的对话,秘书在接电话之后说:“您太太打电话来说您忘记带午饭了,”或者其他偶然发生的事情,比如一个学生手里拿着气球站在办公室门口。但是,研究者并没有在故事中写到这些无关的细节,因此他的故事没有什么断裂之处。

民族志研究者讲述故事时必须同时处理很多这样互相矛盾的想法:是在故事中包括所有的边缘细节还是写一个连贯的故事来向读者说明发生了什么。如果他的确将“所有东西”都写下来了那么很可能写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故事;但是,如果他在故事中过于关注前后联系,那么他就可能不会再去考虑一些可能的其他解释。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我们建议研究者撰写结构更加松散的田野故事。这样的故事是情节性的:在重述事件的时候会描写一些看起来无关的行为;两段情节之间可能没有显而易见的联系;常常开始于某个正在进行的行为,而最后也并没有达成任何结论或者解决任何问题。

民族志研究者按照自己当时的理解来讲述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他撰写田野笔记时是如何看待那些经历的。但是,每个田野故事不仅仅与当天的田野经历有关,而且始终存在于不断进行的田野工作和笔记记录的场景之中。研究者第二天又会回到田野之中去深入挖掘他在前一天的研究中得到的感觉。如果他不断在不同的情况下遇到某个人物,就将使他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和行为习惯。因此,随着描写不断继续田野笔记也不断积

累,研究者可能在重读他之前写的田野笔记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他会重新考量那些曾经不太清楚的联系、他之前不理解的地方以及他推测的结果,接着,他会在之后回到田野的时候更仔细地研究自己的疑问。^①

因此,田野故事的内聚力是暂时的,依不同情况而不同的,随着田野研究的不断进行,研究者可能会改变对所记录的事情的理解。他通过更加深入地观察相关行为以及频繁出现的人物会重新评估情节之间的联系。比如,作者在多次观察校长之后可能会发现校长提到的涂鸦是一条更能够连贯组织故事的线索:校长将涂鸦说成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以此来说明抽烟的情节还是比较轻的。作者然后会顺着这条思路来理解整个故事:权威威胁学生要处罚他的违规行为;学生表示出顺从,找出借口,并且保证以后一定会改正;权威最终答应了学生的请求,警告了一下学生就让他离开了。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由于抽烟只是情节较轻的违规行为,所以学生只要表示合作就不会被开除。

民族志研究者在重读他所写的田野故事时,不仅应该反省他之前建立的不明确的联系,而且应该考虑情节之间(以及情节内部)的断裂。校长的故事中存在的明显断裂——开除和饶恕之间的断裂——可能有多种不同的阐释。比如,研究者有可能提出以下任何一种解释:(a)如果学生表示顺从,校长就会放过这个学生;(b)校长听从了亚裔女行政人员的意见;(c)亚裔女行政人员

① 当然,即使在民族志研究者开始描写田野故事的时候他对故事结构的理解也会有所改变:他可能在描写故事时发现在速记时认为不相关的一系列行为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或者,在他描写故事的过程中可能会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来组织那些事件,这样就可能会相应地改变创作故事的方式。

常常为外籍学生求情。为了在这些可能性之间做出有根据的选择,研究者会更加深入地观察校长如何教训学生。

最后,随着研究者不断推进田野研究并撰写田野笔记,他可能会对故事结局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在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中都会存在一些随意的处理。作者以他开始观察某个事件、核心人物或者有趣的场景为故事开头,在故事结尾处不是以事件的结局(校长让学生离开了)作为结尾,就是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人物、行为或者场景。作者最开始的经历和关注点决定了整个田野故事的框架。但是,当他重读或者重新思考这个故事时可能会意识到由于这个故事与其他故事中出现的同一个人物而使这些故事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某个故事的结尾只是作者停止讲述之处。比如,尽管警察巡逻的故事结束了,山姆和艾莉莎那天晚上以及在后续的观察之中还继续巡逻了很多时间,故事还会不断继续。^①从这一点上,由于有关人物生活的故事在第二天甚至整个田野故事撰写的过程中都在不断继续,因此田野故事只有暂时的结局。

总的来说,田野研究者撰写的田野故事旨在反映他的日常经历,而不追求精心雕琢的、以悬念为导向的叙述。他们采用传统的叙事手法来描写人物的行为,使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文字而重现这些行为,然而又同时忠实于他们对事件的第一感觉。但是,研究者对任何事件的理解都会随着他不断撰写和重读自己的笔记而

① 关于警察的故事的现行结尾取决于我们编辑的需要,符合我们对结构较松散且篇幅较短的故事的需要。如果我们从更早的时间点截取故事,并且在更晚的时间点结束故事,那么读者对整个故事线索的理解就会不一样。或者,我们截取的故事更短一些,从在7-11便利店买咖啡开始,而以拦下第二辆车作为结束,那么这个故事就会看起来像一个更加连贯、清晰的关于警察日常工作的故事,平静的工作有时被兴奋的时刻所打断。

变化和发展。当研究者在后来的研究中重新考虑对某个故事的阐释时,他会向自己提出更加直接和尖锐的问题。所以,田野研究者只是暂时忠于当天所写的故事,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可能会改变整个故事的格局。因此,在一系列田野笔记中,每一个田野故事与其他情节都息息相关,而且会影响其他情节。这样看来,每个田野故事——作为众多故事版本中的一种——始终是没有结束的。

撰写过程中的分析:旁注、评论和备忘

田野工作者在开展研究时一定会反思和阐释他所经历的和观察到的事情。如前所述,田野笔记的撰写突出并聚焦于这些阐释和分析的过程;研究者通过把当天观察的情况记录下来会发现新的关注点,并对看到的场景和事件有更深入的理解。田野研究者在撰写过程中消化和理解自己的经历。他通过直观地选择、突出、安排某些细节,以及通过与之前观察到的情况和描写的经历建立联系或者形成对比,来为当前的情况赋予意义。此外,他还可能在田野笔记中反思他呈现和安排那些事件和行为的方式,在选择性地重读情节和故事的时候关注它们的结构效应。

田野研究者为了捕捉这些反思和洞见并且能够在之后思考和分析时找到它们,就会在撰写我们之前提到的叙述性描写的同时,写下多种形式的分析性文字。通过写这些分析性的文字,研究者可以为进一步的观察和描写提供更具探究性的视角,因此在描写过程中更具选择性和深度。

这些阐释、分析形式的文字包括旁注、评论和备忘。这些分析性的撰写策略随着在田野笔记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叙述性描写的深

人而不断深入。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时会用到旁注和评论；他可能在回忆某段观察和事件的细节并写下来的时候想到一个主意，就用旁注或者评论的形式记录下来。备忘是研究者仍然在田野中或者在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更加集中地确定和提出分析主题的产物。这些备忘往往不是在描写某一事件的时候写下来的。田野工作者为了对田野笔记进行更加统一的分析，会通过阅读最近的田野笔记来确定和提出具体的阐释、问题或者主题，以备忘的形式记录下来。^①显然，这些区分不是绝对的；旁注、评论和备忘之间的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我们认为它们都是带有启发性的工具，帮助田野工作者在撰写田野笔记时回忆当时的场景并更加集中于分析。

旁注是简短的、带有反思性的分析性文字，简洁地就田野笔记中提到的事情或者过程进行澄清、解释、阐释或者提出问题。田野研究者在叙述性描写的过程中匆匆退出，花一些时间以个人的或者理论的视角来反思已经写下来的故事，然后立即又投入描述性文字的撰写中。这些评论可能会穿插在描述性段落之中，以插入语的形式标记出来，就像下面这个例子中一样。

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问乔治他教书多长时间了，他说：“嗯，今年是第八个年头了。”我回应了一声“哇！（我没想到他有那么大年纪。）”他看着我笑了笑，然后向我说起他曾经在哪里教过书。

^① 参见第六章关于备忘、编码和分析之间关系的讨论，第六章的关注点从具体的田野工作转向了撰写完整的民族志。

在下面的片断中,研究者在旁注中写下了一个一直在观察他的人给他带来的不安感觉:

我转过身,离开办公室,面对着那个还在冲着我笑的金发女人。(我始终感觉她在盯着我。)"周五见,"我一边走出前门一边对她说。

田野工作者常常会写一些更加详细的旁注,篇幅长达数段,而且是基于刚刚撰写的田野笔记的,和笔记中的事件或者场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下面的田野笔记中,田野工作者描写了她第一天到急难事务顾问中心的情况,然后用一段较长的旁注反思了这段经历:

我顺着楼梯走到办事处,发现每个台阶都吱吱呀呀地摇摇欲坠。最顶层放着一个旧的松木衣架,满满当当地挂着很多外套。衣架后面有一个公告栏,上面贴着很多介绍组织和服务的宣传页。(回想起我爬楼梯的场景,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心烦意乱的客户,我很可能觉得在这种杂乱无章的地方很难得到有用的帮助信息。)

这个学生通过描写她自己对办事处的“亲身感受”,将旁注结合到对物理空间的描写之中,同时也为其他人可能存在的不同解读留有空间。旁注还可能用来解释那些要不然不太明显的事情,或者对刚刚考虑的问题提出反思或者阐释。比如,田野研究者常常采用旁注来传达他们对事件的清晰“感受”或者情感反应;把这些评价放在旁注中可以避免它们影响叙述性的描写。

评论是研究者针对具体事件或者问题提出的更加详细的反思；它是独立的段落，放在括号内以批注形式存在。评价可能包括研究者关注点的转移，之前考虑的是田野中的事件，之后转而考虑未来读者对观察到以及写下来的故事会有什么兴趣点。与叙述性田野笔记相反，评论可能会考察田野进入的问题或者情感上的反应，对很可能与其他事件产生的联系提出不断的追问，或者提出尝试性的阐释。分段撰写评论可以避免把这些细节当作先入为主的类别或者阐释的证据。^①

在研究者进行参与式观察或者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评论被用来记录研究者自己在田野研究过程中的行为、经历和反应。一位研究社会服务机构的实习生在描述了某一事件之后写下了如下评论，她认为这个事件代表了她和员工之间关系的转折点：

我走进厨房开始准备午饭，员工们也常常在这里进行社交。很快，几个员工走进来，开始互相交谈。我尴尬地站在一边，不知所措。我和他们交流了一会儿，直到主管 D 用她洪亮的带有戏剧性的嗓音问所有人：“猜猜看 A（一个在场的员工）打算去哪里过生日？”屋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我朝她那边看去，发现她正在冲着我问。“去哪里呢？”我问道，多少因为她冲我说话而感到惊讶。“去好时公园！”她说。“不可能！”我说，因为觉得有些尴尬我开始

① Schatzman 和 Strauss (1973: 99—101) 建议在每段田野笔记之前标明类别：“观察记录” (Observational Notes, ON)、“理论思考” (Theoretical Notes, TN) 或者“方法反思” (Methodological Notes, MN)。很多田野研究者认为这个过程有效地标明了描写重点的转换。但是，我们通常不会使用这些标记，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区别既会带来理论问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实际操作。

笑起来。“是啊，”D说，“她要把整个身体放在巧克力里，这样R（情人）可以吃掉她！”屋子里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咯咯笑起来。

（这群人散了，我也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我开始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他们的厨房聚会中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这段经历使我相信我不会再被看成一个外人。我曾经考虑过怎样才能融入这里的环境，而一个毫无疑问的方面就是参加到他们非正式的厨房聚会中，并且不像上面那样表现尴尬。）

研究者在这段评论中不仅记录了她在场景中所感受到自己越来越被员工们接受，而且反思了这些非正式的、有时候会开黄色玩笑的“聚会”在产生对某个组织的归属感时的重要性。

最后，评论还可以涉及词语和事件对当事人而言的意义，在当前的观察和之前完成的田野笔记之间建立某种初步联系，建议之后深入观察的重点或者地点，就如下面这个片段中写到的这样：

M远远地对理查德说：“过来小朋友。”理查德走过去在M身边坐下来。他问起理查德之前理查德说过的什么事情（我不能完全听清）……关于举重的什么事儿。理查德回答说：“哦，要是讲起来我能讲几个小时呢……”M询问理查德校园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练习举重。理查德说有一个举重室，但是今天只有“篮圈”（特指篮球运动）才能使用。M接着问理查德什么是“篮圈”。理查德回答说“篮圈”是指篮球。

（小朋友这个词是不是可能来自于伙伴这一词，指的是很酷的某个人？我看起来觉得M希望和理查德搭讪，虽然他显然不认

识理查德。为了与他交谈,M试着让理查德知道M认为他是一个酷人?小朋友看起来跟族裔无关……他们的互动看起来围绕着一项共同的运动:举重。从M的肌肉来看他应该很擅长举重。)

田野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黑人使用酷来形容那些原本不属于他们圈子的非黑人。在这段评论中,他反思了其他类似的词语。

撰写过程中的备忘是更加持续的分析性写作的产物,而且需要研究者从描述性田野笔记的撰写抽出更长的时间来撰写。研究者常常在写完一天的田野笔记之后再写备忘。尽管这些备忘可能是在撰写田野笔记时被激发起来的,但是它们强调的是同时涉及若干份田野笔记的事件。田野工作者在撰写备忘的时候,脑海中清楚地浮现了读者的诉求,考虑如何把自己的想法和经历以吸引读者的框架整合起来。

撰写过程中的备忘可能谈到实际操作问题和方法问题,包括:接下来我应该在哪里进行观察?就这个事件我还应该问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引导研究者关注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受虐妇女避难所进行研究的学者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能够完整地理解工作人员是如何看待和完成工作的:

工作人员迄今为止谈到的工作目标——为客户“提供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以及“提高她们的自尊”——看起来非常模糊。工作人员怎么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做到了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是基于她们和客户之间的互动还是在员工大会时避免对她们进行带有价值判断的评价或者批评?我会努力发现她们怎样定义和达到“提高妇女自尊”这个目标。很清楚,工作人员认为这个目标不仅仅意味

着妇女们解除了虐待的关系。如果把离开那些虐待她们的伴侣作为她们获得自尊的首要指标,那么这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成功的,因为绝大部分妇女最终又回到了被虐待的婚姻关系之中。但是,我只是知道提高自尊不是什么,还需要研究它到底是什么。

田野工作者这段篇幅更长的评论和问题中指出避难所工作人员认为在他们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中应该达到的两个目标:“提供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和“提高她们的自尊”。接着,她提出了一些方式来帮助自己理解这些泛泛的政策/价值观如何被实际操作以及如何评价员工与被助者之间的互动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撰写过程中的备忘可能通过后续的事件或者理解提出新的阐释,比如:

几个星期前,我写到过一位员工们认为非常可气的客户,因为她每天上午一直不停地打急救热线。当时我的印象是:员工们认为除非当事人很快就会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否则这样的电话很没必要。通过今天的谈话[我在前面的田野笔记中提到],我发现这样的印象是不准确的、过于简单的。尽管员工们认为深夜的急救电话很烦人,他们也承认必须保留这样的服务,主要用来处理那些紧急的会带来身体伤害的暴力事件。但是,尽管打电话的人所处的情况不属于这种暴力事件的范畴,她也不一定会被认为是“妨碍的行为”,除非她一直不停地打电话,而且很了解组织的情况,应该知道不该这么做。每一通电话都会被看成一个单独的情况,也会被当成个案来处理。只有当她们的问题变得很费时间或者难以解决时,员工们才会认为她们是在妨碍公务。

在上面这段备忘中,学生通过更正和扩展之前的分析提出了更加复杂的分析。写作备忘帮助她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根据刚刚达成的理解在系统分析新信息时找出细微的差别。

田野研究者在写作评论和备忘的过程中应该始终保持开放的思想,避免进行过于绝对的分析,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性。评论和备忘中对追问的反思、初步沉思和开放性问题将对之后的研究和分析大有裨益。比如,“可能”、“显然”、“看起来”这些词标明研究者对“小朋友”的评论就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而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

田野研究者可能会不确定怎样分配撰写叙述性田野笔记和分析性文字的时间。分析性评论和撰写过程中的备忘很可能占用撰写占核心地位的描述性田野笔记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新的想法,比如那些使田野笔记变得生动的描述性细节,总是一闪而过;如果不立即把它们写下来就会“忘记”或者最终没有被发掘。因此田野研究者始终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是希望在出现灵感和想法时就将它们写下来,另一方面是想尽快把叙述性的描写“都写下来”,尽可能不要打断写作的过程。

总的来说,田野工作者继续在田野中进行观察或者积极地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不断地反思和分析对于研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分析性的旁注、评论和备忘能够帮助田野研究者推进分析进程,同时收集更多的数据。这种反思性的文字常常促使研究者更加关注所观察到的东西,因此会写出更加详细、生动的描写。撰写过程中的分析帮助研究者更有针对性地观察到支持某项分析的数据。分析性的主题确定得越清晰,田野工作者就越能够“找出”

不同的选择,得出能够确定、修正或者推翻不同阐释的观察结果。理论性的旁注和评论,以及更加详尽的理论备忘也提高了这些可能性。

反思:田野笔记是写作选择的产物

田野研究者撰写田野笔记的首要目的是描写——在纸面上呈现生活的片断——而不是分析。但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术语——描写和分析——更多指涉的是不同的写作方式,而不是认知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撰写田野笔记是“边描写边分析”的过程。因为所有描写都出自研究者的笔下,所以它们肯定是经过选择的,而且带有作者的目的、观点和意见。为了以这种方式“描写生活”,研究者使用语言惯例来展现场景。速写和情节呈现了相对静态的生活片段或者讲述了一段故事;它们描绘情景、人物、行动,而不是提出解释或者建立论点。

根据定义,所有的写作都是抽象和排序的过程:清晰的文字往往具有内在的连贯性,是作者对主题以及对潜在读者仔细考虑之后的产物。民族志研究者组织田野笔记的过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详细描写”,而不是“写下”或者“记下”人们的言行。作者不仅仅是描写世界。就像研究者作为观察者与当事人一起构建了社会事实一样,他们作为撰写者也运用语言创造了世界。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描写真实观察到的细节,民族志研究者也常常是“创作”出所要描写的场景。撰写田野笔记是研究者对自身经历的加工,这种加工不仅来自于研究者在田野中的具体关注点,还来自于作者在书桌前的回忆和行文方式。民族

志研究者理解互动、选择重要的细节；在写作中根据传统的写作技巧将这些细节整合成连贯的故事。^①

但是,运用写作惯例不仅仅指的是作者通过使用恰当的修辞技巧熟练地使写作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它促使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时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描写出被研究者经历和理解的社会世界。谈到影响写作的因素:不仅作者的理论取向会影响行文的选择,而且有时行文的选择也会影响作者的理论取向。比如,几经推敲的言辞、全知的视角和被动语态的使用体现出“客观”社会科学的风格,这样的行文选择也反映了与之密切联系的理论取向。研究者在田野中如何观察,部分取决于他们认为什么内容值得在田野笔记中描写并且“有得写”。因此,恪守研究诚信的学生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写作的方式既影响了田野工作,也影响了田野笔记。

不论田野笔记是仔细完成的还是任意为之,每份田野笔记都反映出作者的选择:包括这些细节而不包括那些,不是通过此人物就是通过彼人物的视角来看待事情,按照这样或那样的顺序(或者是随机顺序)组织行为,或者有目的地为特定的读者撰写。研究者经过这些有意识的选择撰写出包括特定细节、带有特定观点、带有对人物的态度以及使用特定语态的描写。随着这些对场景的例行写作不断积累,写作的选择也呈现出累积效应:田野笔记通过这

① 一些研究者认为他们的田野笔记并不能很好地展现他们在田野中的真实经历和观察。比如,Jackson(1990a:19)摘录了某人的评论:“当我发现它们没有我的记忆那样神奇的时候我很失望……我的记忆中有很多形象的特征,但是田野笔记却仅仅是平淡的描写。”因为田野笔记从不能完全捕捉田野中真实的经历,提高写作技巧则至少会帮助研究者在田野笔记中撰写出一些这种“神奇”。我们认为如果记忆和田野笔记之间存在巨大断裂,那么肯定是研究者没有充分关注写作的过程。

个作者的独特眼光来描述世界。所以,在决定以何种方式写作的时候,民族志研究者怎样写作将给读者以及那些他们笔下的人物带来很大的影响。不论田野笔记是作为私人的田野资源还是出现在最终文稿中的片段都最具说服力。

第五章 揭示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

就给人的第一印象而言,揭示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从根本上来说并不算一个写作问题,而是事关研究者在田野中如何询问、倾听、观察和体验研究对象的关注点。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其实并非是明晰而客观到可以让研究者简简单单地去“发现”的。与此相反,这些意义需要研究者着力揭示出来并传达给读者。尽管这一过程必定是以询问和关注相关事物对某一群被研究者的意义而开始,其关键却是以敏锐的笔触将当地人眼中事物的含义记录下来,然后让那些对这一特定社会生活环境并无了解的广大读者知晓和理解当地人的意义世界。当地人的关注点最终将被写入田野笔记并借以形成其他更综合全面的民族志文本。

考虑到探寻并把握研究对象眼中事物的意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读者应该不难理解田野工作者为达到这一目地而对下列两种研究方式各有偏好。在第一种方式下,田野工作者模糊了事物对研究对象的意义而是使用该特定情境之外的标准和概念范畴来描述当地的环境和被研究者的行为。这一外来强加的研究方式掩盖了观察到的那些事物的内在含义。在第二种方式下,研究者机械地套用当地人对事物的理解和概念范畴。然而田野研究的任务显然较之复杂得多:一方面它不仅需要理解当地人对世界的阐释方式并将此公之于众,同时也必须揭示这些方式怎样指导当地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生活,以及当地人和外面世界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方式的。

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怎样才能使民族志文本敏锐而生动地传达出当地人眼中的意义世界。田野研究者在记录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决定如何观察和描述事物的意义的时候,他自己的意见总是起到先导性并很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不论是写备忘还是最终的民族志文本,研究者都不应该对当地人的观点视而不见,就算最终出于某种考虑需要把当地人的观点转化成对自己也是对读者更加通俗易懂的条分缕析的概念。事实上能否从当地人的角度考察事物的影响与意义并将其叙述清楚可谓是民族志写作中的最大挑战之一,不论对于那些即时写成而充满众多细节的田野笔记还是对于那些更加公开而深奥的最终文本而言都是如此。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本章中我们给出的例子不仅包括学生们原始的田野笔记,还包括了工作备忘以及最终发表的论文。在这一章的开始,我们将反思那些用所研究情境之外的观点和原则来探讨事物含义的民族志文本,看看它们是如何掩盖和压制了原有含义表达的。接下来我们讨论怎样将研究所得的结果记录和传达出来:首先介绍描述研究对象意义世界的方法,然后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予以探讨。

强加的外在意义

民族志研究者撰写田野笔记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在记录过程中并不能始终保持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研究者很容易运用某些事先假定的而并非在该研究情境中总结出来的概念范畴和含义。强加的情境之外的意义使得田野笔记不能很好地传达研究情境下的意义与关注点(Matza 1969:15—40),并且常常

将事件描述得失去它们本来的面目(也就是说,使用那些和当地人不同的概念范畴与标准)。总而言之,当田野工作者试着用当地人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的内在含义时必须非常小心以避免自己所用的概念范畴与当地人认定和使用的概念范畴之间出现偏差。

田野工作者没能使用当地人的认知方式大多出于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囿于惯有的民族优越感,当田野工作者在自己的文化或者情境下总结和归纳出某些概念范畴、标准或者特定含义后,就会倾向于以此来描述在其他情境下观察到的事物。举例来说,西方人基于他们自己的预设会把非洲影院或者剧场内观众们对演员的反应描述为“破坏性”的高声喧嚣,而没能发现这是一种被当地人认可的评价演员表演的方式。与此类似,如果观察者参照自身的文化标准,那么他就会使用“嘈杂”或者“混乱”来形容某些非洲学校的教学秩序,而忽视了事实上当地的师生自有一套关于教学活动应该怎样进行的标准。上述做法与其说是描述还不如说是歪曲了所观察到行为的真实面目。

第二,或许是与第一种原因中的相似情绪在作怪,民族志研究者可能会选用研究情景中某类人认可、使用或推崇的术语、概念范畴或者是评价方式来描述该情境下另一类人的行为与特点。举例来说,治疗精神病的医务工作者把病人的某些行为定义为“行动型”或者“拒绝型”,然而在病人们自己眼中这些行为却是再普通、再日常不过的了。通常当研究者在田野中碰到对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解读时,会把其中的一种意见判定为“正确”的,而轻视与之为对立的另一种意见。一位赞比亚的巫师曾经判定某位老人是由于受到诅咒而突然丧失了行走能力,并且通过一年的药物和按摩治疗治愈了这位老人。然而当地医院的一位西医师在听说并亲见了

这位老人后认定他曾经罹患中风症并因此带来了肢体麻痹的后果。如果是西方研究者来记田野笔记的话,他很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认为西医师的观点是“科学”而把巫医的见解贴上“信仰”的标签。也就是这样,他优先考虑了其中一位参与者的解释,认为这种解释更加“准确”或者干脆说更加灵验。

第三,田野工作者可能对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认为这些解读是有缺陷的、虚伪的、自相矛盾的或者是不可信的。举例来说,一位洛杉矶的学生观察某个信仰爱德加·凯西(美国基督徒和预言家)教义的学术团体的每周例会。在下面的田野笔记里,她记述了某成员向团体谈起的一件小事:

桃乐斯丢了钱包,然而她并不惊慌。她向丢钱包的位置投射一道白光并祈求上帝为她看好钱包。同时她还请求上帝不要让任何人抵挡不住诱惑而拿走她的身份证、信用卡和钞票。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她问当值的保安是否有人发现并送还她的钱包。事实上她的钱包已经在保安手里了,而且没有任何翻动过的痕迹。

在这位学生最初的阐释中,这则故事说明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困境中采取了非常“消极”的方式:

这则故事的寓意是鼓励人们把一切都托付给上帝……但对我而言,不报警或者回头去找钱包,而是看到那道白光并和上帝交谈可谓非常消极的处理紧急情况的手段。

这样的阐释显然将“投射一道白光”和“与上帝的交谈”贬低

为一种无效的行为或者更加苛刻一点说是一种病态的幻觉。该团体成员坚信自己的祈祷使得钱包原封不动地被交回,而上面的阐释显然忽视了成员的这种想法,并与之背道而驰。这样的阐释导致研究者不能呈现这一特定团体对什么是日常生活中有效的行为模式的理解^①。

第四,田野笔记中的描述和备忘经常被局限于某些标准化的模式,而这些规定了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模式则来源于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指导人们行动的权威准则或理解。举例来说,当研究者注意到老人所说的某种仪式的传统含义和过程次序与当前实际操作情况之间的不同后,他很可能认为这种仪式正在“消亡中”,而不是正在经历适应与变化^②。与此类似,田野研究者可能只是从警察如何使用武力这一角度来描述和分析警方在街道上所采取的行动;而忽略了警员是基于什么现实考虑因素来评价具体街道的治安状况以决定在何时使用何种武力的^③。在这两个例子

① 很多研究并不直接声称某一群体的信仰和想法是荒谬错误的,但是却会通过把它们描写成自私自利的信仰和想法来贬低它们。Berger(1981)提出“意识形态工作”这一概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途径。他说,很多社会学分析“要么通过人物的观点展现他们‘真实的’利害,要么通过呈现人们的观点和日常行为之间的差异来‘揭示’人们的观点”(1981:19—20)。民族志研究者有一项不一样的任务——“不要呈现事实和说教之间的差异或者矛盾”(1981:114)而需要细致考察并记录人们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比如,当Berger观察到当地的嬉皮士使用机器锯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这种行为与他们所说的对现代“技术”不信任是相互矛盾的,而是仔细地、不带偏见地考察这些嬉皮士是如何将机器锯视为“工具”而不是“技术”的(116)。这些阐释的过程“目的在于弥补事实和信仰之间的差距,使之保持和谐一致”,呈现出补救性意识形态工作(remedial ideological work)(1981:114)。

② Jordan(1993:41—61)关于赞比亚西北省割礼仪式中面具传统的讨论揭示了这些意识的不同的特点;他发现面具装饰中的创新可能是当地人应对地区政治现实的一种方式。

③ Hunt(1985)对警察使用武力的分析采用了另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她试图理解警察自己认为哪些武力是过分的或者残忍的,而哪些武力是合法的或者“正常的”。Hunt避免使用她自己的判断,而希望了解警察怎样以及在何处将这些区别应用于具体的武力使用之中。

中,研究者已经决定好了观察到的行为与“传统”版本的仪式以及“警察”的武力使用是应该保持一致还是有所不同,并以此为根据来判定这些行为是否就是“事实上的”“真实”的仪式,是否就是对武力的“合法”使用。

第五,研究者倾向于不假思索地运用那些现成的、在学科内部被奉为主臬的理论方法来描述观察到的事物与所处的环境。以对传统叙事法的研究为例,以前的研究者即便在解释非西方传统的时候仍会非常依赖于“神话”、“传奇”和“民间故事”这一分析归类方式。考虑到这一方式背后所暗含的欧洲中心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域的人们叙事习俗的误读,当今的民俗学者日益重视以当地术语和解释方式来刻画当地的叙述习惯,并描述出当地人在实际叙述过程中是如何运用这些术语和解释方式的。^①

田野研究者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不自觉地使用那些“局外”的概念范畴,具体体现在根据先验的研究议程或者理论框架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问题。这不仅包括田野工作者在向被访者了解情况时就已经具备的主观想法,还包括他了解情况的方式本身对被访者回答的影响。举例来说,当田野工作者想要了解某种药方的成分或者某种仪式的各个步骤时,当地人可能出于取悦研究者的目的而信笔写出答案。或者当田野工作者根据研究情境外的知识

^① Ben-Amos(1982)尤其强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族裔和分析体系的差异阻碍了研究者对当地分类体系的考察,他提倡研究者记录并且揭示当地人使用的术语和分类体系。但是,研究口头传统的学者们还是坚持认为他们采用的分析性概念范畴还是具有相当价值的。Okperwho(1992)在强调使用分析性概念范畴来深入讨论的同时建议研究者在描述当地概念范畴时使用当地人的术语。

设计出某些问题后,被访者会以“不明确的回答”,比如“是呀”、“不会吧”或者“有那么几次”等来搪塞,而这种情况在当地人习惯于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那些治疗或者仪式过程的时候尤为常见^①。所以那些真正出色的田野研究,与上面列举的情况不同,是“从被访者身上发现问题和答案”的(Spradley 1979:84)。^②

第六,以简单的二分法变量来描述当地的情境和人们的行为也有强加“局外”概念范畴之虞。当田野研究者把酒吧里的顾客分成“常客”和“偶尔光顾者”时就很有可能忽略了那些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光顾频率不定的顾客。总而言之,如果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归纳成某些变量或是以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予以解释,容易造成剥离背景信息的极端状况或是严重妨碍对当地人意义世界的理解。

研究者做田野笔记或者写备忘录时,如果出现了上面所列举的情况就难以避免忽视、边缘化或者掩盖当地情境下人们对事物或者事件的特定认识。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推荐几种做田

- ① 民族志研究者还可能因为自己看起来对他们的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不甚了解而得不到当地人回答。Diamond(1989)重述了一位著名人类学家所讲的故事,这位人类学家在新几内亚高地与当地的 Kalam 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并向当地被访者了解当地人对一千四百多种动植物是如何命名的。但是,当他问被访者当地人怎么命名各种石头的时候,被访者坚持说他们只用一个词儿来命名所有的石头。一年后,人类学家带着一个地质学家朋友回到当地,那个朋友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列出了一大串 Kalam 当地命名石头的术语。人类学家很生气地质问被访者为什么他要欺骗自己,说当地没有区分各种石头的术语。被访者回答说:“当您问我们关于鸟和植物的术语时,我们发现您对这些了解很多,因此您可以理解我们跟您说的话。但是当您问起石头的时候,很显然您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告诉您一些您没法理解的东西呢?但是您朋友的问题说明他是懂石头的。”(Diamond 1989:30) Diamond 总结说田野研究者为了了解当地术语和分类体系就必须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达到和被访者差不多的了解程度。
- ② 认知人类学家尤其(例如,Frake 1964; Spradley 1979; Agar 1982)需要采用一些技术来避免从另一种文化中“发现”合适的、有意义的问题来把外在的概念范畴强加于当地文化。

野笔记的方法,帮助研究者避免对研究情景给出外界的、主观的判断,从而使得描述和分析能够切中当地人的关注点、内在含义以及概念范畴。

呈现当地人的意义世界

群体生活的很多片段能够体现出研究对象是怎样表达、适应和创造出自身的意义世界的。当田野研究者开始构建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时,可以关注当地人在那些生活片段中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尤其是当地人在这些日常互动中使用的词句、表达方式以及概念范畴。

当地人相互介绍和问候的方式

当地人相互之间的介绍和问候是所有谈话形式中最值得直接关注和最具启发性的形式之一。特别是当田野研究者进入一种全新的语言和文化中时,他可以通过记录并且学会恰当的问候方式来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在很多文化中人们互相介绍对方的方式透露出彼此相对的社会地位;我们可以设想直接以名字相称所显示出来的亲密关系与诸如“博士”、“先生”或者“女士”之类带有敬意的正式头衔之间的差别。此外,人们相互问候的方式——言语上的或者是肢体上的——通常向研究者提示说话者之间亲近、尊敬、防卫或者是带有敌意的关系。^①

^① Frake 所著题为《怎样进入 Yakan 人的家》(1975)的经典民族志中详细分析了在 Yakan 社会中人们怎样相遇并互相打招呼。

例如,在乔克维人的村庄中,人们以亲戚身份互相称呼,比如说 tata(爸爸)、mama(妈妈)、yaya(与自己性别相同而年长的兄弟姐妹)、mwakwethu(与自己性别相同而年幼的兄弟姐妹)、ndumbuwami(与自己性别相异的兄弟姐妹)(Fretz 1987:58—65)。听一听当地人是怎样互相称呼的,既有助于了解他们之间的血亲关系,也能够帮助研究者学会当地人眼中得体的言语和行事方式。还是以乔克维人为例,在那里祖父辈和孙辈之间有可能公开地表示出亲昵关系并开一些与性相关的玩笑,而这些行为在其他类型的关系里是很不应该的。与此相对,姻亲之间只是远远地互相致以正式的问候(年轻的一方应该为年老的一方让路),并且从不在一起吃饭。美国社会其实也与此类似,不同的介绍与问候方式也显示出双方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特点。试想一下在教室或是精神治疗所里,当学生们介绍自己的老师或者病人们介绍医务人员的时候,他们是以“姓”来称呼还是以“名”来称呼,这其中的差异是巨大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地人之间是否互致问候以及怎样问候都可能提示研究者当地人之间的亲疏关系。

日常提问与回答

一个敏锐的田野工作者总能留心收集当地人经常问的各种问题以及人们通常针对这些问题所给出的各种答案。比如在非洲社会里,人们每天会相互问候几次并问一些简单而得体的问题。以前面提到的乔克维人为例,他们经常会问对方的状况,既包括整个大家族(“Kuci ku nzuwo?”“家里怎么样?”),也包括对方和家人的身体状况(“Unahindvuka, nyi?”“你身体还好吗?”)。在这样的问话之后人们可以接着谈论一系列话题,比如健康、工作、经济问

题、家庭里的争吵、生小孩、死亡、吃饭、寻找食物以及庆祝某事等等。学会恰当地询问和回答这类问题能够帮助研究者接下来和当地人讨论那些他们认为事关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①

当我们评价某些研究者能够敏锐地捕捉当地人的经历与观点的时候,这意味着这些研究者不仅能够倾听当地人提出的问题,还能够设计出某些开放性问题供当地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语言做出回答。所设计的问题在那些当地人眼中应该是有意义的、有趣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切合他们行事与言谈方式的。田野研究者为了了解共同观察到的事情或者是偶然听到的讲话常常会提出一些当地人认为有意义的问题;他可以让当地人谈谈他们刚才共同经历的事件,可以让当地人解释一下自己刚刚用过的当地术语或者其他人在谈话中所做的某句评论。这样的问题有助于当地人以他们熟悉的形式表达他们的看法,为他们的回答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背景,从而有助于揭示他们的概念体系——当地人赋予“信息”的意义。

当地人的自发叙述

民族志研究者应当非常留意当地人自己是怎样界定和描述具体活动、事件和人群的。考虑到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必然的、不变的内涵,对于那些构成当地人生活环境的事件与事物,田野工作者不应该事先假定自己已经了解它们在当地人心目中所代表的意义。与此相反,田野工作者应该仔细倾听当地人日常生

^① 当然,密切关注日常问题和得体的回答还能帮助研究者了解如何以自然的方式参与到谈话之中,这一过程就构成了研究者在田野中再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活中发生事件的“真实面目”以及这些事情对他们而言的重要性。^①

被研究者在向外来者介绍自己的生活环境时常常会做一些自发的叙述。通常情况下,这些叙述很明显地被构建在特定的框架中以便凸显当地人认为唯一而独特的特点。我们以下面的一段田野笔记为例。在这段笔记中,一名就职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社会工作者向研究者描述了自己的工作并概括出自己部门的特点:

“高级机构的部门越大,人与人之间互相了解和接触的机会就越显得‘奢侈’。如果我每天要接待 20 到 25 个人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和申请者深入地交谈。我需要做的是处理完手头的这位申请者,然后是处理下一位。有时候政府雇员表现出的那种冷冰冰的态度纯粹是出于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的缘故。但是正因为我们是这个小部门,有时候倒是有这种‘奢侈’去深入了解申请者的情况。某些时候却未必。”

这位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希望深入了解那些联邦住房津贴申请人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使得这种接触有时候变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奢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社会工作者的描述不仅仅起到帮助研究者熟悉工作环境的作用,同时也透露出他对自己这份工作的看法。

对于场景中重要事件的自发描述有时候会以一种更加非正式

^① 参见 Sudnow(1967:36—42)对新来的人如何将死亡是“可计数的”这一不同看法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的方式进行。举例来说,田野工作者也许可以仔细留意人们是怎样向“新来者”介绍并教会他们“怎样做事情”的。既然“新来者”正处于点点滴滴的学习过程当中,他们下意识提出的疑问或者犯下的错误正能最好地提示研究者在这一环境中浸淫日久者所具备的并且已经习以为常的知识与技能。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考虑到那些已经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们通常会像对待任何一个外来者或者是他们自己孩子那样教给田野工作者如何适应当地的生活,研究者或许觉得应该在田野笔记中仔细记录下自己从进入田野到日益习惯该环境的全过程。实际上,这一所谓的社会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所难免的。举例而言,当研究者开始在乔克维村生活时,她在户外学习如何使用炭火炉烧煮的每一个动作——细微到怎样搅动锅里的食物——都成了在一旁围观的邻里妇女取笑、议论和纠正的对象。由于这些当地人平时就在一起劳作并习惯于以彼此的失误取笑作乐,因此她们饶有趣味地看着研究者笨拙的一举一动并且带有玩笑意味地认为研究者的举动活像是一个幼稚孩子所为。经过这一番社会化,田野工作者不但熟悉了当地正确的烧煮方法,也注意到了当地取笑、申斥和纠错的常用方式。^①

研究者现场观察了任何事情之后都会有所发现;一个简单的假设就是任何人只要在亲历了某事之后都会就该事件对他人的影响做出评估。那么当研究者在田野笔记中依照自己的理解描述某个事件之后,就还应该听一听当地人是怎样谈论这件事的,并以此补

^① 很多其他田野工作者也提到自己在当地人的戏弄和嘲笑中完成了社会化(比较 Yocom 1990)。

充自己的记述。因此当田野工作者目睹了某地区律师在偶遇警探后的种种抱怨之后,应该在田野笔记中再详细记录下该律师事后在午饭餐桌上是怎样对同事谈起自己与警探偶遇的具体情况的。^①

与此类似,田野研究者不应该不假思索地认为当地书面文档中体现出来的当地人的意义世界和重要性是明晰无误的。研究者应该做的是尽力了解当地人是怎样阅读、理解和阐释这些文档背后的意义的。正是出于上述考虑,田野工作者不应当简单地把任何文档看作一份客观的记录,而应该仔细考察该文档的作者是怎样归纳概括出这份文档的“精髓”和“要旨”的,然后在田野笔记中记录下文档的内容和人们对它的反应。

下面这段笔记描述了一位缓刑监督官和一名来自缓刑学校的16岁冲浪运动员之间的谈话。这名白人男孩叫汤姆。当田野工作者参考了缓刑学校为汤姆出具的“进步报告书”之后,他写出了如下田野笔记:

总体来说,进步报告书显示汤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儿进步的。但是还有一天汤姆就要被送回家了。缓刑监督官谢莉就回家事宜询问了汤姆本人的看法。

在这段田野笔记片断中研究者不加辨别地断言报告书显示汤姆是“有那么一点点儿的进步”;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缓刑监督

① 在这些情况下,研究者必须总结或者说明“发生了什么”;此外,研究者还应该说明“发生的事情”对具体人物来说的重要性。从这些方面看,这个被研究者所说的话正是对事件的特定“构建”过程(Garfinkel 和 Sacks 1970)。每个事件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出来,不同的方式取决于讲述者的关注点和兴趣。

官在与汤姆谈话之后就是用这句话向研究者评价这份“进步报告书”的,而研究者则只是直接将缓刑监督官的意见拿来当作自己的意见。这套研究程式忽视了对“进步报告书”加以阐释的过程,既没有找出里面可能提及的“进步之处”,也没有指出那些“没能改进之处”。这样就默认报告书绝对真实地记录了该少年的表现,而不是一份在特定场景中完成的但被运用于另一场景中的模棱两可的报告。^① 它并不能显示出到底出于怎样的考虑使得缓刑监督官给出了“有一点点儿的进步”这一结论的(比如说,只是想鼓励一下这位少年)。总而言之,上面这位研究者把某一被研究者的观点作为事实,而不是看作一种出于某种特定目地、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给出的解释。

田野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听取当地人的自发叙述,而应该促使当地人讲述,小心地诱导他们讲出他们认为有重要意义的事物与事件。^② 明白上述道理之后,研究者就可以请那位缓刑监督谈谈自己是怎样写出那份报告书的,以及她认为报告中的什么内容是重要的。

被研究者的故事

人们在描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事

① Cicourel(1968)在他的经典研究中考察了处理问题少年的警察和缓刑监督官如何阅读和阐释众多行为不良的案例中的种种书面记录,包括拘留报告、缓刑调查和学校报告。他还重点关注了一些警察和缓刑监督官的实际的和策略的考虑,这些考虑决定了他们最初如何将他们和问题少年的谈话写成书面报告(尤其参见 Audrey 的案例,130—166)。

② 人们就研究者的问题的回答常常受到问题本身的形式以及访谈环境的影响。Spradley(1979:85—91)说明了研究者应该怎样提出那些能够得到有价值的答案的“描述性问题”。Briggs(1986)讨论了访谈情境和研究者使用的语言如何影响被访者给出的答案。

情(比如“流言蜚语”或者“道听途说”)时总有“添枝加叶”的习惯。他们会采取某种叙述策略来重新组织整个故事,进而形成属于叙述者个人的故事版本。^① 这些故事一方面确实能够给出有关人物与事件的相关信息,然而研究者必须注意这些叙述总会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讲述者讲故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故事版本也会随着现场不同的人际关系以及事态的变化随时加以调整适应。因而这些故事也能够透露讲述者当时的关注点以及所处环境。下面一段田野笔记是某位缓刑监督官对研究者讲的故事:

“你错过了这一切,伙计。”杰姆对我说道。我问道:“发生什么了?”

杰姆走到自动售货机前买了份快餐。然后他开始告诉我今天一位21岁男青年的父母给他打了电话,要求逮捕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刚刚从“局子”(监狱)里面放出来,但是显然连第一次指定的督察过程都没有去参加。男青年的父亲说他的儿子已经复吸可卡因甚至“沉溺其中”了,一天到晚除了吸食可卡因外什么事情也不做,只是躺在床上——即便起床也只是为了吃点东西或者去浴室。在电话里小伙子的父亲请求杰姆不要再给机会让他的儿子选择是接受监禁还是戒毒康复训练,因为他的儿子必定会选择前者。(选择监禁的话,罪犯在仅仅一个月之后就能被释放而再次吸食可卡因。)

尽管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受监管青年的,它却展现出缓刑监

① Johnstone(1990)讨论了人们如何通过讲故事来构建故事以及赋予故事意义的方式,既遵循了当地人讲故事的传统也表达了他们自己的风格。Stahl(1989)指出故事讲述者常常将自己的经历组织起来以适应当地人对故事的认识。研究者在阐释故事的时候必须推断讲述者自己的价值取向。

警官日常的关注与实践,以及这些实践背后的不同视角与使命。^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者并没有把研究对象所讲的故事当作严格意义上的事实,而是看作讲述者在特定时间面对特定听众为实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表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因此,田野研究者记录并评论被研究者讲的故事,从而展现被研究者的经历以及他们的视角。

研究者还应该关注并记录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讲述。这些版本可能都包含了一些相同的细节,然而每种版本都有可能包含其他版本中没有涉及到的细节,都有可能在叙事顺序上做出些许不同的安排,也都有可能对事件的缘起和责任给出不同的阐释。因此,一位老师向研究者讲述的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教室打斗,和他稍后在午餐中与同事们谈起时所做的叙述听上去有可能很不相同。研究者在写田野笔记的时候应该记录下这些差别,当然前提条件是足够幸运而能听到各方面所做的叙述。

不同的故事版本帮助研究者揭示不同参与者各自以何种方式构建同一事件背后的意义。^②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无罪释放殴打

① 当然,这个故事是杰姆讲给研究者听的,而且大概已经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研究者的关注点和兴趣点,也受到了他与讲述者关系的影响。因此,田野研究者不仅要在田野笔记中写下“这个故事”,而且还要描写当时讲故事的情景:怎样的问题或者评论引出了这段故事、在哪里讲故事的(私下里或者在其他活动中)以及还有什么其他听众。

② Mills(1990)提到民俗学家由于关注人们在口头表达中面对面的互动,因此时常会在详细的转录中研究并记录人们在表达中的多重声音和不同视角。很多研究口头叙述的学者(比如,Bauman 1992a,1992b; Briggs 1988; Georges 1981)认为口头表达是自然发生的、独特的,因此他们会详细分析人们每一次表达的动态过程。他们考察讲述者是怎样调整自己的谈话风格和主题以适应听众、场景和具体的环境。研究者通过记录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来证明讲述者常常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对故事进行修改。比如,Coentino(1982)在他研究塞拉利昂本地人如何用门德语讲故事时记录了三个妇女对同一个民间故事各执一种版本,因此互相争吵的情况:每种版本包括很不相同的细节,结局也很不一样。

罗德尼·金的警官后引发了洛杉矶暴动,这位学生的研究对象就是经历这场暴动的人们所讲述的自己的经历。当记录下参与者们讲述的个人经历时,这位非洲裔美国学生强调了非洲裔美国人在谈论他们相似遭遇时所发出的不同声音。在下面一则故事中,讲述者为不同族裔之间的同志情谊以及在人们互相帮助去“拿那个——别人的东西”时感到的“团体般的感觉”而欢欣鼓舞:

“我记得——听到那项宣判结果出来的时候——是在学校里呢——呃,我感到难以置信,那个,呃,他们居然没有罪,安然无恙地从法庭回来了,那些警官。

“然后,呃,我回家了。我的一些朋友从我身边走过而我并不知道他们打算去上街游行。所以,我跟着他们一起出了学校来到闹市区,然后——我们开始拿别人的东西。

“我只记得这就——像一次统一的行动,人人都来到了街上。那些流氓无赖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人,就像,帮助你去拿那个——别人的东西。就像,‘你要那个吗,哥们?好吧,我把那个拿来给你。’然后我觉得这就像,一种,一种,团体般的感觉,由不同族裔组成的团体。我的意思是,这里有西班牙人和一些其他人,我们做出显示威力的手势,拿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呃——基本上这就是当我们听到判决结果后所发生的一切。”

朱迪,一位已婚而拥有财产的妇女,以与上文迥异的口吻谈起了相似的事件以及她自己的经历:

“我和很多邻居谈了谈。然后,我诘问一个拉丁美洲人:‘为

什么要偷盗所有这些本属于别人的东西,你知道。这是不对的行为,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然后我和我丈夫步行往前走。我们只是步行前进,你要知道,我们并没有伤害任何人,因为你完全可以在街上走来走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你知道,最滑稽的是,你知道,我们的一位邻居说,‘你知道吗,我的衣服就在街角那边的洗衣房里。’然后我们就走到洗衣房,去看看是不是已经有人把那里弄成一团糟了。然后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那些家伙已经到了洗衣房。那时她的衣服还在那里,不过一名墨西哥男青年已经把它们占为己有了——因此我丈夫就训斥他们,让他们‘把别人的东西放回原处’。而且[那位邻居]喊道,‘你们不能拿走我的衣服。你们不能拿走我的衣服。你们不能拿走我的衣服。’因为这就是我们去街角的主要原因。”

在前一个版本中,那位非洲裔美国人讲述者承认自己积极参与了“拿别人东西”的行径,并且是和“流氓无赖”、“西班牙人”以及一些其他人一起干的。他把这段经历描述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是一种“团体般的感觉,由不同族裔组成的团体”。与之相对,从后一种版本的一开始,另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就描述了街道上的人们各自做着不一样的事儿:有些人只是走出来看一看周遭发生的事情,而另一些人在非常带劲地“偷盗”。她先讲了自己如何观看事态以及训斥某个“偷盗别人东西”的拉丁美洲人,然后她讲了自己的邻居是怎样差点成了这场偷盗的受害者的:讲述者、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邻居一起去当地洗衣房看看情况,发现“一位墨西哥男青年”强占了她邻居的衣物;他们坚持要求他“把别人的东

西放回原处”。这个版本的故事不仅显示出两位讲述者对暴动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隐含了他们所持有的、对那场暴动性质和意义的完全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在记录这些故事的时候,这位学生——他自己也是经历了那场暴动的非洲裔美国人——指出并不是整个非洲裔美国人群都是以相同的态度对待这一事件的,而是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事实上,虽然有些人认为这一事件是一场“暴动”,但是另一些人则使用“叛乱”一词来强调他们对放火和劫掠的政治性解读。该学生通过记录不同版本的故事进而检视人们对一场社会事件的不同阐释方式。

被研究者使用的术语、概念以及分类方式

民族志研究者都会留意研究对象到底常常使用哪些术语和词汇来描述身边的人和事。然而不少研究者却会相对忽视那些透露出诸如官方要求、公共关系以及前台礼仪等信息的正式的、技术性的术语;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日常的、通俗的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用语,是那些形象生动却又朴实自然的术语(举例来说,埃默森和波尔纳在1976年提到的“最令人讨厌的工作”;范·马南在1978年提到的“可恶的家伙”);这些词语表达和折射出人们现实而又世俗的关切。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休养所中的前精神病患者群体的内部分类是怎样的(Shaw 1988:282—320)。一方面,监护人员把某些“居住者”称作“集群者”或是“行动者”,说明他们能够通过治疗改善自身状态并最终找到一份工作,开始独立的生活。在监管人员眼中,这类患者与一类被称为“失败者”的患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精神方面的症状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他们能利用

的技能和资源都相当有限,并且被认为注定难以脱离看护体系而融入社会。而在另一方面,“居住者”有着自己的分类方式,这一分类方式的依据是一个人是否重视与其他“居住者”的联系,是否倾向于发展与监护人员之间的联系并从后者那里得到帮助。前一种体系中包括“讨厌鬼”、“治疗师”、“巫师”以及“好小伙”以及那些与“服药组”交往的人。而“居住者”则把那些服从于监管人员、顺应他们要求的人称作“老电站”或者是“胜利者”。很显然,这些术语上的差异体现出监管人员和“居民”的实际关注点的极大不同。

田野研究者听到这些特定情景下特有的专有名词时,并不应该认定它们的含义是单一的、离散的;与此相反,他应该探寻这些词语的各种含义以及它们对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而言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下面的例子是关于收容在“雷耶斯改造学校”里的问题少女的。进行这项研究的学生观察了问题少女在校舍内的生活,并且听到了教员和问题少女对“便条”的不同理解——在问题少女眼中“便条”是室友之间的私人便条,然而学校当局由于担心它们被用来发展某种帮派关系而予以明令禁止。这位学生在自己的田野笔记中记录了如下事件,某位问题少女对教员搜查“便条”感到忧心忡忡:

凯特开始讲自己兴高采烈的原因是因为当天没有查房。她记得第四阶段自己在房间里留了七张违规的“便条”。

然而“便条”在教职人员和问题少女心目中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教职人员把“便条”看作一种帮派行为,它的存在很有

可能引发不同帮派成员之间的紧张与对立。而女孩子们把“便条”简单地看作某种“情书”而不带有任何帮派组织或者活动的意味。读者可以体会一下该学生在其分析性备忘中写下的字句：

宿舍里的三位女孩各自这样描述她们眼中的“便条”：

克劳迪亚：“它和普通的书信没什么两样——就像我们给男孩子写的情书，或者他们写给我们的情书一样。”

凯特：“不合规定的信件——不能通过邮局寄送并且如果发现我们就会被罚‘24小时禁闭’[在房间里关24小时]。”

丹尼：“以交流为目的而交给其他同伴的便条，但如果被发现的话你就得承担后果，比如24小时禁闭。”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仅显示出“便条”跟帮派行为没有任何关联；并且可以看出“便条”对女孩子们的重要性，它们成了教职人员密切搜查的对象并且一旦被发现相关人员就会受到规定的惩罚（“24小时禁闭”）。

田野工作者为了探索和揭示更为广泛的含义，往往需要仔细留意某个专有术语和与之相关的其他专有术语用法之间的差异。举例而言，乔克维人就有不同的专有术语来对应于不同类型的“讲述”。^① 他们运用不同的认知概念来区分各种类型的“讲述”，

^① 这段讨论的素材来源于 Rachel Fretz 1982 年和 1983 年在扎伊尔班顿杜省乔克维村的研究以及 1992 年到 1993 年在赞比亚西北省的研究。这一讨论详细分析并拓展了之前的讨论 Fretz(1987)。

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种不同的术语与表达,比如针对不同的场合使用措辞、风格抑或社会行为。^①比方说当地人用 *kuta pande* 指代对个人近期经历的非正式讲述——通常采用一种夸张的、戏剧性的方式——当人们在傍晚或者夜间互相访问的时候使用。而 *kulweza sango* 指的是讲述那些人们事先已经知道发生过的社会新闻或者社会事件;当地人常常把讲述这些新闻或者事件当作问候或者拜访的一部分。与此不同,*kuta yishima* 指的则是讲述传统故事(某些时候可以是谚语),这些故事都流传已久并被认为是以祖先的真实经历作为蓝本的。人们认为 *kuta yishima* 是“从祖先处得来的”,“通过讲述和聆听可以教给人以智慧的”,然而他们也意识到出于教育目的,这些讲述的事实都带有了一定的虚构,并且在讲述过程中也做了某些修饰和润色。

然而这些术语并不足以充分显示出乔克维人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讲述”所做出的细分。尽管乔克维人并没有为每种讲述形式都配以专门的术语,但他们确实区分出两种不同形式的 *yishima*——短篇谚语或寓言以及长篇故事。当地人在非正式或者正式谈话(比如说庭审)中都可能使用短的 *yishima*(寓言)来立论。与此相对,当地人只有在晚间走访朋友或者自娱自乐的时候才围坐在火堆前讲长的 *yishima*。在后一种情况下,讲述者为了调动听众的热情而扮演了创作者的角色;因此,同一个故事在不同讲述者的口中会有不同的版本,而即便是由同一个人来讲述也会随着每

① Ben-Amos(1982)建议研究者在考察当地语言的表达种类时应该描写不同层面的种类,如认知的、表达的和行为的层面。他指出某人的表达体系有时候包括行为层面的区别,但是并没有不同的术语来表征这个种类,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观察人物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来确定其中的区别。

次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尽管当地人通常并不从言辞上区分各种 *yishima*, 但是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做出区分, 他们会用“篇幅长的那种” (*yishima yisuku*) 来称呼故事而用“篇幅短的那种” (*yishima yipinji*) 来称呼寓言。此外, 当地人虽然将故事统称为 *yishima*,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对故事类型做进一步细分。举例来说, 当听众们想以伴唱的形式更加深入地参演到讲述者的表演中时, 他们会要求进行一次 *chishima-cha-miaso* (带有演唱的故事), 而讲述者就要把一段反复吟唱的歌曲编入到自己讲述的故事情节中。

事实上民族志研究者应该从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以及其他更广泛的方面考察当地人使用的术语之间的差别。尽管研究者并不能在一次观察或者访问中就发现这些差别,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或者备忘时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它们的存在。通过留心观察当地人对相关术语含义的辨析, 研究者能够降低以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当地术语的风险。揣摩具体情境下某一术语的用法常常有助于揭示这一词语除了第一印象以外的其他认知上的微妙差别。

在某些情况下, 研究者或许可以把观察聚焦于被研究者公认的某些类型。人们常常以不同的术语或者措辞来指涉不同的类型。举例而言, 社会机构会定期对其服务的对象进行比较甄别, 正如一名学生对社区精神健康诊所的情况做出的分析:

所谓的慢性病人指的是那些功能低下、孤僻离群以及带有其他“症状”(比如一听到别人的谈话就马上顶嘴)的人。在诊所工作人员眼中, 这些人是“难以对付”的, 而且他们都只“生活在他们

自己的世界里”——相对于“慢性病人”的“症状”，那些所谓“潜在”的病人看起来有着良好的预后，而且他们的“症状”也相对偶发。诊所工作人员更多地使用诸如“合作的”、“聪明的”或者是“潜在的”来形容这些病人，他们认为这些病人“比慢性病人更加努力地”试图改善当前的状况，既有更大的能力也有更大的希望。正如朱里安对一名“潜在的”病人的评价：“尽管有时候山姆也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还算是个好小伙。他在努力，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在界定研究对象给出的类型时，这名学生不仅说明人们在谈及某种类型时会使用特定的名词，比方“慢性病人”或者“潜在的病人”，她还记录下了研究对象对这两种类型的描述：慢性病人的症状是持续的，而潜在的病人则是聪明而合作的，并且他们愿意“尽力”地改善自己的状况。

被研究者自己所做的对比

尽管民族志研究者着力避免使用语境外的概念系统来描述观察到的事物（比如与自己熟知的另外一套场景和标准进行类比；参见 Gearing 1970），然而有时候被研究者自己也会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认识事物。这类“自己所做的对比”^①很有可能为探讨研究对

① 这个说法直接来源于 Moerman (1969: 464) 提出的概念“文化内的对比”。Moerman 指出，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句描写：“泰国人在寺庙里很杂”，包含了研究者跨文化的比较，他所希望表达的是“我在寺庙里看到的泰国人比教堂里的卫理公会教徒要嘈杂”。如果研究者要对泰国人的宗教行为进行跨文化的比较，那么他就需要比较当地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举止，比较不同的组织模式和互动模式。因此，研究者也许可以比较寺庙里的嘈杂（以及其他社会行为）和其他可供比较的当地场景中的嘈杂（比如，泰国人在听证会、村落会议和日常交谈中的争论）。

象自身的感知与评判系统提供有力的洞见。举例来说,某缓刑监督官在与这位学生的交谈中比较了雷耶斯改造学校、其中的青少年与她工作过的其他几座青年监管所及里面的青少年:

由于之前曾经在其他青少年监管所里工作过,她一下子震惊于雷耶斯改造学校的种种不同。雷耶斯并不像那些青少年监管所那样问题严重。“这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小纸条(便条),这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在那些监管所里,钢笔和铅笔是禁止使用的,而雷耶斯则不是。不过在雷耶斯金属也是违禁物品,因此她从凯特的房间里没收了一块金属薄片,为的是防止青少年把它用来当作武器……

她把雷耶斯描述成一个“安置中心”,供孩子们在这里接受“治疗”。“这些孩子并不是非常成熟世故。”在其他青少年监管所里,孩子们会把东西藏在润肤膏或者婴儿粉里,而雷耶斯的孩子就不会这么做。在那些青少年监管所里,“潜在的危险总是存在”。而在这里,女孩子最想做的只不过是和男孩子说说话。

这名学生在田野笔记中记下了缓刑监督官口中雷耶斯改造学校与其他青少年监管所之间的不同之处。这种“自己所做的对比”突出了缓刑监督官眼中两种工作环境的不同:工作人员减少了对危险的担心、提供更加宽松的监管环境以及更加努力地去“帮助”孩子们。当地的监管人员也在其他的场合对雷耶斯和青少年监管所进行了类似的比较,强调雷耶斯相对于青少年监管所来说是“宽大仁慈”的。

与此相类,警官们在巡逻中通常把那些“积极进取者”和只为

了“打发工作时间”的“马虎应付者”区分开来。一位学生通过用心观察写下了下面的备忘：

对警官而言，“积极进取者”指的是总是寻找犯罪行为、寻找“一个好的彻底搜查”、寻找应该被关进监狱的罪犯的那些警官。“一个好的彻底搜查”指的是警方如果搜捕到某人之后会有一次“有价值的逮捕”。而“有价值的逮捕”通常是指大多数针对重罪或者行为不端罪所做出的逮捕（比如说，私自拥有武器）。某位警官描述了最近的一次有价值的逮捕：“我昨天抓到的那个劫匪非常有意思。几周之前我逮住了一个骑着车带着45发自动步枪的家伙。他也穿着一件防弹背心并且藏有一些毒品。那真是一次有价值的逮捕……”

[与此相对]，“积极进取者”把“马虎应付者”定义为那些只能完成“垃圾式”逮捕的警官；也就是说，在“积极进取者”眼中，后者逮捕的家伙并没有什么重大罪行，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应付成绩。“成绩”是警署对所属警官们的月度考察，以选出当月逮捕最多罪犯的警官。“马虎应付者”考虑的只是他们所逮捕的罪犯数量而非质量。某位警官就表示过不愿意与另一位警官一起工作，因为在他眼里后者逮捕的对象都是“无关紧要的”——醉酒或者交通事故。

上面这段备忘中呈现的“积极进取者”这方指出的“积极进取者”和“马虎应付者”之间的不同让人感到非常意外。那些自称“积极进取者”的警官把“马虎应付者”定义成与自己工作方式不同的人。进一步讲，这种对比充斥着价值取向；“积极进取者”所

做的逮捕会带来“一个好的彻底搜查”而“马虎应付者”则是在上层管理压力下完成一些“无关紧要”的逮捕。在这里,那些被称作“马虎应付者”的警官没有机会说明他们自己是否认为自己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巡逻方式。而田野笔记中也没有提到那些被戴上“马虎应付者”帽子的警官们可能对巡逻有着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他们也许会认为自己的工作方式所体现出的阅历与成熟正是那些带有暴力倾向、怀有“雄心壮志”、富有进攻性的年轻警官们所不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被研究者自己所做的对比也许并不总能帮助研究者理解整体情境;但是,这些对比却能够提醒研究者去关注在具体情境下某一人群眼中关键性的或者是显著性的差异。

被研究者给出的解释和内在逻辑

民族志研究者应该尽力探寻并揭示被研究者对于某一事件做出的更为深入和丰富的解释:该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出于怎样的原因而又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为了突显当事人本人对该事件的背景和原因所做出的描述,不得不把自己的理解放在一边。这样研究者就能引导被研究者说出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和内在逻辑。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研究实例:妇女参政行动委员会的某地区支部进行挨户拉票。该委员会希望达到两个目的:政治性捐款以及在支持代表妇女权益的州立法请愿书上签字。游说者每4至14人一组,在地区负责人的监管下被分配到不同的区域,或者说是“地盘”;当募得款数额高于事先指定的下限时,游说者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从募得款中获取提成。不同的游说者

筹得的款额相差甚远：有些人工作一整天却没有太大的收获甚至两手空空；而另一些人一个晚上就能在同样的区域募集数百美元。

研究者很可能在心底里情不自禁地对游说者募款数额的巨大差异给出自己的解释。然而他试图知道的却是置身于这场活动之中的人们心里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当问到这个问题时，研究者注意到筹款活动的参与者自身也对游说者的不同表现表示出强烈的、出于实际考虑的关切和兴趣；而对于原因的解释，却又随着参与者在整个组织内部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游说者强调“容易的地区”和“难的地区”之间的差别，他们认为当来到某个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反对自己所要宣传观点的地区时，没有哪个游说者能够筹集到可观的数目。研究者记录下了这一件事：

在海滩城的一周真是万分艰难，没有人筹集到多少捐款。游说小组成员们都在抱怨并且想马上离开这里，因为这个地区真的太“困难”了。当大家发现地区负责人对自己的请求无动于衷时，每个人都显得非常失望。

地区负责人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他们大多抱怨手下游说者们的技术失误。举例来说，谈到如何让游说者更加关注于“圈钱”，某地区负责人这样评论道：

“人们总是把原因归结为地区的不同，因为这确实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因素。的确，这是最正常的反应。但是我们需要让他们意识到在游说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是他们自己能够掌控的。如果某个和很多人交谈过并得到很多签名的游说者只筹集到很少的

一点捐款,那么他所做的是与人交际,而我们所要的是‘圈钱’。”

地区负责人和一线游说者总在争执哪一种内在逻辑更加准确,以及根据这种逻辑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来改善现有状况。以培训地区负责人的管理策略为例,它所强调的是采取措施来避免游说者“抱怨地区因素”:

咨询师给一名未来的地区负责人提出建议:“如果某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即便他当时的情绪非常激动,你也要想方设法不要让他抱怨地区因素。你应该作为一个情绪的避雷针,但是记住你要紧紧抓牢它。”

而办公室经理又是这样力促他的地区负责人们的:“当你们晚上把结束工作的游说者们召集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要做的是去讲那种所谓的‘(在)车尾行李厢(的)谈话’。当你们开车开到游说者的工作地点时,你们要离他们几尺远,站在一边询问他们的进展。当他们工作进行得顺利时,问问他们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在当晚非常成功。当他们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时,花几分钟看看他们的地区名目然后快速分析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样就可以引导那些游说者去分析自己整晚的表现而不是机械地抱怨地区因素了。”

在这个例子中研究者通过呈现各方的“内在逻辑”来推进研究的开展。由于研究者把不同的内在逻辑作为分析重点,因此她探讨了在现实互动和组织中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些内在逻辑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田野工作者应该意识到人们对于某一事

件可能给出多种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在研究者看来有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尤其在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并存的社会中,人们在理解和评判彼此之间的行为时就会经常游走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期待以及不同的概念框架之间。这种情况在当代非洲并不少见。以赞比亚西北省份为例,那里的 Lunda、Luvale、Chokwe、Luchazi 和 Mbunda 人之间常有混居和通婚。此外,当地许多年轻人又在语法学校里学会了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在多语种并存的背景下,人们常常会同时使用互相有所冲突的文化框架。比如,当谈及由 wanga(巫术或魔法)引起的疾病和死亡时,年轻人经常游走于基于传统观念的看法以及从学校习得的生物医学知识之间。当地人用乔克维土著语言和研究者以及几位邻居聊天时,他采用了当地占卜者的说法,用 wanga 来解释一位年轻女性朋友的早亡。随后,当他用英语向研究者以及一位兄弟讲述这位女性朋友的生活细节时,他提到她长期以来具有典型的“肺结核”和“艾滋病”症状。他并不认为这两种解释是互相矛盾的,在强调某种解释时他也并不打算否定另一种:wanga 是死亡的原因,而肺结核或者是艾滋病则是疾病的名称。所以,当研究者意识到人们会随着社会身份、情境、语言的变化而随时调整他们的叙述时,他就应该在田野笔记里非常仔细地写明人们是在什么时间、面对哪些听众、怎样解释他们的生活危机的。^①

① 在这个例子中,令人满意的“正式的”解释的标准随着讲述者使用语言的转换而变化,但是两种解释都没有完整地描述当地人是怎样对付艾滋病/肺结核的。研究者需要认识到人们给出的解释往往只能说明他们当时是怎样看到这件事的或者他们希望事情是怎样的。人们的解释并不是真实的经历。Jackson(1982:30—31)在对西非 Kuranko 人的研究中指出人们在希望提出某些主张的时候往往给出口头的、正式的解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常用这种解释。口头的解释和行为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经历。

使用被研究者界定的概念范畴：处理方法和常见问题

无论当地人给出的描述、故事、归类和解释多么丰富和引人深思，它们仅仅是撰写田野笔记的开端。最终的民族志中要有深入、全面的分析与备忘，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仅检视当地人用了什么术语，还必须包括他们在何时、何处、如何使用这些词汇的，以及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当地人到底是怎样将涉及到的人和事分门别类的。

出于讲解的需要，我们将引用一位学生的田野笔记。这位学生对体育场馆非常熟悉，他对参加社区大学举办的“开放场馆之夜”的人士进行了分类：

参加“开放场馆之夜”的体育爱好者分属不同的类型，而每一类型内部又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分。主要的类型包括常来者（regulars）、访问者（visitors）和未经预约而来的人（walk-ins）。这些类型内部当然也包括更多小的子类型。以常来者这个类型为例，它可以分成新手、前体操运动员（老家伙）和有基础的业余爱好者三类。新手指的是那些从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而只是由兴趣驱使进入体育馆的人。有基础的业余爱好者指的是那些虽然没有进入过体操队，但是却参加过这方面的课程与培训或者曾经是未经预约而来的人的那类人。而所谓的前体操运动员指的是那些在高中或者大学阶段参加过体操比赛的人……未经预约而来的人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对体操怀有兴趣并愿意向前体操运动员学习的学生。

上面的这段描述为参加“开放场馆之夜”的人士进行了分类：“常来者”(可以进一步划分成“新手”、“有基础的业余爱好者”和“前体操运动员”)、“访问者”和“未经预约而来的人”。但正如这些名称所显示的那样,这只是这个学生自己做出的分类;我们并不知道在“开放场馆之夜”这一具体情境下,人们实际上是否是以这种分类方式来对别人(也包括对他们自己)做出区分;即便大家都采用这种分类方式,那么他们又是在何时、何处以及怎样的情况下采用的呢?因此,这种分类方式有两方面的弊病:我们不知道参与“开放场馆之夜”的人士是否认可并使用诸如“常来者”或是“未经预约而来的人”之类的术语;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如果当事人使用这些术语,那又会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目的、如何使用的。

由于田野研究一直坚持探寻被研究者在怎样的实际情况下使用特定术语和概念,因此研究者讨论的议题就不可能局限于具体概念在普遍意义上的所谓“正确性”或是“真实性”。与此相反,任何一种对象或者事件都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分类;尽管某些对象和事件可以采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予以归类(比方说,以某种特点或者其他特点,抑或按照这两种特点的总和),这仍不足以证明某种特定的、事先规定好的分类方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因为人们总能找到或者想出其他的特点,从而又能够形成全新的分类方式。^①

① 研究者不应该认为分类取决于被分类的事物的具体特点(那就是“特点导向型”),而应该意识到分类取决于行动者的“实际目的”(Schutz 1964)。具备这种想法的研究者会将注意力从行动者头脑中的认知概念转向实际的互动以及行动者追求的实际“目的”;根据这些不断变化的目的,事物的特点呈现出相关性。随着行动者的目的不断出现、发展和改变,这些目的也由于时间和情境的不同而不同。

参与“开放场馆之夜”的人士的确有可能在某些时候出于某种原因认为“常来者”、“访问者”和“未经预约而来的人”是有意义的概念范畴。但是因为研究者并没有去考察参加者们在这一场合中谈论和彼此称呼的实际方式,因此我们仍然不能不假思索地使用这些术语;也就是说研究者给出的分类方式并不是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获得的,因此并不是适用于任何场合、任何时间的。既然多种分类方式可以并存(Heritage 1984:144—150),田野研究者就不应该将自己的分类方式强加于研究对象,即便以研究对象自己做出的对比开始行文也不应该提到自己的分类方式。研究者应该保持对各种与现场情境相关的、可能的分类方式怀有敏锐的嗅觉,应当仔细留意研究对象是在何种场合、出于何种目的,对实际遇到的事件采用何种方式加以辨别和区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田野笔记不应该仅仅包含研究者在特定情境下发现被研究者使用的术语。更为基本的任务是详细记录被研究者在何种场合下才会实际使用这些术语。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为读者提供两个深入的例子,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是怎样在田野笔记或是其他类型的人类学文本中,更为敏感地捕捉到被研究者是如何在互动中使用他们所认可的概念范畴的。

“讲故事”和“做事情”

人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总带有一定目的。事实上,人们通过讲故事来阐释已经发生事情的意义,或者明确现今的关系来为将来的行动作准备。因此研究者要理解某个故事的含义,就必须对故事类型、听众以及讲述故事的内在企图和其他相关信息

有所把握。^①

雷切尔·弗雷茨在一个乔克维人的村庄工作了几周,并雇用了一位叫做瓦苏西(Mwatushi)的当地人作为研究助理。现在她准备离开这个赞比亚村庄了(弗雷茨未注明出版日期)。瓦苏西的父亲把自己的妻子、瓦苏西以及弗雷茨喊到自己房间里进行临别谈话并给予弗雷茨临行前的祝福:

我们先互致问候,然后谈起我即将离开这件事——他(瓦苏西的父亲、主人)说他对我能到这里和大家呆上一段时间感到非常高兴,但是直到昨天他才知道我们今天就要离开了。要不是这样的话他本可以送我们一些礼物的。现在仓促之间他只有一些甜土豆可以送给我,要是下次我再来的话,他们会给我一些更好的礼物——比如一只鸡。

接着他开始讲故事,他的语调转向那种叙事特有的节奏并加快了语速……

“从前这里有一位‘chindele’(外国人/白人),他有两个仆人。当他回国结婚时,这位 chindele 把自己的房子和一切财产都交给这两位仆人照看,一直到他从国外回来。这位 chindele 在国外呆的时间超过了这两位仆人的预期,因此其中的一位仆人(仆人甲)说:‘我们不必为他照看了,他不会回来了。’但是另一位仆人(仆人乙)说:‘不,他让我们守到他回来的那一天的。’尽管如此,仆人

① 从事“谈话的人类学”这一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的目的在于详细记录和描写某一社区内不同表达方式。Sherzer(1983和1992)认为这种类型的研究不仅考察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且关注了它们在社区内的作用。

甲还是离开了,所以当主人回来时,这里只剩下仆人乙了——”

瓦苏西的父亲停了一下:“啊,不是这样的,我说错啦。两位仆人都留下来等到那位 **chindele** 回来。当主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回来时,他说:‘你们能在这里一直照看我的财产到我回来,这让我非常高兴。因此我将各送给你俩一份小礼物。因为我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博取我妻子的欢心了,所以让你们带回村子交给妻子的礼物实在微不足道,就请收下这一小捆草权当我的心意吧。’说罢他果真只给了两位仆人每人一小捆草。

“这时仆人甲说:‘我们何必把这么一点草带回家呢,咱们村子里有的是草呀。’‘不,’仆人乙说,‘主人给我们这些草的时候讲明是让我们带回家的。’然后他们离开了主人。

“在回家的路上,仆人甲说到:‘呀,家里已经有好多草啦,可我还要带回这么一小捆草!不,我才不犯傻呢,不如把它们丢掉。’然而仆人乙说:‘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会把主人送给我的这捆草带回家的。’于是两人以各自的方式处理了 **chindele** 送给他们的草。

“当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后,仆人乙把那捆草交到妻子手中,说:‘因为我在 **chindele** 离开的时候帮助他照看财物,他给了我这份小礼物。来吧,把它放到屋里去吧。’仆人乙的妻子按照丈夫的吩咐收好了那捆草。晚些时候天开始下雨了,雨水从房顶的破损处直接漏了下来,于是仆人乙就用那捆草补好了屋顶。夫妇俩一夜安睡。

“第二天早晨,仆人甲——就是那位把草扔在了路上的仆人——起床后往窗外看了一眼。他赶紧叫来自己的妻子:‘快来看咱们亲戚家的屋子呀,他拿 **chindele** 给的草修了家里的屋顶。’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有着好几间房间并带有锡制屋顶和窗户的大房子。院子里停着两辆车，一辆是男主人的，另一辆是女主人的。女主人身着带有黄金装饰的衣服，刚从屋里走到院子里来。

“这时那位扔掉草的仆人甲说：‘老婆，我们赶紧回去找找我扔掉的那捆草吧，这样我们也能有座好房子啦。’然而当他们赶到昨天仆人甲丢弃那捆草的地方时，发现那捆草早已散开了，而草也已经破烂不堪了。”

瓦苏西的父亲（讲述者）继续说道：“同样的道理，尽管我们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送给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拿不出鸡来——我想送给你几句话，希望你能够记在心里而不要抛在脑后：‘愿上帝保佑你并在旅途中支持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或者生活在哪里）都能得到上帝的眷顾。’”

我说：“Twasakwila（谢谢你）。我已经从您这里得到很多帮助了。这些帮助便利了我的工作，而当我回去（回到我自己的村庄）之后也将和您儿子一起继续这项工作。非常感谢您送给我的这些祝福，我会牢牢记在心里的。”……

他又说：“我很高兴你能带上我儿子和你一起工作。不管你吩咐他什么事情，他都会按照你的意思办好。你喊他过来他就会过来，你让他停下他就会停下。无论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会去做的。”

[谈着谈着，瓦苏西的母亲为没能给我一只鸡再次表示了歉意。]她说：“所以请收下这件小小的礼物。”说着塞给我 500 块 kwasha 币[这足以买两只鸡了，对我而言并不算一个小数目]……我和瓦苏西向大家说“晚安，睡个好觉”之后就一起离开了。

瓦苏西的父亲把这则故事作为礼物送给研究者,取代了本打算当作临别赠礼的那只鸡,并祝福研究者在返回自己生活的村庄时一路平安。故事暗示作为临别赠礼的祝福话语和 kwasha 货币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就像故事里的那一小捆草一样,也许会隐含着意想不到的价值。如果以恰当的方式接受这份礼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给弗雷茨带来极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这则故事还可以被看成是一篇 misende(寓言),人们可以借助寓言含蓄地交谈(Fretz 1994)。而在这里,这则故事又为接下来的谈话提供了某种语境。瓦苏西的父亲用这篇寓言引入有关互惠关系的谈话:一方面既申明瓦苏西——他的儿子——将尽职工作并严格听从研究者的指示;另一方面研究者虽然远在自己的村庄中生活,却仍是瓦苏西家庭中的一员:

“这样我们就把瓦苏西拜托给你了……麻烦你在各方面给他提提建议,让他在异乡能够好好地生活。因为在那里他将是孤身一人[在研究者生活和工作的村庄瓦苏西没有一个亲人],你将担负他母亲的责任,他父亲、祖父和祖母的责任。你将担负他兄弟姐妹的责任。全靠你来看护他了。”

这篇寓言还给出了“仆人”一词的言外之意,意味着就像故事里严格执行主人指示的仆人那样,当瓦苏西和作为 chindele 的研究者共处一段时间后也将(也应该)得到奖赏。而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瓦苏西的父亲说瓦苏西既然是家庭成员就会对研究者比“仆人”更加可靠和忠诚;接着他又谈起瓦苏西为研究者做的工作——看起来瓦苏西可能要和研究者游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在

建立上述人际关系后,瓦苏西的父亲向研究者提出他儿子将来从美国回赞比亚时应该要给他们带一份礼物。根据乔克维人的习俗,为了建立和保持彼此之间的良好友谊,关系密切的朋友之间不但要互赠礼物,还会很诚恳尊敬地请求礼物或者寻求帮助。作为一种充满敬意的讲话方式,寓言非常得体地提出了讲述者的想法和请求。

总而言之,研究者在特定情境中听到的寓言通过暗示非常巧妙地揭示出瓦苏西的父亲礼貌地对互相之间关系的理解。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临别的赠礼和对旅途的祝福,同时也包含了对发展这段人际关系的考量。瓦苏西的父亲认为研究者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从长远来看对后者会有很大帮助。但是只有研究者意识到这则故事其实是瓦苏西的父亲对她含蓄讲出的一篇寓言,研究者才有可能真正听懂他所讲的内容。

被研究者在日常互动中使用的术语

一位学生在代理销售方面的亲身经历中发现那些经常或者“肆无忌惮”地“挖别人顾客”的销售人员被他们的同事们称作“蛇蝎”或者“鲨鱼”,并且常常由于这些行为受到后者各种形式的压力、指责与制裁。对田野工作者而言,一个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的做法是当某个同事认为另一个同事是“蛇蝎”时就直接采纳这种指控,把他工作和接待顾客时的表现与那些没有被称为“蛇蝎”的销售人员做比较。然而一旦田野研究者真的采取了这种做法,那么他对特定情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描述和分析就将是被删节而片面化的,必然会错过那些多角度、多方面、纤毫毕现的记述。尤其来说,他就不能全面了解和记录那些含有微观政治意味

的、充满互相角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同事把另一些同事称为“蛇蝎”并且试图说服其他同事认同自己的判断。这样研究者就不能描述复杂的地方性知识(Geertz 1983),而这一地方性知识对于被研究者在具体情景中使用的术语却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通过检视当事人自己所做出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到更有深度、更富内涵的信息。为了便于说明这一点,读者可以参考下面这段田野笔记。作者是一位销售员/研究员,她在一家价格昂贵、款式时髦的女装店担任售货员,而她在自己描述的工作单位上的一次争吵中扮演了重大角色:

我正在接待一名妇女,她丈夫陪着她。我把她带到后面的试衣间让她试穿看中的几件衣服。每当顾客试穿候选的衣服时,所有售货员都会注意到这个顾客,以及是谁在帮她选购衣服。当我帮那位妇女试衣服时,她丈夫显然只能在试衣间外等候。就像后来发生的那样,她丈夫看上了收银台上方挂着的一件漂亮的毛衣,于是就向站在柜台前的艾伦询问起来。那是一件带有崔弟和大笨猫镶珠图案的冰山毛衣,售价710美元。他立刻跟艾伦说打算把它买下来作为送给太太的礼物,并且要求她在太太从试衣间里出来之前把这件毛衣包装好。我一出试衣间就看见艾伦正在给那件毛衣开销售单。我愤怒了。是我在接待那位妇女而她丈夫的生意显然也应该由我来做。我接待了妻子当然等于我接待了她丈夫。当我问艾伦为什么不让我来做那件毛衣生意时,艾伦辩称自己不知道我在后面接待那位妇女。我根本不信她。这单生意数额巨大却又不费吹灰之力,艾伦决不会错过的。所以当那位妇女从试衣间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打算买的价值500美元的衣服时,帕特和简从柜

台那边远远地望着我,她们眼神显示出她们也无法相信艾伦刚刚到底做了什么……艾伦偷走了我的生意,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直接跑到艾伦面前跟她说她的所作所为是很不对的,而在我的潜台词中她就是“蛇蝎”。她竭力为自己辩护。她说:“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也不迟。”然而当我听完她的辩词开始讲我的道理时,她一下子把我的话头打断,说:“那我们去见萨米好了”[萨米是我们的经理]。而帕特和简此时则表示整单销售都应该算在我名下。我首先一个人跑到楼上跟萨米交涉这件事情,萨米问我要把整个销售额还是半数销售额算作我的工作量。我说我觉得自己理应得到全部的销售额,但是如果艾伦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愿意分给她一部分。萨米告诉艾伦她应该把她的销售额分出一部分给我作为补偿。我走到艾伦面前跟她说明之前她挖走我的顾客是不正当的行为,她再次打断了我的话头:“这一切已经结束了。”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则田野笔记的叙述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作者并没有采取中立的态度,而是在当事双方之间有所向背。“事实的确如此”、艾伦“挖走了我的顾客”这些叙述明显带有主观意味。而这则指控看起来至少部分遭到了艾伦的驳斥;根据间接引语我们知道艾伦说她并不知道“我在后面接待那位妇女”,并且希望向经理申诉这件事。^① 作者在做出判断时忽视了下面的可能性:任

① 这则田野笔记几乎没有提到艾伦对这件事的看法,只提到“我听完她的辩词”而没有具体记录她到底说了什么来为自己辩护。她说她不知道作者在后面接待那位妇女,说明她意识到自己“错误地”将毛衣卖给那位丈夫了,也就说明她不是在“挖顾客”,因为她并没有“处心积虑”地去做这单生意。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她辩解说自己做这单生意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是那位丈夫希望背着妻子买一件东西或者买一份神秘礼物,所以他敦促艾伦赶快卖给他。

何一个称职的销售人员都应该“知道”一对夫妇是一个“整体”，并且当潜在顾客试穿各式衣服的时候会对此加以注意；现场的其他各方在这件事上与作者持有相同的看法；商店管理层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支持了作者的想法。

田野笔记中的情境描写也引导读者关注那些将此事件定性成“挖顾客”的一系列互动。尽管这件事经过多方参与之后最终以第三方做出“挖顾客”的认定而结束，然而这一结果并不能被事先预料，而是随着多方互动的进行得以显现。这一过程中各方不断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释，并且希望得到同事的支持。总之对研究者而言，不是简单地引用当事人使用的术语，而是深入理解隐含在这些过程中的微观政治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在上述“挖顾客”事件中，作为一名细致的研究者，作者的视线透过了宣称艾伦“挖走了自己的顾客”这一简单的事实，而关注到销售人员如何显示自己正在为顾客提供服务、其他销售人员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去忽视或者说绕过前者的暗示、前者又会采取何种行动来再次确认并保证自己服务该顾客的优先权以及当发生冲突后各方的观点、立场将怎样得到表达并最终解决这一矛盾。

此外，这则田野笔记说明在具体情境中获取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对具有说服力地控诉别人“挖顾客”的行为非常重要。作者宣称其他销售人员“挖走了我的顾客”的前提是假定在此情境中人们普遍认可“宣称已经为某顾客提供服务”的方式。这位学生在其他段落描写了售货员如何宣称自己已经在为某位顾客提供服务的方式：

当询问过某位顾客是否需要帮助之后你就可以站在她身边；如果此时还有其他的售货员试图走近那位顾客，我们就会大声地

喊出她的名字。如果其他售货员往这边看过来,我们可以指指眼前的这位顾客以表示自己已经问过她是否需要帮助,这个动作本身隐含着该顾客是“我的”顾客的意思。我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说明我们已经“占有”了那些从街上进到店里的顾客。

因此,“挖顾客”暗含了该售货员故意忽视其他同事的示意。实际上作者在叙述冰山毛衣事件时已经暗示读者作为指控对象的艾伦“必定已经知道”该顾客是已经有人接待了的:“每当顾客试穿候选的衣服时,所有售货员都会注意到这个顾客以及是谁在帮助她选购衣服。”这样来看,当事人研究者必须尽力分辨和描写被研究者适用的术语中所隐含的地方性知识和实践。

正因为田野研究者致力于探求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他们就必须开始理解人们是怎样运用那些互动的、政治性的因素来构建自己的意义世界的。一名细致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人们品评事物时的弦外之音后面的地方性知识。尽管这些被研究者没有讲明的目的和想法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事物,田野工作者们却并不能仅仅通过访谈或者非正式的问询就完全理解当事人的意义世界。为了理解地方性知识,研究者就不能仅仅依赖于被研究者的言谈,还要关注他们的“谈话与互动”,也就是说,必须留意当事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通过怎样的反应来传达具体情境中的意义。

被研究者对族裔、性别与阶层的解读

出于对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和亲身经历的关注,民族志研究

者在处理日常生活中有关性别、族裔与阶层的问题时不会像常见理论方法那样事先假定预设和定义,因而与那些方法很不相同。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要像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在一开始就列出一些在研究过程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对象,并通过对这些事物的持续观察以期达到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民族志研究者可以优先关注被研究者自身是如何在具体的动态环境中解读性别、民族和阶层的。

然而民族志研究在处理性别、族裔和阶层问题时所采用的这种方法曾受到多方面批评。一派批评意见认为理论指导能够帮助研究者突破眼前具体事件的影响,从而描摹出事物背后更加普适的社会力量,而田野研究方法正缺乏这样的理论指导。另一派批评意见则认为民族志研究对性别、族裔和阶层问题的处理过分局限于经验观察: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者笔下的特定场所和情境是孤立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力量的,然而这些结构和力量对具体事件或者个体的决定作用却又是显而易见的。

这两种批评意见的确指出了民族志研究在处理性别、族裔和阶层问题上与那些包罗万象的研究方式之间的区别。正是出于对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和亲身经历的关注,民族志研究者更加钟情于格尔兹(1976)所称作的“切身经历”而不是“间接经历”:他们通常优先关注研究中揭示出的种种意义而不是去接受已有的现成理论。研究者评判那些当地的具体事物时,采取一种聚焦的方式来观察日常生活,而不是采用那种宽泛的、普适的方式去考察一般的范式。民族志研究者当然更愿意看到社会结构对被研究者的切实影响,而不是一开始就假定它们的关系和作用。粗粗看来,这种“切身经历”的方法在探讨社会结构的作用时似乎在田野研究的

实践和理论之间制造了某种张力。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民族志研究者处理性别、族裔和阶层问题的种种方法时,有些原本显眼的张力就会变得松弛,也许甚至于消失殆尽了。这些方法连接了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和研究者关注点。

当民族志研究者对性别、族裔和(或者)阶层问题怀有强烈兴趣时,他至少应当非常仔细挑选某处适当的场所来进行观察,而这又是他事先预期能突出自己的一个或者几个兴趣点的场所。在选择场所时,研究者应该挑选那些性别、族裔和阶层多样性非常显著,同时这些因素又深深影响着当地人生活的场所。比如说可以是警察队伍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或者是少数族裔人士,或是拥有众多族裔学生的学校,等等。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应当选择那些当地人直接涉及上述议题的事件来加以研究。举例来说,那些对性别问题感兴趣的民族志研究者可以选择老一辈教育年轻一代的一些场合。在许多社会里,成人仪式很明显地将对青年人予以性别角色和责任的教育。以赞比亚的乔克维人为例,他们在少女月经初潮后举行的 mwadi 仪式和男孩切除包皮后举行的 mukanda 仪式是全村的头等大事,而研究者在这些仪式上可以轻易得到当地人性别构成的信息。

事实上民族志研究者不仅可以聚焦于选定场景和事件中涉及的性别、族裔和阶层议题,他还可以根据自己关心的议题所引申出来的理论问题来设计出田野研究课题。比如,如果研究者关注校园内的阶层差别,他或许可以观察某学校中劳工阶层子弟的成长过程(Willis 1977),也可以着重留意学校辅导员在跟踪劳工阶层子弟与中产阶层子弟学业进展时是怎样帮助他们做出不同决定的(Cicourel 和 Kitsuse 1963)。

民族志研究者一旦进入具体的研究情境,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性别、族裔和阶层是如何影响着自已的研究对象的。作为考虑这一问题的第一步,研究者必须关注任何以性别、族裔和阶层为基础的直接对话或者互动。比如,研究者与其假定族裔因素总会是某一行为或者事件的原因之一,还不如尽力详细描述人们之间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族裔身份认同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在下面的田野笔记中,一位非洲裔美国高中教师在教授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的课堂上提出了对黑人与白人之间关系的讨论,一位学生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B 小姐又让达普发言。达普说自己刚刚搬来南国丘陵郡的溪谷镇。几个学生听到后发出了“呜”的声音。达普咧嘴笑了一笑。他说自己搬进的是一个“白人社区”。他有一次沿着自己家旁边的街道溜达,遇到了一个正在玩耍的白人小孩。当小孩的父母看见达普时,他们一把抓住自己的孩子并把他拖到屋里。当讲到这里的时候,达普脸上仍带着微笑。达普说他想对那些人说:“我是黑人,不过我可没打算杀了你呀!”有些同学忍不住笑出声来,并开始相互议论。达普继续说:“我的父母是混血儿(克里奥尔人),他们总说(压低声调做旁白)‘你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黑人’。我的表亲长有金发碧眼,诸如此类……”达普用坚定的语气继续说道:“我是长得黑。我是黑人。……我很骄傲我是黑人。”

这段文字体现出族裔认同对一名高中生而言的意义具有多重维度并且充满了冲突对立。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口中他的身份(“你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黑人”)和邻居眼中他的身份与阶层

(“我是黑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紧张关系。

然而,由于被研究者并不总是直接谈到性别、族裔和阶层问题,因此研究者有可能难以记录这些问题对当地人而言的重要性。在某些场合,研究者有可能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常常是建立在“阶层”或者“性别”基础之上的;然而他却难以指出阶层或者性别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也难以记录下能够明显体现这种作用的场景或者行为。因此,有时候想要在田野笔记中指明并展现这些因素是非常困难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虽然研究者预期性别、族裔和阶层问题有可能非常重要,然而却发现当事人对此不以为然。在这些情况下,研究者就不得不跳出常规思维而对性别、族裔和阶层问题进行更为系统的观察,以期发现相关的行为范式。

比如,当弗雷茨研究乔克维村民的讲述习惯时,当地人总告诉她“任何人都可以讲 yishima”。并且事实上在大多数村庄,男女老幼都曾经在自家的火堆边讲过故事。然而当弗雷茨在最高酋长所在的村庄考察研究时却发现,除去最开始的一晚有位妇女在 chota (酋长的帐篷)里讲过故事之外,她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妇女讲过故事。在后续的观察与反思中,弗雷茨最终意识到酋长本人不但主导了讲故事这件事,而且要求所有的故事都必须在他自己的帐篷里讲。然而酋长的帐篷是男人们聚会交谈的地点,妇女们即使被邀请参加那里的活动也只是去唱歌。因此,妇女在讲故事活动中的角色并不能用来说明在帐篷里“讲故事的权利”方面的地位和性别影响力,这是因为问题的答案并非指向“讲故事”这一活动本身而是其他与之相关的、受外界情况影响的因素。只有在相似的场景中反复观察和比较才能最终理解这一场景、性别与地位相互

交织的情境。^①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被研究者的只言片语可以作为进一步深入调查的起点,从而描绘出当地社会生活中有关性别、族裔和阶层的更为广阔的画面。比如,一组学生被派去研究某所多族裔学校中的学生关系,他们采集回来下面这段关于校园中不同“圈子”的谈话:

今天午饭的时候,几位平时称兄道弟的小伙子围在桌子边说话。我想他们也许可以帮助我了解主校区内学生内部的不同群体。他们使用了不少我之前曾经听说过的词儿。一个小伙子谈到了“潮人”,并且教我怎样把潮人认出来。另外有人谈到了“球手”,特指那些玩篮球的人;学校里还有“(美式)足球手”,指的则是那些酷爱(美式)足球的学生;还有所谓“极大乐趣者”与各个群体[都能打交道]。此外还有那些“归属者”。“归属者”是一群平时总在一起并乐此不疲的学生,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寻求某种归属感。一名黑人小伙说:“我的玩伴都是黑人,不过这只是一种巧合罢了。”听到这句话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那小伙子接着说:“不,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家靠得很近。我还有些玩伴是混血儿。”还有人被称作“游泳队”,那些人都是瘾君子而且由于滥用毒品的缘故他们的眼睛总是充血,看起来就像游过泳一样。所谓

① 在这个例子中,酋长很有可能由于女民族志研究者在场,因此最开始让一位妇女讲故事;无论如何,再也没有其他妇女在酋长的帐篷里讲过故事。尽管研究者需要通过细致、长期的观察才能发现自身的性别常常会影响田野中的情况,这些影响还是以微妙的形式存在着。请参考下列考察性别在田野研究中的影响力的研究, Camitta (1990)、DeVault (1990)、Golde (1970)、Lawless (1993)、Mills (1990)、Reinharz (1992)、Thorne (1993) 和 Warren (1988)。

“GCP”就是绿卡一族,他们继续说:“哦,还有偷渡客。”“潮人”总是穿着很精致。我问他们如果他们没钱买精致的衣服,是否就意味着不酷呢?他们回答说,那要看有没有很好的人品。要是人品和自己的衣服一样糟糕的话,那就基本没戏了。“学校就是一个走秀场。”

在这段田野笔记中我们看到学生们用他们自己的一系列概念范畴来对彼此进行区分和归类。其中某些类别与族裔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关联,比如,“绿卡一族”。讲到“极大乐趣者”的时候也直接提到了族裔问题,学生们对两者之间的具体联系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他们这个群体都是由黑人组成;而另一个学生则认为其中还有“混血儿”。相反,另一个人把族裔因素弱化为该群体建立的基础。总之,这里提到的大多数概念范畴和族裔并没有明显的联系,如“球手”、“游泳队”或者“潮人”。在此情境下工作的田野研究者也许希望将研究继续进行下去以便在学生们心目中的族裔和不同的概念范畴之间建立联系。上述访谈大可作为研究者观察学生的起点,考察他们对各概念范畴中民族因素的理解,从而也许能够和学生们就研究者观察到的族裔范式进行交流。

民族志研究者也可以将这次谈话作为起点,进而揭示学生们的这些概念范畴和性别或者阶层之间的关系。这次谈话所涉及的校园群体看起来似乎只存在于男孩子内部;而田野工作者也许希望知道上述概念范畴是否也适用于女孩,并且想对在校女生是否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群体组织方式做进一步的了解。研究者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全面地描绘学生们和他们的行为中的族裔隔离与相互间的整合交叉之中蕴含着怎样的性别范式。

研究涉及社会阶层的问题会更加复杂。“性别”和“族裔”隶属于“直接经历”，而“阶层”是一个更倾向于“间接经历”的概念（Geertz 1976）。在现实生活中民族志研究者很少会碰到人们直接谈论“阶层”的例子。但是人们在谈话中会使用很多术语，这些术语涉及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的方方面面。以上述访谈为例，它直接涉及到学生间自然产生的“等级划分”，而这种所谓的等级划分在某种层面上折射出社会阶层这一概念。此外，学生们谈论的“钱”、“精致的服装”以及称作“走秀场”的学校显示出家庭收入与显性消费可能会影响学生在校园内所处的群体。因此，田野工作者可以在这些方面进一步询问和观察，从而揭示出学生们眼中的“精致服装”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又是怎样精心展示这些衣着的，以及这些服饰和购买它们所需要的钱款又是从何而来的。

当地事件与社会力量

最后，田野工作者可以采用一系列的策略以尽力将当地发生的事件及其直接结果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背景及长远影响联系起来。研究者首先可以寻找当地的场景和外界社会因素之间的具体联系。尽管最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被研究者如何谈论和理解自己与外界的联系，研究者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被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的意义。比如，当田野工作者开始着手研究街头流浪者时，一个好的策略就是考察后者眼中的街头生活图景以及他们是怎样面对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的，这也包括了他们对自己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比如，Show 和 Anderson 1993）。同时，研究者还应该关注那些经常与无家可归者接触的各方人士、办事处与机构：慈善会

堂、旅店以及其他能提供临时住宿的地方；为他们提供食物的常规施舍站或者偶尔为之的饭店等；巡警或狱卒等与之接触的人士；救济工作站或者社会福利人士等等。^① 然后研究者（或者其他研究者）就可以跳出流浪者的世界来研究这些办事处和机构以及它们自身的运行情况。

被研究者和场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民族志研究者可以通过持续观察这些变化过程来探索其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过程之间的联系。比如，研究者为了了解劳工阶层子弟如何受到学校的影响并对此作出反应，他就必须进行长期不间断的观察。尽管在田野研究中引入长时程的观察会给实际操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一方法使得田野工作者能够描述被研究者生活中的一系列变化，还能帮助他清楚了解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比如，田野工作者常常会研究特别的“机构性职业”（Goffman 1961）以及形塑它们的因素：无论这是与通过转学到不同学校的最终结果，还是通过警务或法庭受到处理的不同命运。对于“广度”有限的民族志而言，其缺陷可以直接归咎于缺乏长时程的观察，这些研究者认为自己可以关注某个生活片断而不用考虑随着时间因素而发生的种种变化。

反思：通过田野笔记来发现/创造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

在本章中我们为研究者提供了几种策略，让他们以缜密而又

^① Wiseman (1970)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贫民窟酒鬼“怎样经过康复训练”的研究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去考察一群类似流浪汉的人如何与众多“帮助机构”取得联系并从一家搬到另外一家。

有理有据的方式了解并揭示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这些策略要求研究者必须抛弃研究前已有的条条框框,从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当地人组织和理解他们自己所处世界的那些方式。采取这种做法的研究者认为被研究者赋予事物的意义对他的行为有指导作用,也就是说人们的行为是基于他们对当地社会的理解的。

在探寻被研究者意义世界的过程中,民族志研究者从当事人对生活中人和事的描述和分类入手;试图解析他们使用的术语、短句、分类方式以及内在逻辑。然而被研究者自己的分类只能够作为研究的起点;研究者的任务并不只是简单记录下当事人所用的术语和概念,还要找出在怎样的实际情境下人们在彼此互动中会使用这些术语。没有研究者能够仅凭术语或者范畴的名称就能了解它的实际用法;它在具体情境下的用法不可能事先予以规定。因此民族志研究者在使用被研究者特有的术语和概念范畴来描述社会生活场景时不能脱离实际使用的环境。当地特有的术语和概念范畴只能在当地使用,并且需要符合当时特定的情境。在前面讨论过的“开放场馆之夜”,那位学生在田野笔记中把某人定义为“常来者”,却忽视了当事人在该场景中实际上(互动层面上)如何使用这一术语,最后他终于意识到研究者应该在具体情境中分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分类。

如果研究者意识到在田野笔记中记录当事人的意义世界时应当写明当事人是在何种情境中使用这些含义的,那么他就会得到如下几条启示。首先,研究者在田野笔记中写下来的不应该是从具体情境中剥离出来的词句,而应该是人们实际使用这些特定术语的互动。那些有助于读者理解当事人意义世界的田野笔记应该充满了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而不是拘泥于对词句的认知;研究者

记录下的不应该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的一般意义上的、脱离上下文情境的交谈,而应该是研究对象通过互动构建出来的意义,是他们实际上如何解释和组织自己与他人的行为。

这里还有一些方法论上的启示。许多民族志研究者似乎认为探寻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就是询问他们哪些东西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然而当研究者真正去收集相关材料时,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脱离生活背景的对话,而是那些自然发生且随场景变化而变化的互动过程,当事人的意义世界正是产生并存在于这样的互动之中。撰写一篇能够敏锐捕捉当事人意义世界的田野笔记首先不在于访谈,而在于从人们在一系列自然而然的场景中的交谈和行为中推断出人们真正的关注点。因此,面对面的访谈,特别是直接询问当事人某一术语的意义或者询问究竟什么东西在他们心目中是重要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了解被研究者意义世界的主要方式。研究者应该采取的方式是观察并记录下那些自然而然的谈话与互动。询问当事人某些术语和词组的含义与用法是有益甚至是必须的,然而研究者更深层次的关注则应该集中于这些术语在日常生活中随情境变化而变化的实际用法。^①

最后,研究者关注当事人在互动中对术语的使用,有助于提高他对当事人如何在具体情境中做出调整以及巧妙阐释术语的复杂过程的敏感性。研究对象眼中的概念范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与具体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者更多了解地方性知识以及成熟的判断技巧对正确使用这些概念

① 如果民族志研究者要进行访谈,我们建议他针对他观察到的互动和场景提问;这样的访谈不仅有时候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而且能够获得很多人对同一事件的观点和看法。

是很有必要的。回到“开放场馆之夜”的例子,那些将要在“记录者”在场的情况下完成某套体操动作的选手也许会热衷于评估其他人的技巧水平。事实上有经验的体操选手一看某人的表现和动作就能知道他到底受过什么样的训练。总而言之,为了深入理解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研究者需要了解到被研究者何时以何种方式做出评价,以及这一评价又是建立在怎样的背景知识基础之上的。

第六章 田野笔记的处理：编码和备忘

当田野研究进展到某个阶段——研究者已经写过数周或者数月田野笔记之后——民族志研究者就要从研究中抽身而出，暂时不再那样积极地写田野笔记了。此时，他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已经写成的这些记录中来，把收集到的材料转化成面向更多外界读者的书面作品。研究者要对已有材料进行更加认真、集中和全面的分析：他开始系统筛查厚厚一沓记录着相互之间少有关联的事件的田野笔记，寻找叙事的线索进而将这些事件编织成整篇故事（或者是好几篇故事），以描述他们观察到的社会生活场景。田野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集中且连贯地分析研究者观察并记录下来的社会生活，而那些并没有实际接触过相关议题的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分析来认识和理解研究者所讲述的世界。

面对包罗万象的田野笔记——多数情况下很容易有数百页之巨——即便是那些在写田野笔记的同时也写了分析性评论的学者，要想藉此完成连贯而集中的分析也会感到束手无策。尽管如此，田野工作者只要在分析数据时注意以下几点还是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

首先，研究者应该将撰写田野笔记让位于阅读田野笔记：把田野笔记作为整体记录通读一遍，回顾一番记录中那些随着时间推进而开展的田野研究经历。研究者通过细致而集中地反思和分析

田野笔记数据来阐释并完善自己先前的判断和见解。

第二,研究者可以始终把仔细阅读笔记和分析性编码结合起来。编码就是将具体的田野笔记逐行分析和归类。在此过程中,田野笔记之于研究者的意义发生了变化:田野笔记以及它所记载的人物与事件都变成了文本对象(尽管与个人的记忆和直觉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研究者可以怀着分析和呈现的目的加以考察与检视。

定性研究的分析性编码通常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开放式编码阶段,民族志研究者逐字逐句阅读田野笔记以发现和形成一切可能的想法和主题,而不去考虑这些想法和主题之间差异很大或者比较分散。而在集中性编码阶段,研究者就会确定某个感兴趣的话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田野笔记进行逐行逐句的细致分析。研究者在此阶段动用的想法和概念只是所有想法和概念中特别有价值的一小部分,以此作为最终民族志的主要议题和主旨。

研究者在逐行通读田野笔记的过程中很容易淹没在一大堆想法、洞见和联系之中。为了使编码过程得以继续,研究者可以通过写理论性备忘来详细阐释自己形成的那些想法。早在分析数据时,田野工作者就会就一系列离散的现象、议题或者概念写成最初形式的备忘。此后,当田野工作者对将要重点阐述的想法和主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时,备忘也会更有针对性;它们会将那些原本看来关联不大的数据片断和分析论点联系或者整合起来。这些整合性备忘录的目的在于澄清并整合分析性主题和概念。

我们在本章中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学家发展出来并

用于进行定性分析的“扎根理论”^①。扎根理论更加看重的是自己发展出而不是去验证已有的命题。这一理论认为如果研究者能够减少对已有理论的接受和依附,就更有机会从自己的数据中“发现”原创理论。研究者通过不断分析、比较收集到的数据,可以提出、完善并扩展出最切合数据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田野工作者从细致而系统的编码入手,从而提出分析性概念。然后,他将通过撰写理论性备忘录来进一步详细说明、拓展并整合所形成的概念。

在信奉扎根理论的研究者眼中,分析过程是一种明确的甚至自动的研究活动。当信奉者强调从田野笔记或是其他定性数据中“发现”理论时,他们默认田野笔记中的数据是毫无瑕疵的,可以作为分析的起点;他们的言外之意是任何研究者都可以撇开田野笔记作者的分析过程和理论取向来分析这些笔记。相反,我们认为数据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分析过程存在于研究的各个阶段——存在于研究者观察的时候,将观察所得记录下来,进行分析性编码的时候,直至最终形成鲜明的理论观点的时候。从这一观点来看,分析过程本身既是归纳性的也是演绎性的,这就像一个人同时制谜又解谜或是一个木匠在改变门的形状之后相应改变门框的形状一样。

在本章我们用于分析田野笔记的方法就是以上述思想为基础的。一开始我们将介绍最初分析田野笔记的方法:仔细阅读、开放

① Glaser 和 Strauss(1967)最先提出了扎根理论。接着,Schatzman 和 Strauss(1973)、Glaser(1978)、Charmaz(1988)以及 Strauss(1987)细致阐述了这一理论,对运用扎根理论的核心程序——编码和备忘——从定性分析数据中提出分析性种类,采用了多少有些不一样的路径。实际上,很多运用扎根理论的田野研究考察了人们对疾病的治疗和患病经历;尤其参见 Glaser 和 Strauss(1965)、Biemacki(1986)、Corbin 和 Strauss(1988)和 Charmaz(1991)。

式编码以及撰写最初的备忘。接下来我们将研究更加具体、完善的分析过程：集中性编码和撰写综合性备忘。尽管我们在讨论分析田野笔记的过程时将阅读、编码和备忘作为相互独立的步骤，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者并没有必要拘泥于一次只完成某一具体步骤或者按照固定顺序来完成这些步骤。实际上，研究者可以通读一遍，接着认真编码，然后进行透彻的分析，之后他又可以从头再来。换句话说，研究者从阅读中得出编码并撰写备忘，这些编码和备忘为研究者提示了一些议题和可能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些议题和可能性，他就会进一步阅读同一份或者其他田野笔记。

阅读作为数据集的田野笔记

民族志研究者在开始集中分析和写作时，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阅读田野笔记，在这种方式中他将细致而系统地检视自己所做的观察与记录。这样，研究者就把田野笔记当作一个数据库，从而重新回顾、体验和检查记录下来的一切。与此同时，他还必须有意识地寻找和发现有价值的主题和模式。

我们强烈建议研究者尽可能多地逐字逐句阅读田野笔记，至少直到编码再也不能得出新的想法、主题和议题为止。将田野笔记作为整体并按照写作顺序阅读会给研究者带来不少益处。首先，田野工作者将感受到随着时间的变化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研究者只有花上数小时阅读在数周以至数月中写成的田野笔记，才能够感受到自己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一步步从疏远变得熟悉的。第二，研究者回顾了所有田野笔记之后会产生新的洞见，改变自己原先的理解和阐释。

通过对后续情况的了解,研究者多半会发现最初的阐释和评论是幼稚的甚至错误的。在完全陌生的文化或者语言区中进行研究时,最初理解与后续认识之间的差异往往是惊人的。因此,研究者必须以新的方式去重新阐释事件或者行为背后的重要性和意义。也许他会发现当地的某些概念和术语在英语中完全找不到相对应的词。研究者通读田野笔记后认识到的模式和趋势将帮助他以一种异于当初的解读方式来解读人物的行为和言语。最后,阅读所有田野笔记使研究者第一次能够在比较集中的时间内理解、吸收自己观察并记录的内容。阅读完整的田野笔记有助于研究者提出范式并进行比较。他开始思考笔记中记录的各种事件之间是否具有相似性。同时,他也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原先认为相似的事物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民族志研究者如果希望带着分析的目的阅读自己的田野笔记,就需要把这份笔记当作别人写成的。事实上很多田野工作者觉得很难与自己深入交往的对象保持一定的感情距离从而进行客观的分析。有些田野工作者说,将别人的生活“放在显微镜下检查”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特别是面对那些跟自己接触颇多并且自己还很在意的被研究者。对某些研究者而言,细致的分析近乎背叛;有很多研究者表示自己完成田野笔记之后要过上几周甚至是几个月时间才能开始做分析。而另一些研究者甚至觉得自己跟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在那些情况下研究者或许会将研究项目束之高阁长达数年之久甚至彻底放弃这项研究。某些研究者解决内心煎熬的方式是与当地人合作,甚至偶尔与当地助手共同撰写民族志。

尽管上述深思熟虑的、充满着自省意味的分析过程会给研究

者带来某种距离感,我们有必要提醒研究者:充分理解“发生了什么”正是被研究者社会生活中的一项日常的、可预期的活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当地社会生活模式的分析往往是面向外界读者的,我们还是力图欣赏和理解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及其生活世界,并将这一理解传达给未来的读者。

针对田野笔记提出问题

编码通常是从民族志研究者根据具体田野笔记进行自我发问开始的。在提问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动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他在研究场景中对当地生活和事件的直接体验;对当事人关注点和价值取向的敏锐判断;对在其他田野笔记中出现的某一事件的记忆;研究者在其他研究中获得的经验与洞见;或者职业与学科训练中获得的观念与思维方式。没有什么是不能加以利用的!

然而编码的奥秘在于将这些问题的答案转换成完全不同的写作形式——用一个词或短语来抓住并概括一段材料,使之与某个概括性的分析议题建立联系。这一写作方式与研究者的思考和阐释的过程紧密相联,他正是在此过程中“形成”所谓的编码。反过来,研究者写下这些编码——将想法或者是直觉转化成简明扼要的具体词汇或短语——有助于激发、塑造并约束田野工作者的想法和反思。约翰·福里斯特(John Forester 日期不详)的那句俏皮话“用你的指头来思考”恰当地表示出反思与写作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我们认为研究者在开始检视具体田野笔记时对自己提出下面这些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当地人究竟在做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到底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他们采用了什么方法或者策略？

当地人如何谈论、界定和理解他们面前发生的事的？

他们有什么假定？

我看到眼前发生了什么？通过重读田野笔记，我又有了什么收获？

我当初为什么要将这一内容写进田野笔记？

上述问题反映出我们对如何撰写民族志和田野笔记的关注，并推进了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做的思考。首先，这些问题优先考虑的是事件的“过程”而并非“原因”或者内心的“动机”。这种优先考虑意味着研究者会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事的先后顺序如何，而不是询问导致某一结果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开放式编码的目的在于提出阐释或分析性主题，而不是解释事物背后的原因。

其次，上述问题体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中如何面对并处理关注点、具体情况和限制因素持有高度的敏感性。对当事人现状的切实关注要求研究者重视世俗的、平常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是只关心或者基本上都是关心那些戏剧化的、特殊的行为或事件。

最后，这些问题可以帮助研究者具体阐明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和观点。我们试着提出一些框架性问题，以了解当事人怎样看待和经历事件，他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他们怎样描述、界定、分析

和评价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处境和行为。然而,为了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研究者一开始就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提问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当初要将这一内容写进田野笔记?”下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当事人是否或者在什么情况下认为其他事情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些过程促使研究者意识到了解当事人意义世界时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它们提醒研究者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方法来捕捉当事人认为重要的东西、他们的意义世界或者观点。实际上,田野研究者常常阐释他认为对当事人来说有意义的、重要的事情。

基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会在田野笔记的页边上进行编码。下面这个来自学生习作的例子说明了编码的过程,她研究的是自己担任领座员的工作:

<p>观众类型:迟到的人 把观众拦在外面 等待的人:发火</p>	<p>观看舞蹈的观众常常在快要开场时才到场,因此我们必须要把一些人拦在外面。今天也不例外。一号入口差不多有 50 个人在大堂里等……其中有个人正在发火。他已经进去过了,但是有什么事情出来了。我们关门时他开始冲着看门的人大叫。他说他已经进去过了——不像那些“迟到”的人。他并没有迟到,不应该受到一样的对待! 大堂经理走过来,用平静的语气笑着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会被拦在外面——是舞蹈演员这样要求的。那个人平静下来,但是还是很生气。在我走过他身边之前他一直沉默不语地等着。我到处散发演出简</p>
<p>迟到的人强调自己的 不一样 经理进行干预 推卸责任 让迟到的人平静下来 有事可做</p>	<p>说他已经进去过了——不像那些“迟到”的人。他并没有迟到,不应该受到一样的对待! 大堂经理走过来,用平静的语气笑着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会被拦在外面——是舞蹈演员这样要求的。那个人平静下来,但是还是很生气。在我走过他身边之前他一直沉默不语地等着。我到处散发演出简</p>

转移注意力

微笑

减少等待的时间

介,这样他们就有东西可读,而且领座员检票时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发放简介了。我还告诉人们应该走哪个通道,这样也减轻了看门人的负担。我走到这个人身边,问他是否需要我告诉他从哪个入口进去,他生气地说他已经进去过了,知道从哪个入口进去。我只是笑了笑,告诉他们还需要等几分钟。我觉得这让他们稍稍平静了一些,因为他们脸上不再有愤怒的表情了。

这个学生就领座员的实际工作情况提出一些问题,领座员如何理解别人的行为和发生的事件,相互之间如何互动以及如何与观众互动。她通过编码“迟到的人”说明在实际工作中,总有一些持票人不可避免地迟到。另外,编码“把观众拦在外面”以及“让迟到的人平静下来”说明领座员如何处理现实工作中遇到的迟到的人。作者然后问自己领座员实际上是怎么完成这些工作,为了“让迟到的人平静下来”她做了如下努力,并编码为“有事可做”、“转移注意力”、“微笑”、“减少等待的时间”。

研究者通过这些编码开始找到并分析很多可供分析的点。比如,编码“迟到的人”定义了某一类型的观众;通过把“迟到的人”作为一种“类型”,说明迟到在这一场景中是很正常的,“迟到的人”是众多观众类型中的一种。这一编码通过确定一种顾客类型,提出了存在其他顾客类型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提出了还有什么其他“顾客类型”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一过程是辩证的,提出了“这是一个隶属于何种更为普遍的类型中的例子?”田野研究者在回

答这个问题时可能运用自己的众多经历和不同种类的知识：她自己作为领座员的经历，她意识到安排迟到的人是领座员日常工作中必定面临的现实问题，她作为一个迟到的人的经历，以及她所熟悉的社会学知识：等待是理解权力差异的钥匙（比如，Schwartz 1975）。

虽然观看舞蹈表演时总有人迟到，但是编码“等待的人：发火”又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观众类型，这个迟到的人给领座员带来了麻烦因此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编码“迟到的人强调自己的不一样”既说明了领座员需要处理的事情，并且进一步说明了这个迟到者的不同。接下来的编码——“经理进行干涉”、“推卸责任”、“有事可做”以及“转移注意力”——提出了“后续”的不同反应，包括经理安抚生气的观众，以及作者让观众们忘记延误的种种努力。

编码将具体事件或特点与其他事件或特点联系起来，清晰地
进行区分。研究者通过比较这一事件与其他“类似的”事件就可以明确更加普遍的分析维度或范畴。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可以对自己提问：这一事件应该属于什么更加普遍的范畴或者与当前的事件有什么具体差异。比如，“被拦在外面”的观众的反应可能促使研究者关注相反的情况（比如，“领座员在演出过程中带领迟到的人进去”），因此会提醒研究者观察领座员到底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尽管很多编码已经包含了当事人的关注点和术语，我们还应该通过编码“迟到的人要求进去”关注当事人的意义世界。这一编码力图捕捉该观众为了回去观看演出而提出的自己与迟到者的实际差别——一些人在演出开始之后才来，但是他之前就来了，现

在只是想再进去,因此,不是“迟到”,应该获得与那些人不一样的待遇。我们可以通过工作人员的反应看出这种差异事实上没有任何关系,在工作人员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公正与否(比如说,是否应对“真正的迟到者”和暂时离开之后又回来的观众区别对待),而是任何人在开映之后进场所必然引起的扰乱。

这个学生在逐行阅读自己的田野笔记之后,开始说明领座员的工作事务,即负责安置观看舞蹈演出的观众。她在阅读过程中提出问题,“领座员的工作程序是怎样的?”这样她就会写出更多编码;其中一些编码会进一步列举或解释之前的编码,而另外一些编码可能会提出完全不同的主题或者分析思路。比如,一旦将“迟到的人”定义为观看舞蹈演出的一类观众,她就会在田野笔记中寻找另外的观众类型。类似的,编码“等待的人:发火”就说明生气只是观众的众多反应中的一种,因此她可以继续寻找观众的其他反应。她还可以思考: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但是不是通常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呢?这种情况是在何种背景中出现的?

同理,这个学生还可能提出整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是按照何种顺序自然发生的,各个阶段的情况如何。她还可以通过继续寻找每一阶段通常出现的麻烦事以及领座员回应的众多技巧和行动,来进一步顺着故事线索提出可供分析的主题。比如,编码中提到的策略——“让[观众]有事可做”、“转移注意力”以及“微笑”——说明她寻找进一步的例子或者说明来阐释领座员处理、回应、控制或者对付不同类型观众的普遍方法。

田野工作者在编码过程中始终在进行分析;尝试着超越田野笔记中的具体事件或情况,去捕捉一些更加普遍的理论维度或者议题。尽管在开始编码时关注田野笔记中的术语——不论是田野

工作者的还是当事人的——对研究者很有帮助,他也必须对术语进行转化,这样就能够涉及更加普遍的概念。但是,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使用概括性概念来作为编码并没有帮助。比如,用“社会控制”这一编码来意指少年教养院中工作人员在居住者的屋子里寻找“致瘾物”以及其他违禁物品的过程,就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这个概念太笼统,而与田野笔记中所写的事情没有具体的联系。但是,编码如“工作人员的控制——房间搜查”就把这些工组人员的行为刻画为具体的控制过程,而且也许会促使田野研究者思考并且发现其他形式的“工作人员的控制”。

开放式编码

田野研究者一边认真仔细地阅读田野笔记,一边开始用词语或词组写下一些具体分析维度或概念以详细察看田野笔记中的片段,并且对其进行分类,这些词语或者词组恰恰反映了研究者的观察。这些编码可以写在相关田野笔记的边上,也可以写在单独的一页纸上(标明相关田野笔记的位置),或者写在文字处理程序的“批注”或者文本数据库的关键词中。研究者在这样逐行编码的过程中得出了所有可供分析的议题;他尽力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捕捉尽可能多的想法和主题,但是又常常近距离地接触田野笔记中记录下来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考虑最终会不会采用这些观点和概念、是否还有其他相关的观察或者它们之间怎样联系。

以这种方式对田野笔记进行编码与对定量研究中的编码存在根本区别。研究者在定量研究编码中采用的是演绎的方法,从理

论出发提出包括各种概念的问卷。他将被研究者对问卷的回答归入已经存在的各种概念,以此确定事件发生的频率。定性研究是归纳性的,研究者撰写的田野笔记体现了事件或者经历对被研究者来说的重要性。^① 定性研究中的编码是开启调查路径的一种方法;研究者通过对田野数据的细致考察和反思提出概念和分析性观点。从根本上说,编码的目的并不是直接对数据片段贴标签,然后把“相匹配的”材料放在一个单独的概念之下;田野研究者实际上最关心的是概念,不是以一种挑选数据的方式,而是一种如何命名、区别和确定特定观察的概念重要性的方法。与定量研究的编码不同,我们在定性研究的编码中通过也为了阐释数据而确定、分析并且修正分析性观点。^②

定性编码意味着具有不同理论敏感度和取向的研究者面对同一批田野笔记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编码。学科背景和理论兴趣尤其会对分析性编码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研究文化概念的人类学家与关注讲话者-观众互动的民俗学者相比,可能会提出不同的分析概念。同一学科内部的不同理论取向可能也会在编码过程中造成

① 当然,定量研究也包括类似的概念建构和修正,这些工作主要是在前测阶段完成的,但是定量研究并不将此过程称为“编码”。

② 专门为分析定性研究数据而设计的电脑软件程序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编码和分析的途径(Pfaffenberger 1988; Tesch 1990; Richards 和 Richards 1994)。当前,这些程序在通过“编码和检索程序”来处理海量田野数据时最为有效;田野研究者“根据数据段落是关于什么的或者段落中的其他兴趣点来”贴标签(编码或者索引),然后使用软件来找到那些具有相同标签的段落(找回)(Richards 和 Richards 1994:446)。Richards 和 Richards(1994:447—449)提出已有的采用这种编码-检索程序的软件能够帮助研究者建构理论,但是当前只能通过多种“在文本的层次操作”。这些软件还缺少用来提出、阐释和检验理论的实质性“概念水平的操作”。不论田野研究者是否使用电脑软件对数据进行编码和分类,他始终是对田野笔记进行概念化、阐释和重构的那个人。得出编码概念的质量和有效性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思考。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参与我们所描述的对田野笔记的阅读、阐释和编码的过程。

上面所提到的不同。比如,两位研究家庭的田野工作者可能会以不同方式撰写和编码他们的田野笔记(我们可以假设,即使他们是在同一情境中进行研究的);一位研究者可能在编码时关注于经济政策对家庭关系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影响,而另一位研究者所关注的是女性在家庭中所完成的隐性劳动。总体来说,田野研究者并没有单一、正确的方法来最终决定如何从众多可能的模式和观点——包括当事人的想法和兴趣点——中选择一个关注点。

田野研究者在开放式编码中不应该带着预先设定的概念去阅读田野笔记;而应该在阅读中注意把有可能支持某一概念的数据汇总起来。即使编码与原先的“关注”并不符合,他也不应该否定这样的编码;当研究者不断阅读田野笔记时,他的关注点会不断发生变化。因此,研究者至少在开始阶段应该寻找尽可能多的编码,而既不要考虑编码与学科内已有概念的关系,也不要考虑编码与分析和组织中的基本理论关注点的关系。与具体田野笔记相关的或者从中得出的任何想法和概念都应该被认为是有意思的,应该尽可能地构建或者表达出来。因此,任何编码都不一定要和其他编码或者其他田野数据相关;整合概念是以后的工作,研究者不应该因为一些编码看起来不能整合在某个主要关注点之下或者不能与其他编码进行整合就忽视它们。

我们将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研究者如何对某一事件进行开放式编码,这个事件是关于那些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成员所组成的支持小组:

问题:健忘;危险驾驶	露茜说她丈夫身体很好,但是他的症状有
医生没有任何帮助	健忘和危险驾驶。医生没有对他驾驶采

寻求建议

家属对医生施加压力

医学检查→没有结果

不要依赖医生

建议去车管局

没有得出医学诊断

建议:和医生联合起来

实际的方法:欺骗

建议的方法不管用

“劝说”

取任何措施。她问:“你们怎么看呢?”一些成员说:“换医生。”露茜解释说医生和自己家是朋友。她儿子曾经提醒医生他爸爸开车很危险,他们有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医生为他做了电脑断层扫描,但是那之后也没有得到什么指示。

帕特,小组组长,建议:“你自己解决吧。”她建议露茜去车辆管理局。卢说最近有一部新法律不建议任何有精神疾病,包括老年痴呆症的人开车。露茜说:

“但是我不知道这病叫什么——它让人行动迟缓。这真的让我很沮丧。”维说:“对你来说医生让他不要开车是不是很重要?”露茜说:“医生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可能他已经快这样做了,但是不愿意牵涉进来。”其他人建议她把车钥匙藏起来。乔伊说:“你要骗他。”露茜说:“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乔伊说:“我们也都这样做过。”……露茜说他知道还有备用钥匙。另一个妇女说她曾经和自己的丈夫谈过,然后他就不开车了。“我也试过了。没用。”有人说:“你需要一份医生出具的诊断书。”露茜:“这也是我所想的。”小组里的其他人也表示同意。

田野工作者通过这些页边的编码提出了很多联系松散的(甚至没有关系的)议题:

老年痴呆症患者开车可能非常危险;家里照顾病人的人必须积极应对那些坚持要开车的病人;

医学诊断对照料者控制病人的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照料者可能由于医生不在意或者不支持家人的想法而感到绝望;

支持小组的成员会提出了很多建议来应对医生不提供帮助的情况;

支持小组的成员会提出很多实际方法来阻止患者开车。

一些编码展现了田野研究者一开始就关心的议题:现实的“麻烦”,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或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参见 Emerson 和 Messinger 1977)。但是还有一些编码以独特的、未预期的方式阐述或者提出了某些概念,比如“藏钥匙”是应对危险驾驶的一种实际方法。其他编码提出了研究者彻底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比如,在照看者应对执意开车的患病家人时,医生有可能成为障碍也有可能成为同盟。

当研究者阅读完所有田野笔记时,他的概念和主题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研究者将会舍弃很多概念,同时,他也会更加关注另一些概念以及更加有趣且频繁出现的问题。此外,作者一开始会认为田野笔记中“包含这样一些内容”,而编码会形塑甚至改变作者一开始的想法,因此编码过程可能能够帮助研究者认清笔记的意义或者重要性。就像一位学生所说:“因为田野笔记是你写的,

所以你觉得你对它们非常了解,但是事实是因为你是很久之前写的,所以你并不能一下子就读明白。”

很多学生称编码往往在不断推进,而且看起来没有终点,因此这一过程最开始会让人沮丧和不安:

编码过程一次次重复出现。我一次又一次地结束编码……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可能会错误地编码,或者我不能真正发现任何好的概念或者互相没有关系的事物。我必须克服自己的恐惧,不能总是想那里可能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材料。

由于编码不是简单地“发现”数据中有什么,而是更加创造性地将具体事件、观察与更加概括性的分析概念和议题联系起来,所以编码确实是带有不确定性的。尽管研究者必然会根据他们所属学科的概念来提出这些联系,但是编码过程能够帮助他们聚焦于自己的数据,扎根于自己的数据。研究者常常已经很熟悉所属学科的核心概念和关注点,这样就可能很快从某份数据中找出与之相关的内容;但是研究者很多情况下可能必须从他从未看过的文献中找出合适的概念。研究者通过投入时间、进行实践、对学科更加广泛的了解,逐渐对自己建立分析性联系的能力具有信心,编码也就变得不那么可怕和不确定。

这种开放式过程会给研究者带来各种层次的焦虑:一些学生担心他们不能找到论文的主题。其他人发现逐行编码很费时而且很辛苦,所以就想集中在少数主题上,这样就可以有更快的进展而不会“浪费”很多努力。还有一些人表示得出很多不同编码的过程和他们所被教导的“逻辑地”(比如,提前认真规划)思维和写作

是相互矛盾的。参见两个学生的评论：

在我开始之前我没有得出任何概念。我只是一边阅读田野笔记一边把编码写下来,但是这个过程看起来并不是很有逻辑性。

我浏览了两三份田野笔记,发现里面有很多随机的、重复出现的主题,而没有什么内容是有组织的。

但是在这一阶段田野笔记看起来很难处理,而编码又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其实是一件好事;这样的编码会带来大量可能的议题和方向。尤其是在开放式编码初期,我们建议研究者不要集中在具体的主题和话题之上,而应该坚持浏览田野笔记,得出更多的编码。

但是我们也已经发现持续的开放式编码会随着观点之间不断产生联系而引起很多问题;持续的开放式编码实际上可能会使研究者在有可能或者需要得出具体关注点时并没有得到关注点。因此,选择性开放式编码的策略可能更加值得推荐。田野研究者在不同的时候、对分散的田野笔记进行选择式开放式编码。比如,研究者可能开始的时候使用系统性开放式编码,但是在阅读了某个重要部分之后,面对“核心的”、“丰富的”、“发人深省的”事件,采用选择性开放式编码对剩下的田野笔记进行编码,同时对之前的编码进行重新编码。

撰写最初的备忘

田野工作者通过阅读田野笔记并对其编码,开始就田野笔记提出很多想法。他可以通过撰写最初的理论性备忘把这些想法写

下来并且进行分析。我们鼓励研究者撰写尽可能多的想法、议题和线索。一些观点反映了田野工作者从阅读中得出的关注点和洞见,另一些是通过自己重新回到田野笔记中所描写的场景和事件中而获得的。

在编码过程中撰写的备忘比过程中的评价更具分析性。它常常帮助研究者从具体的、“丰富的”田野笔记中挖掘出理论意义。研究家庭成员如何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田野工作者就某段简短但是“带有暗示性的”田野笔记片断,写下了下面的备忘:

田野笔记:富美子(Fumiko)在支持小组讨论时谈到了她丈夫的情况:“他有时候像只小猫(开怀大笑)”,“但是当护士协会的人来给他洗澡时他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她补充说最近他不许她给他剃胡子,但是“今天早上他又同意了”。

备忘:注意这段描写怎样提出家庭照看者发现病人合作与否并没有受到他的能力和境况的影响。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老年痴呆症患者是否能够自己吃饭、洗澡、剃胡子,等等;老年痴呆症患者如何看待这些帮助和照顾则又是另一回事儿。

还要注意对家庭照看者来说这些事情有不可预见性;在一些情况下,给病人洗澡、剃胡子会很顺利,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就很麻烦。而且家庭看护者看起来并不能找到理由来说明什么时候病人是合作的,而什么时候病人会抗拒。

此外,给家庭照看者带来严重麻烦和负担的可能是病人的不合作和抗拒,而不是病人需要帮助本身的多少。这样看来,照顾病人的关键可能是那些阻止、克服或者回避病人的抗拒的设施或者

行为。绝大部分情况下,家庭照看者会这样描述合作的(或者不抵抗的)病人:“我还能照顾他。”类似的,合作的患者是“可沟通的”,比如,在他的/她的日常生活中经过劝说而或多或少“自愿”进行一些改变。

在这段备忘中,田野工作者提出了田野笔记中的两个最初的、有些没有联系的议题:一些家庭照看者说病人的合作程度并不根据身体状况而变化,他们合作与否是不可预期的。在最后一段,她推测了这些问题之一——合作(以及它的对立面,反抗)——在形塑为老年痴呆症患者提供家庭看护的普遍模式和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其他情况下,民族志研究者采用最初的备忘来说明涵盖一些具体事件的某一具体分析性问题。比如,研究者可能会在很多分散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力图确定并挖掘某一概括性模式或主题。顺着这些思路,请参考下面这则来自某项对审判人员(书记员、录音师、法警)之间支持和互动的研究中的备忘,这段备忘考察了庭审程序中“维持群体和内部性”的模式。

“维持群体和内部性”的例子往往发生在休庭期间、工作不忙的日子以及每天工作结束之后……比如,今天庭审结束后,除了法官以外所有参加庭审的人活跃地进行互动,法官这时往往会离开。他们的方式包括相互进行眼神的交流、交谈、开玩笑、打断谈话。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之间会分享信息、交换想法。

由于参与者积极参与到互动当中,所以有别于庭审中的空谈。高度参与意味着群体性和内部性;而以互动的简短性和缺乏感情

和眼神交流为表现的低度参与相当于空谈。

此处,研究者提出了庭审人员之间的一种更加强烈、活跃的常规言行模式,这一模式与其他包括较少互动的情况截然相反。在写作过程中,她对关于这种互动模式何时发生(在休庭期间、工作不忙的日子)以及怎样互动(活跃交谈、开玩笑等等)进行了初步观察。

总的来说,最初的编码和备忘要求研究者从田野中抽身而出,来确定、提出和修正更宏观的分析性主题和论点。在开始阶段,这些努力应该是灵活的、开放的,研究者对田野笔记进行阅读、编码和分析以获得很多新的想法、联系和关联。但是,最终田野研究者将超越这些开放的宽泛过程,而更加深入地寻找更加集中的分析性主题。这个缩小和集中的过程最开始包括挑选少数核心主题,然后研究者会对其进行集中编码和综合备忘。

选择主题

民族志研究者通过编码和备忘提出了很多想法和主题,但是这些想法和主题远远超过了她实际上能够在一篇文章或者一本学术著作中探讨的内容。因此,她必须决定哪些想法需要进一步挖掘,而哪些想法至少暂时要放在一边。

田野工作者有几种挑选核心主题的方法。其中之一是优先选择那些已经收集了很多数据的并且能够反映田野中重复出现的或者潜在的行为模式的话题。田野工作者还会优先考虑那些看起来对当事人很重要的内容,是不是他们认为是关键的、看起来事实上

很重要的或者占用了他们很多时间和精力。比如,一个学生在县缓刑教导办公室担任实习生期间写下了下面的过程:

我一边阅读[田野笔记],一边考虑问题,比如我们要做很多日常文书工作,而人们必须签很多文件,然后我开始对这个大一些的问题——这个部门是怎样处理这么多文书工作的?——有了一些想法。在我浏览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我发现,“哦,是这样,我们常常相互帮忙。”一个缓刑监督官会说我昨天在食堂看到你在监督的缓刑犯了;因为我看到他了,所以对你来说这将被视为一次附带的接触[必须记录在文件中的一类接触]。还有一些这样的捷径。还有“季度报告”这样的总结性报告,用一张纸列出三四个月的工作。因此,像这样的三个或者四个事情就是大一些的问题下面的子话题。

这个学生浏览自己的田野笔记时,带着对工作情况和限制的敏感度,开始注意到缓刑人员必须完成的不同工作。通过考察缓刑人员事实上如何对付其他机构——警察、诊所等等——所带来的实际限制和机会,为一开始看起来分散的任务提供了一个可供整合的框架。发现更多这样的主题就会指导研究者阅读和编码剩下的田野笔记。

田野工作者还必须考虑选出来的主题怎样与其他主题联系起来。那些能够让研究者在这一主题和田野笔记中的其他主题之间建立联系的主题尤为有价值。一旦研究者发现联系主题的新方法,那么原先被认为没有关系或者可能已经被放弃的一些主题就会被作为“子主题”重新纳入分析之中。

在挑选有价值的主题并且寻找可能的联系的过程中,田野工作者可能会失去她的思路,因此要修改她的观点,以重新阐明事情。一个研究公立高中乐队的学生,在开始编码时已经想好论文的主题,但是最后发现自己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她在访谈中描述了这样的过程:

我开始认为我会解释某人如何在面临预算削减的情况下维持这样的课外活动项目的运转。然后我就罗列出老师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方式,在此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他必须想办法让这些孩子成为朋友。接着我想,等一等,那就可以是整篇文章的主题。有很多事情正在同时进行,我怎么才能在文章中解释110个孩子内部的众多小团体呢?有那么小的小团体。接着我开始只研究学生之间在乐队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这是最怪异的事情——这不再是我的文章!我编码得越多,就越不像我一开始所构思的文章。

最后,这个学生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从小团体之间的众多差异到老师在面临预算削减和众多小团体时如何维持这个项目的进行。她无奈地说“这不再是我的文章”实际上正说明她找到了新的意义以及整合数据的新方法。

处于这一过程的学生常常会说某个主题自然地向他们“跳出来”,或者民族志失去其“关注点”。这一经历如此强烈而普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处回顾之前提到过的两个紧密联系的问题。首先,研究者的经历往往只是“田野笔记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田野笔记以及它们的意义“在那里”,而只有被写下来以后才是真正纳入其中的内容。更准确地说,研究者作为田野笔记的原创者,一直

在创造和发现田野笔记的意义。研究者的敏感度决定他会撰写一些主题而不是其他主题；这些敏感度可能来自于个人的习惯和感觉以及所属学科、阅读的文献和/或老师所提供的观点。第二，如果研究者认为他就某个主题已经拥有“大量的数据”，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数据的内在逻辑；而是因为田野研究者通过阐释、组织数据而使之支持这个主题。

民族志研究者一旦确定一些可供进一步分析的核心主题，他可能会发现把田野笔记根据这些主题进行分类是很有帮助的。这里，田野工作者把田野笔记拆分成更小的、更加可操作的片断，分别把有关每个核心问题的片断集中起来。研究者在这种分类或者找回的过程中把有关同一主题的数据片断集中起来以便探讨它们的意义。把片断按照主题分类就将与某个问题相关的田野笔记集中起来，因此为分析提供了方便。^①

我们建议研究者在对田野笔记进行分类时采用宽泛的主题，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可能带有不同但是具有相关性的编码的笔记集合在一个主题之下。比如，研究者在扩展的开放式编码之后决定将“管理方式”作为一个核心主题。管理方式包括了照看者为了管理和控制病人的环境和行为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这个主题是有意识这样宽泛的，它允许研究者把带有很不一样编码的田野笔记整合起来；在“管理方式”的标题之下，她收集的素材包括：对病人的持续监视、警告或者“与病人交谈”、为了防止病人添麻烦而精心

^① 定性研究中分析数据的过程与定量分析过程的步骤是相反的：研究者不是采用预先设计的概念来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分析，而是首先通过最初的编码来对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再进行分类。因此，在定性研究中，分类是隶属于展开以及修正分析的过程的；它更是编码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欺骗病人。这一阶段的分析还仅仅是初步的,研究者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任何田野笔记的意义和重要性,甚至从根本上重新阐释。基于这个原因,田野研究者可以在众多主题中随意加入任何具体的田野笔记片断。

分类必然改变了田野笔记原先的叙述顺序。过去,田野工作者常常将田野笔记复印一份,然后把片断剪成一片片纸片,把纸片按照每个主题放在一堆,这样他在分析过程中可以把纸片重新分堆。现在很多电脑程序可以快速、有效地进行分类,尽管一些田野工作者还是更喜欢把田野笔记的小纸片放在桌上或者地板上一起看所带来的灵活性。^① 我们强烈建议那些使用后一种方法的研究者保留一份完整的原始田野笔记的电子版本(带有备份)或者纸质版本,以供后续参考。

集中性编码

民族志研究者确定核心主题并按照核心主题对田野笔记进行分类以后,转而采用集中性编码对田野笔记进行细致的逐行分析。这一过程包括提出并且仔细阐释有趣的分析主题,即通过在之前看起来没有关系的数据之间建立联系,也通过在某个宽泛的主题之下提出不同的子主题以及子话题。

举例来说,研究那些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看护者的

^① Richards 和 Richards(1994)对当前很多“编码-检索”软件程序进行了精彩的回顾。但是,只有少量数据的学生可能会发现使用 word 程序中的标准 block 和复制功能来创建新文件是更加方便的方法。

田野工作者开始注意到污名常常与病人的状况和行为联系在一起。她把所有关于污名(广义上的)的田野笔记整理成一份长文档,然后在提出关于污名的一系列子主题的过程中,重读这些素材,并且重新编码。例如,她区分了“转移视线”——避免污名在公共场合被发现的努力——和“掩人耳目”——遮掩可见的污名行为,让这些行为合理化或者把别人的注意力从这些行为转移开来。她还发现并编码了一些情况,比如照看者与老年痴呆症患者一起对付污名,照看者和其他人达成某种“共谋”来对病状所导致的结果表示抱歉,或抚平污名事件及其社会影响。^①研究者在集中性编码过程中不断在事件之间做出比较,找出在某一维度上可供比较的例子或者在某一维度上截然不同的例子,因此可以得出相反的例子或者差异。当田野研究者发现这些差异时,他会思考这些例子有何不同,也会试着确定这些差异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研究者通过更细致地对田野笔记进行子编码,来发现新的主题、话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前强调研究者要对理解和安排数据片断的新方法保有开放的心态,这种心态对集中性编码也同样适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过程得出的新问题或者开启的新话题的分析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展开的,甚至可能要求对田野笔记进行再思考和重新归类。一个学生写道:

当你撰写片断——最初的编码——的时候你既在发现也在创造结构,而这些编码和结构决定了你还会选择哪些其他片断以及

^① 参见 Blum(1991)对这些问题的完整分析。

它们之间将如何整合在一起。你手头有一份笔记,然后你会对自己说,“哦,这份笔记看起来和第一份很像,但是也有点小区别,这就是差异。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们看起来是前后相继的。”然后你继续阅读田野笔记,大约15页以后发现一些可以放在一起的内容。你开始找到一些可以按照某种方式放在一起的片断。即使你不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你也不要担心它们在整篇文章中如何相互契合,只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即可。我们的目的在于发现有什么素材,不需要考虑之后是不是用得上。

另一个一开始为数量巨大的初步编码而苦恼不堪的学生说:“我感觉编码很多很多,而且没有逻辑性。”但是当她一直坚持到能够开始发现田野笔记中还有其他可挖掘的东西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把更加宽泛的编码拆分开来,它们就可以被分成更小的子群体。我需要做的就是继续这样做。”民族志研究者在集中性编码的过程中开始从最初看起来是一堆让人费解的数据中发现某种模式。他通过集中性编码还可能得出提出论点或者讲述故事的可能途径。

学生们常常为他们就某一具体事件或者议题只有一个例子而表示为难。他们担心如果例子只能反映一些人的情况,那么只写一个例子就会歪曲自己的分析。如果民族志研究者的目的在于说明频率或者代表性,那么只找到一个例子可能的确会有些麻烦。但是频率只是分析的维度之一。尽管研究者乐意得到关于某个主题或者话题的很多例子,但是他进行分析的目的却不是代表性,而是说明当事人对社会场景和事件的理解以及对这些场景和事件的反应的关系和方式的模式和差异。所以“只有一个例子”往往并

没有问题。^① 如果民族志研究者很幸运地发现不止一个例子,那么注意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点是非常重要的。此时研究者头脑中可以记住的有用的问题包括:这个例子是如何呈现出相同点和不同点的?这些异同点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综合备忘

综合备忘通过详尽地阐述观点把编码和部分数据联系在一起。当研究者越来越从收集数据转向分析田野笔记时,撰写综合备忘就变得非常重要。研究者在撰写综合备忘时,力图挖掘已经编码的田野笔记之间的关系,通过把很多分散的观察联系起来而对某一主题或议题提出更加持续的考察。此时,很多田野研究者还是继续写给自己看,注意力集中于写下他们的思路,仍然保持我们之前谈到的备忘的几个特点:松散、“注意这个”和“观察那个”。但是,还有一些研究者发现在写综合备忘时头脑中始终清楚地意识到未来读者是很有帮助的。对这些研究者来说,综合备忘提供了第一次机会,让他们开始阐明那些不了解田野情况的读者需要了解的背景信息,这样读者才能理解研究者的核心观点。想象特定学科的未来读者会激励研究者采用更加书面的语言,也就是说,

^① 也就是说,即使你的数据中只有一个例子也并不会影响你能从中得出的很多分析性观点。重要的是这个例子的理论相关性或者重要性。一个个别的、不常见的例子可能能够反映出很重要的但是在场景中很少观察到的过程(Harper 1992),或者反映出日常生活中很少显现出来但是却是人们深度关注的问题。与此类似,社会学的“分析性归纳”过程坚持认为,如果发现一个个别的、与既有理论相背离的个案,就需要研究者修正理论解释或者能够解释这种现象(Katz 1988)。通过这种方式,随着研究者寻找并且把这种不符合理论例子纳入分析之中,理论就变得更加深入和精细。

使用和最终文本中的分析性描写差不多的概念和语言来阐明观点。在此过程中,研究者第一次尝试采用将来可能用来组织最终民族志的方式——一个连贯的观点(参见第七章的讨论)。因此,研究者应该更加雕琢这样的备忘。

实质上,综合备忘可能涉及一系列田野事件,并通过连接句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将通过下面这段篇幅较长的备忘来说明这些过程,这份备忘讲的是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成员所采取的“补救措施”:

补救措施就是尽量纠正病人的不当行为。照看者有责任在各种公共场所照看病人并且尽力“抚平事情”。比如,劳拉谈到她在朋友在场时是怎样做的:

如果他把杯子从茶碟上拿开,放在桌子上的其他地方。我就会说:“我想你最好把杯子放回去,要不然有可能会打翻,如果像这样离你很近就更容易打翻了。”我试着抚平这些事情。

在类似的例子中,卡罗尔描述了奈德在餐馆里把假牙取出来的行为如何让她感到尴尬以及她是怎样处理这件事的:

“我很快起身站到他面前说:‘把你的假牙放回嘴里。’”然后她向我解释:“我觉得我必须保护他。要是服务员来了怎么办呢?”

在第一部分,研究者通过“照看”和“抚平事情”这两个主题把发生在餐馆里的两个独立的事情联系起来。通过这样做,虽然事情之间存在差异——比如,在第一个例子中不当的行为还没有发生就被阻止了,而第二个例子中不当的行为已经发生,但是被正确地“掩饰”,然后纠正了——但是也具备主题所述的共同点。

研究者接着对补救措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说明了需要老年痴呆症患者合作的掩饰与直接由照看者进行的掩饰之间的不同之处:

补救措施包括照看者必须在病人有能力的时候,劝说他/她配合自己。比如,劳拉描述她在当地餐馆里如何与丈夫沟通,如何通过很多吃东西的任务以及他的反应来教导他并且从肢体上操纵他(“操纵木偶”,Pollner 和 McDonald-Wikler 1985)。她对他们之间互动的描述为照看者的详细细节增色不少:

我会说:“现在再转一点,这样你的腿正好在桌子下面,然后再往前一点这样你就正好在餐垫前面。”……然后他可能会把啤酒很危险地放在桌子边上,我就会把啤酒放回原处……然后我就要开始安排一些东西……他拿起玉米薄饼,这是不合适的举动。如果有人看到了,他们就会说:“啧啧”。

当劳拉用上面的例子向威廉提出一些补救措施的建议时,泰斯在她遇到的情况中直接接过窘境,完全依靠自己处理问题。她描述了她和一些同事去吃自助餐时,为了不让同事发现而试着掩饰她父亲的错误:

我们一直一起去吃自助餐……我会照看他。我让他走在前面,这样我可以处理任何他惹出来的麻烦。他喜欢拿着汤匙,把奶酪放在沙拉上面,把汤匙放在盘子上……而我就拿起汤匙放回原处……所有同事都在我身后……

这里,田野研究者提出了照看者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不当行为的两种不同反应。首先,她提出劳拉通过发出指令来照看丈夫;

她发现并且使用她所熟悉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概念“操纵木偶”来指代这一过程。第二,她考察了泰斯通过直接“接管”来照顾她父亲的方式。接着她分析照看者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这种或者那种补救措施:

当老年痴呆症患者越来越不能配合照看者的补救措施时,照看者只能被迫按当时的情况加以更多控制。比如,卡罗尔说:“我越来越有准备成为终极权威了……将来必须这样。也就是说,全面控制。”

作者在这份备忘中又提出随着患者病情不断加重,补救措施从温和不断向更加积极和限制的形式转变。她最后提到这个进程从根本上是不断对患者行为加强控制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她引用了看护者公开所说的“全面控制”。

撰写分析性综合备忘的核心任务是在田野笔记片断之间建立理论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面临不同的分析选择。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把哪个主题作为最基本的关注点,哪些主题作为子主题,哪些主题彻底排除。回到那个学生在对田野笔记进行分类时面临的“这不再是我的文章”的困境,研究者可以采取的策略之一是把文章分成不同部分,老师管理乐队、学生自己组织小团体的问题可以各成一体。第二种可能性是把这些策略看作某个更加宽泛的主题下面的不同角度。这样,文章就会关注老师面临很多困难——减少的资源和很多结成小团体的学生——的时候如何维持一项课外活动项目的进行。具体的子话题包括他怎样动员孩子们在周末或者工作日付出更多时间,怎样调和不同小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和不同的兴趣点。

决定如何构建分析框架需要研究者从具体分析中抽身而出，回答下列问题：我所面对的更大更宽泛的问题是什么？比如，一个研究非传统公立高中的学生一旦明确了她所希望讲述的故事，就能够把下面例子中的主题整合起来，这个例子讲的是全校大会上有关一把椅子的故事：

那把椅子就在那里，我坐在一群占座的人后面，一个女孩儿拿过那把椅子，把脚跷在上面，那群人说：“嘿，这个椅子有人。”她说：“好的，那能不能在他回来之前给我用用呢？”接着一个实习教师走过来，你会发现他看了看椅子，说：“我能坐这把椅子吗？”她说：“这里有人坐。”他说：“好的，我就在他回来之前坐坐，”然后他坐下来了。但是第一个人说：“不好意思，已经有人坐了。”他说：“好的，他回来我就会把椅子还给他。”那个学生[椅子的主人]回来了，那个实习教师站起身走开了。

这个研究者从田野笔记中发现学校学生们如何为了一把椅子互相协商以及如何与一位实习教师协商。然而，当她发现这个例子和几个类似的例子都是关于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师生之间关系的，她就会尽力把这样的事件和很多其他主题联系起来。这时她决定抽身而出，试着把这个事件和她所知道和发现的关于这个学校的其他既有趣的又更加宏观的事情联系起来。比如，她想到非传统公立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以“民主决定”和“共享权力”为傲。她把这种现象和很多更传统的学校进行对比，在那些学校中老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当她头脑中已经形成关于这个差异的更宏观的

问题时,她发现在一些情况下,非传统学校的老师可能不会选择使用权威,而是协商或者向学生对空间的要求表示妥协。这就引导研究者发现她可以把对空间的协商和很多采用非权威方式决定的其他事情联系起来。她还开始寻找这一主题中的明显差异,尤其是那些类似于协商的例子。研究者按照这条分析线索发现最开始看起来可能分离的、世俗的事件和更大的关于权力和权威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为这一事件找到框架,有助于她(研究者)认识到:师生们“民主”和“共享权力”诉求,是当事人在特定场合得到不同程度上褒奖的成果,因而对此不可信以为真或想当然。

我们再一次强调,不存在组织主题和子主题的唯一正确方法。选择哪些内容取决于记录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在对高中乐队的研究中,对学校中学生类型的丰富、详细的记录为描写学生小团体提供了基础。但是如果缺乏这样的观察,小团体就不应该作为分析的中心,而应该和一些其他内容一起作为情境或者背景。田野研究者在决定采用某种方式讲述故事之前,常常需要尝试、修改、抛弃并且重新考虑很多可能性。就像最开始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一样,如何组织论文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从这个组织主题的涵盖性如何到它是否能够凸显理论关注点。

反思:从田野笔记中创造理论

对田野数据的分析始于一些概念,这些概念根植于并且能够反映研究者对被研究场景或者事件的熟悉性。研究者通过将田野笔记作为数据进行近距离的系统分析,试图得出尽可能多的观

点、议题、话题和主题。这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民族志研究者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后者通过对理论的演绎解释现象,并且试着在数据中找出可以支持或者否定它的例子。尽管田野笔记会凸显特定类型的事件——比如,对当事人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或者能够说明社会过程的事情——民族志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式还是开放式的,试着通过仔细阅读田野笔记来提出议题和观点。而且研究者始终愿意接受其他可能性,它在他回顾数据时会对越加明显的过程和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

我们不能由此认为田野工作者完全忽视既有理论,而在回顾田野笔记之前没有理论关注。然而,这的确说明对民族志研究者来说,理论并不是简单地等待分析者通过社会事实来逐一检验;数据也不是作为自立的方法独立于理论充分性之外。更准确地说,研究者的假设、兴趣、理论取向已经渗透到撰写民族志的每个阶段,影响了众多决定,从选择哪些事件进行描写,到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当事人视角的例子而不是其他例子。因此,这一过程包含着理论和数据之间的不断反思或者交流,理论渗透到每一点,不仅影响了分析过程,而且影响了研究者如何看待社会事件以及如何撰写这些事件的方式。

田野工作的目的就是得出产生于被研究场景中的或者与被研究场景相关的理论。这不仅与那些从既有理论出发进行演绎的研究过程相反,而且与“扎根理论”的拥护者也背道而驰(Glaser 和 Strauss 1967)。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扎根理论”主张通过对定性数据的近距离分析来“发现”和修正理论。但是这种方法把数据和理论两者截然分开;它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认为理论是内在于数据中的。然而就像我们所强调的,数据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它夹

杂着各种意义,而且常常是研究者之前的阐释和概念的产物。“扎根理论”忽视了数据是如何聚集的过程,忽视了在撰写田野笔记的时候就开始的将概念纳入数据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经常说的“发现理论”其实是一个歪曲的说法。当我们带着反思性仔细阅读田野笔记时,常常感到我们是在那些数据中“发现理论”。理论看起来只是从数据中跳出来,撞上了研究者;这种顿然醒悟的感觉只是因为研究者之前已经写进数据的分析观点、在阅读中思考的理论关注点和理论取向以及与其他观察到的和写下来的“相似的事件”之间建立的联系。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田野研究者创造了理论而不是发现了理论。这种创造不仅是发生在阅读和反思他所看到和写下来的事情的过程中,而是在整个田野工作的观察阶段中(也会发生)。

田野笔记中的事件和行为由于正在成形的有意义的整体而变得有意义。研究者对田野笔记的分析不仅仅是寻找数据中有什么,更是挑选出一些事情,给它们排列优先顺序,在事件之间的关系中理解它们。研究者要透彻理解田野工作的持续分析这一特点就必须在我们通常考虑田野研究者与田野笔记以及田野研究者与分析田野笔记的关系中不断转换。一位学生这样描写她发现“田野研究的声音”的过程:

一开始,我希望文章会从田野笔记中出来,因为它有它自己的故事,而且我希望就讲述这个故事。但是,我必须从期望讲述田野笔记中的故事转换到从它们中得出一些可靠的东西——我的想法,而不是想那些田野笔记背后隐藏了什么。

田野工作者使数据变得有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展示数据所讲述的事情。相比于从数据中自然流露的东西或者简单地发现数据中有些什么内容,分析从根本上更是通过不断思考之前记录的事件和意义的重要性而进行创造的过程。

第七章 撰写民族志

研究者在从田野笔记转向民族志的撰写时,从当地的场景、被研究者以及在当地建立的关系以及人情债中抽身而出。现在,作者坐在书桌前,回顾他对当地人日常活动的记录。为了写作供更多读者阅读的作品,他把田野笔记看作可供分析、解释、挑选的素材。因此,当研究者进行参与式观察时常常忽略自己同时作为当事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而在撰写民族志时研究者更容易而且必须认识到这种双重身份。

田野研究者可能能够想到不同的读者,但是多数民族志是写给其他学者看的。^① 受过学科训练的(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或者民俗学)田野研究者,在该学科的概念体系中提出有意义的观点。学科关注点可能已经影响了很多田野笔记的写作过程,在实际撰写民族志时,研究者也会有意识地拿他对某些当地场景的观察和经历来与某个学科的概念和传统对话。作为作者,人类学家必须为那些没有亲身经验的读者呈现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或者那个社会的某一部分或一些特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断在田野笔记中记录的事件和自己的学科兴趣点之间来回穿梭。对学术框架和概念的过分关注会破坏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但是如果只是按照被研究者所说的情况进行分类所写出来的文本对同行来说将是

^① 但是,Richardson(1990)曾经讨论过为大众畅销书和杂志所写的民族志。

无趣的。

在本章中,我们将介绍一种撰写民族志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试着利用和平衡分析性命题和当地人意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建议研究者撰写民族志时把它当作叙述性的“故事”(Van Maanen 1988; Richardson 1990),而不是组织紧密、逻辑严整的分析性论证。民族志之所以是故事不仅因为它们是小说式的,还因为作者采用了文学的方式(Atkinson 1990)来通过田野笔记“建构”一份能够吸引其他读者的描述。这些故事把对分散的田野笔记的分析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某个分析主题的,但是往往比较松散;而且它一般都是田野笔记导向的,也就是说,是从一系列主题性的、有组织的田野笔记和分析性评论组织而来。

在这一章的开始,我们将讨论一种特别的民族志——我们称之为“主题描写”。主题描写通过一个共同的主题将多个分析性主题或者概念联系起来。^①接着,我们将会讨论撰写田野笔记导向的民族志的一系列步骤。这些步骤包括提出最初的分析主题,然后将田野笔记片断选择、说明、排列、编辑成一些分别关于某个主题的片断和分析性评论。最后,我们将讨论对撰写完整的民族志来说所必须的开头和结尾。^②

① 我们提出的在撰写民族志中的主题描写很大程度上对应于 Atkinson(1990:126—128)关于“片断化描写”的讨论,“片断化描写”是“传统民族志”最常见的形式。片断化描写是非线性的,将每天的事情“非时间地、例证化地”组织和呈现出来。Atkinson 将这种片断化描写和更加经典的“时间顺序描写”对立起来,认为后者笔下的事件是线性的、有如“编年史那样的”。

② 我们关于撰写最终民族志的很多建议要么与 Becker(1986)为社会科学写作提出的建议相吻合,要么就是直接借鉴他的想法。因此我们强烈建议所有要撰写民族志的田野研究者他们在他们项目进行之初就阅读 Becker 的书。

主题描写

民族志研究者在编码和备忘的过程中就开始寻找可供分析的主题。作者在撰写民族志时,将一些这样的主题组织成一个有关生活和事件的连贯“故事”。这种描写要求研究者从整套田野笔记中仅仅选出一小部分,把它们组织成一段连贯的文本来呈现被研究社会的某个方面。

主题描写和分析性论证不论是从把材料组织起来的过程还是从最终文本的结构来看,都是根本上不一样的。就结构来说,作者在逻辑性论证中首先会提出正式的论题或者观点,然后通过实际证据来分别支持每个观点。^①相反,民族志故事的展开是通过对证据的分析来最终得出核心观点。主题描写以主要观点开头,然后通篇对这个观点进行尽可能详尽的阐释。的确,往往只有在故事结束时才能有效地呈现出更加精确、更加全面的观点。

此外,民族志故事的结构取决于对田野笔记片断的排序。田野笔记中的细节是整个故事的重要核心。也就是说,主题描写在使用田野笔记时,不仅把它们作为可以支持已经提出的观点的证据和例子,而且从一开始就作为构建和讲述整个故事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主要观点是研究者在编码和选择片断的过程

^① 因此,逻辑性论证中的主题是在开始就清晰地提出来的,后续的观点不断展开这一主题,而后实际证据证明了这些观点。Richardson(1990:13)指出这些基于推理和陈述的“逻辑-科学编码”的论点与那些在大多数民族志中采用的描述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民族志忠实于当地的、具体的情况,因此往往不会采用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采用的高度正式化的分析性论点。可参考 Richardson(1994:520)对适合民族志写作的若干“写作形式”的讨论。

中得出的,而不是通过预想田野笔记可能得出的结论而得到的。民族志故事中的片断更是故事的核心,而不是分析性观点的证据。

就写作过程来看,研究者进行主题描写就需要不断来回地在田野笔记中记录的具体事件和不断集中、细致的分析之间游走。为了更好地写作,我们不建议研究者在一开始就提出暂时的命题或者假设。相反,我们建议作者直到写完整个故事时再总结出最准确的命题,这样即使在写作过程中他也可以不断地发现数据,不断平衡自己的分析和当地人的观点。我们建议研究者在主题描写时先写出宽泛的话题或者问题,这个话题能够将很多分析的关注点或者对田野中发生的事件的感悟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社会结构的高中族裔”和“家长在未成年人庭审中的参与”就是这样的主题。^① 在早期阶段,某一主题指的是关注点或者现象,它们既没有提出具体问题,也没有提出正式观点或者解释,而是提出了更加宽泛的关注点,帮助作者开始将田野笔记整合成连贯的整体。

总的来说,民族志故事的主体部分会包括几个更加具体的分析性主题,比如提出田野环境中的关键模式、过程或者规定。因此,提出主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回顾之前的编码和备忘,在田野笔记中找出若干更加有趣或者相关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建议研究者运用清晰、准确的词语来表述潜在的主题。最初,研究者不需要决定这些主题之间如何联系或者它们怎么整合起来;只需要简单地找出可能感兴趣的主题。但是一旦确定了几个有价值的主题之后,

① 每个主题都提出了与某个学术文献相关的理论关注点;每个主题确实都因为与以往文献的关联才得以提出。比如,“作为社会结构的高中族裔”体现了研究者对考察高中生内部的族裔差异的兴趣。类似的,“家长在未成年人庭审中的参与”含蓄地提出了有可能影响庭审过程的因素。但是此时此刻研究者既不需要清楚地提出理论也不需要引用文献。

研究者就需要思考如何将**这些主题融合成一个话题**,然后放弃那些与此话题无关的主题。

或者,民族志研究者可能会从**编码或者备忘**中获得对某个有趣的话题的清晰理解。然后,他应该把这个话题尽可能清楚地写下来,通过回顾他的**编码、备忘**,甚至原始田野笔记来试着找出能够阐发这个话题的更加具体的主题。比如,一个学生写道:“我会展示家长是如何参与到法庭判决的过程中的”,那么他就会考察家长参与到听证过程的不同途径。在回顾编码之后,他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在一种模式中法官把家长作为了解未成年人信息的来源,在另一种模式中法官帮助家长去管孩子。然后,他写出了两个具体的主题:“法官有时候从家长那里获得信息来对未成年人宣判”和“法官还可能帮助家长教育未成年人,扬言要处罚他们”。

在任何情况下,田野研究者都会在话题和主题之间不断游走,并总结这一主题和某个话题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主题之间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以及/或者以明确的词句把各个话题表达出来。主题之间的关系不需要非常紧密或者逻辑严密;在“主题描写”中主题之间的联系可以是松散的。在主题之间建立联系、安排主题之间的顺序常常会需要词句上的修改以及概念化。显然,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一些主题也可能与另一些主题不“契合”,此时研究者可能就需要放弃这些主题。事实上,即使提出第一稿的完整计划以后,研究者也常常会随着工作的进展和民族志故事初具雏形而多次修改主题的表述并调整主题之间的联系。

我们可以参考下一位学生如何开始就公立高中里“作为社会结构的族裔”这个话题展开主题描写。首先,他将这个话题详细

阐述如下：“人们在某一情境中通过互动，持续地再造和修正‘族裔’。”接着，他列出了一些他希望探讨的具体主题或者问题。最后，为了呈现这些主题，他按顺序提出了下列5个具体的板块——每一个板块围绕一个主题：

1. 我就族裔如何运用于学校情境中的几种不同方式进行了概述。
2. 我证明学生提到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族裔群体，但是每个群体的组成不一。
3. 我考察黑人族裔的使用以及黑人社会群体维持族裔边界的方式。
4. 我依据边界的定义，讨论那些对他人抱有族裔观点的人（模仿黑人行为方式的白人）。
5. 我将族裔冲突作为产生文化区隔的过程来进行分析。

民族志研究者提出这些主题时，不仅列出了不同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相关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比如，关于学生们怎样谈论和显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族裔群体”的主题不仅考虑了一系列族裔的（和社会的）群体，而且涉及到赋予他人的身份；相反，关于“黑人社会群体如何维持族裔边界”的主题中就会考察群体成员如何建立他们自己的族裔身份认同。他还提出了这些现象之间的重要联系；比如，研究“模仿黑人行为方式的白人”就提出了研究者对模糊和跨越族裔边界的问题的关注，而这一关注将会拓展他对维持黑人族裔边界的兴趣。

研究者为了提出话题和具体主题就必须做出选择。田野工作

者常常发现他们总有很多主题不能纳入手稿之中。描写故事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选择一些能够体现个人的或者学科的关注点的主题以及那些在田野笔记中多次出现的主题。民族志研究者在选择这些有联系的主题和数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其他的主题和数据,至少在某一份手稿中是这样的。

民族志研究者在提出话题并将主题整合进故事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包括多重声音和视角。为了做到这一点,常常需要研究者特别关注如何选择和确定话题以及相互联系的主题,比如在提出和阐述某一话题或主题时完全可以突出一些声音和视角而排除其他声音和视角。比如,一位研究工人和老板之间关系的学生最开始将“雇佣”作为民族志的一个话题。但是“雇佣”是从老板的角度来组织材料的,突出了他怎样判断工人是“可靠的”和“值得信任的”。“雇佣”这个话题忽视了本国工人以及他们“怎样被雇佣”和“找工作”的实践。更加体现关系的构架——比如,“雇佣状况”——就能够将老板和工人的视角都纳入其中。

在下面的部分,我们将提出几种将田野笔记转化为民族志文本的方法。由于我们意识到最初的宽泛话题和若干最初的主题会影响这一过程,因此会着重关注研究者为了撰写最终的民族志故事而如何对田野笔记进行阐释、详细说明以及节选——这可能与主题之间只有松散的相关性。

将田野笔记转化为民族志文本

阿特金森(1990:103)提出民族志文本的“说服力”来源于“具体的例证和推论性的评价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将明确关注如

何写作这种以田野笔记为中心的文本——那些故事中充满了很多零散的田野笔记片段。为了写作这样的文本,民族志研究者必须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关联进行概念化,这样就在这些事情和分析的问题之间建立了联系;但是同时,研究者必须始终牢记这些重构有可能歪曲当事人自己赋予概念的意义。

为了开始这一进程,田野工作者必须回到田野笔记中去寻找那些可能发展成故事线的潜在片断。研究者首先找出若干田野笔记中的数据,然后就这些片断撰写阐释性评价;他还要编辑每个由田野笔记片断和分析性评价组成的单元,这样的分析突出了那些作为故事核心的田野笔记。最后,研究者必须将这些片断-分析的单元整合成民族志故事的连贯部分;也就是说,他将这些片断-分析单元按照顺序安排,形成有说服力的故事线,引导读者对其中谈到的人物和议题有更全面的理解。

选择田野笔记片断

田野工作者首先在头脑中形成一个话题及若干主题,这样他就可以回到已经编码的田野笔记去确定哪些田野笔记与这个话题更有关系。他回到这些整理好的田野笔记,找出那些能够构成民族志故事板块的田野笔记片断。我们这里将给出几条选择田野笔记片断的准则。

选择田野笔记片断不是简单地“找出最有趣的例子”。实际上,研究者决定将某段田野笔记纳入最终文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田野研究者介绍某一场景时,可能会因为一些片断恰当地说明了不断出现的行为模式或者典型场景而被选择出来。类似的,田野研究者可能会选择那些讲述日常发生的事情或者人们的

普遍关注点的田野笔记片断。这些片断可能会从看起来很普通的情况中抽取出更加具体的分析主题或者找出重要的不同。

研究者还会根据说服力来挑选田野笔记片断。某个片断可能因为描绘了不常见的或者感人的瞬间而很有感染力——某人表达深深的痛苦或者两个人在互相诉说辛酸的经历。或者田野笔记片断的描写能够使读者身临其境,并且时不时与作者形成共鸣。一般来说,包含特写、生动的描写的片断所描绘的行为和声音会使读者身临其境;这样的片断常常能够使读者可以想象并且像作者那样感受研究者的经历。相反,缺乏生动细节的“短小”片断由于更多依赖于作者的阐释而不是读者可以直观想象的场景和声音,就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此外,描写自然而然的对话片断常常能够展现当事人的关注点。读者通过倾听谈话中双方的反应就能够对这些言语形成自己的阐释。田野研究者通过这样的对话片断呈现了双方在互动中的协商——因此更体现出某一过程,而不只是结果。所以,有洞察力的读者需要的是能够体现当事人不同观点和兴趣点的片断——尤其是那些包含语言和动作的片断。

田野研究者在选择有说服力的片断的过程中,头脑中不需要有明确的分析观点。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会在这些片断中找出可供分析的重要意义。研究者可以凭借自己的直觉去判断某段具体的描写是否发人深省,即使当时他并不能明确地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研究者通过不断反思某个片断怎样以及为什么是能唤起感情的、感人的或者生动的,可能会得出新的评价以及更加深入的、具有洞见的故事。

田野研究者在主题描写时,尤其会寻找那些能够解释概念以及提出澄清或说明这些概念的方法的片断。研究者找到并选择的

这些片断为未来的故事提供了素材。他寻找和重读新的片断时,更加深入地明确了自己的想法,并且相应地,重新考虑另外一些他们一开始忽视的片断。这些想法常常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当他们阐明了某个主题或者概念时,头脑中就会冒出某个在别处记录的相关例子(“我记得另一个例子!”),这两个例子之间有着分析上的联系。而研究者在寻找和回顾那份数据之后,可能会更加深入地阐明核心观点。他会查看田野笔记以及之前的备忘来找到现在看起来相关的片断。^①

关键的出发点可能就是那些得出对当前关注的主题的具体编码和备忘的田野笔记片断。回到这些已经主题化的田野笔记(以及相关的编码和备忘),重读它们,挑选出相关的片断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一项关于妇女如何请求家庭暴力限制令的研究项目关注朋友或者支持者在促进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下面的田野笔记在帮助研究者认识到这一过程的核心维度中起了重要作用:

朱莉亚是我的第五个当事人。她是个24岁的白人,丈夫是个白人警察。她丈夫从来没有打过她,但是曾经用枪指着她,不断用言语侮辱她。朱莉亚带来了她的朋友蒂娜,蒂娜替她说了绝大部分话。可以说,朱莉亚非常安静而且心事重重。蒂娜说朱莉亚确实“很糟糕”,连头发都快要掉下来了。

朱莉亚:我只是不希望我老公失业。你知道嘛,他是个警察。

^① 这就是分析性归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为了“在数据和解释之间建立完美的联系”(Katz 1988: 130)既可以修正概念分类又可以修正正在解释的东西,或者同时对两者进行修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将主题或者概念分类修改成适合田野笔记的数据,可能就会使之前的编码作废;实际上,在撰写过程中,往往不能一直使用最初的编码。

调查者:我知道你很担心他,但是我们呆会儿再讨论他的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心你。

朱莉亚:我知道,你是对的。

蒂娜:她挣扎了很久才到这里来的。我得把她拖过来。她早上哭着给我打电话,我说:“好吧,我们必须要去了。”

在这个例子中朋友所说的促使妻子来请求对她丈夫的限制令的情况,是典型的支持者推动“受害者”寻求法律解决方法的过程。由于田野笔记中提到了朋友在申请限制令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因此这段田野笔记具体展现了在法律的或者其他官僚制度的情景下,“第三方的支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总的来说,片段可能引起研究者的回忆,从而提出其他“类似的”例子或者事件,为收集关于某个主题的众多片段提供了基础。或者,民族志研究者可能会通过系统回顾编码和田野笔记去寻找提到“同一件事”的片段,他可能在众多田野笔记数据中发现共同的模式或者规律。比如,在一项对未成年人法庭缓刑听证程序的研究中,民族志研究者观察到法官常常询问家长他们对孩子的行为的看法,请参考下面的例子:

史密斯法官用平静但响亮的声音[向未成年人]回答道:“我告诉过你要取得好成绩……但是你没有取得好成绩……我还告诉过你要听你妈妈的话。”他接着问他的妈妈:“他听你的话吗?”“不听。我让他去学校他也不去……”她看着她的儿子说。

通过收集很多这样的例子研究者就可以发现主题内部的细小

差异,从而改进他对具体片断的阐释。

为了做到这一点,民族志研究者可能开始在所观察到的和写下来的例子之间寻找不同点。首先,他可以寻找田野笔记中的不同主题或模式。比如,在研究朋友和支持者在申请家庭暴力限制令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寻找例子,首先是支持者积极参与到谈话过程中的例子,其次是支持者说话不多,扮演次要角色的例子。类似的,研究者可能会寻找不同的片段,反映了家长对法官询问他们孩子过错的回答的不同模式。因此,民族志研究者可能会将这两个片断放在一起,一个就是上面那个片断中描述的未成年人的妈妈说她的儿子“不听话”,另一个则是下面一个片断中的情况,妈妈——至少某种程度上——对女儿表示支持,尽可能不汇报她的不当行为:

一个年轻女孩儿坐在她的律师的左边。她的妈妈坐在房间后面,离入口处很近。史密斯法官直接问她妈妈那女孩儿怎么样。她回答说在家“跟她”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学校“有问题”。

在相似的内容中寻找差异会帮助田野研究者进行深入的比较,从而一些原先认为无关的片段也就变得相关了。

然后,民族志研究者可以另外再选择一些差异更大的片段。这里,他所找的是与之前发现的模式所不同的例子,比如,在未成年人法庭缓刑听证中,民族志研究者可能会选择一个法官没有向家长询问他们孩子的不当行为的片段。这样的片段首先显示的是形塑和限制互动模式的情形。在未成年人法庭上,这种状况可能在家长已经失去信用或者未成年人必然会面临监禁时发生。

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志研究者应该如实描写所有的关键方面、模式或者特点。虽然用来编码的短语或者单词已经代表了某种观点,但作者的思考常常在最终将它写入句子之前都是模糊的。在将这些想法写出来的过程中,他不断地仔细考虑他的阐释。最后,他会将暂时的想法磨练成最终文本中更加清楚地表述出来的假设。但是在此阶段,他的目标是发现富有质感的丰富资料和事件流,而不是逻辑的严密性,精确的构想和用词留待以后再考虑。他力图全面地考察主题内部的差异以及例外的情况。

通过这一过程,民族志研究者不断改进他对民族志的总体构想。民族志的主要想法往往和之前——在编码过程中找出话题或者主题的时候——相比变得更加清晰。还有一些研究者在选择片断的过程中提出了主要想法。而一些作者直到开始对已选择的片断撰写评论的时候才关注主要观点。但是,很多研究者只有到撰写引言时才最后确定准确的关注点和对主要观点的表述。同时,田野研究者通过写出暂时性的主要观点来开始形塑整个文本的关注点以及民族志故事所要讲述的故事。但是这个暂时性的核心观点——还不是最终对核心观点的表述——在分析田野笔记和修改部分文本的时候常常会发生变化。

分析田野笔记的多种选择

民族志研究者头脑中想着一个故事,手头拿着一系列田野笔记片断和最初的备忘,接下来他要开始撰写更加详细的分析性评价,这些分析性评价阐释了每一个片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通过这种方式——撰写一系列将分析性评价和田野笔记片断结合在一起的段落——逐渐得到连贯的、以田野笔记为中心的故事。

研究者采用两种文本写作技巧来撰写由田野笔记片断和分析性评价组成的单元。综合的技巧将阐释和片断整合在一起；这样写作出来的文本很少使用空间标识——比如缩进或者单倍行距——来区分田野笔记的部分和阐释的部分。比如，请参考下面关于非正规焰火制造者——那些非法制造和销售自制爆竹和相关产品的人——怎样获得原料的描写：

之前主要焰火制造商购买的第二类高产炸药包括军用的和工业用的黄色炸药和各种液体的炸药和塑料炸药。在一些地区，黄色炸药很容易获得。我得知在临近的一个州，任何年满 18 岁的人，只要有“正当理由”就可以在市场上购买黄色炸药。在研究期间，阿诺德，罗素和汉克曾经去那个州买了八筒炸药和其他东西。阿诺德说：“我们就说我们在——南边的矿山工作，我们只是想把它[炸药]引爆，就像放鞭炮——只是为了娱乐。”他又说他和其他人为了避免将炸药运输过州界，就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把炸药引爆了。

研究者将这段田野笔记作为解释某一模式的实例或者“范例”(Atkinson 1990)，即选择这些田野笔记去解释和证明这些模式。因此，田野笔记和观点融合成了采用同一语态的统一顺畅的文本。作者没有在文字上区分过去写的田野笔记和现在进行的阐释，而是通过转折性的词汇，如“比如”或者“生动的插曲”来暗示两者之间的变换。

相反，摘录的技巧常常通过缩进和/或斜体一目了然地将田野笔记从评价和阐释中标注出来。下面的民族志段落是关于“自闭

症患者在试图融入身边的社区时所面临的困难。”作者在开头提出了分析的观点：邻居们经常用“污名化的方式”对待他们。然后她引出了一个片断：

社区里的人有时候会和患者打交道，虽然是以污名化的方式。一个酒保在当地的保龄球馆试着与约翰打交道，但是却可怜了他一下：

我和约翰去保龄球馆买咖啡。约翰向酒保要了“一大杯咖啡”。那个人递给他一杯咖啡，约翰付给他钱，酒保一边找零给他一边说“我去年忘了你的生日。生日快乐！”约翰把钱放回口袋，跟酒保说“谢谢”。我们回到车上以后，约翰说：“今天正好是我生日。我要去找东西打开（例如生日礼物）。”约翰直到遇到下一件事儿之前一直不停地重复这些话。

尽管酒保跟约翰进行了积极的社会交流，但是却带有歧视色彩。约翰试着去融入社区，但是得到的反馈说明他还是被排除在外的。酒保对约翰的“特殊照顾”说明他还是认为约翰是“特殊的”——不一样——应该得到或者需要优待。酒保本想做一件好事儿，但是却给一个已经很努力去争取得到自己所属社区最低限度的接受的人更深的歧视。

在这里，具体的例子说明了作者在开头提出的分析性主题句。田野笔记使读者信服作者的分析。接着，研究者在例子之后的分析中考察了互动的不同层面，因而扩展了她开始提出的观点：约翰希望融入社区的努力、酒保积极的互动以及特别对待所带来的微

妙的污名化。

读者很容易从格式上的缩进分辨田野笔记片断。这种一目了然的布局提高了描述和分析之间的对比度。因为田野研究者采用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作为田野工作者在片断中描写经历,另一种是作为作者正在向读者们解释那些事件,所以还随之产生了明显的对话体文本。

此外,这种呈现方式通过把片断与评价分离开来,将田野笔记片断作为过去写作而成的文本,这样就与田野中发生的事情很接近。从这种意义上看,摘录将田野笔记片断作为“证据”,作为“原始记录”,与后来的阐释形成对比。确实,田野研究者通过清晰的摘录向读者表示:“这是我的所见所闻,而这些是我当下对它的感觉。”

很多田野研究者对这两种方法各有偏好,在具体文本中会使用其中一种方法。^①但是也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写作目的而同时使用综合的和摘录的技巧。综合的技巧便于研究者更加顺畅、更加集中于某个主题呈现的数据。因为作者会较大幅度修改原始田野笔记中与当前的观点或问题关系不密切的部分,所以这种技巧使得作者可以准确、集中地传达很多想法。另外,综合的技巧尤其适合呈现篇幅比较长的、连续性的田野笔记:可以以连续的故事的形式把不断发展的情节和复杂的背景情况讲述出来。^②出于这个原因,这个技巧适用于始终使用第一人称的情况,而且更

① 使用综合技巧的当代民族志请参见 Berger (1981)、Diamond (1992) 和 Thorne (1993)。Anderson (1990)、DeVault (1991) 和 Emerson (1989) 常用的是摘录的技巧。

② 篇幅比较长的事件或者情节很难用摘录的技巧处理,因为要么就需要采用很长的片断,要么就需要把片断武断地分割成很多短小的段落。

易于作出更加灵活的、带有反思性的描写。最后,综合的技巧有助于将散落在田野笔记各处的观察和事件整合成一个连贯的问题或者模式。

相反,摘录的技巧保留了未经编辑的描写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让读者自己看到分析和阐释的“基石”。摘录的技巧通过从文本上区分田野笔记和分析来让读者评价作者所提供的阐释的基础、建构过程和可靠性。显然,这一技巧依赖于田野笔记片段作为“证据”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修辞影响。而证据是(研究者)在阐释之前所收集的,并可能独立于最终阐释。最后,摘录的技巧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在田野中观察到的不清楚的事件的细节和性质。因为田野研究者不需要,而且在实践上不可能详细分析纳入文本的田野笔记片断的每一个方面。相反,他们常常让场景自己说话。这些片断所包含的内容超过了作者所选择进行讨论和分析的内容,因此增加了民族志文本的深度和质感。实际上,这些没有经过修改的细节有助于读者不言而喻地理解被描述或者被分析的场景或者事件。在这种技巧中,片断在民族志故事中成为引人注目的核心文字。

除了形式的区别以及其他区别,综合的和摘录的文本技巧都是为了将部分田野笔记和分析性评价结合起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两种技巧都是撰写结合分析和田野笔记数据的连贯单元。我们接下来将讨论撰写这些片断-评价单元的具体过程。

撰写片断-评价的单元

为了最大限度加强分析性观点和片断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田野笔记为中心的分析性评价必须通过分析性观点集中注意力;通

过相关的环境信息被介绍的描写性片断进行分析和阐释;通过基于片断细节的评论来探讨和阐明观点。我们用片断-评价的单元这个词组来刻画这个民族志写作的基本组成部分的特点。在一些情况下,所有这些部分可以围绕某段具体的田野笔记数据而整合成单独的一段,而在其他情况下,对片断的完整解释可能就需要几个段落。我们仅研究了田野研究者如何使用摘录的技巧撰写这样的单元;但是我们声明,通常来说综合的技巧在过程上只有些微差异。

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摘自一份民族志的完整片断-评价单元,这份民族志是关于为同性恋学生开办的一所成人业余补习学校。作者在介绍了这一段的主题之后——学生通过“性别化”的交流,狡猾地削弱老师的权利和角色,已经呈现并且阐释了一个典型的“性别化”事件。然后他开始撰写下面的这个单元:

分析性观点 此外,有时候学生们通过把教师的教导色情化来
指导信息 把自己置于更加强势的位置。下面的片断发生在
老师迈克尔和学生马克之间:

片断 迈克尔离开房间一小会儿,跟克里斯谈了几
句以后,回来了,看着马克说:“马克,你跟我来。”
马克这时候正在把他的东西收到背包里,他转过去背朝迈克尔说:“我不想跟你走。”他一边说一边微微地看着克里斯,笑了起来。其他人[所有学生]都笑了。

分析性评价 这个片断中有几个尤为重要的方面。首先是这些谈话发生的次序。老师要求“跟我来”,体现了他

作为老师的权威,马克后来的色情化则是对这种权威的挑战。第二,马克不仅拒绝了权威的要求,而且通过把迈克尔的要求当作性请求,并且予以拒绝,而进一步抬高了自己的地位。实质上,马克通过拒绝老师的要求,而显得自己在两个“可能的伴侣”中是更加有影响力的一方。最后,这些对话是在其他学生面前进行的这一事实非常影响互动的结果。当其他学生因为马克的话而笑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意识到他言语中的色情成分,而如果他们只是两个人在谈话,那么迈克尔可以忽视这些色情成分,而现在他不能。也就是说,学生们的笑声让马克言语中的色情成分在迈克尔这个老师这里变得真实而有意义。

作者以分析性观点作为开头——学生把将老师的教导色情化作为反抗的方式之一。这个陈述不仅与前文呼应,由此融入这一部分的主题和整个民族志故事;而且通过直接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特定的问题而“引导”读者顺着他的思路去阅读和阐释。

在分析性观点之后,作者运用一句话连接了分析性观点和片断,这句话就是指导信息。这一信息列出了场景中出现的人物的姓名和身份。由于作者已经描写了这个小学校的物理空间和日常生活,所以他可以默认读者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教室里的。他还默认读者可以不需要确切知道这件事发生在一天中的什么时间或者不需要了解老师和另一个学生克里斯之间的互动,就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作者需要将读者准确地引

向内容以及接下来要讲述的事情。在这个指导信息之后,作者以格式上缩进的方式呈现了他所写的片断。

最后,研究者用篇幅更长的分析性评价讨论了片断中描写的互动,提出了与主题相关的三个问题:第一,马克的话是对老师权威的挑战;第二,马克的挑战是通过将老师的要求理解成性要求来完成的,以游戏的心态转变了他们之间的角色;最后,其他学生是这次互动的观众,他们的笑声认同了马克所提出来的色情理解,也使这件事对迈克尔的权威造成了影响。

田野研究者在分析性评价中进一步告诉读者他希望他们在田野笔记中看到什么。在撰写分析性评价的时候考虑到以下几点是很有帮助的:片断中叙述的事件或者交谈有什么影响?场景对文章中提到的分析性问题来说有什么重要性?实际上,田野研究者常常通过考察所关注的想法和更加有质感但却不清晰的田野笔记之间的紧张关系来撰写分析性评价。比如,他们可能会考察互动中谈判的成分(比如有意把某个命令理解成性要求;其他学生的观众角色),而不是仅仅考虑最终的结果。

在这一部分,田野研究者常常采用过去时描写片断,而以“民族志现在时”发表他们的分析观点。这样的手法将片断中的事件描绘成世俗的、历史的,而将分析性评价展现成非历史的、普遍的。^①的确,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对具体的个人、独特的互动和当地的事情进行概括——至少进行一定程度的概括。但是只要评

^① 一些批评家提出运用“民族志现在时”撰写分析性观点造成了对非历史的连续行为的错误感觉。Fabian(1983)考察了这一问题,他研究了人类学研究之下的时间和历史概念。我们认为田野笔记片断和分析性评价能够清楚地在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社会环境中进行任何讨论。

价是基于田野笔记片断的,那么这些抽象从来不会偏离得太远。片断中生动、清晰的明确性和互动的动态过程弥补了分析的概括性。

研究者在撰写片断-评价单元时,必须密切审视他的写作技巧以确定观点和描写之间是不是互相支持。在以田野笔记为中心的民族志中,分析性观点和实证片断之间存在着富有创造力的紧张关系;田野研究者同时通过片断和评价来讲述故事,因此观点和描述性细节必须相互支持。片断必然要深入某个主题或者概念,而且还应该让读者信服研究者的具体阐释以及整体的故事。研究者还应该确保分析性观点突出了片断中的细节。在检查田野笔记和分析之间的適切性时,常常需要修改相关分析,使它更加切合片断。在一些情况下,对分析性评价的修改可能会使它变得与这部分的主题无关;于是,整个片断-评价的单元可能需要被删掉——至少暂时性删除——直到它在另一部分中变得有关。

观点和描述性细节之间的差异可能还会产生于片断中的弦外之音和分析性评价所提出的观点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具有说服力,分析性观点和具体描述的视角必须是一致的。比如,一个研究未成年人拘留所的学生希望集中关注未成年人对工作人员的权威的反应。但是,请注意下面的片断和它所呈现的视角:

男孩子们面无表情地坐在休息室。一个西班牙裔男孩把脚放在塑料椅子上,L让他把脚放下。他把脚放下了,L顺着走廊离开了。当她几分钟后回到屋子时,发现男孩又把脚放在椅子上了,她叫他去了监控室。男孩儿微笑着走进监控室。L问他为什么把脚放在椅子上,他耸了耸肩,眼睛看着地上。接着,L警告他,他最好

按照她说的去做。然后就让他走了,回到休息室。

除了作者最开始写到“男孩子们坐在休息室”,这个片断的视角很快从对男孩子们的行为进行观察的匿名观察者转换为负责管理的成年的缓刑监督官。由于分析性观点集中于男孩子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对权威的反应,因此工作人员的视角与分析性观点是相互冲突的。^①

田野笔记片断和分析性观点之间的適切性应该被视为整个民族志故事进展的一部分。作者应该考虑写出能够体现这部分主题的分析性观点,还应该考虑如何通过田野笔记的细节和分析性观点的相互作用来使片断和随后的分析变得可信,从而推进整个故事。在撰写片断-评价单元的过程中,分析性观点对片断并没有很大影响,而片断本身——如同之前建构的那样——限制了作者能够做出怎样的分析以及如何分析。这样看来,主题描写在递增的重复中向前发展。每个单元既重复了主题,还添加了一些进一步的观点和对人物的刻画。从不同角度不断审视某一部分的主题可以深化读者的理解。

最后,民族志研究者应该根据已经存在于民族志故事的片断-评价单元,来思考还应该再撰写哪些单元。卡茨(Katz 1988:142)提出民族志具有“网状特征”,这个特征促使读者用支持某一观点的数据来肯定或者否定其他观点。研究者意识到这种特征之后,就应该对其他未经研究的田野笔记片断和分析性评价的重要性的

① 但是,这个片断可能可以用来有效地描写缓刑监督官的日常工作,如果研究者关注的是工作人员的情况,那么这个片断将会更加贴切。

当前理论观点之间保持敏感度。

由于在片断和分析性观点之间不停进行辩证的选择和写作——而不是提出观点；然后寻找好的例证——作者就更可能采用当地人的视角。既有理论或者观点不应该过度决定片断所应体现的观点。实际上，研究者在编码、片断和分析性观点之间不断游走，这样它们就共同推进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这一过程在片断和分析之间建立了创造性的关系，这种紧张关系能够推进故事并深化读者对作者所描述的世界的理解。

编辑片断

民族志研究者在撰写片断-评价的单元时重构了相关片断。研究者首先回顾原始的田野笔记，决定哪些部分是需要，然后得到初步的片断。这个决定就是最开始节选片断中的哪一部分，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总体来说，研究者保留而不是去掉更多的内容，也就是说保留篇幅较长的田野笔记片断是最开始删减田野笔记时比较谨慎的策略，因为这样作者之后可以再去掉被证明是无关的部分。

民族志研究者在精心撰写阐释性评价的时候不断回顾和编辑原始的田野笔记片断。我们建议研究者在撰写片段-评价单元时仔细编辑片断。因为作者沉浸在片断的细节和多种分析的可能性，所以此时正是评估田野笔记中的哪些部分是有关和哪些部分是无关系的绝好时机。这样近距离地对田野笔记片断进行反思可能会促使研究者获得新的想法并改进自己的分析。作者在撰写完整的片断-评价单元的过程中常常决定调整片断的起始位置，还可能为了精简文本而缩短某个片断，一些作为指导信息的背景也将在

之前的文本中提及。

这些编辑既取决于选择某个片断的目的(比如,提供生动的细节),也取决于分析性评价中所提到的问题。但是民族志研究者在编辑片断的时候还会考虑很多更加普遍的标准,包括长度、相关度、可读性、可理解性和被研究者的匿名性。

片断的长度应该是合适的。片断不应该只因为描述或者对话可能比较有趣而漫无边际地写下去;读者很难对没有节选过的篇幅很长的田野笔记——也就是说,很多页——保持持续的关注和兴趣。如果不能删除某段材料,研究者也会将原始片断拆分成很多更短小的、独立的单元,然后针对每个单元撰写分析性评价。

相关性是编辑田野笔记的另一个基本标准。田野工作者在决定某个片断是否相关的时候,既需要考虑对于描写来说哪些特点是关键的,还需要考虑哪些特点支持这一部分的主题或者分析观点。因此,民族志研究者最开始的时候会标记出那些对互动来说是核心的特点以及那些与观点相关的特点。然后,他就可以回顾那些介于中间的材料,考虑一下哪些部分可以删除,哪些部分需要保留下来保证描述的连贯性或者使读者对整个场景和情景有所了解。然后,他遵循引文中省略的编辑手法,用省略号(即“……”等)来替换去掉的部分。研究者尤其需要重视编辑访问中的对话,不要删掉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答案是就这些问题而得到的回答,所以它们应该保留下来。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雷切尔·弗雷茨在撰写一篇关于赞比亚西北省乔克维人的口述史(kulweza sango)时是如何选择和编辑田野笔记片断的。在当地通常用来描述传统故事的手法也被用于

讲述最近发生的事情,她对这些口述史很感兴趣。^① 她的田野笔记片段聚焦于采用乔克维人口述史方式的某个例子,这个例子讲的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政治人物木沙拉(Mushala),他没能取得合法的领导权,于是带领一批士兵占领了村庄,就地封王。最后,政府军到这个地域来搜捕木沙拉,把村庄从他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很多听众目睹过这些事情,其他人也听说过很多有关的故事;他们有时还进行评论,提出自己的看法。田野工作者录下了讲述的过程和听众的评论;她在田野笔记中主要描写了讲故事的环境、在场的家庭成员和他们当晚以及第二天的反应。在分析的开始,她首先听磁带并重读下面这段篇幅较长的田野笔记:

我们问约翰叔叔他是否知道什么木沙拉的事情。他顿了顿,回答说:“是的,我最知道了。”他开始用严肃的声音慢慢谈起来。他讲述木沙拉如何在这一地区抓捕和驱逐乔克维人和伦达人(Lunda):火烧村庄、屠杀家畜、村民们逃到树丛里躲起来。他大概讲了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家里人都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唐叔叔也加入了这群人,但是坐在他自己的火炭炉旁边——杰拉德,他的侄子凑到他那里去了。讲故事期间偶然有人会评论几句。[听录音]这是一个围着火炉的传统场景:祖父、两个年长的叔叔和他们的侄子们。除了乔的妻子凯茨(陪着我旅行的年轻女孩)和我,其他人都是男性。[绝大部分女人都坐在附近厨房的火堆边,也都很投入地在听故事。]

① Okpewho(1992:183—203)对“历史传奇”的分析中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Okpewho认为人们在讲述最近发生的事情时,会让听众感到故事的真实性,因为一些听众也许曾经亲眼目睹了这件事。但是,讲述者却采用修辞和叙述手法来重述这个事件,因此“历史传奇”听起来很像“神话故事”,而“神话故事”没有任何人曾经亲眼目睹过。

傍晚之前,女人们、尼亚罗娜和卡伦博穿过小路回家了。祖母进屋去睡觉了。祖父一直在打瞌睡,醒来以后也去睡了。约翰叔叔则一直在讲故事:当我坐在那里听的时候,我发现他运用了故事讲述的戏剧效果和对话手法,以木沙拉的死作为故事的高潮并且就此结束。

当他讲完时,每个人都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说:“谢谢”,然后他们开始交谈——法兰克、切斯特和唐叔叔都补充了他们自己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唐问了他的哥哥约翰一个问题,而且他又讲了一些事情:他的父亲认识木沙拉。他还提到了齐伦博,这个人是一个参与了这些事情的邻居。(齐伦博是一个穿戴整齐的男人,穿套装、打领带,有一天在 *chisambew* [男人和客人们坐的屋子] 附近的克乔维跟我交谈过。他问我是不是会到他的村子里去,因为他有很多故事要讲。我说我会去的。今天,杰拉德说在城里遇见他了,他还问起我为什么没有守约到村子里来。杰拉德说他——齐伦博——一直在等我。下次吧!)

录音的最后瓦苏西问每个人的名字。在结束录音以后,人们还坐在那里,又交谈了一会儿,深深地被这些震撼的事情迷住了。当我们穿过小路回自己的村子时,瓦苏西、约翰叔叔、切斯特、杰拉德、凯茨和我一直在谈论这件事。他们告诉我(并且演示)村民们如何倒退着穿过小路,这样他们的脚印就朝着相反的方向,以此来迷惑那些士兵。

那晚我很久才睡着——头脑里一直听到那首歌,“*Kanda uliya mwana, kanda uliya. Kaakwiza akuloze.*”[“不要哭泣我的孩子,不要哭泣;他们会来打死你。”这首歌是那些曾经为了躲避战争而穿过河去安哥拉生活的当代乔克维人所作——那天晚上我们之前讨

论的话题。]我感觉他们就是那些躲在树丛里面躲避士兵追捕的人们。第二天一早我们都很晚才起来。

今天午饭时瓦苏西说是木沙拉的妻子把他出卖给了政府军,因为她发现最后他会杀死她的家人和村民。当她快生孩子的时候,他们找了个产婆陪她待在树丛里。生下孩子以后,有一天木沙拉正好不在,她决定和产婆一起离开,然后她们遇到了四个士兵。她告诉他们她是谁,而且可以告诉他们木沙拉躲在哪里。她还告诉他们木沙拉拥有魔力,只有他们都赤身裸体才能抵抗这种魔力,但是他们都很害羞,因此她把她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了,于是他们一行人都赤裸地走在路上。然后他们走到一潭水边上,她说你们必须在这儿洗洗,这样他就看不到你们过来了。接着他们听到木沙拉正在走过来,就回到了树丛里。木沙拉扛着枪一路走来,经过第一个士兵,那个士兵害怕地颤抖着,不敢动弹。第二个士兵也是这样。第三个士兵打中了他的眼睛和胸口。木沙拉还想继续走,但是已经回天无力了,他倒了下来。接着他们都走上来,用刺刀刺他。他就是这样死的。因此,瓦苏西讲了很多关于这些事情的故事。

作者在回顾这段篇幅较长的田野笔记时,在两段加粗的段落中寻找可供分析的问题。第一段提出一种分析的可能性:作为对故事的回应,人们可能会模仿其中的某些动作;尤其当目前的某个细节让他们想起了过去发生的痛苦经历时。^① 木沙拉的故事让听

① Young(1988:121—158)在讨论景观和叙述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提出了这个观点。她指出祖尼(Zuni)人的一些石刻所描绘的是别人路过时告诉他们的事情。类似的,乔克维人的历史描述引导听众将故事和现在联系起来;在当时描述时,他们会将故事发生的前后秩序颠倒,倒叙和重温往昔时光。

众们想起了被遗弃的村庄,他们曾经藏身的树丛以及有时候他们溜回村子取一些东西时要经过的小路。作者为了撰写片断-评价的单元,选择并编辑了下面这段简单的片断,描述的是人们模仿当时如何走路来迷惑木沙拉手下的士兵:

当我们穿过小路回去自己的村子时,……[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件事。他们告诉我(并且演示)村民们如何倒退着穿过小路,这样他们的脚印就朝着相反的方向,以此来迷惑那些[木沙拉手下的]士兵。

她介绍说晚上人们听了故事之后都回家了,因此她不需要在片断中包括这些信息。她还去掉了谈话者的名字,但是保留了木沙拉的真实姓名,因为他是公众人物——这是节选田野笔记中的通常做法;她还在括号里说明士兵是木沙拉的手下,而不是政府军,木沙拉的士兵才是迫害他们的人,他们也正是向这些士兵隐藏行踪。

第二段可以用来说明人们通过转述以及对事件的塑造使故事更加符合常规的故事结构。瓦苏西在第二天某次更加不经意的谈话中用熟悉的描述手法重述了木沙拉的死:政府军使用魔力让自己隐身(而且刀枪不入)以及一连三次试着杀死坏人,但是只有最后一击成功了。

她告诉他们[政府军]他[木沙拉]拥有魔力,只有他们都赤身裸体才能抵抗这种魔力,但是他们都很害羞,因此她把她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了,于是他们一行人都赤裸地走在路上。然后他们走到

一潭水边上,她说你们必须在这儿洗洗,这样他就看不到你们过来了。然后他们听到木沙拉正在走过来,就回到树丛里。木沙拉扛着枪一路走来,经过第一个士兵,那个士兵害怕地颤抖着,不敢动弹。第二个士兵也是这样。第三个士兵打中了他的眼睛和胸口。木沙拉还想继续走,但是已经回天无力了,他倒了下来。接着他们都走上来,用刺刀刺他。这就是他怎么死的。

作者在编辑这一段落时没有提到木沙拉的妻子为什么出卖了自己的丈夫,因为这个信息并不直接和描述手法的讨论相关。她也没有对这段描写进行文字上的修改;因为即使这段文字不是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她也希望尽量保持瓦苏西讲故事时的顺序和细节。她在括号里添加了说明信息,并且考虑最能有效地在节选的片断之前提供哪些背景信息。

民族志研究者在为最终文本准备田野笔记时,常常必须不仅仅简单地去掉一部分田野笔记,还必须通过编辑重新调整和加强一些细节。下面是琳达·肖(Linda Shaw 1988)的田野笔记,她所研究的是精神病院的病人们之间的借钱模式。原始田野笔记不仅更长一些,而且比编辑过的田野笔记更加详细。

田野笔记原稿:

我走进食堂去看看供应什么小吃,正好遇到玛丽正在生气地和米歇尔讲话,因为米歇尔让雷德不要借钱给玛丽。米歇尔说她并没有让雷德不要借钱给玛丽,但是他确实不应该借钱给任何人,而应该给他自己留着。玛丽想知道米歇尔以为自己是谁,为什么让别人不要借钱给自己,因为她不是个无业游民,而且还常常报答

朋友。她们又争吵了一会儿,当玛丽责问米歇尔为什么要找她的麻烦时,米歇尔辩护说自己什么也没做,此时情况看起来变得更坏了。然后,米克,另一个坐在饭桌上的人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是什么了——看起来是为了缓和她俩的唇枪舌战,但是他的话却让玛丽开始谈起米克的女朋友帕西,她问米克他怎么找了个这么胖的女朋友。米克反驳说帕西并不怎么胖,而且他们也只是在约会。

米歇尔在这一间隙离开了食堂。玛丽就问我是不是威斯塔的每个人都会相互借钱。我说很多人都这样做的。她说米歇尔是新来的,只不过来了一个月,她有什么权力告诉别人不要借钱给她,而且这里每个人都会借钱的。她又说:“米歇尔是新来的。等她在这儿再住一段时间她也会借钱的。”玛丽接着又说她如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她说上个月厄尔和卡拉没钱花,她觉得他们很可怜,就把自己的整个回扣支票给了他们。

编辑后的田野笔记:

午饭后我在食堂看到玛丽正在生气地指责米歇尔——一个新来的病人——让雷德(另一个病人)不要借钱给自己。米歇尔坚持说她让雷德把钱留给他自己用,不要借给任何人,而从来没有提到玛丽。玛丽想知道米歇尔以为自己是誰,让别人不要借钱给她。她不是在讨钱花,而每次都会报答她的朋友。最后米歇尔起身离开了食堂。然后玛丽问我是不是威斯塔的每个人都会(互相)借钱。我说是的。她提到米歇尔是新来的,到威斯塔来了只不过一个月;她有什么权力告诉别人不要借钱给她,而且这里每个人都会借钱的。她又说:“米歇尔是新来的。等她在这儿再住一段时间她

也会借钱的。”玛丽接着又说她如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她说上个月厄尔和卡拉没钱花,她觉得他们很可怜,就把自己的整个回扣支票给了他们。

作者将这段田野笔记归入民族志中的一个部分,该部分讨论的是精神病院的病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这段田野笔记的作用在于解释以下观点:因为病人钱很少,也没有什么可以提供支持的资源,所以他们指望能够向其他病人借点钱或者其它他们紧缺的东西。我们从这个片段中可以看到当这些资源受到威胁时,病人的反应是何等激烈。作者在编辑这个片段时,保留了原始版本中的间接引语和原先的顺序。她保留了田野笔记中那些能够体现病人们参与到交换之中的理由的那些部分,而去掉了与其它问题(米克和他女朋友)相关的句子和词组。她保留了玛丽说的一些话,那些话说明在玛丽眼中,她的参与说明她已经进入了交换体系(帮助别人),所以现在有权获得别人的回报。最后,她保留了玛丽对外来者的解释,只有以前没有遇到亟需别人帮助的情况的人才会认为这样的交换体系是有问题的。因此,作者对田野笔记进行了编辑,去掉了一些描写而保留了能够直接说明问题的词句。最后,编辑的过程需要精心的平衡,一方面需要保留当事人的关键言行,另一方面要考虑读者对那些言行片段的关注,这些片断清楚、经济地支持了研究者希望讲述的故事。

作者在缩减或选择片断时常常会去掉一些可能能够更加有说服力地呈现人物和他们行为的细节。编辑不是简单的线性工作。一方面,缩减和编辑能够使整个民族志故事变得顺畅:过长的片断会让读者淹没在无关的细节中。另一方面,田野研究者常常在编

辑的过程中错失部分原始田野笔记的生动性和完整性。

田野工作者常常由于某个片断非常“丰富”而面临问题,因为这个片段中的材料涉及了几个不同的主题。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在最终文本的几个部分都完全重复使用这个片段。因为读者很快就会厌倦没有必要的重复,所以研究者需要避免两次使用同样的片段。解决之道就是在片段中清楚地确定不同的分析主题,然后依据这些主题去把片断分成两个独立的单元或者讨论田野片断的不同方面。下面的例子来自于对工人和他们老板的研究,这个片断最初是用来说明工人们老板不做家务进行道德批判:

“她从来不打扫自个儿的卫生间,而我有啥办法把那些污垢从她的淋浴池瓷砖上清除掉?我们用过一个不错的产品,但是我告诉她,‘你得让它浸一整夜’。‘因为实在是太脏了……实际上,当我离开女主人的时候(哈哈),我说:我就把它这样放着’[把很多 Comet(一种洗洁精品牌)留在洗碗槽里],这样第二天她就得自己去冲洗了。”

民族志研究者在回顾这个片断时,决定把工人的最后一段话——关于老板如何耍花招让雇员打扫干净——摘取出来,把它用在接下来的部分,关于工人们拒绝为雇主打扫房子的方法。

研究者通常会去掉他们加入到原始田野笔记中的反思性评价。他们可能会在片断后面的分析讨论中加入任何有用的观点,而不会在最终民族志中保留这些原始田野笔记的想法。当然,研究者常常会提出详细阐述并具体说明分析性问题,与这些问题相比,之前的评论看起来太简单、粗糙,因此很少被采用。此外,因为

作者在撰写、挑选、编辑和组织这些片断的过程中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解释在片断中占据主要份额,就会使片断显得做作,对最终的民族志来说也就显得多余。^①

作者通过运用标点、拼写和语法的标准习惯将片断编辑得更加可读。为了明确清晰,他尤其应该注意修改表意不清的句子,修正间接引语中令读者费解的时态不一致。但是,作者在编辑直接引语时应该非常谨慎,要在读者对清晰的要求以及作者呈现当事人的真实言语之间仔细权衡。研究者尤其要保留当事人的方言、习语和说话节奏。即使某人的言语不畅——错误地开始、停顿和重复——也应该仔细处理。由于很多原因,整理出可读的对话(尤其是基于录音整理稿)需要研究者对很多这样的不畅进行编辑。^②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作者可能非常希望保留这样的谈话来反映说话者当时的感情状态。比如,下面的片断保留了“然后,然后,然后”这样的词句,反映了说话人在向研究者讲述他的“精神疾病”时的犹豫不安:

①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研究者可以有效地把原始田野笔记中的分析或者其他评论纳入最终文本。研究者可能以独立的片断来说明自己如何从最初的理论观点戏剧化地转化到后来更加完整的理解。或者田野研究者可以运用原始田野笔记中的评论来介绍最终民族志的某部分主题。比如,一个研究流浪汉如何使用公共图书馆的学生在题为“作为面具的图书馆资料”部分的开头写道:“这是我早期进行的观察:‘我一直想了解那些整天坐在图书馆里的“流浪汉”。我想知道当他们盯着几乎空白的页面时,他们是真的在看书还是只是无意识地看,脑袋里想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② 请参考下面两个片断,杂志编辑认为原始片断是“难懂的”,而编辑后的版本是最终出现在纸面上的(Emerson 和 Pollner 1988:193),括号部分表示因声音部分或者完全无法听清而无法记录所形成的空白。

原始版本:“这点不符合在这里你的感情对()其他配置好像是。有没有什么部分让你觉得太、太、太就是、我们引申得——离题太远的吧? 哦”

编辑后的版本:“这点不符合你的感情? ……有没有哪些部分你觉得太、太、太就是、我们引申得、不够准确?”

“我有心灵感应。我确实能听到其他人脑袋里想的事情……”他说他希望能告诉别人,但是……“他们就给我吃更多的药……不管我怎么中毒,什么也不能消灭我的心灵感应。然后,然后,然后,这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耶稣赋予了我这样的天分。”

此外,研究者应该通过编辑使读者能够理解片断。作者必须澄清任何需要根据田野笔记以外的材料才能了解的情况——比如姓名、地点、过程。当作者引导读者阅读接下来的片断或者说明简略的、不那么重要的问题时,可以在文本中加入简要的解释,放在括号里面。比如,作者可能在片断中写出相关人物的名字(比如,“其他人[所有学生]”)或者澄清文本中也许不清晰的直接引语(比如,“我们想到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它[炸药]引爆”)。此时,田野研究者必须再一次澄清所有的细节都是准确的;对事实信息或者当地俗语的错误呈现很快就会让读者觉得研究者不可信赖。确实,即使很少的错误也会破坏整个故事的可信度。

最后,片断必须通过匿名来保护当事人、机构和社区。因此,田野研究者在完成编辑时,会对描写中的所有姓名和代表性标志,比如很显著的个人特征进行修改。作者通常采用真实姓名所体现的特点(比如,族裔身份)来提出假名。^① 我们不建议用首字母代表不同的人物,因为这样会使读者很难记住人物的性别,缺少明显

^① 民族志研究者常常提供讲述者的真实姓名,以表彰他们的创造力。在合作研究中,田野工作者也会列出助手和合作者的名字。但是,当人们描写敏感问题的时候——比如讲述一些宗教的、政治的或者历史问题时——大部分人类学家会对名字进行修改,就像 Rachel Fretz 在 *Mushala* 田野笔记中所做的那样。

的特征,而且使读者很难在其他片断中认出这个人物。

在某一节中安排片断-评价单元

民族志研究者以整个框架为指导,常常将民族志组织成若干带有标题的部分。每个部分大致讨论一个主题;也可能进一步分成若干子主题。每个部分都由一系列片断-评价的单元组成。比如,题为“谈话的色情化”的关于高中生同性恋问题的部分由以下单元组成:

单元一

分析观点:“色情的影射”是学生将和老师的谈话色情化的惯用方法。

片断:当一个学生发现老师 27 岁时,他说:“我曾经和一个 28 岁的人做爱——太恶心了。”

单元二

分析观点:学生在回应老师的教导时将谈话色情化。

片断:一个学生把老师向他提出的“跟我来”的要求故意理解成性请求。

单元三

分析观点:在一些情况下,老师不会对学生色情化的挑战置之不理,而是积极回应从而再次确认自己的地位。

片断:老师让学生把口香糖吐掉,学生开玩笑让老师“检查我的舌头”,老师回应说:“我不想这样——我确定很多人已经这样

做过了。”

单元四

分析观点:在一些情况中,老师们自己也会运用色情化的言语来暗中维护自己的权威。

片断:一个学生拒绝了老师提出帮助他学习数学的建议,老师说:“好吧,你之前不是在问他的事情吗?”

田野研究者在某一部分中按照特定顺序安排若干单元,越来越展现田野笔记数据和分析的复杂性,这样随着故事的推进加深读者对主题的理解。在上面的例子中,前两个例子主要关注学生如何把谈话色情化,第三个例子说明了老师怎样回应学生的色情化,最后一个例子考察的是更加微妙的情况,老师会首先开始这样的谈话。

为了使读者能够紧跟从一个单元到下一个单元的观点的推进,作者应该提供清晰的转折,连接当前的单元和之前的单元。在某些情况下,转折就是直接在新单元的开头写一个介绍性的句子。比如,“谈话的色情化”这一部分的作者为他的第三个单元写了下面的转折句:

尽管在前面的片断中,老师有时候不对学生的色情化言语进行评价,但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

这个转折提到了之前的片断,在那些片断中老师并不明确回应学生们色情化的言语。通过回溯这个情况,作者反过来介绍当

前这个单元的关注点：老师怎样回应这样的言语。

在其它情况下，当后续的单元中提出了与前面单元差异很大的分析观点时，作者不应该只是简单地运用介绍性的句子，还应该对前面单元的观点进行补充，清楚地引出后续单元的观点。比如，“谈话的色情化”部分中到第二单元的转折是这样写的：

此外，有时候学生们通过把教师的教导色情化来把自己置于更加强势的位置……

这句话说明学生将谈话色情化作为对老师“教导指令”的反应。但是作者在单元一中并没有谈及这种包含色情化言语的老师-学生互动的具体形式。读者现在看到学生会对老师的教导进行这样的反应时会有一些困惑：学生会不会对其它形式的师生对话也采用色情化的方式？比如礼貌的请求或者一般疑问。因此，作者应该对单元一的讨论进行补充，从而为接下来的对比提供更多的语境。

作者除了要安排各个单元的顺序，还必须为整个部分撰写介绍和总结。介绍应该将这一部分的主题和整个民族志的主题联系起来，还应该讨论一些能够帮助理解不同单元中出现的观点的其它问题。比如，作者用一段话介绍了“谈话的色情化”这一部分，观察到学生普遍都会将谈话色情化，“色情化对师生之间的权利关系造成影响”，因此把这一部分和整个民族志的主题联系起来。在接下来的一段中，他提到“色情的影射”是色情化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是似是而非的、间接的，所以对学生来说尤为管用”，他们可以否认自己的话带有色情成分。

最后,作者在某一部分的总结中必须为了突出核心主题而将片断和分析性评价整合起来。他还可能需要说明这些问题如何与下面的部分相联系。

撰写完整的民族志

民族志研究者可能在不同时间多次修改单元和部分,用新的片断替代原先挑选的片断,修改分析性评价和转折,在某部分内部重新安排各个单元的顺序以及/或者在民族志中调整各个部分的顺序。尽管他也许还能发现可进一步修改和改进的地方,但是到某一时刻为止他必须不再修改,而着手于最后将当前文本转化成完整民族志的一系列撰写任务。这些工作包括为民族志命名、撰写介绍、将话题和主要主题以及其它研究联系起来、说明场景的基本情况和使用的方法、对民族志做出总结。

介绍民族志

民族志的标题和介绍是读者了解整个文本的最初方式。标题和介绍不仅可以告诉读者民族志的内容,而且可以让读者了解作者分析的重点和关注的本质问题。

有一种类型的民族志标题既告诉读者总的话题,也告诉他们作者研究的到底是什么人、场景、行为或者过程。比如:

“兄弟会中仪式化的喝酒行为”

“城市高中里的族裔互动动态”

“等死:一项关于疗养院的田野研究”

此外,作者也可能在标题中提到更加抽象的分析主题,而不是简单地说明总的话题。正如阿特金森(Atkinson 1990:76)所说:田野研究者为了做到这一点,常常用冒号把包含抽象的、普遍的问题的词组和详细说明话题和具体“当地”场景或行为的词组联系起来。

“权力体系:一个男孩之家的权威和纪律”

最后,田野研究者还可能将当地人的用语作为核心元素放在标题中:

“Down 的动态:与 Set 打成一片”

“这些孩子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小小世界里:中途之家的阐释框架”

很多作者会以引人注意的开头作为介绍民族志的第一段文字。他们可能会从田野笔记中选择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聚焦于作者希望探讨的话题或者简要地介绍了研究这一话题的普遍方法。然后作者很简要地介绍话题和他自己研究的地点,引出他的论点。作者在主题描写中撰写“话题的论点”,它说明了文本的总体关注点,并且列出待研究的主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论点既没有描述民族志故事中的每一步发展,也没有预见最后的结论,但是这个论点使故事得以展开。最后,作者一般会概述整个文本,说明每个部分的主题观点。

比如,研究“城市高中里的族裔互动动态”的研究者在开头这样向读者介绍他的话题。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为族裔是一种既定分类,人们属于有着特殊文化行为的不同群体。我们认为美国总统是白人,非洲人的魔法就是阿赞德人的巫术,说唱是黑人的音乐,五月五日节是墨西哥人的节日,等等。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描述的是客观的东西,只是简单地陈述世界的“自然事实”。而我们常常因为发现冲突而更加了解族裔这种分类。报纸报道说“韩国”店员向“黑人”女孩开枪,“白人权力”组织正在“犹太人”社区游行。我们会问,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不一样的人们是怎样相处的?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人们的某些聚集是存在的,他们有着不一样的文化。

作者在这段介绍性的文字中指出,人们在谈论族裔时,普遍认为族裔毫无疑问是指自然的存在和不同的“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他在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中提出了他分析族裔的视角: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忽略了族裔是“社会的”:人们通过默认的接纳和排除机制来确定某人、某地或者某物具有某种“特征”。这一过程塑造了巴斯(Barth 1969)在互动中所说的“边界”。这些边界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它们一直在被重新构建、重新确认、互相妥协,甚至被摒弃。因此,族裔在日常生活中是根植于具体情境的地方性现象。

他提出要将族裔视为“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给定的客观“事

实”，比如，族裔受到当地的、互动的对于接纳和排除的妥协。作者通过引用另一位研究者的观点，既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吸引了其他学者，他的“新视角”为学术讨论做出了贡献。

作者接着充实了他的话题，首先介绍了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场景，然后说明了他所使用的数据的类型：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考察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城市高中里的族裔现象和族裔群体。田野笔记的片段描写了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族裔的过程。

接着，他提出了他对于族裔的总体论点，他的论点是阐释性的，认为族裔是在具体情境中“被重新建构和修改的”：

我认为“族裔”在人们的互动中常常在某个情境中被重新建构和修改。这一在各种情境中通过互动完成的“社会过程”就产生了作为分散单元的特定群体，它们拥有不同的文化、符号、方式和物品。因此，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人们怎样“归属以及被归属”（Garfinkel 1967）。

最后，作者以对自己观点的总括结束了介绍部分，简要地描述了自己接下来各个部分的主要观点（参见“撰写主题描写”）。

一些民族志研究者在介绍部分提出分析的观点，接着顺次说明所完成的研究，而另一些研究者会以基于田野笔记的真实描写或者观察开头，在呈现具体细节之后再指出这一事件所体现出来的更加概括的分析问题。比如，上面这位研究者就可能在开头处

描写“社会过程”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这个例子能够重构和保持特定的族裔身份认同:比如,一个极端或者戏剧化的例子就是一个白人学生按照黑人的方式穿戴、走路或者做事。作者可能接着就会转而通过对这个例子的反思提出更加概括的分析性问题。^①

建立与其他研究的联系

作为介绍的一部分(或者紧接在介绍后面的部分),民族志研究者一般会把他们的阐释和所属学科内更加广泛的学术兴趣联系起来。这样,他们就会促使读者更加严肃地对待所讨论的话题。此时,作者还会考虑到未来的读者,选择他们更加熟悉的词语和观点。

比如,下面这位研究者在面向社会学家撰写关于族裔的论文时就采用了社会学家使用族裔这一概念的方式展开讨论。在每一段中,他都提出族裔问题研究的几个特征。虽然他讨论了其他学者的研究,但是只提到那些他在文章主体部分提到的有关族裔的观点。在研究发现中,他提供了有关他所提出的问题的分析观点和田野笔记片断:

马格尔(Marger 1991)提出社会学家以三种指标来区分族裔:特殊的文化特征、社区意识以及归属感。首先,族裔群体拥有将他们自己与其他族裔区分开来的一些特殊的行为特征。第二,族裔群体的成员具有社区意识。“我们”看起来与“他们”截然不同,这样就建立起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族裔群体之间的边界。第三,

^① 这种技巧还可以在民族志中用来介绍每个部分的主题。

族裔的身份往往是先赋的,常常与生俱来。马格尔在说明这些特征时强调了一种可能用来区分族裔的客观标准。族裔可以被看作是各自相关而又独立存在的可资研究的集合体。在美国的很多族裔关系研究中这种方法是非常典型的,所以这篇文章的人口统计数据也是这样分析的。

但是,这种方法虽然能够为宏观的社会研究提供信息,但是对日常生活中的主观看法和动态特征来说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忽视了“族裔身份如何是一种获得的、使用性的人类身份认同的特点”(Lyman 和 Donglass 1973)。在这个方面,族裔是用于战略性地创造和保持自我的一个资源……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族裔群体定义为“一群拥有自我认同而且被其他人认为拥有相同历史风格的参照群体”(Royce 1982)。因此,族裔群体是拥有符号、风格和形式的亚文化。与很多其他亚文化不一样,族裔群体中的成员资格是先赋的。

这些段落简要提出了族裔研究存在的问题。作者在介绍其他研究时没有试图总括所有研究族裔的可能路径,他只选择了那些能够为自己的研究提供背景的研究和观点。因此,作者清晰呈现了自己的研究和其他社会学家的研究之间的关系,而那些社会学家将是民族志的未来读者。

总的来说,民族志研究者既没有回顾有关这一话题的所有“文献”,也没有简单地摘录其他人做的若干项研究。更准确地说,她仔细挑选了一些能够为她的发现提供语境的研究,只讨论那些能够突出她的分析的观点。

介绍场景和方法

作者开始撰写民族志文章之前会介绍研究场景和研究方法。场景和方法既可以作为两个单独的部分,也可以在一个部分里谈到两个问题。

民族志研究者描述场景时会向读者介绍在接下来的民族志中会细细研究的地点、人物和情境。这一描写应该让读者了解场景的物理特征和社会特征,还应该概括重要人物和民族志中的核心步骤或过程;比如,前者可能会考察社区精神健康中心的核心员工和志愿者之间的差异,或者政治行动委员会里经理们和拉票人的不同;后者则会解释客户将怎样参与此项目、基本职责以及挨门拉票的整个结构。

概括了整个场景、人物和常态的同时,作者还应该讨论、强调对于后续分析来说是核心场景的具体特征。比如,某个田野工作者研究的是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为居住者分类或贴标签的行为的本质和后果,他对场景做了两方面介绍。首先,他说明了收容所寻找的游民类型:

我的田野工作地点是洛杉矶商业区的游民紧急收容所,能够容纳 54 人,但是当我在那里时一般平均有 35 个人。收容所的基本服务就是为那些没钱的人提供食宿。工作人员还为那些收容所里的“住户”(就像工作人员称呼他们的那样)找房子以及和政府福利机构交涉。收容所宣称的目标人群是“新的无家可归者”,也就是那些最近刚刚失去房子而被赶到街上的人。这些人与工作人员所说的“长期无家可归者”或者“收容所跳蚤”是不一样的,后者已经在街上住了一阵子,他们会为了找到更加稳定的住处而从一

家收容所搬到另一家收容所……

收容所的另一个接收标准就是：它们除了单身男人以外什么人都可以接收。它们是少有的几家会接收有孩子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之一，工作人员也很为这点而感到骄傲。实际上，主要的住户群体就是带着几个小孩的妇女。

然后作者介绍了一些工作人员，之后将会考察他们的日常工作：

收容所中与挑选住户最相关的工作人员是6个项目助理，4个大约30到50岁的黑人妇女、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白人妇女和一个21岁的白人神学院学生。可能由于项目助理的报酬极低，所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项目助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在那里可以看到收容所二楼的休息室。（一楼是收容所办公室，三楼是住户们的房间。）他们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只有一个项目助理当班，在换班时会有一个小时的重叠时间前后两个项目助理都在。

他接着又介绍了项目助理的日常职责：接电话、挑选潜在住户、做记录，等等。

民族志研究者可能在描写关键特征之后直接概括介绍他如何进入田野以及自己在田野中的参与情况^①，总结他如何接近并了

^① Altheide 和 Johnson (1994:485) 坚持认为“通过对研究者获得经历和信息的动态过程进行评价和交流”提供了人类学研究的“逻辑”或者“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

解民族志所关心的事件和问题。这样做的关键是解释他是如何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最初进入田野的机会的、被研究者如何理解他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或者是不是对此感兴趣、不同的被研究者对他的反应如何。

此时,考虑研究中的不同阶段或者时期往往是很有帮助的,比如,研究者可以比较刚开始进入田野的过程、开始熟悉研究场景和被研究者的过程以及已经建立的长期参与之间的不同。比如,一位在社区精神健康中心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回顾了自己在那里的社会化过程,从最初通过观察和测试她处理重症患者的能力,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参与一些例行活动,到最后被委以重任,完成与客户之间的社区会议。

研究者在陈述他们的方法时应该尽量描述他们的参与有何特点以及他们对自己在具体情境中的角色的优势和局限性的把握。比如,上面这位研究者用以下语句分析了她的角色:

我的身份是“实习志愿者”。在我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我不确定“实习志愿者”到底要做些什么。通过我和工作人员的交往以及自己慢慢进入工作人员的角色,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是较低级别的工作人员,我没有核心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特权。比如,尽管我被鼓励去参加案例审核会议,但是工作人员做出决定的时候并不必考虑我的“看法”。

这样的分析要求研究者反思那些他未能进入的特定互动和事件。比如,一位学生描写了她在妇女参政行动委员会中的参与者角色限制了她的参与和观察拉选票的关键互动:

我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角色。我是点票人,就本身而言,和其他成员至少每周一起出去一次。但是我还是管理人员,他们正打算夏天的时候把我培养成现场负责人。这种情况给了我理想的观察机会,一方面可以了解点票人的感受和想法,同时又可以了解点票人所不知道的信息。但是有时候双重身份又会带来麻烦,点票人会把我当作管理人员,这样就不会向我透露他们的秘密。当我必须作为管理成员出现时(比如做培训的时候)或者问题比较尖锐时,我必须在管理人员和点票人这两个角色之间做出选择,这时就会遇到麻烦……[此外]我很难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田野,因为如果我站在一边观察就意味着我是管理人员,这样对点票人而言我就更是权威而不是同事了。

最后,研究者在呈现和分析所使用的方法及其影响时,最好采用田野笔记片断来证明和支持自己的主要观点。比如,研究社区精神健康中心的研究者写下了下面的田野笔记:第一个例子是展示她在中心的第一周里某个工作人员对她所进行的性格“测试”,第二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她的角色到底与“正规工作人员”有何不同:

当我看到凯西,一个社工,向大卫指着我的方向时我正在和一个病员管理人员打乒乓球。大卫走到我跟前说:“嘿,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要你去阿拉斯加输油管,去拯救世界以及我在堪萨斯州的姐姐。你必须这样做——这是你对国家的责任。你必须拯救世界。”我看到凯西和一些工作人员在角落里咯咯地笑。我说:“大

卫,我很抱歉,这对我来说责任太大了。”大卫说:“你必须拯救世界。”然后就离开了。凯西走过来说:“他很疯狂,对吧?”她大笑起来:“别担心,他是我们见过的最疯狂的人了。”

今天我们应政府要求让病人们彼此提名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诺曼(一个病人)提名我担任副主席。阿伦(艺术治疗师)走进来告诉诺曼:“不能提名卡利娜。她是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不能被提名。”

讨论研究场景和研究过程的复杂性不仅凸显了接下来分析中的核心特征和过程,也提高了最终文本的可信度,还会允许读者评判研究者所进行的观察的质量是否能够支持后面的分析。读者基于这些背景信息可能会更加确认作者是可信的、有根据的。因此,研究者选择那些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田野笔记片断就是为了明确地向读者说明“我当时就在那里,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

撰写结论

民族志的最后部分常常对介绍部分提到的论点进行反思和详细说明。因此,作者在撰写结论时总是自然地与文章开头的介绍相联系。^① 结论常常探讨介绍中提出的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际

① Becker(1986:50)从 Everett Hughes 那里引用了以下建议:“引言就是用来介绍的。如果你还没写完,那你怎么介绍呢?你不知道应该介绍什么。所以先写好,然后你就可以介绍了。”Becker(1986:55)就这一问题给出了如下建议:“你常常到写完草稿时才发现自己所想的東西。你最后所写的东西会让你发现引言中还应该提到的内容,你可以回到引言,加入这些内容,然后在其他段落中就你新发现的关注点所要求的进行最低限度的修改。”

意义。在人类学文章中,介绍论点的文字能够帮助读者关注到作者的核心观点,但是这一观点往往没有像在结论中解释得那么清楚。介绍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理解接下来的分析观点和田野笔记片断,而结论更加清晰地阐明了观点之间的联系,因为此时读者已经读完了整篇民族志,了解了田野笔记片断的细节。也就是说,读者只有读完分析的过程和田野笔记片断之后才能充分理解民族志所讲述的故事。每个部分的主题、观点和讨论不断引领着读者走向结论,作者的论点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协调统一。

民族志研究者为了撰写结论应该回顾已经写好的故事,尤其注意介绍中所提出的故事框架。在大部分情况下,将对主要发现和主题的结论写下来是很有帮助的。这个结论应该大致重述文章的论点,然后用简短准确的语句说明每个部分是如何对这个论点做出贡献的。在有些情况下,研究者可能会以总结作为结论的开头。而在其他情况下,他可能会直接谈其他问题,而不做总结。但是即使研究者不打算把总结作为结论的一部分,撰写总结对他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它促使作者从撰写具体观点和部分的细致琐碎工作转向对文章整体结构的评论,整体评价研究者一开始承诺的东西与现在他真正达到的东西;这一评价促使作者思考研究是否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不论作者是否进行总结,结论部分总会讨论文章的论点。田野研究者可能采用以下方式来进行讨论:(1)根据已经提供的材料对观点进行拓展或者修正;(2)把论点和相关文献中出现的一些更加普遍的理论或者现实问题联系起来;(3)对论点、方法或者与之相关的假设进行评论。作者可能只会选用以上方式之一,或者可能结合两种或者三种方式来撰写篇幅更长、分析更加细致的

结论。

下面这项田野研究的结论部分就采用了第一种方法,这项研究关注的是照料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照看者是如何处理与之相关的污名的。这项研究的介绍突出了戈夫曼(1971)所提出的“家属信息规则”,比如,家庭成员会把污名的信息(丢脸的信息)控制在家庭内部,不让外人知道。作者在结论中又回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当病人的症状不断加重时家庭成员遵守这条信息规则的能力就会发生急剧变化:

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照看者会尽可能长时间地与家庭成员一起保守秘密,在她或者他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遵守家庭信息规则,尽量不一开始就向身边的人说起这件事。但是,照看者在很多情况下会发现她或者他不能指望老年痴呆症患者意识到什么是丢人的,此时她或者他就会不愿意或者不能够继续隐瞒这件事或减少这件事所带来的尴尬。因此,家庭信息规则就会失灵,照看者会采取更加直接的控制。

家庭照看者越来越依赖于一些管理措施来控制病人,既在私人家庭内部也在外界社会。而且,一旦老年痴呆症患者不能继续与照看者好好配合,那么照看者就会逐渐倾向于寻求外界帮助,因此就会把这个信息泄露出去。

作者在这里提出虽然照看者一开始会试图遵守家庭信息规则,但是这样做需要得到老年痴呆症患者的配合。当照看者认为这种合作无法获得时,她或者他就更有可能把这个丢人的消息告诉外人,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来控制这个病人。这样,作者就在结

论中说明了他的发现如何修正了戈夫曼的概念,指出了原先隐藏在家庭信息规则之下的未被注意的情况,而且提出这些情况可能会促使家庭成员违反这个法则。

作者还可能拓展论点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探讨论点各个部分之间的理论联系。比如,在—项关于前精神病患者疗养院的研究的最初的论点中,作者提出了疗养院中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居住者对工作人员的依赖性以及居住者积极影响工作人员对他们的看法的能力。作者在结论中更加具体地分析了这些关系,把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势联系起来,构成—种持续存在的恶性循环。居住者在工作人员的权力面前感觉很无助,他们可能会尝试着与工作人员建立理解、保持善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参加治疗环节以及工作人员组织的其他活动。由此,他们得到了工作人员的支持和保护,但是也更加直接地依赖于那些“资助”他们的工作人员。这样,这段分析就把—开始看起来分离的、确实相互矛盾的模式联系起来,指出了带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居住者争取降低自己的脆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依赖性的努力最后反而加重了自己的依赖性。通过这种方式,作者讲述了这样—个民族志故事,从最开始提出相互矛盾的趋势,然后深入讨论了分析观点和相应片段,最后得出结论,把这些线索糅合在—起。

第二,研究者在结论中可能会把民族志的论点和相关学科文献中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在老年痴呆症患者家庭照看者的研究中,作者紧接着上面引用的片段之后,把照看者与老年痴呆症患者合谋和局外人合谋,与异常社会学中更加普遍的问题联系起来:家庭照看者在什么情况下会接受、忍耐并且—直关照—位处于污名化境遇或者具有污名化行为的家庭成员?在什么情况下会反对、

排斥、暗中拒绝这个家庭成员？最近一篇题为“走向有关接受的社会学：异常研究的另一面”（Bogdan 和 Taylor 1987）的文章提到了这一问题，研究者就在阐释自己的观点时引用了文章中的文字：

认识到家庭照看者处理污名的两个阶段，其一为老年痴呆病人保守秘密，其二转而与向外人求助，将关于接受的社会学和关于拒绝的社会学结合起来了（Bogdan 和 Taylor 1987）。

作者在此提出了将关于人们为什么、怎样忍受异常行为的社会学理论和拒绝异常行为的理论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这些反应不需要是截然相反的、非此即彼的行为；一些形式的排斥正是出于照顾他人的长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亲密的家庭成员再也不“指望”以容忍的态度来支持家庭照看者。作者认为当家庭照看者对于是否对老年痴呆症患者彻底排斥而陷入深深的矛盾感情时，这种接受和排斥的结合常常被凸现出来：

很多照看者由于需要对病人投入越来越多的关照而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他们监视病人或者采用强制手段时，这样说道：“我讨厌自己唠叨的语气。”或者一位家庭照看者谈到自己控制妻子时说：“我没有这个权利。”

在上述情况中，“接受”这个概念延伸到一些排斥的行为，这些排斥行为是勉强的，带着深深的遗憾。

撰写总结的第三种选择是停下来退一步反思民族志，反思它的方法、假设、口吻或者结论。作者在对前精神病患者疗养院的生

活的研究中,不仅描写了工作人员和居住者之间的关系,还谈到了居住者之间如何建立重要的社会支持关系。民族志中有一部分专门探讨了居住者常常互相交换东西的方式——香烟、食物、少量的钱。作者提出这些交换以及随之而建立和维持起来的关系能够帮助居住者面对长期的艰苦。但是她在结论中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居住者交换的“策略”可以被视为“过分理性”的游戏式交换。她认为为了完善这一观点,需要考察关心和感情的因素、交换的特点以及这些交换在很多居住者之间形成分享和归属感中所起到的作用。之前的策略性分析实际上破坏了这些关键的过程。

在使用以上方法撰写结论时,民族志研究者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以清晰细致的形式向未来读者呈现他的一些经历、观察和观点的意义。研究者通过将田野笔记置于分析过程的中心位置,往往能够获得与既有的学科解释和理论不完全契合的理解和联系。结论中提出的经过修正的、更加准确的论点更可能体现当事人的观点,从而以能够说服其他学者的方式展现当地生活中有趣的(以及具有理论重要性的)事情。因此,结论中更加清晰的观点不仅呈现了研究者的所见所闻,而且进一步澄清了已知的问题或者提出了全新的视角。

反思:在被研究者和读者之间

田野工作者在为广大读者撰写民族志的过程中,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呈现当地世界以及它的意义,另一方面要用他们自己在田野中的经历与有着不同关注点的学者们对话。研究者撰

写民族志时会自觉地偏重于后者；而如果能够经常回到田野笔记以及由田野笔记引发的记忆，他就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前者的重要性。

虽然田野中互相迁就的关系不断影响着研究者的理解，但是民族志就是研究者笔下的事件的版本。绝大部分研究者通常能够接受作者以他最好的方式来呈现他人（以及他与他们相处的经历）。从这种意义上看，研究者公开地具有并且使用了作者的特权。即使在一些情况下，研究者会把部分田野笔记让当地人看或者让他们对一些分析进行评价，作者对文本本身以及多大程度上展示当事人的评价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参见 Bloor 1988；Emerson 和 Pollner 1988；Rochford 1992）。不管做了多么深入的参与、了解当地人意义的努力以及为了呈现事实的反思，最终的文本往往会变成一个较为线性的、被作者赋予了明确规定与控制的故事。^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田野工作开始，一直到撰写文章——研究者对田野经历形成了复杂的观点。但是，民族志文本提供了最重要的视角——他自己在写作时的视角。只有当读者的理解和田野工作者的阐释不一样的时候，阐释田野笔记的很多方式才明晰起来。但是在写作中将这不同的可能性长存于头脑中，可能会使作者无所适从，不能讲述任何故事。因此，研究者应该保留作者本人对田野经历的视角。因此，由于文本取决于作者，他在写作

① 撰写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民族志的努力，如 Krieger (1979a, 1979b, 1983) 和 Crapanzano (1980)，以及 Reinharz (1992) 提出的女性主义形式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局限性。比如，Krieger (1979a) 所作的“嬉皮资本主义”虽然在文体上有着很大创新，但是却被认为既缺乏“目的性”，也缺乏安排得当的情节描写；这些特点“迫使读者自己寻找阐释的框架”（Atkinson 1990: 125—126）。

时就会采用权威的口吻。

但是,田野研究者有时会不经意地提到他人日常生活的片断。读者也可能读出作者没有打算阐述的东西。实际上,读者在文本撰写中的参与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读者更加直接地参与到所描写的社会场景,然后使人信服地展开故事线。另一方面,他们还可以更加方便地评价作者的分析,从田野笔记中得出不一样的洞见。

即使读者面对的是作者写作、选择和安排的田野笔记,他们最终也能够形成自己的感受。研究者出于修辞效应和意义、概念功能的考虑来挑选田野笔记,试着提前提出读者可能会想到的阐释。原始田野笔记依然存在于分析之中,让任何读者都可以近距离地倾听当事人的声音,感同身受地经历他们的行为,想象其他的阐释。最后,看来读者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

第八章 结论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首先考察了田野研究者如何将亲身经历和观察写成田野笔记的过程,然后讨论了如何运用田野笔记来讲述民族志故事的方法,探索了若干帮助研究者基于田野笔记撰写民族志的步骤。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希望就学会撰写和使用田野笔记,以及如何更广泛地将这些写作过程应用于田野研究中进行进一步反思。

如我们所见,民族志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选择;通过这些选择,他将经历和观察转换成文本和数据。这些选择包括决定写什么——记录和描写看护老年痴呆症的家庭成员付出的努力,学校操场上学生按照不同族裔三五成群的场景,还是扎伊尔村庄里听众们参与讲故事的情况。这些选择还包括怎样描写观察到的或者经历过的事情的复杂决定。如同我们强调的那样,撰写田野笔记不是简单地将看到的细节写在纸上,而是研究者遵循一系列写作惯例,在纸面上生动地呈现角色,戏剧化地描写言行,有效地传达当事人的意义世界。

当然,民族志研究者做这些决定时并不总是有意识的;因为当前的工作是把描写和叙述写在纸面上,所以有经验的研究者可能会下意识地使用技巧、做出选择。但是我们相信,如果研究者能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选择,那么这将有助于提高整个田野研究的质量。首先,提高对写作的认识会帮助研究者创作出更加丰富、多

样、有用的田野笔记。随着研究者对写作惯例不断熟悉并熟练运用,他们更可能抓住重要的细节、创作生动的形象、对谈话和事件进行无偏的描写。田野研究者将在选择写作方式时具有相当大的灵活度。他将会了解并采用更有利于发挥自己长处的选择:使用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从特定视角还是从多个视角描写场景,以及用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描写人物对话。

另外,增强对写作选择的意识还会促使研究者在田野中更加关注细节。通过撰写田野笔记来回忆场景会使研究者成为一个更好的观察者。当研究者具备写作选择的知识时,他会对可能有价值记下来的言行很敏感。另外,在撰写过程中在不同的视角中进行选择的研究者,在观察时更不可能混淆自己的视角和别人的视角;因此,他将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并且呈现他人的想法。

此外,在基于田野笔记构建最后的民族志文本时具备对写作选择的敏感度,将促使田野研究者创作出更加扣人心弦的,更加详尽的民族志故事。比如,作者变得不仅对田野中的声音保持敏感,而且还对未来读者的期望有清晰的认识。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对当事人的声音进行转述、阐释,形成顺应于未来读者的分析性语言,来突出特定问题、理论以及可能吸引读者的任何关注点。因此,田野研究者在创作基于田野笔记的最终文本时,虽然会将当事人的言语片段纳入其中,但是同时也意识到他始终在把握和编排这些片断;他在民族志故事中对当事人的言行进行重构和重新排序。如果他对当事人的关注点和意义保持敏感,那么他就能够直接开始重现这些意义的工作——比如,针对读者的兴趣点将这些意义写得“有趣”或者“无趣”。因此,读者从一份好的民族志中能够听到两种声音和谐并存,或者至少不会产生不和谐的声音。民族志

应该使得田野中的声音可以以它们独特的方式被展现出来,同时,又能够以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提出他们心中的问题、理论和兴趣点。^①

通过上述途径增强研究者对写作选择的意识可以让他更加深入地理解写作所具有的力量以及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者肯定能够意识到他不是简单记录看到的事件,而是在通过写作创造事实和意义。他在撰写田野笔记时并不是简单地将那些瞬间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而首先将观察到的瞬间塑造成场景、对话和行为。然后,当他将田野笔记重新加工,并且整理成最终的民族志故事时,他也不是简单重述发生过的事情;相反,他是通过重构“发生的事情”来证明某种模式或者提出某一观点。在为那些不熟悉田野的读者阐述田野笔记的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构建出某种版本的事件。因此,田野研究者在撰写和分析田野笔记时,不断深入地认识到自己在讲述被研究者的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担负的责任;他在写作过程中重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② 通过这样做,他不断被提醒:写作如何构建了意义和知识。

从这种意义上看,对写作选择的意识促使研究者重视田野研

① 传统民族志的问题之一就是单方面的安排:由于民族志几乎都是写给学者阅读,都在学术圈内部交流,所以那些自己的生活和声音被描写出来的被研究者几乎没有机会公开阅读民族志并予以回应,评价研究者的作品。现在,很多田野研究者(如 Tedlock 1979; Handler 1985; Bloor 1988; Emerson 和 Pollner 1988, 1992)主张将民族志拿回去给被研究者阅读,不只是为了“证实”那些描写,更是在被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就这些描写的意义和重要性开展积极的对话。这种“对话”并不旨在达成共识,而是凸显研究者的兴趣点和当事人的兴趣点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之处。(参见 Emerson 和 Pollner 1992: 95—96)。

② Johnson 和 Altheide (1993: 105) 在总结这些相互矛盾的要求时,强调田野研究者/作者必须努力“探明自己在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中的位置,接受权力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不可靠性以及局限,基于有联系的主题讲述‘你的’故事,说清楚你已经因为对材料的关注、选择、描写和阐释,而造成了偏差”。

究的反思性。所谓反思性就是研究者意识到对现实的描述并不是现实,自己在描述时就已经创造或者构建了所描写的东西。因此,“反思性这个概念意味着文本并不能简单地、显而易见地呈现事实。文本本身就暗含着构建事实的工作”(Atkinson 1990:7)。

对民族志的批判性分析越来越集中于反思性(比如,Clifford和 Marcus 1986; Atkinson 1990; Van Maanen 1988),它们关注民族志的修辞结构或者研究者没有明确说明的政治、文化预设,考察研究者如何代表着另一种文化,提出特定的分析路径,或者在最终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或者讲述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是,这些分析自身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们含蓄地暗示最终的民族志完全是研究者为了忠于田野经历所进行的原创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建构。虽然经过润色的民族志部分来源于研究者对田野经历的回忆和反思,但是它们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根据经历的事实写出来的田野笔记。最终的民族志基本上不可能是研究者完全重新写出来的,而往往是在之前写的田野笔记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挑选(或者删减)田野笔记片断,在片断之间建立联系,将片断整合成人称一致的连贯故事,而这个过程并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或者重视得还不够。这样,绝大部分反思性分析忽视了田野笔记在撰写最终民族志时所起到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这种反思性分析不仅忽视了研究者撰写最终民族志时对田野笔记的使用,也没有重视研究者最初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但是,即使这些最初将田野经历和观察转换成文本的过程与撰写最终经过润色的民族志的过程一样,也包括了对社会事实的重构。虽然研究者对民族志质量的反思意识在不断增长,但是基本上没有涉

及日常田野笔记的撰写,而恰恰是这些田野笔记经加工之后形成了最终的民族志。

为了弥补反思性分析和实践之间的空白,我们必须审视研究者如何撰写田野笔记:他们如何撰写、处理以及最后将田野笔记整合成面向更多读者的文本。比如,在田野笔记中对人物、事件和场景的描写使作者对这些事情有一个明确且实质性的把握。最终,作者不是简单地坐下来,把他头脑中的东西直接搬到纸面上。更准确地说,他构建了他的描述:他必须决定从哪里开始写起,哪些写在前面,哪些写在后面,保留什么而省略什么。在写作过程中,他要决定使用什么人的视角;某人或者某事的重点是什么;哪些内容是次要的,可以不纳入笔记的。由于读者并不能了解最真实的场景而只能依赖于作者的文本,因此这些决定对读者来说更为重要。从读者的视角来看,这些描写他人生活方式的文本在自己面前创造了一个社会世界。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集中讨论了几种写作方法,这些方法体现了我们对田野研究的反思性特点的重视。首先,由于研究者是在田野中的互动中创作了他的文本,因此我们提倡研究者在写田野笔记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纳入其中。通过这种方式,撰写民族志的整个过程就能被保留下来,更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反思性能够加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读者会感受到作者、写作过程和作品是浑然一体的”(Myerhoff 和 Ruby 1982:6)。需要补充的是,在这样的写作方式中,研究者不断提醒自己他所了解和记录的东西产生于特定的背景,受到自己所运用的方法和参与方式的影响。

第二,我们主张以能够有效捕捉和呈现当事人意义世界的方式来撰写田野笔记——被研究者的视角、理解、关注点和声音。为

了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作者必须清楚理解他实际上是在重现当事人的意义世界,创造格尔兹(Geertz 1973)所说的“意义的意义”或者“阐释的阐释”。

但是一旦我们意识到当事人的意义世界并不是意义本身,而是由当事人呈现出来的意义,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当事人的意义世界优于田野研究者可能采用的任何呈现方式?这里,我们再次强调田野笔记和民族志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自己的经历、观点和理论取向的影响。但是研究者的视角和理论取向并不是事先给定的;而不断受到他与他所希望理解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和形塑。作为当地社会的参与者,并且与当地人有了一定的联系,研究者成为被研究世界的一员,而不是中立的、超然的观察者。在与当地人建立联系的过程中,研究者必然需要理解他们的意义体系,以及那些要在当地社会中自处就必须知道和理解的东西。研究者越参与到他人的社会世界中就越会将自己的预设和理解让步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因此,研究者在田野笔记中描写并反思他在与被研究者互动的过程中所了解的或者与被研究者一起构建的意义世界。由此,田野笔记反映了研究者通过理解当地人社会世界的逻辑所得到的理解,这种逻辑之后会部分地构成作者观察和理解当地世界的工具。最后,他写出来的文本必然是以他们的版本为基础的他的版本(加入了理论思考以及其他考虑)。但是,研究者构建的这一版本同时受到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观点、逻辑、对世界的建构方式的影响。因此,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研究者就有可能不仅仅通过自己的眼光,还可以通过被研究者眼光来理解他们之间的互动。

反思性对我们如何理解他人的世界以及如何理解研究本身都

很重要。在理解他人世界时,反思性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人物之外的变量和结构如何影响他人的世界,而且帮助我们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和建构意义世界的。因此,当我们作为研究者时,有意识地反思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决不可能身处他人的世界之外来进行描写。这些描写受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和塑造。因此,通过培养自身的反思能力,我们在理解被研究者的同时也在理解自己的研究。

参考书目

- Abrams, M. H. 1988.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5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Adler, Patricia A., Peter Adler, and E. Burke Rochford, Jr. 1986.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 in Field Research." *Urban Life* 14:363-76.
- Agar, Michael H. 1982. "Whatever Happened to Cognitive Anthropology: A Partial Review." *Human Organization* 41:82-86.
- Altheide, David L., and John M. Johnson. 1994. "Criteria for Assessing Interpretive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485-99.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Anderson, Elijah. 1990.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tkinson, Paul.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 Barth, Fredrik, ed.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 Batchelder, D., and E. Warner. 1977. *Beyond Experience*. Brattleboro, Vt.: The Experiment Press.
- Bauman, Richard. 1992a.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ontextual Studies of Oral 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ed. 1992b.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A Communications Centered Handboo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Howard S. 1986.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How to Start and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Amos, Dan. 1982. "Analytical Categories and Ethnic Genres." In Dan Ben-Amos, *Folklore in Context: Essays*, 38-64. New Dehli: South Asian Publishers.
- Berger, Bennett M. 1981. *The Survival of a Counterculture: Ideological Work and Everyday Life among Rural Communar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iernacki, Patrick. 1986. *Pathways from Heroin Addiction: Recovery with Treat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ittner, Egon. 1988. "Realism in Field Research." In Robert M.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149–55.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 Bleich, David. 1993. "Ethn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Literacy: Prospects for Socially Generous Research." In Anne Ruggles Gere, ed., *Into the Field: Sites of Composition Studies*, 176–92.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Bloor, Michael J. 1988. "Notes on Member Validation." In Robert M.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156–72.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 Blum, Nancy S. 1991. "The Management of Stigma by Alzheimer Family Caregiv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263–84.
- Blumer, Herbert.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ogdan, Robert, and Steven J. Taylor. 1987. "Toward a Sociology of Acceptance: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udy of Deviance." *Social Policy* 18:34–39.
- Briggs, Charles L. 1986. *Learning How to Ask: A Sociolinguistic Appraisal of the Role of the Interview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8. *Competence in Performance: The Creativity of Tradition in Mexican Verbal Ar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rown, Richard H. 1977. *A Poetic for Sociology: Toward a Logic of Discove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gess, Robert G. 1982. *Field Research: A Sourcebook and Field Manual*.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 1984. *In the Field: An Introduction to Field Research*.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Cahill, Spencer E. 1985. "Meanwhile Backstage: Public Bathrooms and the Interaction Order." *Urban Life* 14:33–58.
- Camitta, Miriam. 1990. "Gender and Method in Folklore Fieldwork." *Southern Folklore* 47:21–31.
- Cassell, Joan. 1980. "Ethical Principles for Conducting Fieldwork."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2:28–41.
- Charmaz, Kathy. 1988.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An Ex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Robert M.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109–26.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 . 1991. *Good Days, Bad Days: The Self in Chronic Illness and Tim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Cicourel, Aaron V. 1968.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New York: John Wiley.
- . 1974. *Cognitive Sociology: Language and Mean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Cicourel, Aaron V., and John I. Kitsuse. 1963. *The Educational Decision-Makers*.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 Clarke, Michael. 1975. "Survival in the Field: Implicat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Field 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95-123.
- Clifford, James. 1983. "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 *Representations* 1:118-46.
- . 1986.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98-12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90. "Notes on (Field)notes." In Roger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47-7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rbin, Juliet M., and Anselm Strauss. 1988. *Unending Work and Care: Managing Chronic Illness at Hom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Cosentino, Donald. 1982. *Defiant Maids and Stubborn Farmers: Tradition and Invention in Mende Story Performa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apanzano, Vincent. 1980.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nzin, Norman K., and Yvonna C. Lincoln,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DeVault, Marjorie L. 1990. "Talking and Listening from Women's Standpoint: Feminist Strategies for Interviewing and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37:96-116.
- . 1991.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amond, Jared. 1989. "The Ethnobiologist's Dilemma." *Natural History*, no. 6 (June): 26-30.
- Diamond, Timothy. 1993. *Making Gray Gold: Narratives of Nursing Home C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ngwall, Robert, J. Eekelaar, and T. Murray. 1983.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State Intervention and Family Lif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Douglas, Jack D. 1976. *Investigative Social Research: Individual and Team Fiel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Ellis, Carolyn. 1991. "Sociological Introspec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Symbolic Interaction* 14:23-50.
- Ellen, R. F., ed. 1984.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London: Academic Press.
- Emerson, Robert M. 1987. "Four Ways to Improve the Craft of Field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6:69-89.
- . 1989. "Tenability and Troubles: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mmodative Relations by Psychiatric Emergency Teams." In Gale Miller and James A. Holstein,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roblems: A Research Annual*, vol. 1, pp. 215-37.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 ed. 1988.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 Emerson, Robert M., and Sheldon L. Messinger. 1977. "The Micro-Politics of Trouble." *Social Problems* 25:121-34.
- Emerson, Robert M., and Melvin Pollner. 1976. "Dirty Work Designations:

- Their Features and Consequences in a Psychiatric Setting." *Social Problems* 23:243–255.
- . 1988. "On the Uses of Members' Responses to Researchers' Accounts." *Human Organization* 47:189–98.
- . 1992. "Difference and Dialogue: Members' Readings of Ethnographic Texts." In Gale Miller and James A. Holstein,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roblems: A Research Annual*, vol. 3, pp. 79–98.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Erikson, Kai T. 1967. "A Comment on Disguised Observation in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12:366–73.
-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etterman, David M. 1989.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Fine, Elizabeth C. 1984. *The Folklore Text: From Performance to Print*.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 Flower, Linda S. 1988. "The Construction of Purpose in Writing and Reading." *College English* 50:528–50.
- Forester, John. N. d. "Notes on Writing in and after Graduate School." Unpublished paper.
- Frake, Charles O. 1964. "Notes on Queries in Ethnograph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 no. 3, pt. 2: 132–45.
- . 1975. "How to Enter a Yakan House." In Mary Sanchez and Ben Blount, eds.,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of Language Use*, 25–4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Fretz, Rachel I. 1987. *Storytelling among the Chokwe of Zaire: Narrating Skill and Listener Responses*. Ph.D. diss., Folklore and Mythology Progr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 1994. "Through Ambiguous Tales: Women's Voices in Chokwe Storytelling." *Oral Tradition* 9:230–50.
- . forthcoming. "Answering-in-Song: Listener Responses in Yishima Performances." *Western Folklore*.
- . N. d. "Storytelling as Doing: Constructing Each Other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Garfinkel, Harold, and Harvey Sacks. 1970. "On Formal Structures of Practical Actions." In J. C. McKinney and E. A. Tiryakian, eds., *Theoretical Sociology*, 338–66.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 Gearing, Frederick O. 1970. *The Face of the Fox*. Chicago: Aldine.
- Geer, Blanche. 1964. "First Days in the Field." In Phillip Hammond, ed., *Sociologists at Work*, 322–44.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3–30.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76.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K. H. Basso and H. A. Selby, eds., *Meaning in Anthropology*, 221–37.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 .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orges, Robert A. 1981. "Do Narrators Really Digress? A Reconsideration of 'Audience Asides' in Narrating." *Western Folklore* 40:245–52.
- Georges, Robert A., and Michael O. Jones. 1980. *People Studying People: The Human Element in Field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laser, Barney 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Calif.: Sociology Press.
- Glaser, Barney G., and Anselm L. Strauss.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 .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 Goffman, Erving. 1961. *Asylums*.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 . 1971.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 1989. "On Field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8:123–32.
- Golde, Peggy, ed. 1970. *Women in the Field: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s*. Chicago: Aldine.
- Goldstein, Kenneth S. 1964. *A Guide for Field Workers in Folklore*. Hatboro, Penn.: Folklore Associates.
- Gottlieb, Alma, and Philip Graham. 1993. *Parallel Worlds: An Anthropologist and a Writer Encounter Africa*.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 Gusfield, Joseph. 1976. "The Literary Rhetoric of Science: Comedy and Pathos in Drinking Driver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16–34.
- Hammersley, Martyn.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 Hammersley, Martyn, and Paul Atkinson. 1983.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London: Tavistock.
- Handler, Richard. 1985. "On Dialogue and Destructive Analysis: Problems in Narrating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1:171–82.
- Harper, Douglas. 1992. "Small N's and Community Case Studies." In Charles C. Ragain and Howard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139–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ritage, John.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ughes, Everett C. 1960. "The Place of Field Work in Social Science." In Buford H. Junker, *Field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v–xv.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71. *The Sociological Eye: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Aldine.
- Hunt, Jennifer. 1985. "Police Accounts of Normal Force." *Urban Life* 13:315–41.
- Hymes, Dell. 1991. "In Vain I Tried to Tell You." *Essays in Native American Ethnopoetic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Jackson, Bruce. 1987. *Field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Jackson, Jean E. 1990a. "'Deja Entendu': The Liminal Qualities of Anthropological Fieldno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8–43.
- . 1990b. "'I Am a Fieldnote': Fieldnotes as a Symbol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Roger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3–3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Michael. 1982. *Allegories of the Wilderness: Ethics and Ambiguity in Kuranko Narra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John M., and David L. Altheide. 1993. "The Ethnographic Ethic." In Norma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4, pp. 95–107.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Johnstone, Barbara. 1990. *Stories, Community, and Place: Narratives from Middle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Jordan, Manuel. 1993. "Le Masque comme processus ironiques: Les Makishi du Nord-Ouest de la Zambie." *Anthropologie et Société* 17:41–61.
- Jules-Rosette, Bennetta. 1975. *Vision and Realities: Aspects of Ritual and Conversion in an African Church*.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unker, Buford H. 1960. *Field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rp, Ivan, and Martha B. Kendall. 1982. "Reflexivity in Field Work." In Paul F. Secord, ed., *Explaining Human Behavior: Consciousness, Human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249–73.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Katz, Jack. 1988. "A Theory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e System of Analytic Fieldwork." In Robert M.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127–48.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 Kleinman, Sherryl. 1991. "Field-Workers' Feelings: What We Feel, Who We Are, How We Analyze." In William B. Shaffir and Robert A. Stebbins, eds., *Experiencing Fieldwork: An Inside 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184–95.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Krieger, Susan. 1979a. *Hip Capit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 1979b. "Researc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xt." In Norma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2, pp. 167–87.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 1983. *The Mirror Dance: Identity in a Women's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runo, and Steve Woolgar.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Lawless, Elaine. 1993. *Holy Women, Wholly Women: Sharing Ministries through Life Stories and Reciprocal Ethnograph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ederman, Rena. 1990. "Pretexts for Ethnography: On Reading Fieldnotes." In Roger E.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71–9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ofland, John, and Lyn H. Lofland. 1995.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3rd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 Lofland, Lyn H. 1985. *A World of Strangers: Order and Action in Urban Public Space*.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 Lutkehaus, Nancy. 1990. "Refractions of Reality: On the Use of Other Ethnographers' Fieldnotes." In Roger E.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303–2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yman, Stanford M., and William A. Douglass. 1973. "Ethnicity: Strategies of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Impression Management." *Social Research* 40:344-65.
- Lynch, Michael. 1985. *Art and Artifact in Laboratory Science: A Study of Shop Work and Shop Talk in a Research Laborat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arcus, George E. 1986. "Afterword: Ethnographic Writing and Anthropological Careers."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262-6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cus, George E., and Richard Cushman. 1982. "Ethnographies as Tex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1:25-69.
-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M. Fis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ger, Martin. 1991.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 Matza, David. 1969. *Becoming Devia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Maynard, Douglas W. 1984. *Inside Plea Bargaining: The Language of Negotiation*. New York: Plenum.
- . 1989. "On the Ethnography and Analysis of Discourse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n James A. Holstein and Gale Miller,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roblems*, 1:127-46.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Mehan, Hugh, Alma Hertweck, and J. Lee Meihls. 1986. *Handicapping the Handicapped: Decision Making in Students' Educational Care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s, Margaret A. 1990.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Folklorists: Performance, Interpretive Authority, and Gender." *Southern Folklore* 47:5-15.
- Mishler, Elliot G. 1979. "Meaning in Context: Is There Any Other Kind?"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49:1-19.
- Moerman, Michael. 1969. "A Little Knowledge." In Stephen A. Tyler, ed., *Cognitive Anthropology*, 449-6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Myerhoff, Barbara, and Jay Ruby. 1982. "Introduction." In Jay Ruby, ed., *A Crack in the Mirror: Reflexive P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1-35.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Okpewho, Isidore. 1992. *African Oral Literature: Backgrounds, Character, and Commun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Ong, Walter J. 1975. "The Writer's Audience is Always a Fiction." *PMLA* 90:9-21.
- Oring, Elliott. 1986. "Folk Narratives." In Elliott Oring, ed., *Folk Groups and Folklore Genres: An Introduction*, 121-45.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Ottenberg, Simon. 1990. "Thirty Years of Fieldnotes: Changing Relationships to the Text." In Roger E.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139-6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erl, Sondra. 1980. "Understanding Composing."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31:363-69.
- Pfaffenberger, Bryan. 1988. *Micro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Pollner, Melvin, and Robert M. Emerson. 1988. "The Dynamics of Inclusion

- and Distance in Fieldwork Relations." In Robert M.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235–52.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 Pollner, Melvin, and Lynn McDonald-Wikler.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Unreality: A Case Study of a Family's Attribution of Competence to a Severely Retarded Child." *Family Process* 24:241–54.
- Psathas, George, and Timothy Anderson. 1990. "The 'Practices' of Transcription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Semiotica* 78:75–99.
- Reinharz, Shulamit. 1979. *On Becoming a Social Scientist: From Survey Research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Experiential Analysi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 T. J., and Lyn Richards. 1994.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445–62.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Richardson, Laurel. 1990. *Writing Strategies: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Newber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 1994.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516–29.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Riessman, Catherine Kohler. 1987. "When Gender is Not Enough: Women Interviewing Women." *Gender and Society* 1:172–207.
- Rochford, E. Burke, Jr. 1985. *Hare Krishna 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 1992. "On the Politics of Member Validation: Taking Findings Back to Hare Krishna." In Gale Miller and James A. Holstein,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roblems: A Research Annual*, vol. 3, pp. 99–116.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Royce, Anya P. 1982. *Ethnic Identity: Strategies of Divers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anjek, Roger, ed. 1990a.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90b. "Preface." In Roger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xi–vii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90c. "A Vocabulary for Fieldnotes." In Roger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92–12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90d. "The Secret Life of Fieldnotes." In Roger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187–27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chatzman, Leonard, and Anselm Strauss. 1973. *Field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a Natural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Schutz, Alfred. 1964. *Collected Papers*, vol. 2: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Schwartz, Barry. 1975. *Queuing and Waiting: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ccess and Dela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wartz, Howard, and Jerry Jacobs. 1979. *Qualitative Sociology: A Method to the Madnes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haw, Linda L. 1988. *Board and Care: The Everyday Lives of Ex-Mental Patients in the Communit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 1991. "Stigma and the Moral Careers of Ex-Mental Patients Living in Board and Ca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285–305.
- Sherzer, Joel. 1983. *Kuna Ways of Speaking: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 1992.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In Richard Bauman, ed.,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A Communications Centered Handbook*, 76–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avid A., and Leon Anderson. 1993. *Down on Their Luck: A Study of Homeless Street Peopl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pradley, James P. 1979.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tacey, Judith. 1991.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In Sherma B. Gluck and Daphne Patai, eds., *Women's Words*, 111–19. New York: Routledge.
- Stahl, Sandra Dolby. 1989. *Literary Folkloristics and the Personal Narrati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toddard, Kenneth. 1986. "The Presentation of Everyday Life: Some Textual Strategies for 'Adequate Ethnography'." *Urban Life* 15:103–21.
- Stoller, Paul. 1989. *The Taste of Ethnographic Things: The Senses in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tone, Ruth M., and Verlon L. Stone. 1981. "Event, Feedback, and Analysis: Research Media in the Study of Music Events." *Ethnomusicology* 25:215–25.
- Strauss, Anselm L.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auss, Anselm L., and Juliet Corbin.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Sudnow, David. 1967. *Passing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y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Taylor, Steven J., and Robert Bogdan. 1984.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Search for Meanings*. 2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Tedlock, Dennis. 1979. "The Analogical Tradi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Dialogical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35:387–400.
- . 1983. *The Spoken Word and the Work of Interpret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Tesch, Renata.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ypes and Software Tools*. London: Falmer Press.
- Thorne, Barrie. 1980. "'You Still Takin' Notes?' Fieldwork and Problems of Informed Consent." *Social Problems* 27:284–97.
- . 1993. *Gender Play: Girls and Boys in School*.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Van Maanen, John. 1978. "The Asshole." In Peter K. Manning and John Van Maanen, eds., *Policing: A View From the Street*, 221–38. Santa Monica, Calif.: Goodyear.

- .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lker, Anne Graffam. 1986. "The Verbatim Record: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In Sue Fisher and Alexandra Dundas Todd, eds., *Discourse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Medicine, Education, and Law*, 205–22.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 Warren, Carol A. B. 1980. "Data Presentation and the Audience: Responses, Ethics, and Effects." *Urban Life* 9:282–308.
- . 1988. *Gender Issues in Fiel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Wax, Murray L. 1977. "On Fieldworkers and Those Exposed to Fieldwork: Federal Regulations and Moral Issues." *Human Organization* 36:321–28.
- . 1980. "Paradoxes of 'Consent' to the Practice of Fieldwork," *Social Problems* 27:272–83.
-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William A. 1986. "Documenting Folklore." In Elliott Oring, ed., *Folk Groups and Folklore Genres: An Introduction*, 225–54.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Wiseman, Jacqueline P. 1970. *Stations of the Lost: The Treatment of Skid Row Alcohol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Wolcott, Harry F. 1990.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Wolf, Margery. 1992.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ocom, Margaret R. 1990. "Fieldwork, Gender, and Transformation: The Second Way of Knowing." *Southern Folklore* 47:33–44.
- Yoder, P. Stanley, ed. 1982. *African Health and Healing Systems: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Los Angeles: Crossroads Press.
- Young, Jane M. 1988. *Signs from the Ancestors: Zuni Cultural Symbolism and Perceptions of Rock Art*.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